



廬山會議實錄

「敏感作家」的表態

——香港版代序

「敏感作家」奇怪名，《廬山實錄》眼中釘。
《大哉》評說忽傳世，天下是非公眾心。

這是最近吟的一首詩，為了甚麼呢？

近年來常聽說，不佞被列名為應予封殺之人，文章、書籍不准刊出，都說是上面口頭通知。最近見到了文字記載，新聞出版總署的內部資料《圖書出版通訊》2005年5月20日第六期，有關「選題內容中一些傾向性問題，應引起出版單位高度重視」中，同「跟風、格調不高、魔怪、恐怖」等並列的第六條：「敏感作家的選題，有的出版社今年擬安排一些敏感作家的作品，如《廬山會議實錄》（李銳著）、《傅斯年》、《背影叢書》（謝泳著）、《名人筆下的名人》（余杰著），請有關出版管理部門和出版單位嚴格控制，嚴格把關。」

有關《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的出版情況，我簡單說兩句。1988年由黨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內部刊行時，「出版說明」中說道：「1980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看到作者有關廬山會議的長篇發言後，當時主持《決議》起草的中央領導同志即建議作者寫出這一段歷史（在11月19日的信中說）：「你是否可以負責寫一廬山會議始末史料，寫出後再找有關同志補充審定。這事很要緊，值得付出心血。萬一我輩都不在了（人有旦夕

禍福），這一段重要史料誰來寫呢？會寫成甚麼樣子呢？」
「中央領導同志」是胡喬木，他感到此書影響很好，後又贊成公開出版。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時，即發現五個盜印版，1998年出了增訂第三版，2001年我收到「第四次印刷」。人們說，這本書在社會上很流行，總印了幾十萬上百萬本了。我的第一本研究毛澤東的書（《早年毛澤東》），在50年代也發行了一百多萬本。

去年我進88歲，老中青三代朋友中的「好事之徒」，為我出版了一本《米壽紀念文集》，書名居然叫《大哉李銳》，詩文作者八十多人，真使我受寵若驚。為自己的「米壽」，我作了兩首詩。一首七絕：「居然活到米齡年，依舊言多惹討嫌。《近作》豈能封殺住，此生就為自由權。」另外一首七律的最後兩句是：「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人類、歷史、社會的發展過程，是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的勝負過程，尤其近三百年來鬥爭最激烈，發展也最快。經過上世紀第二次大戰之後，現在世界上專制獨裁的國家沒剩下幾個了。人類已走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了。但是我們這個古老的中國積重難返，現在仍是有憲法而無憲政；仍是沒有最為關鍵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連《廬山會議實錄》這樣的書都要封殺，似不僅要封殺我這個人，而是要封殺歷史了，「以史為鑒」的中國傳統文化也要封殺了。從50年代、80年代至今兩個時期，我一共由中央和各地的出版社公開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小冊子不在內）和選集四種。第十八本《李銳近作》卻只能由香港出版了，我這個人曾經被徹底封殺過二十年：「六不怕唯頭尚在，三餐飯後嘴難張。」改革開放後這二十多年，我的嘴巴張慣了，筆

頭也寫慣了；為了繼承和發揮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建立一個真正實施憲政的現代民主國家，我的嘴巴和筆頭是決不願被「嚴格控制」的。這是我向朋友們和我的讀者的一個表態吧。

李 銳

2005年5月17日

目 錄

「敏感作家」的表態——香港版代序	3
前言	8
引論——廬山會議的由來	10
上廬山開會（關於我的記錄本）	20
神仙會	24
十八個問題	29
中南組的討論	36
會外漫談	44
幹部反應與社會輿論	51
李雲仲的一封信	57
7月10日講話與毛澤東第一次召見	64
會議形勢與毛澤東第二次召見	77
《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	87
彭德懷的信	109
對彭德懷的信的反應與形勢的變化	121
張聞天的發言	140
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	148
批評與檢討	164
對事，也要對人	184
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與毛澤東第三次召見	197

7月31日常委會	/ 204
8月1日常委會	/ 213
兩天常委會的傳達	/ 240
中央全會召開時的講話與文件批語	/ 249
揭發批判「軍事俱樂部」(上)	/ 262
揭發批判「軍事俱樂部」(下)	/ 281
關於「斯大林晚年」問題	/ 302
毛澤東8月11日講話(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	/ 323
大會批判	/ 338
毛澤東8月16日講話與五個文件	/ 370
全會後的工作會議	/ 386
結束語——廬山會議的教訓	/ 402
附錄1：讀《彭德懷自述》	/ 414
附錄2：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我認識的黃克誠	/ 424
附錄3：重讀張聞天的《廬山發言》	/ 436
附錄4：實事求是，何惜烏紗——懷念周小舟	/ 452
附錄5：請吳冷西給一個「說法」	/ 458
增訂版後記	/ 464
增訂三版後記	/ 466

前言

1959年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

廬山之變影響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從此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領導層，終於導致十年動亂的到來。

1980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關於廬山會議，我曾做過一個較長的發言（《簡報》刊出兩萬餘字）。當時就有中央領導同志催我，將這段史實盡快詳細寫出，否則，許多真相後代難以弄清。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自己也覺得義不容辭。但由於工作繁忙及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現在利用在青島消夏的時間，將已經收集和整理過的資料編寫出來。

所寫的是回憶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主，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史料，尤其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當年並無錄音或正式記錄（如兩次常委會的批彭紀實是我記錄的），為傳信存真，考慮再三，還是盡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來，以供黨史研究者參考（這對於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研究，也是很有用處的）。一般讀來或嫌繁瑣、枯燥，這也是難以兩全，無可奈何之事。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我這篇史料性的東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資料，其實在十年動亂中已由紅衛兵散播開來，國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利用，應該說不再具有機密的性質了。我現在不能說自己所

記的一定全部準確無誤，但我還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和判斷力，一生在寫作方面也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負責的。如果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廬山會議雖然是當代至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牽涉到許多「敏感」的人事，但畢竟過去三十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我們許多老同志尤其紅軍老同志，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遺產。我們的黨史上有許多有爭議之事，待做正確結論；不論怎樣，直接或間接的當事人，將它寫出來，儘管不完善甚或有錯誤，我總覺得寫出比不寫出好。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歷史會留下空白點或竟成為千古之謎。因此，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廬山時，我親自聽到彭德懷說過，「我一生不留筆記與文件」。但為了要澄清對自己多年沉重的種種歷史誤解（「三七開」，執行立三路線，打長沙，打贛州，會理會議，軍分會指示，二次王明路線，百團大戰，高饒事件，廬山會議等），他終於在待罪閒居時，寫了《八萬言書》以為申訴；在傷殘囚居時，又如實「交代」了自己一生經歷。這就是我們現在何等幸運地讀到的《彭德懷自述》。

作為當事人，我提供了這樣一份史料性東西，自己也覺得是了卻了一件多年來的心事。

再說一句：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引論

——廬山會議的由來

回顧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就不能不想起在這前後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以及神話般的農業高產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在極短時間內席捲神州大地。但也同樣在極短時間內暴露出它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上海會議的半年中，不斷糾正這些「左」的做法之後，為了進一步糾「左」，克服混亂現象，以便繼續鼓勁，繼續躍進，才又舉行廬山會議。可是，當彭德懷、張聞天等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根源有所批評時，毛澤東就立即將會議的方向扭轉過來，要打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要動員全黨、全民保衛「三面紅旗」了。

三面紅旗當然不是突然出現的，有其必然發生的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後，為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原來設想的近期目標是十五年實現國家工業化和三大改造；至於要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則認為需要五十年時間。周恩來也說過，中國工業化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欲速則不達，必須穩步前進。但是從1955年下半年批評農業合作化的「小腳女人」開始，毛澤東就認為各項建設事業應當大大加快，應當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以農業改造速度促進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速度，並

在總結蘇聯經驗教訓後，社會主義建設上開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針。因此，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過快過粗，十五年的計劃三年完成了。（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當時對此種快速進度尤其經濟建設上的加快速度，黨中央領導內部的意見並不是完全一致的。1956年年初，周恩來提出過，既不要犯右傾保守又不要犯急躁冒進的錯誤。1957年的經濟建設是健康發展的，國民收入有所增加，消滅了財政赤字。直到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都對克服急躁冒進做了工作。這次會議制定了一個合乎實際情況的經濟發展計劃，注意到綜合平衡，壓縮了基建規模，控制了過高的增長速度。但毛澤東認為1957年的增長速度低於1956年的增長速度，出現了馬鞍形，反冒進反錯了，是屬於方針路線性的錯誤。他還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將經濟與政治聯繫起來，說這是吹了一股陰風，把多快好省、農業綱要四十條和「促進委員會」吹掉了。於是，從1957年10月三中全會開端，不斷批判右傾保守，實際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經過1958年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廣州會議，為大躍進作了充份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南寧會議上，指名批評了周恩來和陳雲的反冒進，認為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是犯了離右派不遠的政治方向的錯誤。從此，「反冒進」的聲音噤若寒蟬。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周恩來、陳雲等被迫在大會上作了檢討。會上指責對大躍進、高指標抱懷疑態度的人為「觀潮派」、「秋後算賬派」，號召在全國「拔白旗、插紅旗」。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指標，比八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工業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農業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鋼從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煤從2億噸提高到4億噸，糧食從5,000億斤提高到7,000億斤。這樣，全黨從上到下，

形成一種普遍看法：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後，在建設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進；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爭速度、搶時間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針。從而以「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落後面貌」為口號，動員全國人民，以「破除消極平衡論」、「樹立積極平衡論」為經濟高速發展的理論；「以鋼為綱」，「三大元帥（鋼煤糧）升帳」，「兩個先行官（交通、電力）開路」，大搞群眾運動，「小土群」遍地開花等，成為實現高速度、大躍進的具體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會議，要求當年鋼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二五指標比三個月前的八大二次會議，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農業指標，要幾倍、十幾倍地增長，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0%以上，基建投資年增長50%以上。1962年指標，鋼變為1億噸，煤為11億噸，糧食為15,000億斤。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到北戴河會議，就分別改為三年和十年了。

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三、四月間，先後同陳伯達、劉少奇談過「鄉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4月間中央正式發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在《紅旗》雜誌上發表）8月初在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報社記者說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後，全國轉瞬之間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是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也是所謂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從而解放生產力的手段。當時確實從實踐到理論都這

樣認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北戴河會議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還同共產主義聯繫起來，明確說道，這首先是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為過渡到共產主義做積極準備；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應通過公社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由於有了大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熔工農商學兵於一爐的組織，決議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毛澤東這時正式談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設想公社應當實行平等的分配，無甚差別的物質生活；還談到進城以後，改供給制為工資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隨後，全國一哄而起，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吃飯不要錢」最早是由柯慶施提出來的）城市公社也認為是勢在必行。

由於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共產風等，隨着很快在全國颳起來了。1958年6月份開始，河南放小麥畝產衛星從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衛星，畝產多少萬斤的消息，《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作通欄套紅標題予以報道。安徽、江蘇、湖北、河南宣佈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肅四省人均糧食產量，宣佈超過千斤。隨後就放鋼鐵衛星。日產生鐵，先是河南魯山1,000噸，禹縣4,000噸，接着是廣西鹿寨20萬噸，廣東87萬噸，後來河南產鋼三天300萬噸。河北徐水縣三個月苦戰，基本消滅了水旱兩災。河南半年實現了水利化。有的地方四十天實現綠化，實現「四無」（無麻雀、老鼠、蒼蠅、蚊子）。凡事都「化」：「車子化」、「滾珠軸承化」、「繩索牽引（耕地）化」、「機械化」……凡事「全民大辦」：全民辦鋼、辦電、辦鋁、辦煤窯、辦鐵路、辦教育、辦大學、辦哲學、辦文藝、辦體育，直到全民寫詩，人人

當作家。建成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就說成是我國已跨進了原子能時代。總之，一切大躍進，比學趕幫超。

當然，三面紅旗是由急於求成的思想而來的。急於求成是為了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狀態。窮則思變，所謂一窮二白正是大躍進的動力。中國百年落後總是挨打，「開除球籍」的危機感和緊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在籠罩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們，主要是由於我們鋼鐵、機械、糧食少了」，這種種因素，都驅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謀求盡快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同時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當年此種雄心壯志和滿腔熱情，確實感動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

新中國成立前的二十八年，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農民大國，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確實難而又難，尤其是要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作鬥爭，最為不易；其實踐和理論的正確，舉世公認。在這漫長的二十八年中，歷經無數艱難曲折，可以說，毛澤東從不輕敵，始終是兢兢業業，謙虛謹慎的。如在軍事上，從不言決戰，直到遼瀋戰役之後，才準備與敵人決戰。當然，這也同頭頂三座大山，內外敵人強大，還有共產國際與斯大林的干預這些巨大的客觀因素制約有關。這二十八年，毛澤東確實成為全黨的表率，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精神。開國之後，內外情況起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勝利，證明美帝也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斯大林蓋子被揭開；三年經濟好轉，建設順利進行；一連串的勝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觀上失去任何制約。於是，一切困難逐漸不在話下。加之，黨與個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唱《東方紅》。這種種主客觀形勢的變化，使得毛澤東開始不謙虛謹慎了，個人的獨斷專行日漸發展起來。一窮二白不認為是

困難，反而認為「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革命中經歷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現在建設時期可以重現了；搞經濟應當「勢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氣呵成為好」。這樣，片面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為只要「政治掛帥」，就可以無視經濟工作本身內在的規律。於是，隨意搬用革命戰爭時期的各種經驗，乃至將階級鬥爭的方法，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也應用於經濟建設。「六億神州盡舜堯」，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凡是人類能夠做的事，我們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夠做，沒有甚麼事我們不能夠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設）迅速取得勝利這種急性病，並不是從毛澤東開的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過這種情緒：似乎歐洲的革命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列寧更是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它的最後階段；曾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德國和匈牙利等地出現的一些革命行動，看做全歐洲革命的開端。在蘇聯國內戰爭開始時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就包含有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因素。這種「過渡」方式遇到了頑強的抵抗後，才不得不轉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列寧在《十月革命四週年》一文中總結了這個教訓：「我們原來打算（或許更確切些說，我們是沒有充份根據地假定）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要經過多年的準備工作），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系列過渡階段。」「我們現在正在用『新經濟政策』來改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裏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這說明，列寧確實有過直接過渡的意願，而且列寧也並不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多麼遙遠的事情。他在1920年講的《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50歲左右的這一代人，

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現在15歲的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據列寧的設想：「再過一、二十年就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裏。」

斯大林1936年就宣佈，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1939年宣佈，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1952年又宣佈，蘇聯已處於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隔得遠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魯曉夫。1957年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在這以前不久，蘇聯成功地將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宇宙空間的軌道上，開始了人類的太空時代。《人民日報》曾稱讚此事：「幾十天中間，把整個世界形勢的面貌改變了。」在慶典活動期間，赫魯曉夫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既然第一號社會主義國家要在十五年內趕超第一號資本主義國家，那麼，作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第二號社會主義國家也應當在十五年內趕超第二號資本主義國家。於是毛澤東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不但要同資本主義國家比，而且就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就說出過這個意思：「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後來就更異想天開，說是進入共產主義我們不搶先，進入了也不宣佈為好。

希望國家的建設事業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績，這樣一種良好的願望本來無可非議，只會受到人們的讚許。而且在一定限度內事在人為，只要組織得好，避免失誤，再加上機遇，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較快一些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

該積極探索怎樣把速度適當提高的辦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內擺動，歸根到柢，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礎、資源、技術、人的素質等條件，以及經濟活動自身規律的制約。當年毛澤東完全不顧主客觀條件，只憑良好的願望，把人的能動作用無限誇大，結果只能事與願違了。

作為大躍進的組織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澤東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謂的「唯生產力論」，公社則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產關係論」的。他對不斷改革生產關係，可以說是鍥而不捨地執着。公社雖然是在很短時間裏突然出現的，但是它在毛澤東的思想裏卻是蘊蓄已久的。在《學生時代的毛澤東》一文中，我曾說過，「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早年所受的蕪雜的思想影響，終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由於思想往往是『先入為主』的，徹底清理極為不易。青年時代的思想初戀，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種『懷舊』之情」。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號上發表的毛澤東《學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這種「思想初戀」：「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1918年春季，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工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遊，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像，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劃，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當時並不是只有毛澤東一人思考「新村」的問題。《新青年》雜誌上就刊登過周作人、武者小路實篤等談新村的文章，李大釗、瞿秋白寫過介紹一些美國人辦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澤東的思想中，看來是更多地受了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大同書》裏對理想社會描述得十分具體：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學養院，老則入養老院……，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對

所設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這篇文章中關於「工作之事項」的規定「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雞魚」，豈不也很像他後來概括的「農林牧副漁」麼。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提到了康有為，將他列入「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並且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對康有為關於大同世界的設想，其中哪些是應該而且可以實現的，哪些只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毛澤東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無一字評論，這裏只是為康有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這個理想的道路。現在到了中國人民大躍進時代，毛澤東自認為已找到了這條道路：他執掌國柄，康有為只能想想的事情，現在可以付諸實施了。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他說過這樣的話：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當年籌辦人民公社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曾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哥達綱領批判》一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有多麼駁雜了。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還為《張魯傳》親自作註，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做法，也是欣賞的。看

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毛澤東或多或少の影響。

回顧這一頁歷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萬千。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毛澤東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打敗了強大的內外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勝利以後，要在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體現中華民族雄心壯志的領袖，由於急於求成，欲求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趕美，同蘇聯並駕齊驅，於是終於陷入了自己從來對之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竟然無視中國生產力還很低下的現實，無視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規律，無視內外主客觀實際情況，於是戰爭年代的謙虛謹慎一去不復返了，以為憑藉戰爭時期的經驗，黨和個人的威信，動員起來的人民群眾的沖天幹勁，就可以創造人間奇蹟。於是晚年的毛澤東終於陷自己於帶空想色彩的理想社會主義中而不能自拔。1959年的廬山會議，實際表明也是一場為維護這種理想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

上廬山開會

(關於我的記錄本)

1959年6月30日接到通知，上廬山開會。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彭真傳達了要討論的十三個問題，說是開神仙會。一起聽傳達的有薄一波、康生、吳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廬山會議時用的一個黑皮記錄本保存下來了。廬山會議後，在水電部受批鬥時，我曾經將自己多年來的全部日記本、工作筆記本、來往信件（主要是家信）等，凡屬可以反映思想動態的一切資料，統統上交了，以便組織上徹底「清算」我這個人。

（在延安「搶救運動」時就有過這種經驗）可是，我惟獨保留了這個記錄本以及在廬山時的有關資料。我覺得這是山上這場大風波的真實記錄，為歷史也為我自己，我應當將它們留在身邊。

1963年12月下旬，從北大荒回京閒住二年後，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別山中的磨子潭水電站，當文化教員。1967年11月10日，當時安徽省軍管系統來人，以負責人要找我談話為由，連夜將我送到合肥。我當即明白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專機將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監獄。）在清理我的書物時，我告訴那幾位穿軍服的同志，這個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裏寫上「李銳廬山會議的記錄本」幾個字，以防將來找不到。1979年1月，我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後，中組部的同志來退還「專案一辦」為審查我而收存的全部有關資料時，卻不見這個記錄本。這使我想起1967年8月間的事情。北京專案組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

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總理。當時我雖已50歲，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卻依然少年氣盛。我說，毛主席周圍的人，最危險的不是他們三個人，而是陳伯達，「我最不放心的是陳伯達」。於是我舉出事例，以為證明。但是專案辦的人不讓我寫材料，只答應口頭轉告周總理，於是我向總理寫了封信。10月間，專案組的人又來過磨子潭一次，向我查問有關事情，並退還我給總理的信，說此信他們不能轉交。但因此，11月10日遭逮捕時，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觸犯了陳伯達有關。那時此人正紅得發紫。我將這個情節告訴中組部的同志，請他們設法找到這個記錄本。果然，不久他們從陳伯達的檔案中找到了。（這個記錄本上沒有像其他退回的資料一樣，蓋印有「專辦」的編號，可見一開始就被陳伯達取走了。）

1980年10月到11月間，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我根據這個記錄本，得以將廬山會議的情況作了扼要的介紹。當時大家對這個介紹是很感興趣的。現在還是這個記錄本幫助我完成寫這本實錄的任務。

記錄本的第一頁記有：6月30日居仁堂傳達：廬山會議要談的十三個問題，只記了前五個問題的簡要內容，可能是當時覺得反正上山後會有正式文件的，其他的就沒有再記，五個問題所記如下：

(1) 讀書。中委、省、地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卷。

為基層幹部、公社黨委編三本書：好人好事，如王國藩，實事求是；壞人壞事，虛報浮誇，隨風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讀完要考試，在職幹部要抽時間學習。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2) 國內形勢。形勢好轉中，何時基本好轉？徹底好轉？

盲目性也減少了。

(3) 今年任務。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商業、運輸、勞動。

(4) 明年任務。

(5) 1962年任務，不是搞數目字，先確定方針。

(3、4、5三題，後來併為「任務」一題。)

從將要討論的問題來看，大躍進的高溫早已下降，從毛澤東到地方負責人，大家都已冷靜下來，都覺得需要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安排好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人心思定」，許多指標需要進一步落實。

北京上山開會的人，主要是計委和工交各部的負責人，同乘一專列，於7月1日下午7時到武漢，隨即乘船到九江。車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負責人開了一個短會，研究1960年計劃方針。我在發言中談到，去年的教訓在於沒有了綜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萬馬奔騰」都是脫韁野馬。經濟活動本身有其規律，不論怎樣「躍進」，也擺脫不了客觀規律的制約。我還轉告了同在車上的胡喬木的有關談論。胡喬木也談到對綜合平衡、經濟規律的意見：如天體運動，太陽系各行星繞太陽運動，有其軌道，不能失去平衡。火車、汽車運行也有車道，規律亦如車道，車子如不按車道走，就要出事故，特別是火車，一出軌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喬木認識較早。1939年夏，南方局開青年工作會議，我當時在湖南省委組織部工作，兼省青委書記；馮文彬、胡喬木代表中央青委從延安來到重慶。開完會後，胡喬木到湖南檢查青年工作，我隨即調離湖南撤退到延安，我們一直同行。到延安後，他將我留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工作。吳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報》工作時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有文章寄到報社，必經我手（我管評論），於是成為文字之交。在專列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閒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

1958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也同吳冷西有過一次閒談。吳說，不久前在毛主席處談話，主席這樣談到：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心情5月後才開始好轉。吳說，主席還談到政治家與書生問題：書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時機，不能當機立斷。1957年反右時，抓住盧郁文講的話，寫了《這是為甚麼？》，使形勢急轉。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年同我的一次閒談，談到他有次和譚震林一起在主席處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主席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車上，我們四人的交談中有一共同觀點：1958年毛澤東親自到前台來直接管經濟，來發號施令，結果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這時，他自己也感覺到，應當如何來轉彎了。

在「江新」輪船上，遇到陶鑄，他請我們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還是樂觀的。

經過4月上海會議，「以鋼為綱」的問題也大都暴露。農業和工業兩方面，因大躍進造成的後果都很嚴重。兩次鄭州會議之後，農村「五風」等問題已開始有所糾正，但對形勢的總估計，從毛澤東起，一般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頂多兩三個指頭的問題。這時有許多省糧食已很緊張，出現成片地區挨餓甚至死人的情況。山東、安徽、湖北、甘肅、雲南等省都比較嚴重，廣東邊境縣已有到湖南搶糧的。

神仙會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以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廬山會議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各半個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信印發，為真正的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從糾「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突然轉到大反右傾；8月1日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大批彭黃張周，最後全會通過保衛黨的總路線和關於反黨集團的錯誤兩個決議，為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為甚麼叫做神仙會？

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前後，就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經歷來說，除開江西和長征，恐怕是遇到了抗戰時國民黨封鎖邊區不發軍餉後，從未遇到過的困難；也是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後，從來未有過的緊張。大家已不斷檢討，頂風迎浪苦鬥了大半年。一般認為，許多問題在解決中，形勢已開始好轉，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脫，可以讓大家來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安排好今後工作，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夏天到廬山開會，可以避暑，遠離塵囂，精神都放鬆一下，過一陣較閒適的生活。廬山天下名山，富歷史古蹟，多神仙故事，權且都來當當「神仙」吧。

我是第一次登廬山。7月4日寄出的家信中寫道：「1日下午7點半開船。甲板上啖荔枝，談形勢，早稻豐收在望，人們心情倒還舒暢，江風甚涼，留連甲板，12點後始入睡。2日天亮之後，廬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過租界，岸上倉庫頗密，昔日繁華

當遠勝長沙。一路車隊爬上牯嶺，共24公里，登1,100餘米，轉400個彎道。雲霧滿山林，不識真面目。當年蔣介石僕僕此道，乘四人抬滑杆，一條公路也修不成。這次中央來開會，當地主人緊張動員，盡力招待。北京部長們多住在原來一所療養院，其他散居山崖諸樓台，不辨方向。案頭有《注意事項》，諸如加衣蓋被之類，並云：此間空氣清新，使呼吸加深，胸闊肌肉加強，血液循環增進，紅血球增多，氧同化作用良好，食慾增加，發汗咳嗽減少，等等。窗外滿嶺松杉，煙雲瀾漫，清風習習，時感陣雨欲來。午飯前，看完兩本《廬山指南》。午飯吃兩碗半，午睡一小時，晚飯照舊，當是『空氣清新』奏效。整理帶來文件，閱當地報紙。預報有雨，不敢外遊，夜觀贛劇《思凡》、《驚夢》、《悟空借扇》，皆主席所點也。」

以下是三日所記：「晚上跳舞，舞場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進不了天堂的。一切都極安靜。有戲、有舞，卻消沒在山風松濤之中。跟北戴河另一番滋味，那兒總是讓你掛念着海，想到海中飄游整日才好；這兒是『深山養道之心』，塵囂世俗之感皆被融化也。」

4日晨又記：「清晨被陣雨驚醒。夜來風雨聲，雲霧知多少。至今只見窗外廬山，真面目還不清楚，討論問題增至18個。先開小組會，我在中南組。」

7月10日第二封家信中寫道：「7月5日上午陰晴未定，同京官們登含鄱口（壑谷正對鄱陽湖，似口含湖水也），歸來得句，三、四兩句甚為小舟所欣賞：

含鄱口上鄱陽含，水色天光變幻間。

高處為雲低處霧，笑談不覺失群山。

情景完全寫實。」這天同遊的是哪些人已記不清楚。但一陣陣霧氣撲面而來，兩人對面座談，忽然不見人影，轉眼之間霧散雲開，又一切重現。此種反覆圖像，至今如在眼前。

初上山的幾天，人們遊興極高，詩風很盛，這同毛澤東的兩首詩傳開來很有關係。6月23日，毛澤東到湖南，24日下午暢遊湘江，25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日小舟隨同到武漢。毛澤東即乘船到九江，29日上廬山。小舟與我們同船來山。《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一上山毛澤東就寫給小舟、喬木二人，附信徵求意見。我與小舟同在中南組，這時他就興致勃勃地將原件給我看，並將兩首詩抄在我的記錄本後面。詩中詞句，同後來發表的有些出入。《登廬山》還有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廬山，望鄱陽湖、揚子江，千巒競秀，萬壑爭流，紅日方升，成詩八句。」由此可見當時詩人的鬆快心情和豪興不減。《登廬山》最後兩句同後來發表的不同：「陶潛不受元嘉祿，只為當年不向前。」

最初幾天，人們於開會空隙，遊山玩水，成群結隊到仙人洞看晚霞。傳說唐朝呂洞賓在此修仙，繫懸崖絕壁之天生石洞；7月是廬山雲彩變幻最美的月份。古往今來，勝景古蹟，能詩者自不免引發詩興。我的本子上還有董老親筆寫的一首七律：

廬山面目真難識，疊嶂層巒競勝奇。
乍雨乍晴雲出沒，時高時下路平陂。
盤桓最好尋花徑，佇立俄延讀御碑。
如許周顛遺蹟在，訪仙何處至今疑。

花徑離仙人洞不遠。周顛和御碑是朱元璋得了天下後編造的一段天人感應的故事，以說明他是真命天子。不知何故，這首詩

沒有收入《董必武詩選》中；也許選編時，覺得此詩尤其第一句仍不合時宜吧。在《朱德詩選集》中卻有《和董必武同志〈初遊廬山〉》一首：

廬山真面何難識，揚子江邊一嶺奇。
公路崎嶇開古道，林園宛轉創新陂。
行遊險處防盲目，嚮導堪稱指路碑。
五老峰前莊稼好，今年躍進不須疑。

不但是步原韻，意思也是回答原詩的。朱總這詩是7月7日寫的，他們的詩正好反映神仙會初期人們的普遍心情：陶醉自然，忘情物外。我還記得遊東林寺時，匾額為康有為所書，出寺不遠，總理在寺門口向我大聲問道：「李銳，康有為的字是中年寫的還是晚年寫的？」我回頭竟隨口大聲應道：「是晚年寫的吧。」我似乎記得康氏晚年才到過廬山，當時也沒有細看字跡。在神仙會階段，會議討論是由總理主持的。

大躍進時期歷次中央會議，同我來往交談最密切的是田家英。家英也好詩詞。這幾天他同康生、陳伯達也有遊山賦詩之舉。他告訴過我他們三個人的幾首聯句，也抄在我的本子上：「三人結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見鄱陽湖，恨無拿雲手。鄱陽忙開言，不要拿雲手；只因聖人來，羞顏難抬首。五老牛馬走，鄱陽緊閉口；東海聖人來，群山齊拱手。若請諸葛亮，西風去借求；晴日君再來，暢飲潯陽樓。」家英對陳伯達歷來有看法，曾跟我詳談過第一次鄭州會議時，這位「經濟學家」趨時邀寵，發表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謬論，遭到毛澤東批評挖苦的情況。但家英對康生其人歷來敬重，以至詩中稱之為「東海聖人」（康生是山東諸城人），未能識破其陰險奸詐。這大概也同他在

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處於安全狀態有關。

關於神仙會的情況，我的《龍膽紫集》《廬山吟》九首的第一首，說得頗清楚：

借得名山避世嘩，群賢畢至學仙家。
出門總是逐風景，無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隨吟古今句，高談且飲雲霧茶。
林中夜夜聞絲竹，彌撒堂尖北斗斜。

雲霧茶為廬山產名茶。全詩句句寫實，沒有絲毫誇張。

7月16日，我的第三封家信還談到：「擠時間小遊山幾次。此山特點在高，綿延九十餘座山峰，經歷了第四紀冰川，高峽深谷，『磅礴五百里，奇秀甲東南』。因夾在江湖之間，雲霧不斷，氣候變化較大。坐在屋子裏，有時太陽進來，只能穿襯衫；太陽遮沒，又得穿上毛背心。上山後，只熱過兩天。」由此可見，直到16日，我還有興致顧到山景，心情還是愉快的。信中還寫到這樣重要的情節：「幾天來參加起草會議紀要文件，特疲勞。主席約談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開同鄉會也），心情甚舒暢，相機進言，頗為融洽。會議已近尾聲，但具體的日子還不清楚。原來說是開到16、17號的，今天已經16了，還沒有開過大會。」

這以後就沒有再寫過家信了。直到8月1日，為使家中先有個精神準備，寫了這樣幾十個字的「報喪」書：「二十多天來，會議極為緊張。我在會議期間，由於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犯了錯誤，在作檢討，心情極為沉重、緊張，很難再寫信了。還要開全會，大概10號以後，會才能結束。」

如果有「神仙會」的話，可以確切地說：7月16日後不幾天就結束了。

十八個問題

1959年6月29日在船上，毛澤東同各大區負責人柯慶施、李井泉、林鐵、歐陽欽、張德生等座談，徵求對形勢的看法，談了準備在廬山討論的問題。劉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陳雲和鄧小平因健康原因沒有上山。7月2日開過一次常委會，確定了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中國際形勢一題，是旅途中同周恩來通電話時，周建議加上的。

我的記錄本上載明：7月3日，中南組開會，首先傳達下述十八個問題；是組長口頭傳達，並無文件。所記內容，同別組的傳達，詳略與題目次序小有差異，後來我又對照別組的文本補記了一些。從文字記錄看，都是毛澤東本人的口氣。

一、讀書。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8月份用一個月時間來讀書，或者實行幹部輪訓。不規定範圍，大家不會讀。中央、省市、地委一級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卷（第3版）。去年我們把蘇聯一些好的經驗也丟了。此書總結了蘇聯經驗，但有缺點，如和平過渡，通過議會奪取政權之類。哪有那回事，革命必須通過武裝鬥爭（1957年右派無一根槍，還要進攻）。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問讀了沒有？讀了一點，讀得不多，自己也沒有讀。山東、河北建議：給縣、社幹部編三本書：一本，《好人好事》，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不誑報、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荷澤的一個隊。一

本，《壞人壞事》，犯錯誤的，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各省找幾個例子。一本，從去年到現在中央各種指示文件（加省市的）。三本書十萬字左右，七天讀完。讀完後討論三個星期；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領導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提倡讀書，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系統思考問題的時間，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鍋上的螞蟻，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不要整年整月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

二、形勢。是好是壞？有些壞，但還不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是在兩者之間。八大二次會議方針政策對不對？要堅持。總的說來，湖南省委有三句話，他們說得巧妙：成績偉大，經驗豐富，前途光明。實際是問題不少。去年以來，一年半中，許多政策執行的結果，成為一條腿走路。基本問題是：綜合平衡，群眾路線，統一領導，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產品都要有）。農業十二項：糧棉油麻煙茶糖菜絲果藥特，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把精力搞小高爐、小轉爐，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又大春荒。一路看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個省，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今年現在的形勢同去年此時的形勢比較，哪種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颳起共產風，今年不會颳，比去年好。去年許多事是一條腿走路，不是兩條腿。我們曾批評過斯大林一條腿走路，自己提出過要兩條腿，反而一條腿了。大躍進中包含某些錯誤與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些問題，但包含積極因素。去年情況本來很好，但帶來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沒想到困難的一面。現在形勢好轉，盲目性少了。何時能徹底好轉？爭取明年五一節。

去年腦子發熱，但熱情寶貴，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問：你們大躍進，為甚麼糧食緊張？為甚麼買不到頭髮卡子？有些問題現在還沒完全弄清楚。似乎促進派腰桿不硬了。總之：怪話不少，要讓人家講。你說得清就說，說不清就硬着頭皮頂着。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三、任務（或分成兩個問題，即今年任務，四年任務）。工、農、輕、重、商、交各方面，過去是兩條腿，去年丟掉一條，重擠掉了農、輕，也擠掉了商。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輕，就好了。到底如何搞法，基本建設如何安排？今年鋼是否1,300萬噸？能超過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鋼明年只能增400萬噸，達到1,700萬噸（富春插話：明年或6、7、8三個數：1,600萬、1,700萬、1,800萬）。以後幾年也是年增400萬噸，2,300萬噸就超過英國。定要確保質量，不要追求太多數量了。趕上英國說的是主要產品，鋼太多了不一定好。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三成，即1,000億斤。1964年搞到10,000億斤。恢復農業14條。指標比原定的稍高一點，還是十二年達到。兩個口號不變。十五年內主要產品趕超英國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要讓下面去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才實際的。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幾年的指標要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指標，恐怕要4年才能達到。過去安排是重輕農，現在是否改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不會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樣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原則，重工業是不會放鬆的。這幾年農業第一，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應當成立農機部。過去陳雲同志提

過，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黃敬不贊成。現在看來，陳是對的。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會造反，這是六億七萬人安定不安定的問題。甚麼叫造反？就是要使人們少說閒話，不罵我們，過得舒服。日子過得舒服，才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贊成成立三機部，搞農業機械，還成立農業研究院。過去土改時說過：「炮是要打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第三條還有，如果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實際掛帥的是農，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飼料要有單獨政策，現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半斤；過一過，要都吃一斤；再過一過，要人吃一斤，牲口吃兩斤，逐漸比人多。農、輕、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4年（準備犯4年錯誤）。不提口號，不作宣傳。工業要支援農業，明年要多少化肥、農用鋼材，這次會議定一下。

有兩種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兩條還有用。還是要講「一切行動聽指揮」，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搞一平二調。總的看，十年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真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佔多數）是權利歸他是共產主義，否則，是資本主義。山東有的地方發現搶糧之事，這很好，可引起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會亡的，社會主義是亡不了的，搞社會主義是會堅持到底的。蔣介石是回不來的。美國如打來，我們最壞退到延安，但還會回來的。

四、體制。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去年人、財、商、工四權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現在要適當收回，對下要適當控制，要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強調集權，統一領導。統得不可過死，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五、公共食堂。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在這幾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種多樣。太分散的戶不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30%—50%，將來80%。吃飯基本要錢，一部份不要錢。四川是老小不要錢。湖北是半供給制。供給部份要少，三七、四六，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要否定。食堂與供給制是兩回事。按月發工資，大部份辦不到。

六、學會過日子。湖北農民批評幹部：一不懂生產，二不會過日子。農村和城市，都要留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總要增產節約。今年不管增產多少，糧食按去年4,800億斤標準過日子。去年湖北的錯誤，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放過衛星的縣過得最差。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

七、恢復三定：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定多少，要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份徵四留六。自留地不徵稅。

八、恢復農村初級市場。

九、綜合平衡，大躍進的大教訓之一。去年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幾個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三種平衡：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等）；工業內部；工業與農業。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十、生產小隊改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的問題在於原高級社小，現叫生產隊。生產、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則浪費很大，反正歸管理區。一改，怕影響生產，弄個「半」字。

十一、農村黨團作用。基層黨的活動削弱了，黨不管黨，都由生產隊長包辦代替了。無支委會，無組織領導作用。

十二、宣傳問題。去年有些浮誇，怎樣說法？1959年的四大

指標定高了，現在陷於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即有人提出，利用人大會議改，失了點時機。找個適當時機改過來，但改多少還摸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以後是否不公佈絕對數。這可以學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

十三、工業管理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爭取一、二年內解決。煤炭的含硫量超過了允許的標準（0.07%），其他產品質量也很差，出口退貨，名譽不好。

十四、對去年的估計：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要等較長的時間才能看得出來。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看出問題，才能鼓起勁來。躍進公路，修了這麼多也沒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了。

十五、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十六、全國協作關係。破壞了原來的協作關係。搞了大的，擠了小的。大區搞體系，公社工業化，工廠綜合化。協作區搞些調查研究，計委的派出機關。

十七、團結問題。統一思想，從中央到縣委。河南120萬基層幹部，40萬犯錯誤，3,600人受處分，是個分裂。

十八、國際問題（列了個題目）。對資產階級不易一次認清，界限要分清。同蔣介石打了十年，講統一戰線時，一切都忘了。

1958年大躍進的最高潮為8月北戴河會議：鋼翻一番，1,070萬噸；建立人民公社；主張供給制（責難工資制）；宣傳過渡到共產主義非遙遠之事，等等。一整套「左」的理想或空想。從而全國大颳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吃飯不要錢等）、高指標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為保證「鋼鐵元帥升帳」，基建投資增加一倍；工人增加2,000萬；9,000萬人上山

煉鋼鐵，要為1959年產鋼3,000萬噸奮鬥。兩次鄭州會議開始糾「左」，強調要「壓縮空氣」，「冷熱結合」，要搞綜合平衡，要刹住一平二調三收款，要整頓公社，解決所有制，核算以原高級社為基礎。上海會議後，毛澤東又給各級幹部一封信：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定要實事求是；要把糧食抓得很緊很緊。儘管有這些糾「左」的措施和講話，但依然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絕對肯定，仍堅持「以鋼為綱」，對公共食堂等仍舊依依不捨，1959年還要繼續躍進。總之，氣可鼓不可洩。依據這十八個問題的基本估計與基本精神，廬山會議自然不可能對大躍進進行根本調整。例如1959年鋼的指標，從1958年12月武昌會議壓到2,000萬噸，1959年4月上海會議壓到1,650萬噸，廬山會議開始壓到1,300萬噸，仍舊是完不成的高指標。因為1958年鋼的實際完成數即合格的鋼產量，後來只落實到800萬噸。糧食指標從10,500億斤壓到5,500億斤，也還是辦不到的。後來的實踐證明：高指標不降，大躍進等「三面紅旗」不根本懷疑，實難以從根本上糾「左」；所有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等也難以真正刹住。所以這十八個問題的提出，似乎不是「熱鍋上的螞蟻」了，但實際也決非真正「冷鍋上的螞蟻」。何況就是對這十八個問題的看法，當時也還存在分歧，並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廬山這場風波，從發生大爭論來說，是必然的；但是後來出現如此「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可怕局面，則有一定的偶然性。

中南組的討論

7月3日開始，按大區分六個組開座談會。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別參加各組。我被分在中南組。組長是陶鑄。按照十八個問題，擺情況，談看法，提意見。白天開會，晚上自由活動，星期天休息。當時討論的情況，大概是各人根據自己的思想認識來談。我的記錄本只記了些要點，也不是每個人的發言都記，前幾天記得較多，後幾天記得很少。小組會並沒有按照問題逐個討論，多是一攬子發言。

關於讀書，大家發表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讀書，作用極大。在北京沒法讀書，要看的東西太多。學習制度取消了，星期日名存實亡。幾個人一組，讀一個月。「一把手」沒有甚麼難不開的。價值法則、商品經濟等問題，認識上並未解決。過去不知鋼之厲害，去年碰了釘子，也應當利用人家經驗。不學，書記當不下去。還有千萬人餓肚子的問題。覺悟有了，就需要逼着讀，讀完交篇心得文章，很有必要。協作區應當搞點理論協作。《紅旗》應當有爭論文章。關於去年秋收與煉鋼之間的矛盾，還有深翻土地等問題，中央當時未能當機立斷，等等。

7月3日，陶鑄首先談廣東情況：今年廣東洪水災害，早稻約損失30億斤。經過救災與克服共產風，黨群關係有改變。群眾說：「共產黨可共患難。」廣東糧食一向寬裕，多給群眾留一點，挽回在港澳的影響。去年向港澳吹過牛。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颳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攪成一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

一死，都不養了。副食傷得太厲害。群眾回家吃飯，聽其自然，回去一個時期有好處。這樣，家庭養豬能快恢復。群眾懂價值法則，我們不懂（農民捨得殺三隻雞給母豬吃）。過去七年，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同步增長。去年前者大增，後者很少增，都各顧各了。手工業紛紛下馬。過去供300萬噸煤，今年只幾十萬噸，33萬人又返回農村。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建。不能光看這一年、半年中發生的問題，要看三五年，看長遠些，看積極方面。廣東有了年產500萬噸煤，5萬噸鋼的能力，也有了水壓機。去年苦戰一下，不後悔；兵無苦戰不行。不要光看消極東西，不要有埋怨情緒。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沒經驗。廣東講了三個月的一個指頭，現在不講了。落實指標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幹勁。人們對總路線是有懷疑的，定要堅信，不能動搖。

我同陶鑄在延安時就認識，接管瀋陽時，他是市委書記，軍管會時期，天天在一起。他對我們年輕人並不擺老資格，有話脫口而出。他為人直爽，曾經對我說過：「我這個人是只左不右的。」雖然當時廣東形勢嚴峻，他還是幹勁十足，只承認有一個指頭的問題。

同日，劉建勛也多少講了點廣西「大勢」：感覺有壓力。今年很緊張，但秩序好，跟1957年散社時情況不同，說明「社會主義思想革命勝利已鞏固」。去年許多措施、作風，使幹群間有隔閡。缺點那麼多，講了就完了。再不搞甚麼八百斤、千斤省之類虛名了。給農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糧食歸戶，群眾最滿意。劉建勛特別強調廣西煤的問題，現在只有二百多萬噸，明年需要三百多萬噸，也沒有焦炭。周惠後來在閒談中跟我說：劉建勛滑頭，言不及義，每次發言都強調煤的問題，其他要害都不談。

7月4日，周小舟發言，他不僅談了湖南情況，還對總的形

勢提出了看法。他首先說：不可估計太樂觀。去年底，湖南號稱糧食翻了一番，達450億斤，估計只330億斤（按後來落實到245億斤，只增產約8%）。生鐵76萬噸，實際60萬噸。湖南糧食情況較好，是由於我們沒有搞敞開肚皮吃；但其他一樣緊張。基建搞多了，縣以上一千個項目，只有三百個經批准，其他是自由化的。上下都想多幹。工人從90萬增加到134萬。下面幹部對經濟失調，還不感覺嚴重。鋼指標定為1,070萬噸的決心是好的，但安排800萬噸就好了。公社問題，當時似乎是因為農業、工業形勢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幾股風一颳，越包越多。（譚震林插話：「根本是把老規律打破了，不也過來了。」）現在條件下，農業、工業到底能按甚麼速度發展？農業不能30%，每年10%—20%還有可能。過去農業提出要趕日本，可見頭腦發熱程度。食堂問題，湖南的反對派有六條理由：（1）根本不節約；（2）不利於養豬；（3）破壞林業；（4）不能積肥；（5）不節約勞力；（6）吃得不愉快。我們還是努力辦好。糧食定要分配到戶，但只能是指標，糧要按月領，否則必過多餵豬、餵鴨，斤穀斤肉。小自由範圍放寬些，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去年變化不大，只顧了吃穿用，再沒人蓋房子了。現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轉彎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轉。

接着吳芝圃發言：河南共產風颳得厲害，虛報浮誇也最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基層幹部嚴重違法亂紀者三千六百人，堅決清洗。農民的工具、樹木、房子等，都算了細賬，退賠了。由於得到群眾諒解，已有95%的幹部連選連任。春節時有幾萬人浮腫。由於糧食大調動，比歷年春荒吃得好。人均1斤，鞏固食堂，勉強支撐下來。糧食基本供給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麵機。開辯論會後，現在食堂一個未散，90%可鞏固下來。多種經營好的，全省有10%發工資，從六、七元到一元

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農業大膽實驗，創造了一些經驗。最大變化在水利。去年600萬人上山搞鐵，從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鐵廠，算是有了工業。每縣有了個機械廠，可造鍋駝機。每個公社有個小修配廠，車床多了。鐵今年可完成60—70萬噸，鋼5萬噸，就是質量難保證。總路線完全正確。大躍進是事實，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來。錯誤已作適當檢討，怨氣還不是太大。不過，黨內外講話顧慮太大。知識分子有三不講：報上沒登過的不講；領導沒講過的不講；同公佈數字不合的不講。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後方針：一切為鞏固公社、食堂、豐收和大躍進。大集體、小自由要穩定下來，計劃要穩定些，年年能增產，浪漫主義變現實主義。吳芝圃講的精神，同周小舟的顯然不同。大家覺得他對河南嚴重形勢太輕描淡寫了。實際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開的會議上，糧食產量虛報、幹部違法亂紀嚴重等問題，即已發現，尤其密縣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談了湖北許多實際情況，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對1958年看法：成功與失敗都尖銳，取得的寶貴經驗，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面說，都有長遠意義。教訓確實沉痛，比1954年大水災情更困難。今春500萬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才深刻。1954年沒吃過12兩以下。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患浮腫病。早稻下來才能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沖昏頭腦。糧食只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1月還相信有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仍說有430億斤）；3月還說有350億斤；4月再摸，不到300億斤；上山前由縣委書記再摸，230億斤。1957年是219億斤。為甚麼增產不多？大躍進掩蓋水旱災情，500萬畝只收幾十斤（仍報千斤），有100多萬畝早稻失收。去年追求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領

導只抓了小面積樣板田，只抓了公路邊看得見的。腦子發熱，難於轉彎。說真話真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面說假話。假象掩蓋了真相，芝麻100斤可說1萬斤。大半年冷不下來。大家老老實實在說假話。（劉少奇插話：不要輕信，要有具體辦法，使人不說假話。去年一股風，批評右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脅下，說老實話的人去年不好混。）群眾批評：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年底大吃大喝時，老農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樂觀，無大災荒，可增產，但也到不了300億斤。糧種得多，油料就會少產。努力幹，從困難處着想。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小視，有的要一兩年才能好轉。手工業搞掉了，要恢復。工廠財務混亂，超支5億。3萬噸半成品，所賠的錢誰出？說大話，吃大虧。紗廠辦鋼廠，用掉流動資金。各縣盲目蓋了些工廠，可以改辦學校或變成倉庫。總之，1958年有豐富經驗，也有深刻教訓，要作充份估計，不要怕錯誤說多了，影響積極性。講清楚，出點冷空氣，說右傾，我也不怕。人的認識總有局限性，過程是曲線的。腦子發熱，很少看到不利；困難時，又少看到有利。過與不及，永遠存在。黨內有互相埋怨情緒，不利於團結。

7月6、7、8、9日幾天，轉入討論食堂問題和農業問題（這是地方最熟悉的問題），以及計劃、任務，各省談今明年和1962年的指標。例如湖南1962年指標較低：按人均計：糧1,000斤，豬一頭，油6斤；認為糧食指標過高不利，使用勞力過多，會影響其他副業。大家對林業意見很多，認為森林工業局實際是森林商業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來。河南再三講開發三門峽以下梯級水庫，還要大辦水利。

1958、1959年兩年，我以工作人員身份（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列席歷次中央會議，在小組會上從不發言。鑒於當時形勢，7月8日上午，我破例在中南組談了兩點意見。一是「以鋼

為綱」、「元帥」等口號，不再提為好。二是，去年怕提綜合平衡、怕提按比例發展。1958年一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我就不以為然。一次同喬木談及，他只說，這不過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而已。因這口號不合經濟規律，從而對於它引起的工業內部關係問題，他沒有我感受得深切。關於「元帥」，他倒有過同感，說：「元帥是可以發號施令的。」這時我特地細讀了一遍《政治經濟學》的有關章節，關於綜合平衡與比例關係想得比較多。自己管電，電同國民經濟各部門都有密切關係，是大躍進中最為被動而緊張的環節，電力當時雖被封為「先行官」，卻根本無法先行。我在發言中還談到鋼的產量達到1億噸，美國花了八十年，蘇聯花了四十年，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快一倍，但蘇聯人口也多些。我們可能比蘇聯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畫一條線，在某個數字的左右，擺動的幅度要有個限度，即某種波浪式，不能偏離太大，不能打擺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長期計劃。（當時毛澤東不同意定死長期計劃，我幾次進言無效。）還談到工業速度由鋼來決定合不合理？以甚麼「為綱」的口號，容易導致簡單化，片面化，單打一，滑出界限。綜合平衡即相對的穩定性，要瞻前顧後，要看長遠一些。關於必須按比例的問題，我提到1958年《紅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計委的同志寫的。我的這些意見，有的人很不以為然。我發言時，羅瑞卿還打斷過我的話，但我還是堅持把意見講完了。我的記錄本上只寫了「引起爭論」四個字。

7月9日下午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綜合平衡問題，記錄本上沒有具體寫是哪一個人的發言，記了這樣一些意見：綜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積累與消費。積累率蘇聯是25%左右。其次是工業與農業、勞動力分配。工業內部輕與重、原材料與加工業等。關於輕重緩急，重重急急，六保戶都失靈，專案（指必須保證的）

變懸案等，大家意見甚多。認為越躍進越要有後備，越要留有餘地。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公式，共產主義社會還是需要的（列寧的話）。農業「八字憲法」也包含比例關係。主觀能動性須根據客觀規律辦事。統計很重要，去年多假統計，因此也就導致假計劃。去年規律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眾說：共產黨九年半講真話，為甚麼這半年如此愛聽假話？1958年那種突擊性決不能經常，要根據經常現象做計劃。有節奏的均衡生產，鼓足幹勁應當是經常的能持之以恆的幹勁。領導經驗不能代替農民經驗，農民說，「不同意的事情，做起來手軟」。衣服可以幾年不做，飯不可以一天不吃。農業要很慎重，一點不能冒風險。由此可見，大家頭腦基本上是清醒的。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有不少插話，最後還講了這樣一大段話：1958年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補課。領導看好的多，而且估計偏高。去年二類苗比一類苗好，過於密植，施肥不當。產量有的紅旗隊低，白旗隊高。1958年最大成績是得到教訓，比躍進的經濟意義大。全黨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訓，也證明了可以大躍進。另一方面又出現了這麼多亂子，是破壞性的。斯大林似說過，平衡有了破壞，才知其重要。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沒碰釘子就知道轉彎，是難以辦到的。不要犯長期性、全國性錯誤；暫時性錯誤非犯不可，犯了有好處。全黨全民取得經驗，同個人取得不同。全民煉鋼，親身體驗。碰了釘子轉彎，就是正確領導，就是馬克思主義。王明路線，短促突擊，損失完了，還不知道轉彎，要讓歷史來總結。對去年問題，當前形勢，毫無悲觀抱怨之必要；因為有了教訓，認識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半成品還有用。對小高爐、小轉爐，吸取雙輪雙鏟犁經驗。工廠達到設計能力，要時間；快，也要時間，欲速不達。雙輪雙鏟犁的完

善，還有個過程，何況小高爐、小轉爐。去年的經驗教訓，不是以前七、八年能取得的。大家注意，不要洩氣；洩一點也難免，以不洩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要出問題，不能怕出亂子。不要責備下面，所有錯誤和問題都由省地縣擔起來，省委主要擔起來，幹部也不要老檢討了。很顯然，這時劉少奇雖然談到教訓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義來為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辯解。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講了如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辦公共食堂，對生產有利，但消費吃虧。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樣願意共產嗎？食堂自負盈虧，公家吃總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現在，有些農民不安定，想進城，不蓋房子，不買傢具，養豬、種菜比以前少了，有了錢就吃掉，這不好。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甚麼？要讓農民自己想辦法過好日子，興家立業。家庭制度應鞏固起來（按：毛澤東1958年有過廢除家庭的思想，幾次講過這樣意思的話），否則，有錢就花光。原則上應回到家庭過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糧食夠不夠？食堂要吃飽、吃好，人心才能穩定。總之，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不會成富農路線。這是有關5億人口安定的問題。多年以來，陳雲同志對糧食抓得多麼緊。北戴河一高興起來，是從糧食多了出發的。工業主要是大煉鋼鐵搞亂了，其他亂得不太大。蘇聯依靠經濟核算制，商品規律，生產總是越來越多。多搞糧食，變成雞鴨肉蛋，可以出口，換回東西。各省不要搞工業體系，但工業方向是重要的。

會外漫談

大躍進期間歷次中央會議，我同田家英來往最多，交談也最深。我們在延安就比較熟識。1941年後，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國內組，我在《解放日報》評論部。我們對歷史與雜文、詩詞都有同好。從1948年起，他就擔任毛主席的專職秘書。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住在中南海。1952年我調來北京，主管水電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並未因此減少我們間的共同話題。我在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寫道：大躍進期間的交往，就不僅限於擺擺龍門陣，或者跑跑琉璃廠了，而是經常議論時政，憂心國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這是真正的交心，當然也是危險的交心。所謂「危險的交心」，就是有時難免對主公（這是我們談話時，他對毛澤東的尊稱）有所議論：除談論老人家獨到的長處外，還談到短處。如說主公有任性之處，這是他有次同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談到深夜時兩人的同感。他還談到主公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田家英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反右派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自己從未反對過鳴放。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談到江青的生活作風及毛澤東周圍服務人員的某些情況，他很看不慣，很是厭惡。他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公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這是我們不止一次談論過的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事）；三是

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第三條他感觸最深，談過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況。神仙會階段時，我們的心情是比較愉快的，以為這次可以真正認真、徹底糾正一下「左」的東西了。我們都感覺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當時，關於1958年的種種問題，我同田家英談得最多。他還講過這樣一副有針對性的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間。我們都認為，毛澤東不如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為好。

剛上山的7月3日晚飯後，我散步路過胡喬木住處，他讓我進去閒談，實際上是火車上漫談的繼續。隨後陶鑄也來了，三人一起談。

陶鑄願意參加這種漫談，當然同他當時的思想狀態有關，因為廣東去年的教訓太大。他在廣東省委的理論刊物《上游》1958年第11期發表了《總路線與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於7月4日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論述。他認為廣東經濟建設受反冒進影響，1957年慢了一些，而1958年下半年又過了一些。原因是沒有很好掌握速度的客觀法則，躍進速度是在條件允許之下一定的速度，去年將鋼鐵生產強調到無限制的程度。廣東近兩年仍要貫徹執行農業為主的方針，從去年實踐來看，重工業和基建搞得過多是有問題的；今後兩者發展速度，必須在確保人民的生活資料得到基本滿足的前提下進行。以下這些我們三人的談話內容，我都記在記錄本上，大體上以胡喬木的意見為多：

共產風是北戴河颳起來的，也是公社化後颳起來的。會後，張春橋大肆迎合，寫了《論資產階級法權》一文，很受毛澤東的欣賞，親自寫了按語，在《人民日報》轉載。因此鄭州會議時，柯慶施將張帶了去。但當時對共產風利得較快，這個問題就沒再談了。毛澤東對徐水等地農民那種「鋪天蓋地」的勞動生活（集

體勞動，安營紮寨，挑燈夜戰等），極為讚賞，希望推而廣之。關於鋼翻一番，並非從農業生產而來（當時有不少人持這種看法）。這個意圖，是1958年6月間，毛澤東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聽到他說的，這時冶金部還毫無精神準備。我認為此事同1958年各大區安排1959年指標時，華東區首先颳起鋼的上漲風，有最密切的關係。我參加了華東區的這次計劃會議。華東區1959年的鋼指標，要達到600—700萬噸，冶金部曾據此計算過，1959年全國可達到3,000萬噸。因此，促動毛澤東下決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但胡喬木說，這也同他對國務院的領導不滿有關，想以抓綱張目的方法，用此口號來帶動其他工作，帶動各方面的大躍進。從這裏又談到在去年大風大浪中頂不頂得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在成都會議時，冶金部寫的報告，強調小高爐、小轉爐作用，大大受到表揚，因此就更加迎合，後來就更加無法抵擋高指標之風了。三人都談到必須遵守客觀經濟規律，不論如何政治掛帥，也不能違反規律。還認為應當尊重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而去年颳風以來，就都避免再提蘇聯經驗了。對毛澤東所講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說法，我們表示很大懷疑。喬木除開再一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等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記了。計劃工作必須以綜合平衡為主，必須經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來套矛盾規律。平衡內部即包括矛盾的兩個方面，無矛盾即無所謂平衡。然後又談到上海會議。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精神。胡喬木說，毛澤東引起海瑞說法的意圖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為讓海瑞出現，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我

們正在談着，富春進來了。這種談話也就中斷了。大概是由於在火車上我轉述了喬木的意見，富春特來找他漫談的。

7月6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他們住在一起）閒談，胡喬木和陳伯達也在座，幾個人談得很晚。以下所記也是胡喬木談得較多：

綜合平衡的問題進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飯，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的。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此才經常出現危機。（其實當年我們對二次大戰後西方經濟情況所知甚少。）這個問題當時談得最久，也是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我引經據典，舉了不少例子，以說明我的觀點：經濟工作必須保持經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為地破壞平衡。我們還從理論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寧所講的「均勢」，還把書找出來了，又認為並非如此。隨後談到，社會主義經濟現象總是平衡的，而政治現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運動中求平衡」也是一種遁詞；認為毛澤東提出這個說法，是為自己1958年的錯誤辯護，不肯服輸。接着說到比例問題，不按比例，即無真正的速度。「為元帥讓路」，去年做到極點，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結果鋼鐵本身也終於上不去。「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等提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規律。胡喬木又談到，對元帥的命令是要絕對服從的，去年陳雲被迫說過這樣的話：「亂七八糟，總要過河的。」實際是過不了河的。關於公社的由來，是受嶺岬山、七里營、徐水三地的影響，當時供給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來。公社與供給制的問題，在北戴河會議時，無人有精神準備。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和有關言論要及時。為甚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前後，毛澤東的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佈糧產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佈，告訴

了胡喬木，而胡喬木沒有向毛澤東彙報。為此，上海會議時胡喬木挨了批評，稱讚了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這時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佈公社決定，王不敢去彙報，劉少奇向毛澤東轉告了，結果毛發了脾氣。胡喬木說，王稼祥應當受到表揚。隨後大家談到，自南寧會議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這個期間，我同田家英還有幾次單獨的閒談，記得田詳談過他在四川蹲點調查的情況。關於過份密植的問題，農民很反對，他同李井泉有過很大爭論。他還發現真假兩個羅世發的問題。（羅是四川全國人大代表，著名劳模）羅說，過去高產是幹部逼迫下虛報的。田有一個專門調查的材料，我催促他趕緊弄好，送與主席一閱。吳冷西也同我談過，書記處開會，有些意見都是讓胡喬木去反映的。

1959年五、六月間，為查看一些水電工程，我從四川、貴州、廣西轉到湖南（資水柘溪水電站正開工），6月初到長沙。1949年到1952年我在湖南工作時，周小舟與我是正副職關係。他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當年我們一見如故，朝夕相處，意氣相投，凡事直來直去，建立了友誼和一定的交心關係。這次我在長沙只停了兩天，小舟約我到家中長談了一夜。他正從湘西調查一個月回來，途經湘潭、邵陽，豐富了第一手材料，曾邊檢查邊解決實際問題。5月底開了省委常委會。他在會上，就公社、供給制、公共食堂、作業組、大隊核算、怕不怕發生資本主義、人心思定、山區經濟、湖區負擔、糧食與鋼鐵指標，以及農民積極性與勞動生產率等十多個問題，作了長篇彙報，對大躍進、公社化

以來的「五風」等「左」傾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着手佈置較全面的糾「左」。1981年我在懷念小舟文章中回顧了這夜的談話：關於一年來的看法，我們毫無顧忌，交換見聞，觀點一致。雖是憂心忡忡，仍然談笑風生。小舟是一個平易而謙虛的人，並不固執己見，尤不願談自己。這夜的長談，他卻禁不住講到他的先見之明。他說，湖南去年老挨批評，被插過白旗。可結果是插紅旗的省糧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之後，對糧食估產，他跟左鄰右舍有過爭論：要麼你是官僚主義，要麼我是官僚主義，因為湖南估得低，鄰省估得高。還有密植問題，有的省過密，湖南較稀。從農民的一句老實話：「做了一天活，身上冇（沒有）出汗」，提出農民積極性問題。他不贊成辦常年食堂，辦食堂浪費人力物力。說公社供給制，窮的時候不能搞，富的時候也不能搞。還談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飯，糧食也只增產14%。他的總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靜下來，總結經驗教訓。路過長沙時，我同周惠也有過兩次閒談，覺得關於糧食安排，食堂問題，大煉鋼鐵等，湖南做得比較好。有3萬小土爐沒讓點火。中央關於自留地和糧食分配到戶的指示，湖南提出不同意見，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談到廣州開會，壓糧食高產指標，譚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插了白旗；他同譚為此有過幾次爭論。

上廬山之前，毛澤東一路視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對許多情況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後醞釀了十八個問題。去湖南時，王任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讓王接觸湖南情況。當時湖北糧食與市場全面緊張，想向湖南借糧。到湖南後，對毛澤東來說，這大概是當時印象較好的一個省，頗為稱讚，因而採納了小舟對去年總結的三句話，作為廬山會議的基調。周惠有基層工作經驗，雖然有時思想也難免「左」（反右時欠了賬，

後來作了檢討），但1958年糧食抓得很緊，對大煉鋼鐵等一套做法是懷疑的。關於糧食估產，他同廣東、湖北都發生過爭論。他挖苦過陶鑄：廣東糧多，你賣給湖南一兩億斤吧。因此，隨後也通知周惠上山開會。我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時即熟識，南下湖南時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談得來的。

神仙會階段，我與二周同在中南組。我們腦子中都裝了一堆問題，他們裝的農業方面的多，我裝的工業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補充。小組會的各家發言，自然也是我們閒談的話題。他們認為農業的高指標是由上而下壓下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還在毛澤東。因此，去年講大話、吹牛皮的一些人，一個時候很吃得開。小舟認為那些拆房並居、砸鍋煉鐵之舉，簡直是反動的。周惠說，去年第一書記應當各打五十大板。我們都認為在小組會上還難以暢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發言，就有人將我頂住；又聽說田家英在西南組的發言，挨了批評。因此，覺得會議確實還有壓力。

由於都是老關係，我在上述的兩處閒談，自然擇其印象深而觀點一致的互相溝通。小舟同喬木還有過單獨的交談。這種「危險的交心」，當時是無「危險」之感的，而且頗感我們的看法居於上風。胡喬木與田家英在華東組，其他幾個組的情況大體相似，這時會議《簡報》發得不多。彭德懷在西北小組的發言，是後來聽說的，當時並不知道。那時也沒多打聽別組討論的情況。北京來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沒參加過兩次鄭州會議，對綜合平衡等問題的看法意見相差不多。「鋼鐵元帥升帳」之後，一機部同冶金部的矛盾最大，因為鋼材品種特別是生鐵質量不合格，一機部非常為難。上海會議時，趙爾陸同我詳談過這方面的問題，這次聽說他帶了幾箱不合格的生鐵上山，準備讓會議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後來也並沒有擺出來。

幹部反應與社會輿論

7月10日以前，神仙會階段，發的文件不多，大體是有關速度和比例關係的資料（主要是國家計委編的），以及幹部和黨外人士對大躍進的看法。（《內部參考》、《經濟消息》、《零訊》等內部刊物所載）這些都同十八個問題糾「左」有關。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到會議原來的目的。7月23日講話之後，毛澤東自己批發了一些反右文件，其中有《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及《江西省中級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等，還有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的事件。恰恰是這些材料如實反映了當年的真實情況。由此可以說明，我們幾個人的會內會外議論，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幹部和群眾的許多議論，實際比我們談得尖銳而深刻，也更全面。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議論。

1959年5月間，當討論鄭州會議、上海會議鞏固公社方針時，江西黨校八十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初步鳴放後，對1958年大躍進有如下看法：

- (1) 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
- (2) 大煉鋼鐵是勞民傷財，是得不償失；
- (3) 糧食、副食品供應的緊張，就是農副業沒有大躍進的證明。

對公社化運動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 (1) 是「早產兒」，「群眾不是自覺入社，是被風颳進來的」；
- (2) 違反了客觀必然性，「是根據上級指示人為的產

物」；

(3) 沒有高級社優越，「農民只說高級社好，沒聽說人民公社好」；

(4) 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沒有條件，「公社的缺點大於優點，現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關於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認為是「心血來潮」，是「左」傾思想。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把兩種所有制轉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是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階段，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有不少人認為「共產風」是從上面颳下來的，中央、省、地三級應負責任，因為決議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統一核算、自負盈虧；武昌會議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比蘇聯容易；北戴河提過工資制改為供給制等。也有人認為上下都應負責，風由上面颳起，到下面就越颳越大了。關於公社生產方針，認為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時過早，原料、技術、設備、產品、銷路等環節，問題極多，且影響農業生產，容易造成勞民傷財。公社仍應以農業為主，工業放在從屬地位。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應該取消，應增加社員收入。都認為公共食堂並非共產主義因素，有三大壞處：排隊、搶食、浪費糧財；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能要。

在5月間討論經濟形勢時，天津市各區黨員幹部對1958年大躍進有以下種種看法，部份人抱有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1) 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認為全民煉鋼得不償失，糧食不夠吃，市場空前緊張，「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成了盲目發展，是冒進了」。

(2) 工業躍進了，農業沒有躍進。

(3) 政治躍進了，經濟沒有躍進。經濟損失很大，集中表現在煉鋼上。大煉鋼鐵有四大害處：a. 影響秋收；b. 影響整個

工業生產；c. 煉出的鐵不能用；d. 國家賠了23億。結果是勞民傷財，全面緊張。

(4) 生產上躍進了，生活上倒退了。

(5)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對農民的覺悟估計過高，忽視農村的現實條件。」「主觀願望超過了客觀。」等等。

六、七月間，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自由議論學習中，從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看，認為辦人民公社的條件根本不成熟，發展也太急太猛。吃飯不要錢不符合按勞付酬的分配原則。「全民煉鋼」的口號不對，「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萬噸鋼的指標也可以不提，因為這是領導上主觀主義的規定。要算政治賬，但也應算經濟賬，全民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賠的錢可以進口好多鋼。經濟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響不好。「以鋼為綱」的口號有問題，滿足不了經濟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個並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

廣州軍區據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這個材料是彭德懷提供的），「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經濟緊張是全面的，長期不能解決的。有的人講怪話：「現在除了水和空氣以外，其他一切都緊張。」「中國大躍進舉世聞名，但我懷疑，市場緊張就是證明。」有人甚至認為我們的事業後退了，說：「1956年好，1957年較好，1958年成問題。」他們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說「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規律」。「人民的覺悟沒有跟上來，工人、農民和軍官都對成立公社有意見」。「蘇聯建國四十年還允許私人有房子，我們建國不到十年，就甚麼都『公有化』了」。「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他們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說：「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

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甚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職務，彙報材料中說，這些人「政治上一貫落後」、「有一人是反右派鬥爭時的重點批判對象」。上述少數部隊中下層幹部談的，當然主要是當時農村情況的反映。

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於1959年7月4日到無為檢查工作，他是本地人，戰爭時期長期在這個地方工作，因此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感到最突出的問題是公共食堂不能再辦下去了。9日，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隊，向隊幹部和群眾宣佈三條「三還原」：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當晚就要縣委書記予以貫徹。到7月15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就「一風吹散」了，並對少數「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統統解散。張還責令縣委調查公社化前後有關勞動力、生產資料、房屋、幹部作風和發病率等情況的變化。這是會議後期大批右傾時，有名的「張愷帆事件」。

6月間，國務院所屬工業、農業、財經、文教十幾個部委的黨外人士，聽了國內經濟情況解釋後，統戰部作了一個綜合反映：少數人對於這個解釋，仍有懷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質部副部長許傑說：「1958年的成績，說大也大，說沒有也沒有。」有的說：「去年大躍進，還不如前幾年沒有躍進。」有的甚至說：「現在物資供應緊張情況，比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嚴重。」不少人對去年糧食增產仍有懷疑，「糧食增產每年絕不可能超過50%」。不少工程師說：「煉鋼損失了23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去年煉鋼到街上去挖磚，這叫做一面建設，一

面破壞。」「給鋼讓路這個提法不恰當，不符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文化部有人說：「去年大躍進，可說是人民力量大檢閱，是人民對黨的信賴，但黨也不能濫用這種威信。」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去年發生的錯誤，沒有經驗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問題，有些人不懂裝懂。」一機部一位人大代表說：「我在思想上有一個矛盾沒有解決，就是如何對待運動。我很怕運動。對有些意見，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幹。」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說：「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憂心忡忡，持有批評性的看法。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性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19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

7月4日，毛主席批發了「幾篇論述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文章」。如山西《前進》第6期社論《論社會分工與協作》，指出大躍進中，某些社會分工被打亂了，某些地區與部門協作關係中

斷了。當前問題是，對重點建設的要求偏高偏急，基本建設的鋪點過多過寬，而有關生產和生活的輕工業和某些次要的原材料工業，則照顧偏輕偏少。有的行業為保重點，被迫轉業，如陶瓷業改成耐火材料廠，許多鐵器手工業集中成冶煉企業。社論認為目前階段，各地區不應強調建立一套工業體系，決不能把人的主觀能動性估計過高，對待手工業改組要慎重，在相當長時期內，它們在生活與生產兩方面，仍是現代化工業的必要補充。社論還批評了在廠礦企業發展多種經營的思想（這是毛澤東在視察武鋼時提出的），似乎大躍進要求社會分工越粗越好。有些廠礦不管條件允許與否，盲目發展「衛星廠」，提出「萬事不求人」的口號。又如北京《前線》連續發表社論，號召注意綜合平衡，不但在全國、全市應該抓緊，而且在一個廠礦企業，一個縣區、公社內部，也應加注意。從而批評了在計算產品和產值中的不正常現象。在某些企業中，為了追求產值數字，甚至不惜大量投料，生產不急需產品或不能配套的半成品，浪費了材料，積壓了資金。產值計劃雖然完成，產品計劃卻沒有完成。這樣做是本末倒置，從而影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為當前工業生產中主要矛盾之一。

從上述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廣大幹部和黨外人士，尤其是技術人員，以他們的親身感受、所見所聞，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乃至總路線，提出了根本懷疑和否定性看法，也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各省市領導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從思想認識上扭轉過頭的東西。連柯慶施也帶了一些糾「左」的材料上山。神仙會初期批發這樣一些材料，自然是為了澄清思想，統一認識，使廬山會議開出個比較好的結果。

李雲仲的一封信

廬山會議後期（7月26日），毛澤東批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寫了近三千字的批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這個批示實際是7月23日講話的繼續，以推動批判「右傾思潮」。從對大躍進的看法與對計劃工作的意見來說，李寫的是一封極具見解而有代表性的「萬言書」，其中還暴露了計委內部的有關情況。李雲仲原是國家計委基本建設局的副局長，寫信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他的工作崗位使他較能了解全面情況。這封長達一萬多字的信，於1959年6月9日寄出，是直接給毛澤東寫的。信的內容具體，觀點鮮明，論證確鑿，態度誠懇。開頭就說：「很早就想給您寫這封信，一直到現在才發出……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根據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體驗，我想對目前經濟生活中發生的問題，聯繫到一些思想作風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供參考。」毛澤東的批示說，李雲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當年像李雲仲這樣較高級的幹部，敢於直言上書，指出大

躍進是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在會外的閒談，至少都還不敢這樣露骨地直說。信中說「問題可能是從大搞水利建設開始的」，這是事實。我在水電部工作，也有親身體會。這股水利化的風大體是1957年冬颶起來的。李雲仲的信中說：「這裏提出兩年水利化，那裏就提出一年、甚至幾個月水利化，其實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但許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庫、灌渠、河流工程，在既無勘查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後毫無效果，或者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信中還寫到，1958年1月，他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一百多里長的大灌渠，既未經勘查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畝小麥。他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制止住。結果這條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後來又參加「苦幹十天」的大會，十天內養豬增1倍，掃除文盲，除掉「四害」，鋤完大田，等等。「竟沒有一個人提出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信中還特別提到：「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最大的消耗。」關於公社化運動，信中談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這裏共三百多戶人家，去年年初有豬三百多口，但今年只剩了九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關於基本建設，1958年全國已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有1,900多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倍，幾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幾年內建成一個工業體系，現在繼續施工的只有幾百個了。從而談

到經濟工作中的本質、要害問題是：「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動用系數連50%也不到。（即100元投資花下去，能動用的不到50元）上百億投資，上百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在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用。看到這些損失確實很痛心。這種情況本來可以避免的。」然後信中說到，由於到處大辦，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而且售貨員、理髮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份建議「在各級幹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應當說，這是切中時弊的藥方，只差沒說，反對主觀主義應當首先從中央、從毛澤東本人做起。（但說了「各級幹部」）李雲仲認為八大制定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問題是用甚麼樣的思想作風貫徹。他從下面幹部發生的情況這樣說道：「為甚麼主觀主義可以有時在一些工作領域能暢通無阻？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黨內造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在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徵的迎合情緒卻感到很濃厚。這種迎合情緒絕不能與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相提並論。這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他舉出上述灤縣的例子。然後談到他在計委工作時的情況，在局務會議上幾次提出：「計委一定要管限額以上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必須經過審查，否則要造成嚴重後果。這個道理在當時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無人向計委領導反映，也無人認真研究這些對國家有決定意義的情況和問題，你提你的意見，我應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會議提出清查時，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廠房、房架、柱子已立起來了；幾十億的投資、幾百萬噸的建築材料、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被佔用在不能發揮效用的『工程』上了。幾年

來的經驗證明，基建項目、規模的安排合理與否，往往對整個國民經濟起決定性的作用。基建戰線過長對當前緊張狀況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李雲仲親自參加了大煉鋼鐵運動，「回來對一位負責同志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這麼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志卻和我講，事實上很多人當時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當然，這個問題早在實際工作中解決了，不過當時老是想：為甚麼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要發展生產力？又為甚麼不叫人家提意見？」

關於1959年計劃，信中說：「我們從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感到問題很大。雖然在多次會議上，並且向很多能接觸到的領導同志提出意見，也整理過一些資料來說明計劃中的問題，但是誰也不願提出來。今年年初，在整理一個資料時，我又堅持把計劃問題提出來，卻又受到領導上的嚴厲申斥，甚至提出了『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為此事長時間難過極了。」這位申斥過他的領導同志，也明知「差口這麼大」的嚴重性，後來又向人說：「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紅塵。」李雲仲似乎不能理解當時許多高層負責同志的為難處，因此在信中說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卻要大家『看破紅塵』，這是甚麼樣的人生觀！我回到宿舍以後老是想來想去，共產黨員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能採取這種態度？這些人是把黨的事業放在前面，還是把個人得失放在前面？黨的一部份事業，由這樣的『領導』來管理是適當的嗎？」

作為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人員，信中還談到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最危險的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係尖銳化的比例關係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面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係，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就是屬於這一種」。去年增加的2,100萬工

人，大部份來自農村（農村中的骨幹勞動力幾乎抽光了），連他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由生產農產品一變而為消費農產品的人。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關於計劃工作問題，幾年來是大家意見最多，也最不滿意的一件事情。今年這個多了，明年那個少了；今天變過來，明天變過去；今天生產這種產品，明天生產那種產品；今年這個項目施工，明年那個項目停工……總之是，『左右搖擺，進退維谷』，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一位同志跟我說：『今天很多問題，計劃部門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樣說可能有些過份，但是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機關，未給中央當好『參謀部』卻是事實。』」然後，信中指出近年計劃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有三：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況，才能做好綜合平衡，但實際常常是在各單位、部門間，年度、長遠間，以及材料、進度，主機、配套，以及基建項目間，顧此失彼，畸輕畸重，「有數字無措施，有計劃缺檢查」。

（2）這不能簡單歸於無經驗，而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嚴重，特別是1958、1959兩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又很少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規劃；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經過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討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具體經濟計劃工作人員和廠礦企業的意見，很少得到考慮；每次計劃方案，下面意見很多，也知道問題很大，但就是不採納，甚至無人聽取這些。向中央提出所謂方案，往往是3,000萬噸是積極的，是可以爭取完成的；2,200、2,000、1,800萬噸也是積極的，可以爭取完成的。其實很多做具體工作的人都了解，沒有充份根據，漏洞百出。今年的計劃調整後，鋼按1,300萬噸，比去年增加500萬噸好鋼，當然，仍然是躍進指標，但問題還很多。

（3）在大運動中，計劃工作不能正確堅持黨的原則，跟着

人家跑，時冷時熱。蘇聯計劃工作的重要經驗，就是要堅持原則。「計劃機關在一個部門、地區對一些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必須從全面出發堅持原則，不能怕有爭論；事實上往往由於在這方面站不穩而吃大虧。對這項經驗，我們吸取得不夠。」信中還談到一個最迫切的問題（這也是我當時最憂慮並幾次進言的問題）：「長期計劃必須盡快編製，否則許多重大問題不能解決，如基本建設和重大項目建設規模問題，大型設備的生產安排問題，部門間的比例問題，工業佈局和地區規劃問題，重大的技術政策問題等。」

此外，信中還針對毛澤東提倡的一個地區或一個省建立獨立工業體系問題，以及去年以來，中央把工業、商業、財政、物資等管理權限下放過多的情況提了意見。他舉出具體例子，說明原料與產品相互供應的橫向聯繫中斷，生產和市場都會發生嚴重影響，從而提出「國家窮，工業基礎很弱，事實上全國只有一個工業體系」，各地區在短期內都形不成一個獨立的體系。是集中還是分散對國家建設有利呢？「想來想去還是集中多一些好。」信末還談到如何樹立節約與樸實的風氣問題，批評近年豪華的高級賓館、飯店建的太多，國慶幾大工程也有些過份。「今年各地用在『國慶工程』投資恐怕有八、九億元之多，這可以建一個年產300萬噸的鋼鐵企業或1,600—1,800萬平方米職工住宅。」關於會議的伙食標準太高，請客送禮之風，以及負責幹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毛澤東在批示中雖然說「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了一切」，但對他敢於直言的精神還是表示了讚賞，尤其對信中道出計劃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很覺中肯。「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採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

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佔了信的大部份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銜上告。」

從李雲仲的一封信及毛澤東對此信的批示（儘管這個批示是發動批判彭德懷以後寫的），就在當時也可感到：廬山會議本身和毛澤東本人思想的發展（兩者密不可分），是多麼矛盾，多麼不可理解啊！

李雲仲本人的命運如何，當然可以想像得到：在劫難逃。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他的一位親近朋友，曾特意到我家中對我說，他看了這本《廬山會議實錄》（第1版）後，心情很不平靜，萬萬沒有想到這封信還會收入一本史書，並作出符合歷史事實的公正評價。當然，毛澤東當年看了這封信後的複雜而矛盾的心情，以及正反兩方面的評價，他也是看了這本《實錄》後才知道的。

7月10日講話與毛澤東第一次召見

從現在人們寫的有關回憶文章中，我們得知毛澤東在7月上旬還安排了這樣一件事：找楊尚奎和方志純的夫人，7月8日將賀子珍接到山上來，同賀話舊。這件事當時我們都不知道，包括田家英在內。由上山賦詩和這件事來看，當時毛澤東的心情顯然是比較輕鬆的。但是，由於各小組的討論出現了一些相當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意見，不僅包括食堂這種具體問題，還包括對形勢的看法不盡一致，於是7月10日晚，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下面是第二天聽到的傳達：

這次會議初步安排開到15日，延長不延長到時再定。會議討論的問題，整理成會議紀要。形勢、任務等問題起草成文件，由中央批發；糧食問題，大家還有甚麼意見，修改後，作為正式文件發。

對形勢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龍雲、陳銘樞說我們人心喪盡，天安門工程如秦始皇修長城；說歷代開國之時，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就是農民、工人都不贊成了。黨內天津的科局長對去年有議論，大躍進是得不償失。他們不了解全面情況。「得不償失」，可舉幾十、幾百上千件，無非頭髮卡子、菜、肉、蛋不夠，有的買不到了。對這些同志要講清道理，不要罵人，要幫助他們認識整個形勢。得的是甚麼？失的是甚麼？比

如，為甚麼大躍進之後，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上海有一個黨委書記，否認去年的大躍進，辯論之後，殺頭也不承認大躍進好。後來到家鄉調查，仍增了產。可以不殺頭，進行教育。龍雲多活十年好，否則到閻王處還造謠。

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份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份缺點錯誤。去年四件事：1959年要搞3,000萬噸鋼；基建1,900多項；糧食翻番；辦了人民公社。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並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項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為了3,000萬噸鋼，引起各方不滿。不管右派「左」派，黨內黨外，要是說缺點，確實有，都承認。因為總不能說糧不緊張，肉多了，計劃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認有些被動，但並非全面被動，也不會垮台。公社沒垮嘛，垮一部份也不要緊，再辦起來就是。食堂情況也並不比公社好，垮一大部份、垮一部份都好，我都支持。食堂準備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堅持我都贊成。其實公共食堂在公社化前就有了。有人說就是總路線搞壞了，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即否定總路線。所謂總路線，無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會錯。不能說1958年只有多快而無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體分析。過去搞1,900項基建，現在788個，這還是合乎多快好省的。1,800萬噸不行，現在1,300萬噸，還是多快好省。去年糧食沒有翻番，但增加30%是有的。多快是一條腿，好省又是一條腿。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是誇大了一些，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佈。

有這麼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炎培的兒子黃萬里寫詩說，中國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國。經過調查，美國的路面也有出水的。黃萬里的詩，總還想讀

的。（按：黃係清華教授，當年在校刊發表雜文《花叢小語》，對北京市道路修建有違工程常識，造成損失事，小有諷刺，謂如在美國，此等事必引起納稅人抗議。文首有賀新郎《百花齊放頌》。）對蘇聯也是早晚市價不同，斯大林一死，甚麼不好了；衛星一上天，又變過來了。農業發展，通過合作社到公社，我們總是增產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社、公社化總是推動了生產的。蘇聯集體化後，很長時間糧食減產。

現在證明一條，社會主義國家中，過去總是說農業合作化以後總是要減產，但是我們的經驗證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減產。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甚麼觀潮派、懷疑派、算賬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總可以有70%的人贊成總路線的。

打仗，世界上沒有從來不打敗仗的將軍。打三仗，一敗二勝，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勝二敗，就建立不起來。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一個指頭或七個、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彭老總說一個指頭多一點），沒有甚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群眾路線問題。只能說一個時期、一個問題上，我們脫離了群眾。算賬、整社是個大問題，不要虎頭蛇尾。對公社和農村廣大幹部，要繼續整頓和教育，但要分析，要有信心。河南整社中120萬幹部，有三分之一大大小小犯點錯誤；只有3,600人惡劣，受了處分，佔千分之三。對幹部要有分析，對壞人則不講團結。

北戴河會議後，一部份問題被動，特別是四大指標，當時不公佈就好了。自己立個菩薩自己拜，很被動，當時人心高漲，心是好的，形勢很好，但埋伏了被動。經過鄭州會議（指第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漸認識客觀實際後，腰桿才硬起來；但是還有一部份軟，還被動。副食品總還是不夠吧，北京有一個時期每天四兩蔬菜。在這些方面，腰桿子還不硬。人家對此有意見，講得對。要認識這方面的缺點錯誤。這也像打仗一樣，有繳獲，有損失，一個連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總賬不能說得不償失；有的問題是得不償失，這屬於缺點錯誤部份。斯大林講過，關於規律，人們適應時感覺不到，一破壞才感覺到了。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去年確是破壞了一部份規律，才提高了認識。人的經驗從兩方面來：成功與失敗。如打仗，首先從勝仗來，其次從敗仗來。經濟建設亦如此，要從成功與失敗兩方面學習，這樣才能認識與掌握客觀規律。我們要接受斯大林遺產，要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我們為甚麼搞一套兩條腿走路方針，這是鑒於斯大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腿短，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斯大林在世時，對一些大問題，多年來才得到統一認識；但有些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如農業問題。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可劃個界。赫魯曉夫使農業得到恢復與發展。我們要快一點，因為我們找到了一條正確道路。發現缺點快，糾正也快。蘇聯的長短腿（指工業與農業）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要真正用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還有五個並舉，但執行中未能全按這樣來做。去年注意了多快，對好省注意不夠。小洋群代替小土群，對小土群也不要全部否定。

張奚若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

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甚麼不好呢？去年1,900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只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志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再過十年到十五年趕上了英國，那時陳銘樞、張奚若這些人就沒有話講了。這些人希望他們長壽，不然，死了後，還會到閻王那裏去告我們的狀。

北戴河會議以來，雖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總是抓工業了。（按：這是就他自己和某些過去從來不大過問工業的地方領導幹部而言。）一年中有很多經驗，我負有責任。1953年批評薄一波，後來批評計委，這次自己負了責任。南寧會議後搞地方工業規劃，聽湖北彙報，說過去太保守，只有70個億。當時說過，這可能是主觀主義，但總比不搞好，因為原來沒有甚麼地方工業，搞了點東西，就是檢討起來，也有個根據。搞經濟建設，過去不過陳雲、富春、一波，現在大家擔當起來。過去省的同志沒有抓工業，去年都抓起來了。過去大家抓革命，經濟委託一部份同志做，書記處、政治局不大討論，走過場，四時八節，照樣簽字。從去年起，雖然出了些亂子，但是大家都抓工業了。所以，還是湖南那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鋼已超過蔣介石時代，十萬零一噸就超過了。這樣看，成績是偉大的。這樣的形勢分析，是關係全黨、全民的問題。有無信心，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問題。

一年實踐，抓了工業，取得這麼多經驗，同過去只聽「訓話」，走過場，讓簽字畫押，總算是不同了。一年來有好的與

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說光有壞的、錯誤的經驗。

〔總理插話：副主席（按：指當時應中國邀請前來觀察全民煉鋼運動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副主席扎夏季科。他回國後向蘇聯領導人談中國觀感，有批評性意見。不知道是他沒有向中國方面全部談出他的真實看法呢，還是周恩來沒有轉述批評性部份）來談兩條：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缺點、錯誤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我們發明「大躍進」這個詞好。〕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蘇聯經驗寫了書。以前他們有公社問題；斯大林講過，集體農莊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虧就在說他辦的事，一切都很好。從不講缺點，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有錯不能很快改正。蘇聯1936年憲法，《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否認矛盾；否認缺點錯誤，就不能前進。我總是同外國同志說，請你們給十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應該說，我們對建設還沒有經驗，至少還要十年。建國後十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開會，第十年度在廬山開會。我們這一年來的會議，總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決。大家要記住：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常分析問題，腦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們這一套。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不在制定之時，而在執行之後。過去的革命路線，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的建設路線，要再看十年。從具體事情來說，有些得不償失問題；但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一定學費的。（劉少奇插話：大辦鋼鐵花了二十多億，全民學了，值得。）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

講到報酬，要按勞付酬。把共產主義引導到平均主義是不好的，過份強調物質刺激也不好。報酬以不死人、維持人民健康為原則。這話是黨內講，對先進分子講的。國家建設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份先鋒分子、積極分子。我們為革命死了多少人，頭都不要了，還給甚麼報酬。天天講物質刺激，就會麻痹人的思想。寫文章要多少稿費，錢多了，物質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養共產主義風格，不計報酬，為建設事業而奮鬥。

宣傳問題。關於已公佈的指標改不改？兩種意見：一種，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一種，現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計劃一起改，正式發公報。也有一種意見，1958年不改，1959年就不好說實話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計劃改不改，要不要？明年拿不拿出來？我看現在難搞，經驗還不夠。對外來說，八大通過的，已經有過一個二五計劃，實行中無非超過。可以黨內搞個二五指標，此事也難以肯定，搞個發展趨勢，發展方向。

今年黨代表大會是否不開？經驗還不成熟，缺一年也可以。黨代會開不開？各級改選不？小組會討論一下。

農業四十條，贊成搞；人大大會還沒通過。單位面積產量，有人提出400、500、800斤改為500、600、1,000斤（即黃河以北，以南及長江以南畝產指標），是否改500、600、900斤？高寒地區在外。不要把兩廣壓得太重，大家考慮。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還要搞。麻雀是否還要打？

糧食如果今秋確實大豐收，可以徵購1,100億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減少一點，如甘肅、湖北，可以減少一點。過日子問題，要好好給大家講一講，有些地方去年增產不多，今年糧倒不緊；增產多的反而緊，主要是估產高了和安排不當。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鄉、社幹部。「糠菜半年糧」改為「瓜菜半

年糧」好，原來只是極而言之。

縣級以上基建項目，原來有13,000多個，許多根本沒有動，只是列上計劃。去年打了個大勝仗，把我們也打得稀里嘩啦。現在是後備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點，增加儲備。過去打了勝仗之後，人員傷亡，可以合併編製。搞經濟建設，不能將兩個工廠合併成一個。

從這篇講話看到，當時毛澤東的思想雖然仍堅持大躍進還是打了一個大勝仗，總的說不過是1個指頭與9個指頭的問題，但確實是要大家冷靜下來，要承認去年確實出現了失誤，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待一個個去解決。講話中還提到彭德懷的看法，可見對彭尚無戒心。那時的大問題是必須將各種指標落到實處。例如7月5日，有關糧食問題的一段近千字批語，就是如此。陳國棟關於下年度糧食分配調整意見的報告，認為必須把糧食分配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留有餘地；仍應繼續貫徹執行「瞻前顧後、以豐補歉、細水長流、計劃用糧」的原則。認為全國約需4,300億斤原糧才能過日子。除1958至1959年度銷售了1,020億斤外，歷年銷量都沒有超過840億斤，因而提出1959至1960年度銷售指標855億斤（比上海會議定的少120億斤）。毛澤東批示，此數似乎也略多了，可否調整到800億斤或810—820億斤。「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乾，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手裏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他基本上同意陳國棟的報告，要「各大區區長主持討論，細緻地討論，討論兩至三次」。

為了弄清情況，克服困難，統一認識，在7月10日講話以

前，毛澤東還批示印發了好多份有關資料，其中或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或反映市場的緊張情況和幹部群眾的不滿情緒。如《宣教動態》上刊登的山西《前進》、廣東《上游》、北京《前線》（當年各省的理論刊物）上的文章，總政轉發的少數營團幹部的意見，以及國家機關黨外人士的看法等。其中有的意見很尖銳，直指「全民煉鋼」口號的不正確，人民公社化太快。同時也批發了河南整社算賬，情況好轉，以及公共食堂優越性的材料。

綜觀7月10日這個講話，仍是十八個問題的精神，是想使討論盡快結束，大家取得一致意見。廬山會議原來傳說開半個月左右，即7月16日大體要結束，這次講話前後，就安排寫會議紀要了。

7月11日夜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談話，當他們談到在小組會上我的發言被人頂住，馬上就通知我也去參加。（所謂頂住，是前述中南組的會上，我的發言被羅瑞卿頻頻打斷。後來羅在8月9日第二組的會上批判周小舟時，羅是這樣說的：「我和李銳同志有點衝突，他說以鋼為綱不對，政治掛帥有副作用，還說有人不喜歡講缺點，我不同意他的觀點，雖然沒有展開爭論，但有幾次短兵相接。」）我一進門，毛澤東就笑着說，「我們來開個同鄉會」，可見氣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觀點，看到我被人無理打斷，而難以暢言，這樣向毛澤東作反映的。談話完全是四個人輕鬆愉快地交談，有時相互插話。我的記錄本上分別記了些簡單要點，現照抄如下：

周小舟談：農業是根子。糧食「高產」引起鋼鐵高潮。（毛澤東說：也不盡然。）颺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裏有甚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毛澤東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畝產幾萬斤，因

此就相信了。)「書記掛帥」權力太大。去年傅主席的話，有些亂傳，更增加了紊亂。譚老闆(譚震林)有的講話和文件，湖南壓下了，沒有向下傳。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因此沒有失收的問題。會議還有壓力問題，還是不願多談多聽缺點。周惠也插了話。都說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互相交鋒，才有好處。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建議，最好將大區組打亂，各組人員互相穿插，這樣更便於交流情況、交換意見，免得一個地區總是唱一個調子。這個意見毛澤東當時就欣然接受。隨後就通知了秘書處，從16日以後，開會人員就打亂平分，但組長沒動，仍分六個組。

南寧會議之後，我有多次同毛澤東單獨談話的機會，從未感到過拘束，心裏有甚麼就說甚麼，這次還是照舊。我主要談冶金部的問題。關於各地大煉鋼鐵中的情況，如指標落實及質量等問題，冶金部一點風不透，問不出消息；不如計委內部，還能及時知道點實情。今年4月上海會議之前，我就是從計委廖季立處問到鋼鐵若干實情(1959年2,000萬噸絕對不能完成)，以及自己從其他方面特別是電力平衡上感到問題的嚴重，於是向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1958年6月華東計劃會議時寫的，對那次會議潑了冷水)，明確提出鋼的產量必須下降，落實指標，這樣才免於影響全局。對鋼鐵還提出關鍵是質量問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關於綜合平衡問題，這時我談到蘇聯經驗，以及列寧、斯大林的說法，隨手將1959年第9期《宣教動態》(中宣部內部刊物)送上，請毛澤東過目。上面有一篇引證蘇聯經驗和斯大林語錄的文章，社會主義如果發生經濟危機，會比資本主義嚴重得多，因為社會主義是集中計劃體制。我說，去年是唯心主義、小資產階級急性病大發展的一年，敢想敢幹起了許多副作用。「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等口號不科學。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說，以後可不提這些口號了。毛澤東在去湖南視察時，一

路同王任重發表過這樣的感想：去年大躍進搞亂了，「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即指陳雲而言。（這句話隨後柯慶施等都知道了）我這時乘機建議，財經工作還是由陳雲同志掛帥為好。（南寧會議以後，陳雲只擔任建委主任，歷次中央會議很少發言）二周也當即附議。毛澤東於是向我們講，「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這是《三國志》郭嘉傳上的話。曹操打袁紹，吃了大敗仗，於是想念郭嘉。說陳雲當總指揮好，陳雲有長處也有短處（短處大概是指對群眾運動注意不夠之類，我的記錄本上沒有記具體內容）。

毛澤東談的主要內容如下：提倡敢想敢幹，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裏，他自己和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起來，久久不息。說關於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胡思亂想起來。「許多事我都要負責，有些也真負不了。」關於公社的由來，毛澤東說：在河南七里營，記者問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誰知馬上就都登上報了：「人民公社好。」接着談到亂傳講話，傳得快。我們說，還是形成文字為好。毛澤東說，講得不對，文字也一樣不好。鋼翻一番，誰知道當成了法律，黨比人代會厲害得多。（他似乎忘記了，對大煉鋼鐵執行不力者，北戴河會議還內定了六條紀律：警告；記過；撤職留用；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北戴河規定翻一番，索性登報，是薄一波和胡喬木的建議。接着談到自己的性格，回憶起江西時代的往事。一次向毛澤覃大發脾氣（或者還要動手打人），毛澤覃回嘴：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裏；現在還有肝火。」鄭州會議後，開始右傾。去年是幾件事都擠在一

起了。（承認糧食、鋼鐵、公社化等幾大躍進不對頭）關於下面講了假話，可以轉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麼沉重。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意指客觀規律不易弄清），誰知道搞鋼鐵這麼複雜，要各種原材料，要有客觀基礎，不能憑手氣。（這以後毛澤東反覆講了鋼的問題。我再三提到，二五計劃輪廓要定下來，否則不好辦事。）搞到1967年，十年計劃，明後年再看，能達到2,100萬至2,400萬噸就很好了。今年1月開政治局會，關於鋼指標，陳雲講2,000萬噸不易完成，同陳雲意見原來一致，不知為甚麼他後來要檢討。去年的問題就是抓了個「兩小無猜」，別的忘記了，這是本末倒置。去年農業是否增產了三成？還很懷疑。全國各地很不平衡，有各種災情，有豐收有歉收，一填平補齊，三成很不易得。還談到他自己就是個對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時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

毛澤東這夜同我們的談話，對糾「左」的許多看法，比頭天在組長會上的講話還要明確。關於對糧食與鋼鐵的增產和高指標的看法，同我們是很接近的。因此，我們三人談完話出來，都覺得心情舒暢，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膽講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句話直接批評了毛澤東，不僅絲毫沒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談笑風生了。

這時，毛澤東似已多日沒有找下面的人個別談過話，大家都在摸風向，不知他的意圖何如。我比較謹慎，許多人向我打聽（包括總理的秘書），我都沒吱聲。劉瀾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沒有向他透露甚麼。這是從田家英那裏得來的經驗：常有反覆之變，不可輕易傳話。可是後來才知道，小舟隨意向人流露了高興之情（羅瑞卿曾陪毛澤東一起到湖南，小舟向羅講了「上有好者」的話），於是有的話就傳到柯慶施這些人耳朵裏去了，他們正在窺測方向。他們對去年的所作所為，興風作浪，迎合抬轎，

不僅沒有絲毫內疚，認真檢討，反而觸動不得，一觸即跳，過於護短，過於護身。他們打着保衛總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旗幟，將「神仙會」變為「護神會」，將中國繼續推向大災大難之中。

我的《廬山吟》第三首「初登樓」，即寫這晚奉召談話的輕鬆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
話到曹營事難辦，笑聲震瓦四心通。

會議形勢與毛澤東第二次召見

在《議定記錄》和彭德懷的信沒有印發之前，根據毛澤東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以及十八個問題，六個大區小組會的討論，大體上西北、東北和華北三組，較能敞開談，成績大講，缺點也隨便講；但中南、西南和華東三組則有所不同，缺點多講了一點，就會有人不高興，甚至打斷發言，護短的人還是比較多。北京來的人，因沒有參加過兩次鄭州會議，不大知道糾「左」和開五級幹部會等情況，不免對缺點談得多一點，關心的也還主要是鋼鐵等指標落實，以及1959年和1960年計劃的安排，也關心二五計劃怎麼辦。

7月12日到22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李富春、李先念都參加過，劉少奇也參加過一兩次。我的記錄本上，記有12日周恩來的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北戴河會議到現在將近一年，應如何將認識與措施過程縮短。他說，這次在廬山比以前認識多了一些。如財政有赤字，是否即通貨膨脹？物價只少數有變化。過去陳雲總強調財政、物資、現金三個平衡，要略有節餘。去年全衝亂了。主要是貨幣與財政不一致，銀行多發行了。他將工業、農業、商業分頭算了細賬，單生鐵，國家即補貼25億元。商業透支了50億，用於賒銷和工農業預付。今年上半年銀行支出中，工業有30億不正常。攤子鋪大了，一機部等生產任務多變動，品種不齊，不能配套，質量下降，次鐵退貨等。冶金部今年24億投資，上半

年已用去19億。他認為繼續躍進，過份緊張，綜合平衡工作沒有做好，不能這樣過日子，特別是三材太不平衡。國家一定要把賬算清楚。要收權，去年四權分給省市，要收到中央與省市兩級，上下納入計劃。要歸口管理，不能一個人四個口袋，流動資金不能當基建使用。最後說，要號召增產節約，解決商品與貨幣比例的正常化。大家採取積極態度，不要隱諱問題，也不要埋怨和推諉。

這天李富春講了兩個問題：

(1) 繼續鼓幹勁，採取積極措施。政治、經濟、技術要三結合，現在確有指標越落實越低的情況，否則今年鋼產1,200萬噸也不能完成。

(2) 工業如何過日子。要真正建立經濟核算制；質量定要提高，關鍵是鋼與鐵，「兩小」的質量問題。去年和今年，鐵是補貼60億的問題（去年1,100萬噸40億、今年900萬噸20億）。此外，還要清理半成品，新招工人力爭退回800萬。

劉少奇插話：錯誤是大家犯的。基建今明兩年統一安排，更為主動。

李先念發言：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農業還鼓點勁。流動資金大體已堵住。問題是不該上的項目要捨得下馬。滕縣官橋煤礦，花了3,600萬，18萬人上陣，沒有挖到煤。提高勞動生產率與降低成本兩件事，要叫得響一些，造成一股空氣。全面大算賬，要分期還，要逼點債，公社的積累應大部份用於還債。下半年資金很緊張。

17日和18日小組會，傳達了16日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講話。這可能是他們16日在組長會上的發言。這天印發彭德懷的信，大概會議談到「得不償失」的問題。從《簡報》反映，大家認為劉少奇講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可以解決問題。只

有把成績講夠了，才能把缺點講透。「氣壓下降」的情況，值得引起注意；否則，1,300萬噸完不成。許多人認為，大煉鋼鐵，也是「失少得多」。認為周恩來算的一筆賬，很有說服力：雖然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份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的盈虧賬，也要算將來的盈虧賬。只能兩條腿走路，不能一條腿走路。很顯然，這時大家都認為應維護大躍進和總路線所取得的「偉大成績」。

我的記錄本上，7月17日，記了李富春的這樣幾句話：關於鐵的問題，是否得不償失？算投資、時間、佈點三筆賬，雖然生鐵補貼了40億—50億，但爭取了時間，全國鋼鐵因此展開了佈局。總的得多於失。這顯然是在為得失之爭，為全民煉鋼作辯護。這是當時一般人的認識，也可說是一種情緒。不少人對1,300萬噸還認為是洩了氣。富春說：今年1,300萬噸是否機會主義？要鼓足幹勁才能完成。

還有劉少奇這樣幾句話：吃苦頭有的要吃兩三次，沒吃過的總要吃過才行。虛報浮誇已制止否？全民力量到底有多大，去年檢閱了一下。

國家計委草擬的《對於1960年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任務和速度的初步意見》，是7月16日印發的。這兩段話很可能是7月16日下午，他們在周恩來主持的一次會議上談的，組長在小組會上作的傳達。總之，是自己覺得應當記下的重要意見。李富春是計委主任，這番話自有代表性。當時大家對他的意見比較多，計委內部也有不同意見。劉少奇實際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的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後來聽說，他找胡喬

木長談過反「左」的問題，同武昌會議時陳雲不同意公佈7,500億斤一樣，胡喬木不敢及時去反映。後來還聽說過，八中全會的《決議》草擬過程中，劉少奇想加一段同時也要注意反「左」的話，也沒能實現。

這時《議定記錄》草稿已經付諸討論，彭德懷的信剛發出。

7月16日上午，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要求當天立即排出一個新表，從第二天起照新表辦事。所謂「新表」即開會的六個組不按地區分，將人員打亂重新組合，只是組長依舊。信中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第二封是要求通知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長和三委（計委、經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參加最後一個星期的會議。信中還問陳雲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請他來此參加七天會。請徵詢陳雲意見，能來則來，不能來則不要來。根據這兩封信，這天下午，周恩來主持一個15人的會議，有中央和各大區負責人參加，討論今後會議如何進行。

從這兩封信主要看到兩點：一是彭德懷的信已印發，同彭德懷歷史上關係密切的人應來參加（如安子文是七大前華北座談會批彭德懷的重要當事人）；二是準備通過《議定記錄》，一週內結束會議。

這個時候還發生過周惠閒話事件。在小組會上周惠發言，對1958年砸鍋煉鐵、拆房併居，批評者多，講到激動處，冒出一句：「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書記，應當各打五十大板。」這話會下聊天時也說過。在飯桌上，周惠對廣西的劉建勛說過這樣的話：「你們當第一書記的，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周惠與劉建勛私交甚深，因而話說得很直：「你們廣西搞『兩小無猜』，煉鋼放衛星，《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還套了紅，第一名，發文章祝賀。過一兩天你又發電報，向中央說是假的，空的。反正

報紙也登了，沒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個講老實話，做老實人，你這不是滑頭嗎？」周惠還對劉建勛說，1958年無非三種人，第一種是官僚主義，不了解下情，老老實實講了假話；第二種是滑頭，看風使舵講了假話；第三種最壞，明知是假的還成心說謊。說這個話時，碰巧王任重進來，劉建勛又對王重複了一遍周惠的三種人的說法。這話傳出去了，引起軒然大波。到7月20日，周恩來不得不為此事專門開一次會，批評了周惠。

如果要說得形象一些，當時廬山會議的形勢，正是密雲不雨，氣壓很低；或者如每天常見的窗外景觀：雲霧繚繞，不識廬山真面目。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7月17日下午5點到夜10點，毛澤東又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和我五個人去談話。其中四人是《議定記錄》的起草人。胡喬木與田家英不消說，在毛澤東身邊已十多年，其他三人，應當說，當時也是很受毛澤東信任的或看重的。這次談話，還是毛澤東談得多，也談得很融洽，最初大家還議論了他的《返韶山》、《登廬山》那兩首詩。一起吃晚飯，喝茅台，還敬了酒。下面是毛澤東談話的要點，按記錄本上一條條記的（括號中的話是筆者加的）：

「關於總路線，真有70%擁護就不得了。真正骨幹有30%也不得了了。大部份人是隨大流的。」

昨天晚上（指組長會上）我談了：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要有幾個右派朋友。（這裏講的右派，很可能是虛的即打引號的，但也可能是實的即不打引號的。近三十年之後，寫到這裏，我也無法肯定是虛是實，請讀者和史家來研究。據筆者回憶，當時的意思是虛指的，也許毛澤東本人當時也確定不了。當然，按照後來歷史發展的事實本身來確定這種含混不清的說法，也無不可。）我是機會主義的頭子。我要找唱

反調的人通訊。計委這次來了反對派的人（指賈拓夫、韓哲一、宋平），正面有富春一個人就夠了。只讓簽字不行，還得了解情況和問題。工業系統是獨立王國，誰也進不去。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孫悟空偷桃子，只有這個辦法，開廬山會議之類。過去不懂得管理經濟之複雜。革命是搗亂，而且敵人有隙可乘。（這是承認管理經濟比革命難。）

六個地區大組人員打亂（這是11日夜談話時，我們三人的建議），使之不成體系，免得談來談去一個腔調，問題展不開。國務院那麼多部組成的，不包括省；任何一個工廠總辦在一個省。（之所以搞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對國務院工作不滿的一種表現——抓不住『主要矛盾』。在成都會議時，喬木同我談過這個問題。）權力集中很不容易。過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指井岡山時期），權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敵委員會。（這是說明自己為何要親自抓經濟的道理。）中央紅軍8萬多人，到吳起鎮剩7,000人。開幹部會，說比過去強了，因為幹部經過了這樣艱苦的鍛煉，當時許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這個話的意思，還是指1958年雖吃了虧，但取得了經驗，大家得到了鍛煉。）接着反覆講1,300萬噸來之不易（這是指1959年落實的年產鋼指標，有人說是否右傾機會主義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喪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幹勁，指標沒有完成也沒有關係。成績講夠很重要。他們（指各省頭頭們）在當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都有保衛自己勞動果實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擔子的人，容易有脾氣。我提倡過密植，（關於密植）現在是中間偏右派。」

關於密植這段話，是由田家英的插話引起的。1959年初，田在四川他舅舅的家鄉蹲點，才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關於1958年稻子平均畝產千斤，原來都是一個口徑。食堂經常吃稀飯，菜裏

見不到一點油葷。後來才查清楚，畝產只有580斤。這個現象在四川是普遍存在的。上海會議時，家英就告訴過我，他在家鄉如何餓肚子。上海會議後，他又到四川調查，發現省委規定的「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只有行距，沒有裸距）的高密植，社員都接受不了。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他就據此在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於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議上，他反對高度密植，同李井泉有過很大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是讓田家英所在公社可以稀一點。

早在1958年10月，田家英在河南新鄉七里營公社調查時，就發現過小麥產量浮誇，食堂伙食很差，社員體質下降，勞動生產率低等情況。同時還根據修武縣委書記的意見，反映了公社所有制存在的種種問題。在四川將近半年的調查，使他對農村五風的情況，有了更多的感性的了解。在西南組開會時，談到下面受壓而虛報產量這些問題時，他受到組長李井泉的批評，以致講不下去了。上山時，他領導的工作組交來真假羅世發的材料。這些這時他都直率地談了。毛澤東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邊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講的話，但又還得維護那些最忠實地、勇敢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的威信，認為他們是身挑重擔的人。

毛澤東接着說：現象與本質有時不容易看清楚。萬人檢查團（這是大躍進時各地流行的造聲勢的方法）是形式主義，不能深入了解情況，群眾不會當眾說真話。稱讚《宣教動態》、《外事動態》辦得好（這兩個內部刊物都反映了1958年以來的某些真實情況），應當辦《經濟動態》。關於糧食產量的估計，比7月11日夜談的更為謹慎。毛澤東說真正高產的恐怕只有5%，一般水平的是95%。而我們做工作，只能立足於95%。因此，年增產30%是不大可能的。

談到糧食問題時，小舟又說到全民煉鐵，各種高指標，其根子在糧食估產高了。毛澤東認為也不盡然。接着他又談到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道理。談到這個問題時，喬木一言未發，他是不同意這種理論的。毛澤東頗同意喬木提出的，各工業部長們下去當幾年廠長的建議。說孔夫子的職業為道士，做過會計，管過田地。也同意我們說的，政治掛帥，不能代替具體的經濟工作。我們又提到還是由陳雲掛帥好。我還說到三委（計委、經委、建委）工作要統一。喬木說，少奇的意見，還是由陳雲主管計委工作為好。他還反映了劉少奇的一個說法：有人在觀測中央仍有兩派（促進與促退或左與右）。毛澤東說，富春是依靠王鶴壽的。接着又談到袁紹之多端寡要，好謀無決，不會用將。《曹操傳》、《郭嘉傳》中對此都有反映。

之後又談到不要怕亂的問題。周惠說，還是學生不上街、群眾不打扁擔的好。毛澤東卻說，亂了才好。1957年漢陽學生鬧事，當時估計全國各地市一二三萬學生想鬧事不等，也不過幾百萬人吧。意思很顯然：大亂了才好大治。胡喬木當場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膿瘡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潰爛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此時彭德懷信剛發出。毛澤東便從彭信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華北軍委分委發的小冊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1980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我在國務院第十組（能源系統），曾應小組同志要求，介紹廬山會議情況。談完7月17日的召見後，大家插話說，這次談話已經把你們幾個人當做右派朋友了，你們還蒙在鼓裏。當時我即不以為然。後來也曾聽有的老同志談到，上海會議時談海瑞問題，就是「釣魚」，就是「引蛇出洞」。我認為，「1959年的夏

季形勢」是否可以套用「1957年的夏季形勢」，這個問題有待史學家研究。

這是7月17日，彭德懷的信剛剛印發。從這天談話內容以及情緒來看，特別是飯桌上頻頻舉杯，談笑風生，應當說這時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上述兩封信也可為證。但對彭德懷的信（及彭德懷本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按照黃克誠後來同我談過的，毛澤東與彭德懷兩人相互成見很深，有許多歷史上的疙瘩沒有解開。上海會議毛澤東作報告，批評了一些人的時候，講過這樣一段話：「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跟我兄弟也是這樣。」以此作為印證，黃克誠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記得1958年4月從武昌到廣州開會時，當夜我同彭德懷住在一起，在廣州又同住一層樓，他除同我談過平江起義的情況，想專門寫戰史這些事外，還談到在江西時，同毛澤東一起生活時的如何隨便：有事到他屋裏去，如果還睡在床上，把被窩一揭就是了。於是慨歎道：現在可不行了。彭德懷是「山野之人」，始終保持某些「游擊習氣」，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也不喜歡叫「主席」。這種性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實毛澤東自己何嘗不更具「山野」之氣，他經常穿着睡衣，靠躺在床上跟客人談話。還在游泳池游泳時，同赫魯曉夫會談。）

毛澤東這次找我們幾個人再次談話，關於彭德懷的信並沒有多說，只是順便提到洛川會議，應當說是含有深意的：讓我們知道，彭德懷這個人同他在歷史上不一路，啟發我們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懷那一邊去。同11日的談話相比較，這時無疑有變化了：在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在防止彭德懷的信

出來之後，形勢可能向右發展。光幾個「秀才」講點偏激的話，講點不愛聽的話，無關大局（有時還有好處）。總之，事後細細想來，17日找我們五個人作如此長談，而且有些話可說是「知心話」、「私房話」，其原因可能是，聽到「左派」們對我們有議論，希望我們能同他一條心，照顧到各方面，以大局團結為重，這樣使會議能較快圓滿結束。

同我們這兩次談話之前，還沒有傳出毛澤東正式找過哪些人談話。田家英同毛澤東的保衛負責人王敬先（廬山會議後被調離，「文革」中去世，時任蘇州地委副書記）、英文秘書林克及機要秘書等，都關係密切，有甚麼動靜，田家英都會知道。當時人們都知毛澤東找我們談過兩次話，都想探問，摸摸風向，這時我是守口如瓶的。

田家英從他的內線得知，毛澤東這時找各大區負責人談話時，還說過要印發《阿Q正傳》的話，意即要啟發大家，不要自己的缺點毛病觸動不得，像阿Q一樣，一觸即跳。

大概是17日談話後第二天，我來到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都在。談到彭德懷的信，我們都很感興趣，覺得信的內容很好，觀點跟我們一致。我還說，只有彭老總才有膽量，敢這樣寫。胡喬木卻講了這樣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大概是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和觀察，而得出這個看法。後來聽說，毛澤東同王任重廬山水庫划船時，談到彭德懷信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說「現在我不發言」。此事胡喬木可能知道了。

我的《廬山吟》第四首，這樣記述了第二次召見：

登樓再度群言堂，尚在閒談新樂章。
都覺暢懷言已盡，誰知一夜落颯狂。

《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來月，通過一個會議紀要性的文件，大家下山，各奔前程。文件起草小組，毛澤東原指定五個人：胡喬木、楊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7月13日凌晨，他致信楊尚昆：「五人起草小組，建議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筋、李銳、曾希聖、周小舟六同志，成為十一人小組，先議兩天，即今明兩天議事。14夜印出交我及各組同志每人一份。15日下午到我處開大區區長會議，議修改意見，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閱讀，會談，修改缺點。文件名曰『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你們在幾天內一定要做苦工，不可開神仙會，全文不超過五千字。」第一次碰頭會，根據十八個問題和各組討論情況，擬定了以下十二個問題：關於形勢和任務、讀書、宣傳問題、綜合平衡問題、群眾路線問題、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問題、體制問題、協作區和協作關係、組織農村集市貿易問題、過日子問題、公社食堂問題和加強農村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各人分工寫一或兩個問題。除「形勢和任務」外，每個問題寫一千字，最長不超過二千字。胡喬木寫總綱性的「形勢和任務」，我寫「綜合平衡」和「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周小舟和田家英寫有關農村的幾個問題。大家知道，譚震林和曾希聖是大躍進時衝鋒陷陣的帶頭人，譚主管農業，曾是安徽一把手，但他倆不是主要起草人。從人員組成情況來看，毛澤東無疑希望這個文件是一個繼續糾「左」的文件。因為我們這幾個人這次不只是當做所謂「秀才」看待，而是

被認為對大躍進確有不少中肯的意見；尤其周小舟在內，說明湖南的工作被讚賞，採納了那三句話作為會議的基調，現在進一步讓湖南的做法在文件中起作用。

7月16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將原來按地區分的六個小組，將人員打亂，重新編組，組長不動。第一組組長林鐵，副組長宋任窮、江華；第二組組長柯慶施，副組長廖魯言、甘泗淇；第三組組長陶鑄，副組長謝富治、譚政；第四組組長李井泉，副組長王任重、蕭華；第五組組長張德生，副組長舒同、黃火青；第六組組長歐陽欽，副組長江渭清、張國華。從17日起，按新編小組開會，繼續討論形勢和任務等問題。這時彭德懷的信也已印發出來，討論中對《議定記錄》談的意見就逐漸少起來，對彭德懷信的意見就逐漸多起來。

大家對《議定記錄》的意見，多集中於「關於形勢和任務」部份，一般認為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的經驗表達得不夠充份有力，因而對大躍進中所產生的一些缺點和問題及今後前途，也寫得不順暢。或者認為對成績講得不夠，會對當前形勢有不利影響。或者說，成績寫得很抽象，缺點寫得很具體，這樣傳下去要洩氣的，今年計劃就會完不成。「關於形勢和任務」中寫到的缺點只有三條，即比例失調，共產風，命令主義和浮誇風。關於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提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時，後面括弧中有這樣一句話：「對於1958年以前我國建設經驗和蘇聯建設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研究。」這句話受攻擊最厲害，有的人甚至說：看到這句話我就讀不下去了。曾希聖是起草小組成員，對這一段寫法也是不滿意的，他在19日第三組的發言中，以安徽小高爐煉鐵為例，證明大辦鋼鐵的正確，說安徽小高爐1噸鐵的成本比武鋼的便宜九十多元，質量規格也可以用於建水庫。武鋼要8年才能做到年產380萬噸，安徽今年就可出鐵

140萬噸，所以最大好處是爭取了時間。他認為安徽最大缺點是颳了共產風。下面幹部對於缺點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點墨水，一擦就掉了」。「至於去年工農業比例失調，我不承認。工業、農業不都是增產很多嗎？工業內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調，但是我的看法很樂觀，不經過這樣的大演習，我們受不到這樣的教育。」

面對這些對《議定記錄》的非難，我們幾個主要起草人被逼得講話，要起而維護。胡喬木在第二組，7月19日他作了較長的發言。《會議簡報》中有摘要記載：

「完全同意把成績說夠。《記錄》（草稿）中沒有把成績說夠，主要是受到字數限制，力求簡要，以致只講了原則，決不是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甚麼分歧。相信絕大多數同志對於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準備把成績部份展開，篇幅適當擴大。缺點部份也決定根據各組同志所提意見改寫。主席為會議出的那些題目，主要是為了總結經驗，使『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當然，如果對於大躍進的成績還有懷疑，那是不可能把經驗正確地總結起來的，所以就要統一認識，在這個前提下把經驗總結起來。總結經驗的任務，是與肯定成績一致的。現在的問題是會議已經開了18天，但是看來真正客觀地、系統地、冷靜地研究經驗的空氣，還不是很濃厚。會議時間不會太長，因此希望研究經驗的空氣能有所增加，特別是研究那些還沒有引起普遍重視的問題。《記錄》（草稿）中關於缺點的原因，說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時，括弧中有一句話說，『對於1958年以前我國建設經驗和蘇聯建設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研究』，這樣說是錯誤的，應該改正。（按以下接着說的，其實是說明，這樣說並不錯誤。）原來的意思是說，許多同志在實際工作中對於過去的經驗研究不夠，已經總結過的在實踐中也堅持不夠。這個意

思，是毛主席在上海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現在在《記錄》中指出這個事實，恐怕還有需要。例如，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上所總結的1956年的經驗，許多毛病仍然在去年重犯了。值得我們回想一下，為甚麼這樣？分析起來，我們是又有了一些經驗，而又沒有經驗，這就是矛盾所在。大躍進當然史無前例，但是社會主義又是史有前例的。正是由於毛主席、黨中央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才產生了十大關係的報告和黨的總路線。在這個基礎上，做具體工作的同志應該具體地總結各個工作部門的專業性的經驗。總結經驗，要有原則的總結，也要有具體的總結；要有政治的總結，也要有經濟的總結。經濟有經濟的規律，社會主義經濟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又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正如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所說戰爭的規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一樣。為要取得經濟戰線的勝利，就必須深入研究經濟的規律。去年下半年發生的一些問題，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經濟規律和經濟工作的具體經驗研究得不夠。在這次會議上，需要認真地總結一些經驗。為此就要有利於總結經驗的空氣，讓參加會議的人暢所欲言，不要感覺拘束，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只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甚麼說甚麼，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經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虛誇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沒有了。毛主席要求我們的宣傳工作像過去發戰報一樣，確實繳了幾枝槍就說繳了幾枝槍，一枝都不要多。在經濟統計中達到這個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要為此而努力。我們

黨，在長時期中形成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現在應該恢復這個傳統。」

胡喬木的發言是有代表性的，他至少代表了我們這些認為缺點應該說透，認為會議還有某種壓力的人。他完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但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李富春也在第二組，他接着發言。他認為正確地認識形勢和認真地總結經驗是密切結合的。「對形勢有不同看法，通過討論求得認識統一是完全必要的。對於總結經驗，認真研究缺點錯誤以利於提高我們的工作，也是完全必要的。1958年以前，我們建設的經驗是有一些，但是，很多具體的經驗認真總結很不夠，而且如何用於大躍進中來，也沒有把握。就全黨說，全國性的大規模的全面的建設經驗，確實不夠，大躍進的經驗也確實沒有。從去年北戴河會議到現在，十個月來，全黨取得了大躍進的經驗，這是過去八年經驗中所沒有的。問題確實不少，經驗教訓也很多，需要認真總結，因之就需要大家冷靜下來。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不冷靜是不可能總結經驗的，從去年鄭州會議到現在，中央都是在不斷地發現問題，糾正缺點錯誤，不斷地總結經驗。我們一方面要說，9、10、11月中發生了不少問題，以及現在還存在的和還可能發生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現在的情況與去年下半年比，已經有顯著的變化，這也正說明了黨掌握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的英明偉大，也正是『前途光明』的有力保證。」同樣，李富春也沒有提到彭德懷的信。

周小舟也在同一個組，李富春講完之後，他接着發言，講了不少心裏話。他同意《議定記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總精神。肯定了總路線的正確和大躍進的成績，應該如少奇說的，把「成績講夠，缺點講透」。主席提出「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的精神要大講特講。「我想，廬山會議是高

級幹部會議，所以在肯定成績之後（這點是大家意見一致的），應該着重總結經驗。得失問題，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領導總的來講，成績肯定是偉大的，是『得大大多於失』的。這個思想，在這次會議上是一致的。但對於總結經驗、揭發缺點，從而克服缺點或者對於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我看還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以為個人由於工作方面不同、接觸的事務不同，因而看法有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大家一塊討論，從各方面把問題提出來，經過分析和討論，就可以達到一致的。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別講。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萬個土爐，有2萬個爐子根本沒有生過火。某些地方晚稻並秧，大大減產，這些，我看就只有失，無所得。同意《議定記錄》關於缺點原因的原則分析。我們這些人都是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想多搞一點，快搞一點。颯『共產風』也是想快一點搞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違反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某些社會主義原則，所以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把所有這些經驗總結起來，引為教訓。基層幹部的浮誇作風、強迫命令與我們上面的計劃偏高偏大是有很大關係的。我們只是鼓下面的勁，某些事情辦法不具體，某些事情或者我們自己心裏也是『虛』的，然而還總是去鼓勁，這當然就會發生缺點或者錯誤的。這種情形，我們自己當然首先就負有責任。這個經驗或者說教訓是極為深刻的。我的看法，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缺點少講，或者講而不透，是難於使我們自己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的。缺點講透，會不會妨礙我們這些人的積極性呢？我認為正確地檢查缺點，不僅不會洩勁，反而能夠更鼓正確的幹勁的。」小舟對彭德懷的信，最後表了個態：「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在我們幾個人

的漫談中，對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提法，我們都是覺得不大妥當的，容易引起誤會。

我在第一組。作為《記錄》草稿的參與者，我發不發言呢？一次散步時，同吳冷西談及，他覺得有責任講，應當講。（他的發言談到彭德懷的信，只認為是文字上的問題，後來也挨了批評。）我上山時，確實帶了一大堆問題，如綜合平衡、比例關係等問題。我認為關鍵在1958年5月的華東計劃會議。那時柯慶施正進入政治局，很受寵信，頭腦發熱得厲害，對下驕橫得很。上海工業基礎較好，於是想鋼鐵先來個大躍進。李富春以及王鶴壽、趙爾陸、呂正操等工交部門主要負責人都雲集上海，幫助華東訂1959年的大躍進計劃。我代表水電部參加會議，與冶金部副部長徐馳住隔壁房。華東鋼的指標漲到600萬噸，各大區通電話，一起看漲，因此導致1959年計劃的過高指標，也推動了北戴河鋼索性翻一番。我再三問徐馳有無可能性，徐答華東有此條件，別的地區恐怕不行。一機部的部長助理陳易，則向我訴苦。當時一機部同冶金部矛盾已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鋼的品種太少，質量也有問題，如發電設備主機的大軸，即遠不能滿足需要。會議期間，我到閔行參觀過製造發電設備的三個大廠，廠長告訴我：指標是柯老硬壓下來的，會上無法提意見。汽輪機廠廠長還向我做了一個手勢：這玩意是會飛的。即大軸出了問題，發電機可以發生大事故，乃至廠毀機飛，歷史上上海出過此種事故。於是華東1959年的大躍進計劃，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在會議上頂住了，電力無法保證，我有賬可查、可算。柯慶施甚為不滿，給我們放上海大躍進記錄電影看，還讓我去參觀上海三大躍進廠：江南造船廠、一個變壓器廠和永鑫鋼管廠（後兩個廠都是里弄小廠）。臨走時，我給柯留下一封短信：奉命去看了這三個廠，很受教益，但不能解決電的問題，電仍無能為力。其實，

當時江南造船廠「三個月下水」的一艘5,000噸輪船，我上去看了，只是一個空殼殼的船體而已，主機和內部其他設備裝修都還沒有趕上。這個情況我不便在短信上反映。華東計劃會議後，我將這次會議情況及我的疑慮，於7月7日向毛澤東寫了第一封信，信中主要談到電力設備等情況：根據華東需要推算，1959年全國共需生產發電設備900萬千瓦（各國最高年產千瓦，英國為400萬，蘇聯750萬，美國1,370萬），相當於1958年的十倍。發電設備的複雜，還在變壓器、開關、儀錶、電纜以及電動機等配套，大小幾千種，特別是銅、鋁原材料不夠。電與一切工業生產有直接關係。1958年全國發電量達不到300億度，按華東計劃推算，1959年全國缺電100億度以上。因此，全國工業必須分輕重緩急，很好排隊。否則會出現整個國民經濟失調，財政收入減少，反轉來影響重點建設。大家都全面躍進，一切都感不足，需要強調協作和照顧全局精神。信中最後有這樣的話：有些事可以蠻幹，有些事蠻幹不得。大家確實鼓足了廿四分幹勁，但是在計劃上很少聽見「留有餘地」。這封信長達三千字。後來證明，在北戴河會議以前，毛澤東並沒有重視這封信，武昌會議時才予以重視，特別找我詳談了一次。7月20日，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就先講了華東計劃會議的事。現在將《簡報》上刊登的照錄如下：

去年大躍進的成績是極其偉大的。產生了總路線和整套方針。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速度上突破了蘇聯的經驗，突破了許多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束縛，技術革命收穫很大，在群眾路線上也有發展。成績是根本的。缺點雖然是一個指頭，但有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對缺點和問題要講透，不能諱言；目的是為了今後更好地躍進。

去年許多東西都是正確的，主要是有的過了頭，超過了客觀可能性，因而出了問題。關於鋼的指標，八大二次會議所提，比較接近客觀實際（1959年1,200萬噸，1962年2,500萬噸至3,000萬噸）。二次會議後，華東600萬噸帶頭，就想得過高了，遠遠超過客觀可能。主席提的某些指標曾是當做問題提出的，應該獨立思考，講清情況，慎重回答。冶金部的思想解放過了頭，只根據煉鋼能力提出過高的指標，對上下左右內外前後，照顧考慮太少。計委主要是根據冶金部這種不可靠的指標，作為整個計劃的依據，沒有很好綜合平衡。關於綜合平衡問題，曾經在思想上發生紊亂。武昌會議之前人們只講打破平衡，打破比例（《紅旗》1958年12期的社論可為代表），不大敢說比例關係、定額計算。成都會議上，主席所提的均衡的有節奏的生產，有勞有逸，留有餘地，波浪發展等等，很快都忘記了。有不少正確的東西過了頭。例如敢想、敢幹、規章制度的打破，對蘇聯經驗的看法，權力下放，等等。去年安全工作有很大的忽視，據統計傷亡15萬人，其中死5萬人。（按：這是中南組開會初期，羅瑞卿提供的數字。）也有些事情簡單化了。如下達計劃採取壓的辦法；插紅旗、插白旗的不夠慎重（在農業上，插白旗者問題少，插紅旗的反而問題多）；放鬆了傳統的由點到面的經驗。過去發表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言論是很嚴格的，去年在這方面也有輕率之處。如王任重《七一》（湖北省委理論刊物）上發表的《毛主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夠慎重的

（按：其中有毛澤東講糧食多了怎麼辦這類話）；又在三峽科學研究幾百人的會議上（可能有非黨幹部）講話：成都會議的決議都是促進的，惟有關於三峽的決議是促退的。中央工業各部在計劃指標漲風中，雖然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齊抬的。當時連紙面上虛假的平衡也是片面的。當前突出的問題，鋼鐵是數量與質量的矛盾，這也是冶金部同一機部和其他各部的矛盾。過去說，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現在應當說，沒有質量就沒有數量。要下決心，寧可少些，但要好些。

去年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某種空氣與壓力的問題，對於提出某些懷疑和反面意見的人，輕易戴上觀潮派、算賬派、促退派的帽子，壓力是很重的。對1959年3,000萬噸鋼發生懷疑，曾認為是立場問題，離開總路線問題。《經濟消息》今年第3期發表了關於完成2,000萬噸鋼所存在的一系列困難，即受到批評，聽說當事人還作了檢討。去年6月到今年年初，確實有些反面意見很難提出來，很難展開討論。

這次廬山會議仍有不願談缺點、不願聽缺點的情況；一談缺點，就可能是否定成績，這種壓力還多少存在。對於《議定記錄》草稿「關於形勢和任務」部份的批評，有些是過重了的。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作為對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按：本來我也講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種提法值得考慮。修改記錄稿時，我刪掉了這句話。）

緊張形勢是存在的，總的說來不是很快就能完全解決的。虛誇的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

我發言之後，同期《簡報》上刊有同組其他人的發言，大抵都是針對我的發言說的。如關於形勢問題，大家認為是完全可以好轉的，現在浙江、河南、河北都有好轉，有些地方群眾幹勁更踏實了。對緊張要分析是甚麼性質的緊張，究竟緊張到甚麼程度。工業方面，無非是原材料緊張，經過調整平衡，加上增產節約，也是能夠解決的。廬山會議，大家沒有感到有怕說缺點的空氣。對缺點不是不講，不在講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質。我們的缺點或錯誤不是方針路線性的，是在執行正確方針路線中產生的。對《議定記錄》草稿，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只是表明不同的看法，不是不許說缺點，更不是對起草人的意見等等。

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時浙江同志的發言講農村情況已大有好轉，市場供應雞蛋已很豐富。葉季壯（外貿部長）一聽說雞蛋多了，馬上興奮起來，只盯住浙江同志問，雞蛋能調出多少，因當時外貿太困難，完不成合同。當然問不出結果。

北京來的人大都住在一座樓上，記得刊有我發言的《簡報》出來之後，遇到賈拓夫、韓哲一和宋平三人，他們一起向我作揖，說是代表他們發了言。「文革」期間住秦城監獄時，還有外調韓哲一歷史的人，要我為此事寫材料。

7月20日前後，小組會上對《議定記錄》發表的意見逐漸減少，較多的意見集中在彭德懷的信上了。但上述周小舟和我的發言，則成為7月30日以後批判我們的主要根據。

7月20日，政治局正式討論過一次《議定記錄》稿。當然，隨着風雲突變，這個《記錄》就無人提及，流產了。7月23日劉少奇聽了反彭講話出來，曾約喬木到他住處談話，以為下面還是

必須糾「左」，《議定記錄》定稿能否爭取仍發下去。喬木認為已不可能了。後來在全會《決議》中也未能寫上繼續糾「左」之意。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聽田家英說過，喬木曾經提出，要為《記錄》平反。

現將《議定記錄》中被人們責難得最厲害的「關於形勢和任務」，關係較大由我起草的「綜合平衡問題」，這兩部份全文並其他十個問題摘要如下：

一、關於形勢和任務

1. 必須肯定成績

去年和今年的大躍進，成績是偉大的。

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大大地展開了幹部和群眾的眼界，空前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變了工業每年只能增長百分之十幾、農業每年只能增加百分之幾的局面，用事實證明我國國民經濟可以用躍進的速度向前發展。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大躍進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真正管理經濟工作的開始，大躍進使黨和人民在短短的時間內獲得了豐富的經驗。

人民公社化運動加速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對農村整個面貌的改變指出了遠大的前途。在現階段上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聯社。由於它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便於加快農林牧副漁和工農商學兵的綜合發展，並且為農業機械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糾正了公社化運動中某些暫時性的偏向以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將在長時期內發生作用。同時，公社化運

動對於將來農村中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轉為共產主義的過程，也提供了良好的組織形式和寶貴的經驗。

2. 大躍進中也產生了一些缺點和問題

主要是：

- (1) 國民經濟發展的某些比例失調。
- (2) 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
- (3) 命令主義作風和虛誇作風的發展。

產生這些缺點和問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缺乏經驗（一般的建設經驗不足，特別是對於大躍進缺乏經驗），部份的也由於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對於客觀的經濟規律的意義估計和認識不足；沒有完整地有計劃地執行總路線；對於1958年以前我國建設經驗和蘇聯建設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研究。）

對於這些缺點的一般估計：

(1) 是局部的、暫時性質的，就全局來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2) 在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的最初階段，這些缺點多數是難以避免的。

(3) 對於這些缺點發現得較早，克服得較快。

(4) 農村情況、市場情況、工業品質量和建築工程質量等，已經先後開始好轉。只要重視存在的問題並且抓緊組織措施，完全可以縮短解決問題的過程。

(5) 但是也應該認識，還可能有未發現的問題。在今後的繼續躍進的過程中，也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

3. 對於當前形勢應該採取的態度

(1) 在全面地、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的基礎上，團結全黨

和全體人民，繼續鼓足幹勁，採取積極態度，抓緊組織措施，努力鞏固和擴大勝利的成果，縮短克服缺點的過程。全黨同志必須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充滿信心地艱苦奮鬥，反對任何畏難、洩氣、否定成績、互相埋怨的消極情緒。

(2) 認真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不論是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經驗，都要作系統的、科學的總結。在肯定成績之後，對於工作中的缺點，必須加以充份的重視。不要怕說缺點。為此，必須在全黨幹部中間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由於各人的工作經驗和工作崗位不同，對於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些參差不齊，只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麼，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採取粗暴武斷的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全黨幹部都必須認真地學習政治經濟學，切實把對於經濟工作的認識水平和領導水平提高一步。

(3) 要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徹底糾正過去一個時期中某些脫離群眾的傾向，把當前的形勢和任務向群眾講清楚，依靠群眾來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4. 今年下半年主要任務

(1) 在工業上抓緊時機，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努力按質按量按品種地完成和超額完成6月間調整後的生產計劃和基本建設計劃。特別要抓緊煤炭、木材、鋼材、水泥的生產、分配和運輸工作。對於調整的基本建設項目，不論是繼續施工的還是停建緩建的；對於工廠中積壓的產品，不論是製品、半成品還是次品和廢品，都必須迅速分別情況，妥善安排和處理。

(2) 在農業上抓緊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秋田管理，力爭糧食有較大的增產，力爭經濟作物的豐收，及時做好秋收工作，

細收細打，並按時完成交售入庫任務。在總結去年今年經驗、適合明年國民經濟計劃要求的基礎上，切實做好秋耕秋播和明年的生產準備工作。在農村中完成整社工作，深入貫徹執行鄭州會議以來中央的各項政策。

(3) 在市場方面，保證副食品、手工業品和輕工業品供應的增長，管好農產品的收購和糧食、煤炭的供應。在全國城鄉大力解決學會過日子的問題。切實實現中央6月1日緊急指示中壓縮購買力的各項措施，妥善完成減少職工800萬至1,000萬人的任務，並且迅速加強信貸的管理。

(4) 根據去年以來的經驗，修訂各種經濟工作和計劃工作的管理體制。在各個企業中切實解決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的問題。

(5) 編好1960年計劃，同時着手研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問題。

(6) 在宣傳上適時地轉入主動。

5. 明年的任務和四年的任務

明年的任務，應當是在1958年和1959年躍進的基礎上，按照必要和可能，繼續和有系統地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大力加強農業戰線，爭取國民經濟全面、平衡的發展，並且為1961年、1962年的更好的躍進準備條件。

明年的發展速度要適當放慢。考慮工業增長20%左右，農業增長10%至20%。

在1961年和1962年，應當在做好綜合平衡工作的條件下，實現穩步的躍進。

在整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根據初步設想，工業可以平均每年遞增25%左右，農業可以平均每年遞增10%至15%左右。1962年比1957年，工業可以增長2倍左右，農業中的糧食可以增長1倍左右。在1962年，我國將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

量方面趕上英國的生產水平，並且使全國人民的生活得到適當的改善。

二、讀書

中央委員到縣委書記，都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3版下冊。縣級主要幹部還要另讀《中央的政策和有關工作方法的文件》和《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正面經驗和反面經驗》兩本書。讀書的目的在於使同志們改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走群眾路線，調查研究，講政策，講老實話。

三、宣傳問題

在最近期間，採取適當的步驟和方式，公開宣佈去年糧、棉總產量的核實數字和今年落實的計劃指標，並動員全國人民鼓足幹勁，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實現今年的繼續躍進。

關於人民公社，亦應當在適當時機，根據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和這次會議的精神，公開宣傳整社的結果。

報刊、通訊社和廣播電台，應當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和公開文件，對我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對當前的任務，對目前存在的某些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進行有領導的、有計劃的、有分析的、有分寸的宣傳，既要理直氣壯，鼓足幹勁，又要實事求是，反對虛誇。

四、綜合平衡問題

去年經濟工作中的一個教訓，是放鬆了綜合平衡的工作。這

是引起目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

國民經濟中的各種比例是客觀存在的。各種比例關係是互相聯繫和互相制約的。隨着國民經濟的發展，各種比例關係是不斷改變的；但是社會生產在其發展過程中，各個部門必須遵守一定的比例關係。只有掌握和運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才能使整個國民經濟多快好省地發展。因此，就要在計劃工作和經濟工作中掌握綜合平衡的方法。

國民經濟的平衡，最基本的是安排好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關係，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這也就是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為此，就要做好以下各種具體的綜合平衡工作。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原料、燃料、動力工業和加工工業，生產和運輸，建設規模和材料設備，生產和建設，建設速度和建設能力，勞動工資、人民購買力和商品供應，財政收支，現金收支，生產力的地區分佈和地區產銷，勞動力和技術人員的訓練和分配等等。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內部，也存在比例關係的問題，要求做好綜合平衡。例如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要按比例發展，農、林、牧、副、漁要綜合平衡。

綜合平衡可以概括為這樣四句話：統籌安排（國民經濟各部門），供需協調（人力、物力、財力），瞻前顧後（年度和長期），合理佈局（地區、資源）。

在綜合平衡工作中，必須注意計算經濟效果。多快好省是經濟效果的綜合表現，也是政治、經濟和技術結合的表現。綜合平衡不僅要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而且要符合其他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要求，如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按勞分配的規律，價值規律等。

在國家計劃的統一領導下，每一個部門、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地方（從省、區、市、縣到公社），都要注意綜合平衡的工

作。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才能有比較正確的反映客觀實際的全國綜合平衡。

根據去年和今年的經驗，今後的綜合平衡工作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保證重點要與照顧一般相結合，防止重點過份突出所引起的失調。

(2) 根據現有的可能物質技術條件，同時充份估計人的積極性和各種潛力，進行積極平衡，而不是消極平衡。一般應採用平均先進定額作為平衡計算的依據。

(3) 要注意不斷克服薄弱環節，經常做好調整工作。在物資、財政、勞動等方面，掌握一定的後備。

(4) 中央與省、市、自治區共同負責，貫徹全國計劃「一盤棋」的方針。在計劃之內，留有機動，沒有統一的計劃，就不可能實現綜合平衡。

(5) 在制定1960年計劃時，必須很好考慮同1961年、1962年乃至以後年份的計劃相銜接。

五、群眾路線問題

各級幹部必須繼續注意虛心傾聽群眾對於工作的各種不同意見，使下情充份上達，反對強迫命令、打擊報復、壓制人民內部不同意見的做法；必須繼續注意鼓勵群眾和下級幹部敢於反映真實情況，說真心話，使我們的工作能夠進一步落實，反對虛誇作假的歪風。上級幹部應該以身作則，打掉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和嬌氣。中央、省、自治區、市、縣各級黨委的領導同志，特別是管理工業和農業的同志應該每年分批下廠下鄉當一個時期（1個月或2個月）的工人或農民或基層幹部，要在群眾中有一批

知心朋友。

對於工業、農業和其他方面的一切新措施，都必須通過群眾，進行試驗，然後逐步推廣。

六、關於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問題

去年的企業管理工作有了重大的改革，促進了生產的大躍進。但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企業生產管理中某些混亂現象。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很多企業的產品質量的下降、成本的提高以及事故的增多，都同這種混亂現象有關。出現混亂的原因：一是有些企業在精簡管理機構和改革規章制度時，過份追求簡化，不適當地推行所謂無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等方法，把不應該取消或合併的機構，也取消或合併了。二是領導思想比較普遍地注意了多快，忽視了好省；同時生產秩序的混亂，沒有得到及時的整頓。

為了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老企業在今年下半年，新企業在明年上半年，應當逐步建立一套既便於發動群眾積極性，又便於集中領導的管理制度。應該抓緊三個環節：

- (1) 加強對產品設計的管理。
- (2) 嚴格執行工藝規程及操作規程。
- (3) 加強質量檢查，把群眾檢查與專職檢查結合起來。

七、體制問題

從1957年到1958年，中央和國務院曾經決定改進財經工作的管理體制，下放了管理權限。由於當時經驗不足，管理權限下放得多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民經濟的計劃性。現在應當

收回和重新調整那些下放得過多的權限，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集中到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兩級，以利於提高國民經濟的計劃性。關於計劃、工業、商業、財政、勞動工資的管理權限，都作了明確的劃分規定。

八、協作關係和協作區問題

去年以來，地區、部門、企業之間各種原有的協作關係，由於許多複雜的原因，時常被單方面地廢棄，這對國家經濟建設事業是極為不利的。應當在國家計劃统一安排之下，充份發揮協作力量，恢復原有的協作關係和建立新的協作關係。

九、組織農村集市貿易問題

管理農村集市貿易的原則是，活而不亂，管而不死。進入農村集市進行交易的公社、生產隊和社員，只限於出售自己生產的產品和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不得進行商業販運，不得開設店鋪。根據農副產品和工業品的類別，作出具體的貿易規定。

十、過日子問題

在全黨全民中，首先是在各級領導幹部中，進行一次學會過日子的教育，以求普遍樹立起「富日子當做窮日子過」的觀點。具體措施：繼續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減少職工800萬至1,000萬人，城市繼續實行糧食依人定量的辦法；農村的每個公社和生產隊都應當對全年所需要的糧食、瓜菜、飼料、燃料等作統籌安排。

十一、公社食堂問題

公社食堂，凡是有條件辦的地方，應當堅持辦下去，並且努力辦好。如果條件較差，困難較多，可以縮小，成為一部份人參加的食堂；可以把常年性的食堂改為臨時性的農忙食堂；也可以暫時不辦。

十二、加強農村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

為加強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1) 要克服認為任務重，黨的工作可以暫時放鬆的錯誤想法，建立任務越艱巨，基層組織領導作用越要加強的思想。

(2) 要把整黨工作和黨的經常建設工作密切結合起來。

(3) 所有基層組織要嚴密黨的組織生活，要按期開會，要按照黨章辦事。

(4) 各級黨委均要由專人管理黨的工作，加強對基層組織的領導和幫助。

(5) 要加強黨的教育。

三十年過去了，這個《議定記錄》已被人們忘記，甚至參與起草的人如筆者自己，也已忘記還寫了「關於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問題」這一節。這十二個問題都是當時亟待解決，直接關係「三面紅旗」如何繼續堅持下去的問題。現在看來，它提出的速度無疑還是過高，還沒有擺脫急於求成、急於過渡的總設想。但不論後來的實踐如何，當時如果通過了這個《議定記錄》，廬山會議及時結束，則當代中國可能是另一種面目。真是

「傷心往事知多少」！有甚麼辦法呢，回顧歷史，我們只能這樣感慨繫之而已。

彭德懷的信

在1958年初剛提出大躍進口號時，彭德懷是有懷疑的，當時他在文章中用的字眼是「大發展」。參加3月成都會議時，聽了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幾次講話，以及與會者的發言和討論之後，他就接受了大躍進的提法，並在自己的發言中由衷地讚揚：「南寧和成都會議的偉大收穫，不僅是對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有了比較深刻一些的認識，而且對於解決個人與集體、局部與整體等矛盾的方法，也有了正確的措施。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6億人民中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一個新發展。」並且還深有感觸地談到自己的「思想長期落後於客觀形勢」。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後的三個多月裏，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樣，彭德懷也是懷着極其興奮的心情，深入部隊和農村，先後到東北、西北和華中十多個省進行了考察。在東北視察途中，他看到了火光沖天的大煉鋼鐵的動人場面。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也同其他許多領導同志一樣，反映過極為樂觀的情緒。如讚揚軍事工程學院「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後，基本樹立了『以我為主』的大膽創造的思想。已經設計出不少新式武器和戰鬥器材，有些達到了或者超過了國際先進水平」。對這個學院的實習工廠說1959年能生產4,500台28馬力的拖拉機，也信以為真。隨後他又去西北地區考察。到敦煌縣時，全縣8萬人已組成一個公社，貧農要求割資本主義尾巴；富農不肯將生產資料全部交出，有的把毛驢殺掉。他就對縣委書記說，一縣一社不一定是方向，要注意避免發生破壞生產資

料的事，不要影響生產的發展。他對棉田散落的棉花和菜地亂堆的白菜，很是惋惜；對公社食堂都吃麵糊煮土豆，表示了懷疑。到蘭州聽到省委負責人說，當年糧食特大豐收，人均可達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完成後，黃土高原可以不再靠天吃飯。還看了近郊雁灘公社的興旺景象，不禁發生今昔對比的感慨。他談到解放蘭州時，在城外察看地形，到過一農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赤身蜷縮在一個炕上，因全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到西安和延安後，他已感到有些問題值得重視，對糧食高產有了懷疑。

當時大躍進運動也影響到軍隊。下面幹部反映，軍隊也應當改為公社，實行供給制，也有要求大煉鋼鐵的。對這些脫離軍隊本身業務太遠的做法，彭德懷是未予同意的。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他只參加了最後一天，聽了毛澤東反對「共產風」的講話。武昌會議時，他參加西北小組，討論當年糧食公佈數字，有的說可報10,000億斤，有的說9,000億斤。他說糧食沒有那樣多，即受到譚震林客氣的批評：「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彭德懷回答：「公佈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比較主動，公佈多了就被動。」後來他也同意了毛澤東定的7,500億斤，但心中仍有懷疑。武昌會議後，他到了湖南，由周小舟陪同，先到湘潭烏石（他的家鄉）、韶山和株洲。在烏石看到為搞居民點，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飯的鍋都砸了。在自己的舊居開調查會，了解到基層幹部打人罵人、訓斥體罰很嚴重，安排勞動，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還看到有千把人在一丘20畝的田中，搞深翻地。又到一丘畝產1,000斤的豐產田，數一兜禾苗有多少稻穗。在「幸福院」看望老人，得知他們每餐只有二、三兩米。在韶山了解到，那個大隊吃了偏飯，1958年也只增產14%。隨後他到了平江（這年正好是平江起義30週年）。周小舟預先介

紹：這是個颳「共產風」比較嚴重的地方，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也厲害。在平江參觀工農業生產展覽館時，他發現一個造假：將1957年的糧食高產數字公佈為1958年的產量，1958年的低產變為1957年的。有一位紅軍時期殘傷的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後來被廣為傳播的民歌：「穀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呼！」他不能不感到：這是群眾多麼沉痛的呼聲。在株洲，恰與薄一波相遇，他感到糧產決沒有公佈數字高，認為當年徵糧1,200億斤很危險，建議薄一波向中央反映。後來還是他自己發了一個電報，說只能徵購900億斤。

在湖南同周小舟一起活動的3天中，小舟談到當時感到的一些問題和工作中的缺點。彭德懷在閒談中涉及一些歷史情況，特別談到他對毛澤東的偉大，是在長期接觸中逐漸認識清楚的。廬山會議後期逼迫小舟交代同彭德懷的關係時，小舟談了彭德懷這時向他講的兩件事：一是朱德部隊在湘南失敗，毛澤東動員井岡山部隊去迎接時，只准說好，不准說壞，以利團結，可見毛澤東的偉大深遠精神。二是洛川會議關於運動戰與游擊戰的爭論，說很久以後，才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毛澤東的正確。

經過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已經強調要「壓縮空氣」、「冷熱結合」，要搞綜合平衡，要繼續糾「左」，解決公社存在的一些問題，並下降鋼鐵和糧食兩大指標，但由於同時繼續批評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觀點，各主要指標仍然是偏高的。1959年上半年，市場空前緊張，各種弊端暴露得也就越來越多越深。這兩次會議，彭德懷都參加了，因忙於處理西藏反動集團叛亂，雖參加了小組會，卻沒有作甚麼系統發言。在上海會議期間，他和陳雲同住同餐，飯後常一起散步，交談過不少問題，對大躍進中高指標等問題，兩人看法比較一致。在上海七中

全會大會講話中，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人，重提歷史舊事，哪些人曾反對過他。其中說到同彭德懷的關係時，說「彭德懷恨死了我的」。這是一句很重的話。同時，又誇獎了一些人，讚揚陳雲不同意公佈1958年的糧食指標，主張鋼鐵指標下降，說，「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上」。在這個長篇講話中，毛澤東還談到明朝故事，號召大家要敢於提出不同意見，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嘉靖。說明朝皇帝對臣下嚴酷，廷杖致死，還是堵塞不了言路。「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因此上海會議結束之後，彭德懷到東歐各國訪問前，找來了有《海瑞傳》的那一卷《明史》，有半個月的時間，這本線裝書常置案頭。

上海會議後，4月29日，毛澤東向全國各級幹部發出的《黨內通信》中，繼續發揮他在上海會議上講話的精神，又着重談到講真話的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強講能夠做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抵，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邊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彭德懷在國外就聽人轉述過這個通信，回國後，又特地找來細讀。

在匈牙利訪問時，同國防部長的談話中，他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訓在於：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眾的不滿情緒外，主要還是由於肅反的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卡達爾接見，談到匈牙利事件時，彭德懷曾感慨地說道：「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切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

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回國後，在一次中央常委會和赴廬山的火車上，他都談過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車上，他還隨意跟人講過這樣的話：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的。（後來批鬥他時，這話被當做一個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提了出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顧不上在國外五十多天的疲勞，馬上同黃克誠談了一個上午，了解到有些地區缺糧和春荒情況，尤其是甘肅嚴重缺糧，使他大吃一驚，感慨萬端。於是決定緊急動用軍隊運輸工具，幫助向災區運糧。據保健人員說，彭德懷在去廬山的火車上，吃飯極少，保健工作人員問他：「為甚麼吃這麼少，是不是在車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說：「看看外邊，這叫人怎麼能吃得下去。」原來遠處站着許多人，衣衫襤褸，蓬首垢面，手把柵欄，呆望着車廂。顯然都是災民。當時我們同乘一趟專列，卻沒注意到這一情景。彭德懷幼年過着極其貧苦的農家生活，逢年過節，老祖母常帶着小弟弟出外討飯，他的一個弟弟是活活餓死的。終其一生，他不忘本，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由於出國的疲勞，彭德懷原不準備上山開會，後來還是黃克誠的敦促，他才上山的。前面談到，神仙會階段，人們遊山賦詩，雅興不淺。彭德懷卻沒有這番心情，除開會外，整天關在房內閱讀文件。在會議後期查清，彭德懷在7月3日到10日西北組的小組會上共有七次發言（或插話），幾經校對，印發出來。這些零碎的發言，談了一些情況和問題，有的措辭較嚴厲。如談了韶山只增產14%。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67%，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脫一次脫光，免得被動。說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這一條，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農村4個月不供油，事實上辦不到，這完全是主觀主義；他問地方同志：你們提了意見沒有？抵制過沒有？

他認為去年出問題有一個原因，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性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他也談到自己的四次錯誤：打贛州、百團大戰（還沒作結論）、西府戰役打寶雞、朝鮮第五次戰役。他還提了一些全局性的、尖銳的意見，歸納為八條：

(1) 人民公社辦早了一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驗上一年半再搞，就好了。

(2) 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

(3) 「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麼辦？

(4) 每個協作區、省要搞個工業系統，這不是一兩個五年計劃能辦到的事情。

(5)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6) 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9至11月）發生的，而影響則不止三個月。

(7) 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認識）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8) 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領導作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此外，這時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會上，他鄭重地講到：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東歐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國高得多，還

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講全民煉鐵，國家與地方補貼共50多億，比一年的國防開支還大，用這筆錢去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怕有廬山這麼高呀。毛澤東說，不會有廬山這樣高。彭德懷說，那就矮一點吧。

這個期間，周小舟曾找彭德懷兩次談話。第一次是7月5日。小舟談了關於湖南情況的十來個問題（後來在8月3日的第二組會上，作了較詳細的交代）：如人心思定，農民怕變。供給制只能佔1/3，假如去年公社沒搞供給制，現在不一定搞了；劉少奇也認為必須有限度，這屬於社會保險性質。食堂問題，決不能大辦，勞民傷財，應自願為主。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大隊，主張稍大一些，約500戶左右為宜。勞動生產率下降，同供給制過大有關；同時管理和分配方面都有問題。去年湖南糧產還是估計過高了，今年也只能爭取300億斤（上海會議時加到450億斤）；農業躍進推動了鋼鐵躍進；農民要機器，於是生鐵原計劃30萬噸，後增加到70萬噸；湖南小土群，搞了5萬多個；有兩萬多沒點火等等。彭德懷除了重述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外，還談及今年1月，毛澤東召集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就認為2,000萬噸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組織和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彙報，說起鐵托左右有幾十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此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從而談到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他自己對某些工作缺點，倒是敢於說話的，並且還常給毛澤東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這次送的廣州軍區材料。說毛澤東凡事總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則，不願轉變或回頭。有些意見想找他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會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以當

國防部長。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毛澤東找我們三人談話後的第二天，小舟體會毛澤東是願意聽人談缺點的。周惠鼓動小舟再去找彭德懷談一次，告知毛澤東跟我們談話的精神。小舟於是向彭德懷介紹了這次談話的情況，關於會議多談缺點還是有壓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以及蔣幹故事等等，雙方都談了。說我們講話很隨便，毛澤東都聽進去了，希望他能去找主席談談。彭德懷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小組會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很贊成寫信，說將那些發言加以整理充實，就很好了。彭欣然同意，還對小舟說：「你當了我的參謀。」

在廬山時，張聞天的住處同彭德懷很近，早晚散步常見面。由於觀點相同，張聞天到彭德懷的住處交談過多次。張聞天對小土群煉鐵特別不滿，認為浪費人力、物力太多，並影響秋收，歸結為「得不償失或損失很大」。彭德懷則認為，「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搞得太多，有很大浪費，但也發動了群眾，取得了經驗，還普查了地質。中國太落後，他贊成大中小並舉和土洋結合的方針。張聞天認為今年鋼產1,300萬噸很難完成。造假報告，誇大成績現象仍然嚴重。報紙上公佈的超過國際水平產品，實際是仿照人家的樣品。有些產品質量不好，出口後不僅賠償損失，而且影響國家信譽。張聞天還談到廬山會議壓力很大，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彭德懷則說，西北小組情況還好。兩人也議論到，政治局開會，大事缺乏充份討論，為瑣事佔去時間太多。由於大躍進後出現的紊亂情況和緊張形勢，張聞天還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話很尖銳：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彭德懷則有不同看法，說毛澤東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解決了社會

主義時期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而斯大林是否認有敵我矛盾的（憲法規定過取消死刑），後來又把主次顛倒了。說毛澤東對於中國歷史的熟悉，是黨內其他任何同志遠不及的，說歷代開國之君都英明而厲害，無產階級領導也要厲害才行，同皇帝有本質不同，說列寧很英明，對資產階級則很厲害。彭德懷還對張聞天說，上海會議時，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人，包括對他的批評，他是不滿意的。說毛澤東自己犯了錯誤，不認賬，不檢討，反而責備別人。兩人都談到由於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有些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毛澤東也有些驕傲了等等。

由於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時，仍認為彭德懷在黨內「背着中央進行派別活動，陰謀篡黨」。彭對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實在難以「領受」，這年6月間，曾向中央寫過八萬言書，以澄清在廬山會議時的種種人事來往，以及自己的整個歷史情況。在寫到上述同周小舟、張聞天的這些交談內容後，他認為，「並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其他陰謀目的」。「別人有不正確的意見，自己聽了有時不作聲，不表示反對，這是一種嚴重的自由主義態度，我認為這只是缺點或錯誤，並沒有甚麼反黨陰謀。」

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懷還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覺得寫信不易，還是當面談談算了。可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如果見面談開了，不發生寫信事件，人們又要歎息這種歷史偶然性了。）這時傳說會議可能幾天內結束，於是決心還是寫信。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後，他親筆修改兩遍，參謀謄抄兩次，於14日下午送與毛澤東。後來迫逼這封信起草過程時，都懷疑周小舟參與過其事。為了避免連累身邊工作人員，彭德懷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間寫出來的，從來不講隨從參謀作記錄之事。

這封後來傳播很廣的信，內容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大

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列舉了工農業增長數字，增長速度，「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基建項目過急過多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關於公社化發生的問題，經過中央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關於全民煉鋼，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在第一部份中，後來被指責為「否定大躍進」或「別有用心的」，是「有失有得」四字。（「為甚麼要把『失』字寫在前面呢？這還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以及談到基建項目與計劃安排時的一句話：「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被攻擊得最厲害的是第二部份，即「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中的這樣幾段或幾句話：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關於當時各地「左」的傾向還在繼續和發展，彭德懷掌握了很多材料，他並沒有都在信中反映出來。如相當多的地方還在搞大兵團作戰，不分強弱，不計報酬；由於拆房建居民點，有些群眾無處棲身；不少地區搶着實行「圍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種樹栽花各1/3，這是1958年愁「糧食多了怎麼辦」，毛澤東提出過的設想），加上農村勞力極端不足，1959年春播全國比1957年少9,000萬畝；由於基建項目過多，資金材料等過於分散，造成了限額以上項目窩工待料等嚴重後果；以及市場的緊張等，信中都沒有寫。可見彭德懷在寫信時，還是留有餘地的，並未感情用事，而是考慮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的。他曾估計，即使採取有效措施，至少也要兩年才能恢復到1957年的正常情況。這些都是他當年在廬山的一個筆記本中寫到的。

為甚麼要寫這封信？《彭德懷自述》說道：「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所以我7月14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甚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由此可見，這封信確實是寫給毛澤東本人參考的。不論動機與內容，寫信人應是無可指責的。

對彭德懷的信的反應與形勢的變化

7月16日重新編組之後，彭德懷的信也分發下去了。從17日起，開新的小組會。頭兩三天，對《議定記錄》稿與彭德懷的信的意見，發言者如有涉及，大體是同時談到的。後來兩三天，即到22日下午為止，如果涉及，就只是對信的評論了。但總的還是在「形勢與任務」這個範圍內來談的。這時總理正召集各部開會，討論計委提出的今明兩年的計劃安排，落實各項主要指標，通過《議定記錄》，以便結束會議。

會議原來還是比較平靜的，雖有不同意見，在一些問題上有所交鋒，但並不很尖銳，沒有根本性質問題的爭論，也少長篇大論。所有的發言，包括我們幾個認為會議還有壓力的人的發言，以及《議定記錄》和彭德懷的這封信，都是從根本上肯定和維護「三面紅旗」的。可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彭德懷的信發出之後，突然起了這麼個作用。發言中對信有意見，或多或少，或輕或重，主要集中在第二部份，即對大躍進、全民煉鋼、人民公社化等缺點、錯誤的評價，是甚麼性質的錯誤，如何看待1958年的經驗教訓問題。關於對這封信的看法，彭德懷後來在自己的筆記中，是這樣估計的：多數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份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還有許多人沒有發言。這個簡要分析，大體符合實際情況。

前面已錄下了胡喬木、周小舟和我的發言，是很支持彭德懷的信的。下面錄出的一些人的發言，對這封信，有的是明顯的

支持或反對的；有的沒有直接表態，言內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對，讀者可以自加體會。

黃克誠是17日上山的。18日一早參加國務院會之前，周小舟和周惠約我去看望他。我們都談到會議有不能多說缺點的壓力。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議上他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點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太好講了。談到彭德懷的信，黃克誠說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照實際情況，還可以說得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德懷說。後來傳說周恩來有這樣的話：黃克誠早上山就好了，這樣，彭德懷寫信之事就可能不會發生。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曾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19日，黃克誠在第五組發了言，沒有談彭德懷的信。他說，他同意主席講的三句話和少奇講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現在爭論的主要點是中間「問題不少」這句話，兩頭是一致的。他說：檢查缺點使我們前進，不會使我們後退。毛主席教育我們要天天掃地、洗臉，檢討了缺點，我們就會更加健康，就會幹勁更足，更踏實。他同意《議定記錄》中講的三條缺點，再補充以下幾條：

- (1) 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
- (2) 比例失調；
- (3) 1959年計劃指標過大。

頭一條起了主導作用，後兩條與之有聯繫。北戴河通過公社決議時，黃克誠就對陶鑄、周小舟等人談過：公社掛個牌子算了。黃克誠是一個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慣於多想困難的人，這是大革命失敗後他自己的艱辛經歷，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蘇區，以及多年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在黨內鬥爭特別是打AB團等錯誤肅反政策的教訓中，使他養成的一種思考習慣。他在黨內是有名的「老右傾」，受過多次打擊和處分，但他不以為意，該講的還是講。

可惜陶鑄也好，周小舟也好，誰也擋不住公社大掛牌子。這時黃克誠在發言中談到公社問題時說：「我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對不對請大家研究，去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時期說，不搞更主動些。北戴河決議的領導作用，趕不上七里營、徐水那一套。」談到作風問題，他補充一點，即只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舉出高揚反映河南煉鐵中問題的例子。當時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長高揚帶了一個工作組，到河南登封、禹縣、魯山等地了解煉鐵情況，這是大放衛星的地方，發現質量不好，產量不實，向中央寫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轉到河南省委後，河南省委大發雷霆。這就是講好的高興，講缺點不愉快。黃克誠認為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在發言中，他還指出去年興了鋪張浪費之風。中央出來開會，也很鋪張，我雖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帶戲班子的辦法不好。對群眾講勤儉持家，幾個月不吃肉。幹部吃那麼好，行嗎？最後談到缺點造成的影響：

(1) 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的。基建材料、市場副食也緊張。

(2) 黨與群眾的關係受到影響。

(3) 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影響。毛主席也講過開動腦筋，放下包袱；缺點不講，總是個包袱。

趙爾陸（一機部部長）和陶魯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都在第四組，他們21日的發言，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後來都引起非難，受到批評。

趙爾陸說，過去一個短時期經濟生活上的脫節現象，不能不說已使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響，造成一定的被動。作為高級幹部，由於自己缺乏經驗，頭腦發熱，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確切的情況和資料，應該感到沉重。從這種心情出發，

對彭總的信感到同情，彭總的精神值得學習。建議書值得斟酌的是有個別問題的提法（如說缺點的性質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夠，容易引起誤會。大躍進期間，部門之間工作矛盾最嚴重的是一機部同冶金部。可以這樣說，冶金部在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包括產品的質量、數量等問題，最後主要都落實到一機部，由一機部來承擔。

陶魯筋直率地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樣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詞句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生活上的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關係緊張，是相當嚴重的，現在雖然已大體糾正了，但完全解決還要做很多工作。缺點的性質問題，從理論上講，如有缺點錯誤，必然非右即「左」；大躍進中主要的傾向，肯定不能說右，當然就是「左」。彭總並未說黨的路線「左」了，只說缺點的性質屬於「左」的範疇，這是對的。問題是處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開提出反「左」，以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但將來一定時間，把執行總路線中右的和「左」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還是必要的。

賈拓夫（在第三組）也覺得彭德懷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精神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上山時，自己腦子裝了很多問題，在西北組討論時，感到缺點講得不夠，應該在肯定成績下把一個指頭的問題講深講透，從而得到教訓。這些問題搞不清楚對今後的躍進是不利的。同時，既然已經分清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把缺點講透不會吃虧，否則還會吃虧的。後來賈拓夫受到嚴厲指責，認為他給彭德懷的信提供了炮彈（材料），批評他把陰暗面看得大了，在重大關鍵問題上，嗅覺不靈敏，有點搖搖擺擺。這是後話。

還有萬毅等人的發言也是基本同意彭德懷信的內容和精神的。

7月22日上午，歐陽欽任組長的第六組，繼續討論形勢和任務問題時，關於缺點和經驗教訓，大家仍繼續發表了許多意見，《簡報》有如下較詳細的反映：

缺點和問題：

(1) 不會過日子，誤以為糧食已經過關，失收的損失約佔10%到20%，以致有些地方發生浮腫、夏荒。

(2) 颳「共產風」雖時間不長，但很危險。

(3) 少種、高產、多收乃長遠方向，沒有經過試驗，就過多、過早地實行，結果少種了一些地，造成損失。

(4) 比例關係失調，市場緊張，緊張的時間較長，影響很大。（這是針對其他組有人發言，認為市場緊張已經或很快就會過去而說的。）

產生缺點的原因和經驗教訓：

(1) 經驗不足，確有些問題不可避免，但也不要將甚麼事情都說成經驗不足，說成發展過程中難免的。

(2) 知識不足。

(3) 官僚主義這一條，應寫到文件中去，有些虛假現象是不了解真實情況所致。

(4) 虛報浮誇的作風一度滋長。

(5) 誇大主觀能動作用。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增產無限論」等。當時有的技術人員說，「你們在搞精神第一性」。

(6) 有驕傲自滿情緒。對外國專家的意見不虛心聽，不學習先進經驗，在國外的留學生也一度翹尾巴。

(7) 對於重點與一般，注意重點忽視一般，多快好省貫徹不全面，沒有真正實行兩條腿走路。注意多快，忽視好省。

(8) 沒有掌握毛主席久已強調的「一切經過試驗」，「由

點到面」的逐步發展的工作方法。

(9) 有搶先的思想。如「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北戴河有人提出是作為今後考慮的（按：這個口號，柯慶施在八大二次會議時就提出了），有的搶先實行。報紙一宣傳，就普遍推開。爭着放衛星，互相攀比之風氾濫全國。

(10) 提口號不慎重，如「糧食基本過關」，「放開肚皮吃飯」等。

關於今後如何鼓足幹勁，必須解決四個問題：

(1) 解決政策問題，認真貫徹鄭州會議以來已公佈的各項政策，農民就怕變。

(2) 一切重大措施要經群眾討論。

(3) 把人民生活安排好。

(4) 改進領導作風。中國是個大國，必須注意多留後備，生活資料、生產資料都應有必要的積蓄和儲備。

這個組在17日、19日和20日三天的討論中，發言涉及彭信的，只有個別人批評了「得不償失」論，說「有得有失」不能並列，而且得多失少；不同意工農業失調是「具有政治性」的提法。也有人說，目前主要不是浮誇風，而是「指標越低越落實」的洩氣思想。谷牧、戎子和、鄧潔的系統發言，都一致認為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說夠，同時缺點也要說透。不要隱瞞缺點，但也不要一個指頭說得又大又粗。談缺點的目的是為了有利於改進、提高工作和有利於全黨的團結。鄧潔說，颺「共產風」那一時期，有驕傲自滿情緒，有的不可一世，以為超英趕美不在話下，對蘇聯也不放在眼裏。有的濫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說的是政治掛帥，實際是主觀主義掛帥，如說白水可以煮成酒等。對於缺點不要怕痛，怕痛將來還要犯錯誤，已經花了「學費」，就要把經驗教訓總結出來。戎子和對大煉鋼鐵很是懷疑，小高爐煉出的生

鐵含硫太高，不僅不能煉鋼，用於澆鑄都不行，老百姓都不要。這種生鐵成本高，調撥價也高，冶金部向財政部要補貼20億元（後來實際補貼了40億元）。谷牧分析了鋼鐵形勢，1959年可產鐵50萬噸以上的省有10個，產鋼50萬噸以上的省有六個，生鐵合格率已達70%。還對比了八大規定的1962年各項主要工業指標，同1959年預計完成的相比，即兩年完成了原來的五年計劃，確是大躍進。他還說，從某些具體問題看，缺點可能是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指頭的問題，說它是一種「左」的傾向也未嘗不可。但是從總的形勢說，主要是缺乏經驗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觀片面性以及官僚主義，糾正過程中轉得很快，以不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左」的傾向為好。

這個組22日上午的討論，萬毅說，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到的問題提出來，對於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從肯定成績、提出問題到糾正缺點，基本精神都是對的，但是有的問題說得簡單一些，如果再多說幾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萬毅還批評說，在大躍進中虛報浮誇的作風在滋長，誇大主觀能動作用，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增產無限論」等，是搞精神第一性。對於重點與一般、多快與好省貫徹不全面，沒有真正實行兩條腿走路；注意重點忽視一般，注意多快忽視好省。萬毅說，沒有認真掌握主席久已強調的「一切經過試驗」、「由點到面」逐步發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搶先思想，比如「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在北戴河會議上有人提出是作為今後考慮的，但是有的就搶先實行，加上報紙一宣傳，就變成較普遍的行動。放衛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號提出不慎重，如有的說「糧食基本過關」，「放開肚皮吃飯」等等。有的人說，從實際工作執行中，從一個時期發生的具體問題看，如颳「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說

它是政治性的問題也未嘗不可。有的人說，有些問題熱得過火，如有的縣提出「兩年進入共產主義」等。類似這些問題，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不算過份，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現象，不要說成是普遍現象。有的人說，說我們處理經濟建設問題不像處理平定西藏叛亂、金門打炮那樣得心應手，指我們這方面還缺乏經驗，也是可以的。

從18日到21日，第三組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不同意見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

陳正人不同意信中「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這一點。他認為大部份地區的糧食並不緊張，只有小部份地區緊張，市場情況也是如此。而且，緊張情況正在逐步好轉。好的現象多，壞的少。虛誇現象過去是存在的，現在已大力改進了。現在的問題是另一方面的，即發生瞞產現象。陳正人同柯慶施等住一棟房子，當時很受柯的影響。我們都在一個飯廳吃飯。記得在23日前，不同觀點緊張交鋒的幾天，也許出於好意，一天飯後，陳正人把我拉到一邊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指誰？為甚麼說「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得心應手」這些話也是有所指的。

程子華認為「認識過遲」的說法，不符合實際情況。從北戴河會議到現在，許多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並非認識過遲。「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這種估計，實際否定了農業大躍進的成就。也不能把工業、商業上的缺點，都推到農業上去。「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說的錯誤的思想根源。可是總路線三句話，「十五年趕上英國」，以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幹等，都是推動大躍進的動力；廣大群眾要求很快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並不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把黨的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也不

符合實際。去年群眾路線有了很大發展，商業戰線也搞起了群眾運動。「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這種說法不恰當。就是對食堂不滿意的，也只是少數人。對全民煉鋼估計上，結論是「有失有得」，也不恰當。發生一些缺點，有的不可避免，有的由於沒有經驗。最重要的是，因此取得了寶貴經驗，不能把得、失並列相看。

賀龍認為，我們的缺點還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上有一點缺點、錯誤，有甚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回想博古、王明路線的錯誤，「整個湘鄂西蘇區，被承認為黨員的只有關向應、盧冬生、夏曦和我。提起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像這樣的路線錯誤是難以糾正的。而我們去年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傾保守錯誤，執行總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點所產生的。既是這樣，就談不上甚麼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和甚麼難於克服的錯誤。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着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過火了。」這就是毛澤東23日講話中，關於「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由來。

余秋里的發言中，也對彭德懷的信提了兩點不同意見：第一，說「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浮誇作風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點是有的，不能說是吹遍各地區各部門。同時，成績的確很大，並不是誰瞎吹。對於吹，要有分析。第二，「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不能這樣說。我們有缺點錯誤，群眾固然有意見，但是群眾也的確承認我

們去年的成績了不起，群眾是高興的。

柯慶施17日的發言，根本沒有對彭德懷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見。就得失關係，只是說，就某一部份來說是有失，但就整個情況來說，不僅不是「得不償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於失」。說1959年華東428萬噸生鐵任務，就是要靠去年建設起來的「小洋群」設備完成的。群眾對缺點的意見，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麼嚴重。正如上海工人說的：「只要向我們說清楚，我們哪裏是要搗國家的蛋。」「不要說當這個大家不容易，我當這個小家也不容易，還經常買蔥忘了買薑的。」說農村糧食真正緊一點的是山東濟寧，但濟寧現在基本上穩定了。華東其他各省尚有小部份地區的糧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緊張，都已作了安排，沒有發生甚麼大問題。我們正在切實改正缺點，同群眾的關係不像有些人談的，那麼緊張得了不得。

在柯慶施這個組的張仲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不點名地批評了彭德懷的信中的觀點。他說，從甘肅去年的大躍進情況看，是「得多於失」。甘肅去年的糧食落實數字120億斤，比1957年增長41%。糧食真正緊張的有7個縣，主要是不會過日子，疏忽大意，對糧食問題抓得晚了，對倉庫也沒有管好。由於糧食方面發生了問題，有的同志就懷疑到去年大辦鋼鐵對不對？說煉鋼任務大了，划不來。這些看法雖然不是多數人的，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必須在認識上統一起來，才能達到團結。張仲良舉了甘肅的例子，說1957年甘肅鐵一噸不產，去年鋼就煉了5萬多噸，建設了一批小高爐，培訓了1萬多技術人員和工人，這樣既煉了鐵，又煉了人，不花點學費，是辦不到的。他說，這些成績沒有去年的大躍進，沒有去年的群眾運動，是辦不到的，花再多的錢也是買不到的。最重要的是爭取了時間，加快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這些成績說明「得不償失」的觀點是錯誤的，「有

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對的。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不能等量齊觀。

李井泉也沒有對彭德懷的信發表意見。但在後來批判彭德懷的時候，我聽到他說過這樣的話：你們有一個俱樂部，我們也有一個俱樂部，來對付你們那個俱樂部。20日的小組會上，《簡報》反映，他只談了公社問題。他是從供給制這個角度，評價公社優於高級社的。他認為發生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所有制和「吃飯不要錢」兩個問題上。把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很快變為公社的大集體所有制，步子邁大了一些。「吃飯不要錢」，看來全國普遍實行也有問題。北戴河關於公社決議中，「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他認為高級社的評工分制度雖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但社員收入懸殊很大，有30%超支戶，需要救濟。這是幹部、群眾容易接受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的社會基礎。「我對於這點寄以極大同情。有的高級社不按國家計劃，偏重種植價值高的經濟作物，這也是高級社所有制的缺點。因此，應當承認半供給制是多數農民贊成的。四川實行包兩頭，對老人和小孩實行糧食供給制。公社經過整頓後，佔人口多數的貧農心情舒暢，勞動積極。食堂對組織生產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至20%，勞動時間增加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半供給制和食堂儘管還有缺點，「我是很留戀的」。

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作了長篇發言。他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着絲毫懷疑。去年糧食增產30%，工業增長66%，古今中外所無。大搞群眾運動，是我們黨在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局面，而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變，其價值更是難以估量的。有些問題本來可以避免，是工作沒做好，如廣東不該提倡吃三頓乾飯，土爐煉鐵可以不搞，公社化

應盡量少搞平均主義等。我跟陶鑄比較熟，閒談時他跟我說過：「我這個人歷來是敢打衝鋒的。」陶鑄確實是一個痛快人，心口如一：「我們在下面做工作，腦子確有點熱，因此，出一點亂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不同意不讓講缺點和有壓力的看法：「事實上，不僅在中央的會議上我們不怕講缺點，就是萬人大會要我們脫掉褲子，狠狠地打自己的屁股，我們也幹過了。」他說，搞運動開始時是要一點「壓力」的，運動起來後，就要善於傾聽反面意見。省一級領導在制定政策、措施時，要因地制宜，嚴格遵守一切經過試驗的原則。還要認真讀點書，真正懂得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並能運用它。農業要發展，主要靠機械化；逐步改善農民生活，搞平均主義是不行的。這次會議總結經驗很重要，是在肯定偉大成績的基礎上來總結。「如果中央和省的主要領導幹部看法表面一致，實際上有分歧，對下面影響就大了。下面在等待廬山會議出『安民佈告』。」最後，他談了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彭總的信對這次會議深入一步展開討論，起了好的作用。黨內應該提倡彭總的那種不隱諱自己的意見，大膽講出不同意見的精神。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也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看，對缺點的看法決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裏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的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就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是一個指

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我們並未糾正，因此目前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左』。這樣就會把事情搞壞。雖然大家憂國憂民來提出問題，結果一定會適得其反。」

在陶鑄發言的同時，王任重第四組也作了發言。他同意趙爾陸的意見，對自己犯的錯誤沉重一點，可以多想點問題。（討論中有人對趙爾陸所說「對缺點、錯誤應該檢討，應該沉重」不以為然，認為檢討是應該的，但不必那樣沉重。）過去總喜歡聽好的一面，對壞的一面則不那麼容易聽得進去，或是聽了之後心裏不如聽好的那麼舒服。而下面的同志對我們缺點的批評是非常謹慎的，有的害怕提了意見給戴帽子。中央部門有的同志下來看到了問題也不公開對我們提出批評。省級機關下鄉檢查工作也是多說成績，不大肯說缺點，這是值得我們省委負責同志注意的。他說，無論是總結經驗、說透缺點或調整比例，都不能把沖天幹勁減少。湖北省委接受去年「說大話，吃大虧」的教訓，提出「立大志，建大業」的口號，仍然需要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關於「左」和右的問題，在執行總路線當中發生的某些方面的缺點和錯誤，如颳「共產風」，是帶有政治性的，是「左」的。但不能一般化地講「不『左』則右」。計劃或高一點或低一點，任何時候總是有的，所以一般的計劃不準，不能認為是「左」或是右的問題。在經濟建設中，究竟是「左」的危險是主要的，還是右的危險是主要的？從長期看來，主要的障礙可能還是右傾保守。王任重表示不能同意在經濟建設中糾正「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的說法。關於「得不償失」的問題，王任重說，「得不償失」的說法必須批判，大躍進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總的說來，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

指頭的問題。從1958年造成了大躍進的局面的歷史意義來說，缺點錯誤則不成比例。一個指頭的問題今後還會有的，甚麼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王任重還說，經過幾年努力實現「吃飯不要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說，辦食堂是個正確方向，但可以根據地區的不同，靈活執行，不必強求一致。他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據條件，可辦可不辦」的方針，認為「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是對的。

北京來的同志多關注計劃安排和一些具體問題。這些方面比地方的同志體會深，也談得深。

19日，聶榮臻（在第六組）就小高爐和大型鋼鐵企業問題，對於地方同志還在吹「兩小無猜」，有針對性地發表了意見。首先，認為小高爐目前還有一定的生命力，如容易建設，適合生產鐵合金等，但要調整、提高，並且要形成原料基地。大型骨幹企業如武鋼、包鋼，必須引起足夠重視。這樣大的國家，發展工業，沒有大型企業做骨幹是不行的，它們是全國性的，下放到一個省管理是困難的。今後大型企業的建設，因時間長，必須作規劃，選擇基地更具有決定意義，不能隨意修改設計標準；那種只注意「省」而不注意「好」的現象要糾正。大型企業的發展應當是向現代化、機械化、自動化的方向前進，而不是搞土設備、土機床。其次，還談到增加鋼的品種和提高規格質量問題。今後必須注意提高質量。目前我們鋼的品種只有三百多種，而世界上鋼的品種已達三千多種。應該對鋼的品種規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別是合金鋼最低應佔10%以上，而現在只有3%。現在有的特殊鋼廠為了完成任務數量，在煉普通鋼。此外，還要大力抓一下化學工業，現在化工很薄弱，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特別是酸、鹼最感缺乏，應對化工原料生產規定出一個必須達到的指標。聶總沒有提彭的信。他所談的問題，北京同志都感到是最切中要害的。

18日，王鶴壽就冶金部的工作作了簡要檢查，說關於鋼鐵方面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主要由於存在主觀性和片面性，沒有注意到鋼鐵同各方面的平衡，這應由冶金部負責，跟各省無關。鶴壽同我一個組，我曾將毛澤東跟我們的談話，「兩小無猜」，「曹營之事難辦」等，同他談了，暗示他作點檢討為好。

李先念在第四組，20日的小組會，李井泉發言之後，他有針對性地談了幾個具體問題：

(1) 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分別不同情況辦常年的、季節的、臨時的、一部份人參加的食堂。食堂的好處是節約勞力，但有三個問題要考慮：是否多吃和浪費糧食？360斤口糧肯定不夠，在家吃飯可以糠菜半年糧；燃料問題，北方用煤要增加，今年預計要銷八、九千萬噸；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會下降？（有人插言，肯定要下降）

(2) 公社問題，步子走得快了點，對農民的覺悟和幹部的水平估計過高。

(3) 綜合平衡問題，這是大躍進中一條主要經驗教訓，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門內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鋼，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爐、平爐和轉爐，還要看礦山、軋鋼能否跟得上；左鄰右舍的平衡；最後集中在物資、綜合財政和勞動力的平衡。去年計劃工作在這三個方面都有缺點。

(4) 小高爐問題，需要整頓，否則不能堅持。去年搞小高爐貼了40億，也不可惜。但有些同志認為40億搞1,000萬噸鐵的生產能力，比武鋼用15億搞300萬噸並沒有多大不合算，這一點要研究。小高爐的賬要細算。

20日，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在第二組）也作了檢討性的發言：去年報糧產7,500億斤，現在4,800億斤，高了1/3多；棉花報

6,700萬擔，現在4,300萬擔，也高了1/3多。（後來查明的實際數字都更低，糧食只比1957年增產2.5%）這種工作中主觀主義的原因有二：

（1）總想多搞一點，對困難條件看的少，有利條件看的多，腦子發熱，願聽好的，不好的聽不進去；

（2）官僚主義，對下面數字缺少核對。現在要更正，弄得中央很被動。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主管部門應該負主要責任。」關於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錯誤，談了五條：

（1）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2）混淆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這兩項都是鄭州會議後才糾正過來。

（3）過早否定了高級社小集體所有制。第二次鄭州會議才解決。

（4）對社員統得過多，如勞動時間、副業生產、集體生活等管得過死過多。這些問題，中央、主席很快發現，連續發了好幾個文件，及時改正。

（5）具體工作當中的錯誤甚多，如強迫命令、技術措施一般化和亂推廣等。

「但搞錯了的畢竟是少數，如果多數搞錯了，又為甚麼大增產？」關於群眾路線問題。強迫命令，一度有發展，這不能全怪下面，上面指標高，不切實際，下面就不免強迫命令。但群眾路線也都有發展。同自然界作鬥爭，怎樣搞群眾運動，也應該加以總結。廖魯言認為市場是緊張的，豬和蛋要到明年夏天才能緩和。最後談到彭德懷的信：「我認為彭總的精神、態度是很好的，把問題直截了當提出了，引起大家討論，這已經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這種精神，我們應該學習。至於信的內容，有些問題

的估計，例如『基本證實總路線是正確的』、『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不能同意。」

劉瀾波也在第二組的討論中作過類似發言。他主要是談電力工業的情況，說我們也有指標過高、不切實際的地方，如曾設想過今年裝機1,000萬千瓦，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在提出裝機指標時，對製造發電設備所需鋼材品種、機械製造能力等未認真研究，總想多搞些，不願落後影響別人。你可以，我也可以，大家團團轉。如果認真研究以上情況，感到不可能時停下來，問題也就暴露出來了。電力工業的計劃指標過高，我們是有責任的。劉瀾波還談到彭德懷的信：「關於彭德懷同志給主席的信，有意見就說的精神是好的，主席講過多次，要大家有話就說，應當提倡這種精神。」

20日上午，朱德（在第三組）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幫助農民建立家務的重要性，並且說，不論在工礦企業和公社中，都要加強經濟核算，個人也要有核算，這樣，日子就好過了，生產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以形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毛主席號召我們讀書，就是要把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搞通。

彭德懷在第四組。就在21日討論到他的信時，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話，說到他寫信時的心情：大躍進的成績是偉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對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點也已經基本糾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風上的毛病，還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績之後，必須正視缺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全黨。他聽說15日要閉會，有些意見未講完，心裏放不下，倉促寫了這封信，文字上、邏輯上有些缺點，沒有能準確表達本意。建議會後把他的信收回。這個插話雖短，但寫信的本人聽到許多反應之後，已感到不安，感到信有缺點，怕引起不好影響，要收回他的信，以免再向下擴散。按理說，即令對這封信和寫信的人抱

了成見，本人有此聲明，也可以不再追究了。可是這段話，後來也認為是假的，不是本意。

以上扼要地記錄各組討論情況，儘管對彭德懷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執一端的，但總的說是正常的發表意見，不過有了更多的、甚至較尖銳的爭論。應當說，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現象。其實，當時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安排好今明兩年計劃，有個「安民告示」，快點通過《議定記錄》，以便下山去抓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二十天了，都想快點下山。可是，會議形勢的變化，不在會場上，而在會外的活動。譬如：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慶施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廣州會議時，毛澤東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時說過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我連忙將柯慶施的話告訴田家英。田家英跟我談到他們的估計：「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也攻周惠。他們知道彭德懷同毛澤東之間有歷史上的宿怨，說這封信的矛頭就是針對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個人決定」，「政治性問題」，「糾『左』比糾右難」，「不那麼得心應手」，這些話都是指着毛主席說的。說犯了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還有傳言，彭德懷在拉隊伍；說書記處成員，一半對一半（有一半拉過去了）等等。彭德懷在西北小組說的，華北座談會「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的話，都傳出來了。同時，在小組會對彭德懷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態的人，有的到毛澤東處談了自己的意見；或者反映現在會議一個勁在洩氣，指標越低越好，大躍進再搞不起來了。這些事實，從以後兩天的常委會上批彭時，毛澤東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此，導致7月23日毛澤東那篇講話的原因，除開他本身的主觀原因外，還有眾多的客觀原因。毛澤東當時除找我們幾個人談過話外，當然還找各大區負責人談過話。究竟柯慶施等人怎樣在毛澤東面前攻擊彭德懷以及我們這些「右派」的，詳情雖不得而知，但上述這些傳言，肯定都是或多或少講過的。在22日之前，毛澤東同中央常委同志，肯定沒有交換過有關23日講話內容的意見。我的記錄本上，記有7月20日劉少奇提的三個問題：

- (1) 1958年是「左」傾錯誤還是右傾錯誤？
- (2) 去年三個月時間，是否犯了路線錯誤？
- (3) 1,300萬噸是否右傾？3,000萬噸是否「左」傾？

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時，我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我有意問道：你看彭總的信怎麼樣？周恩來說：那沒有甚麼吧。意思指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周恩來一直在主持國務院會，在抓計委，急着安排好今明兩年計劃。7月22日下午，政治局還開會修改《議定記錄》草稿。

彭真上山後，7月22日，由彭真接替周恩來，主持廬山會議的討論工作。

張聞天的發言

大概在北戴河會議以後，張聞天對總路線大躍進這一整套做法，就開始懷疑。他對經濟問題有過研究，也深感興趣。在延安，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之後，1942年1月，他率領一個調查團，到陝北神府綏米四縣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對農村、城鎮進行長達四百天的全面調查，收集大量有關經濟和社會的材料，自己或指導其他同志共寫出很有內容的十九篇調查報告，從而更加養成堅持求真知的科學習慣。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工作時，他曾着意研究經濟問題。1948年到東北局任常委後，常率領巡視組深入基層，對東北各種經濟成份的歷史和現狀進行過多次調查，並用很大精力研究過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建設方針。主持東北城市工作會議時，他為東北局寫過《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科學地分析了當時東北存在的5種經濟成份（國營、合作社、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小商品）及其相互關係，並據此提出了黨對經濟建設應該採取的方針路線。這個《提綱》受到中央重視，其中許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文件中。到1949年7月這個期間，他還先後就供銷合作社的方針、土改後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對待私人資本主義政策等問題，向中央和東北局寫了四個文件。其中允許新富農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等意見，曾受到過非難，但他並沒有輕易放棄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

1951年後任駐蘇大使期間，張聞天十分關注國內經濟建設，一直將介紹國外經濟情況及經驗，作為使館的首要工作。1952

年，他曾給中央寫過《關於中國工業化問題》的建議書。其中提出兩個重要思想，一是「拿來主義」，即國外於我有用的先進東西都拿來；二是「穩步前進」，不要離開中國現有條件去加速工業化，否則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進後，張聞天就在駐外使館談過，國內有冒進，供應緊張，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觀主義。他對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准講反冒進，是有抵觸情緒的。按照他自己後來寫的「檢討」說：八大二次會議後，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始也是擁護的，也興奮過。但看到一些缺點、錯誤後，就發生了動搖，以致懷疑總路線，即對毛主席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懷疑。外交部機關煉鋼，由於沒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據張聞天的秘書蕭揚回憶：「外交部黨委開會時，有時也會談起國內形勢，與會者對當時『左』的錯誤都很不滿，陳毅對浮誇風、『共產風』等批評得尤其尖銳。」（《憶廬山會議前後的張聞天同志》）1959年3月在兩廣參觀時，張聞天作了很多調查，注意到勞動力的緊張，許多小高爐並未點火，糧食與副食緊張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在廬山會議前的兩次政治局會議上，他一再陳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尤其認為宣傳中要承認缺點和錯誤，說我國的國際威信已經受到影響。發言時被人頂了回去。他同彭德懷在會前和會議期間，以及各自在東歐訪問碰面時，都有交談，觀點比較一致，他是贊成彭德懷寫信的。

會議前期，他還找計委和財貿部門的負責同志了解情況；也找周小舟談過，同樣感到會議不能暢所欲言，談缺點還有壓力。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確是為黨為國憂心忡忡的。他過去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對「左」的東西自然特別敏感。他有經濟理論修養，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對蘇聯建設的經驗也比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這樣重要的歷史關

鍵時刻，自然感到有責任向中央闡明自己的看法。

在彭德懷的信印發之後，我們幾個人在田家英處聚談的那次，正談到信的內容時，張聞天進來了，同我們一起議論起來。記得我還開過一個玩笑，說我們這是「低調俱樂部」。（抗日戰爭初期，汪精衛、陳公博等人持悲觀論調，自稱為「低調俱樂部」。）所幸者，這個如追究其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後來批鬥高潮時，未揭發坦白出來。胡喬木馬上接着說：不是，不是，我們這是馬克思主義俱樂部。這個細節可以說明我們之間談話的傾向。這是在廬山會議時，我同張聞天主要的一次接觸，因為我們沒有編在一個小組。

張聞天的長篇《發言》，是7月21日在第二組作的（組長是柯慶施），距離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只有兩天。這時對彭德懷的信的非難已經很多，說這封信的矛頭主要是「針對着毛主席」的種種嚇人說法，都已傳開，形勢比較緊張。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早晨，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打電話關照，要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張聞天以鮮明的態度、確鑿的事實、科學的語言，冒險犯難，直言極諫，完全支持已遭非難的《議定記錄》稿和彭德懷的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在他發言時，組長柯慶施和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的意見。他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侃侃而言，直抒己見。後來批鬥他時，說他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小組會的發言，《簡報》一般只刊要點。7月23日之後，這個「副帥」的《發言》記錄稿就全文印發下來。（這個記錄稿不完整，現在《張聞天選集》所載是根據原始記錄重新整理的。）批判時，有人讓秘書作了統計：全文八千多字，而講成績只有二百七十餘字。用了

39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議定記錄》對缺點及其原因沒有展開論述。《發言》說是對《記錄》所談缺點補充一些意見，實際是關於大躍進的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總結：對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點及其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作了系統的論述；對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三種所有制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根本問題，作了理論的探討；最後歸結到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

當時各小組討論中，有一種較為普遍的意見，即前述多說缺點，就會洩氣，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發言》針鋒相對地說，缺點定要講透，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我們從前犯過盲動主義，毛主席總是經常提及。對缺點不要輕描淡寫，要採取鄭重態度。馬克思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我們現在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增產數字報了那麼多，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馬克思說過，革命時容易辦蠢事。列寧也說，要正視這些蠢事。

《發言》指出，缺點的原因可以講得具體一些：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講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如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太長；「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二千多萬，人浮於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不能實現價值；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等等。從而造成大量資金和物資浪費、積壓，市場供應緊張，物資儲備

減少，財政結餘用光，外貿出口不能完成等惡果。全民煉鋼不單賠了50個億，最大問題還在9,000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去年甚麼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

從毛澤東起，當時大多數人還是要保食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一個標誌。報紙上曾大批「資產階級法權」，批按勞取酬。《發言》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照顧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同時明確提出：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社會主義要貫徹按勞分配，就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權，這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發言》還精闢地談到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宣傳問題：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這些可以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先進分子，但不能當做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

關於產生缺點的原因，《發言》同意《記錄》說的，主要是由於缺乏經驗。但不能以說到此處為滿足，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和作風上去找原因，這樣才有利於總結經驗教訓，避免今後重犯錯誤。這也是張聞天發言的主旨所在。關於主觀主義和片面性，《發言》專門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是對的，但強調過了頭，以致不顧實際可能性，這就成了主觀主義。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

速不達，好事變壞事。從主觀主義進而談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領導經濟光政治掛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賬，只要算政治賬。這是不行的。今天總結經驗，尤應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

綜合平衡的問題，當時也是很有爭論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一哲學範疇的法則，為大躍進出現的嚴重失調辯護，甚至認為就是要衝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記錄》中「綜合平衡」一節是我起草的，內中有四句話：「統籌安排，供需協調，瞻前顧後，合理佈局。」因字數所限，沒有展開講透。《發言》明確地說，經濟建設就是要找出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利用相對平衡制定經濟計劃，要使之大體是個平衡的計劃。遇到某一個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時平衡，這就是所謂積極平衡。還建議在《記錄》草稿中加一條「經濟核算」：任何產品，都要講成本，要算賬，這跟「算賬派」是兩回事。用毛主席的話說，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就是要精打細算。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立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說是要算「政治賬」，而「政治賬」同「經濟賬」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發言》認為，我們國家還是一窮二白，資金有限，必須根據節約原則，嚴格控制資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塊錢。因此，毛主席要大家學政治經濟學。領導經濟建設，不懂或不熟悉經濟規律是不行的。中國經濟建設有其特殊性，但是有關的普遍規律仍然起作用，問題在於兩者相結合。政治經濟學，不僅高級幹部要學，廣大幹部也要學。

大躍進時期，不按科學辦事的事情太多，報紙上放肆地報道，隨便吹牛，放衛星，越外國，引起很大的混亂，國外影響也

不好。廬山會議前夕，在外交部的務虛會上，張聞天就講過不要吹，說有些東西我們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但究竟正確與否，還有待實踐證明。因此，《發言》強調，必須學習科學技術知識。許多東西我們缺乏常識。不能隨便把原有的行之有效的東西推翻，更不能隨便吹牛。生產技術措施沒有科學根據，光用土辦法蠻幹不行，蠻幹是要死人的。對於已有的科學成果要重視，「一切經過試驗」，試驗確實成功了，再推廣不遲。但實驗室裏成功了，還不等於在生產中也已成功。趕超世界水平之類的話，要謹慎，的確比人家高明，再講也不遲，而且以自己不講、讓人家替我們講為有利。

《發言》針對性極強，如此明快而尖銳，幾乎毫無顧忌。最後說到根本關鍵還在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時，尤其如此。上海會議時，張聞天在小組會議上曾說過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問題。《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發言》還特別欣賞《記錄》草稿中的一段話：「必須在全黨幹部中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對於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參差不齊，只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麼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採取粗暴武斷方法，不要隨便扣帽子。」《發言》說：「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光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

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幹部有利，對工作有利。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面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甚麼這樣呢？為甚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裏，怕甚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發言》的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針對有些人對信中某些措詞的挑剔，《發言》為之辯解。特別是關於最敏感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法，為最受攻擊之處，就是贊成彭德懷的信的精神的人，也無不多少表示不同意見。惟有張聞天一個人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廳『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促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的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一副催化劑。

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據傳，其他常委也同大家一樣，是臨時得到通知的。）動身之前，我曾同劉瀾波談到對毛澤東講話的一種估計。

劉瀾波和我住隔壁房，我們不在一個小組。我在會外的活動以及毛澤東找我們兩次談話，我都避免跟他交談。我們在延安就認識，1952年我轉業主管水電工作後，我們之間先後是上下級與正副職的關係，我視他如兄長，能談點私房話。在懷念劉瀾波的文章中，我曾寫道：「7月23日之前，柯慶施等率領的『左派』很活躍，劉很擔心我捲入被攻擊的靶子中。當時對於彭德懷的信有各種談論，『左派』認為彭的矛頭是對着毛主席的。他和我一起估計形勢的發展，問我的看法。我說，主席講話，可能是『左右』兩邊各打五十板子。我當時心情很沉重，還有點憤激的情緒。劉也表現得跟我一樣心情沉重。」

下面是毛澤東講話的全文，當時我作了詳細記錄，現在參照別人的記錄予以整理。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份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

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颶風。右派講，秦始皇為甚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份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們搞出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甚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硬着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佔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為甚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甚麼聽不得？我們多數

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甚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甚麼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鐘頭。嶺岬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7、8、9這三個月，平均每天3,000人參觀，十天3萬人，三個月30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麼多人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到那裏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30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還吃不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30%是積極分子；30%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份貧農）；40%隨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

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只30%。總之，加40%為70%，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颳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颳「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甚麼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颳大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捨不得。哪裏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立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就走。那個我看是可以的，他劫甚麼人？劫土豪劣紳。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颳「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徵購，擠垮，贖買。怎麼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

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做詩，他口唸，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進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做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是一篇翻譯作品。）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宰相，為甚麼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麼，工人學哲學麼；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有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了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麼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

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次會，我就是這麼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着頭皮頂住。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真成假，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份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份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份同志是我講的四種人裏頭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份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份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份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份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甚麼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

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1956年、1957年的那種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甚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洩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份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麼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只要你登70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10件事，9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

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這是一方面。我勸一部份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正確的，部份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要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18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着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甚麼只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忙不忙講，硬着頭皮頂住。我不忙講，硬着頭皮頂住。我為甚麼現在不硬着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甚麼不可以？

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能保持1/3，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5億農民來說，多少人？1億5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闢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麼，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辦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着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

有缺點。無論甚麼事都有缺點。無論甚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甚麼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裏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就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甚麼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12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蕉，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去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總理着急。無一股熱氣，神氣，

辦不好事，李達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礴，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甚麼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麼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做甚麼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份人都不高興：一部處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份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啊！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大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嵯峨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甚麼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誌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甚麼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的也相當多，

如譚老闆（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得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他是唱戲的，不然為甚麼叫譚老闆。長處是一股幹勁，肯負責任，比那淒淒慘慘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問題上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地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20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麼久？還是不要那麼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覆覆。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啊！（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革命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頭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這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麼辦？只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的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只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划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

社，1927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1927年那樣失敗？像萬里長征那樣，大部份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1/10，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麼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毫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份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份沒有失敗，一部份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動力，多付了一點錢，颯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甚麼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海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600萬噸（按：1958年6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1959年鋼鐵

指標為600萬噸，引起全國1959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1958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9,000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補貼40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這個講話，對我們這些「動搖分子」，「離右派30公里」的人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悶頭一棒。散會後，我們離開小會場不遠，回頭看見彭德懷擋着毛澤東在說話。（後來知道，是彭德懷申明，這封信只是供主席個人參考的，沒有準備印發給大家。）

我們四個人：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和我，沿着山邊信步走去，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講話，懷念田家英文中，我記下了這一情景：走到半山腰的一個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來，還是沒有人吱聲。亭中有一塊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陽明詩句：

昨夜月明山頂宿，隱隱雷聲翻山谷。
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

刻詩者是否預知我們要到這個亭子來？詩意跟我們此時心境有某種暗合。（此詩是不久前偶然碰到的，在秦城做詩時怎麼也想不起來了，當年是背得的。）在亭中，遠望長江天際流去，

近聽山中松濤沉吟，大家仍無言相對。見到亭中幾個石柱無一聯刻，有人提議，寫一副對聯吧，我揀起地下燒焦的松枝，還沒有想好聯句時，家英抬手寫了這一首有名的舊聯：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在心頭。

寫完了，四個人依舊默默無語，沿着原路，各自回到住處。我的《廬山吟》第五首，回憶了這一淒涼時刻：

信步無言山路旁，大江天際去茫茫。

明詩刻石已難記，亭柱書聯卻未忘。

中午飯吃不進去。下午就開小組會，討論毛澤東講話。晚飯後，千不該萬不該，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處去了。這當然是由於思想不通，滿肚子意見要發洩，去找他們談談，平息一下情緒。小舟同我一樣，比較激動。他懷疑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覆變化太快。談到斯特朗的談話，她曾當面稱讚毛澤東超過馬恩列斯，而毛澤東沒有答話。感覺多年來的順境，毛澤東確實驕傲起來了。我認為毛澤東確是喜歡高指標的（這是我這一年多來的接觸和個別談話中，深深感覺到的），只喜歡柯慶施那樣一些吹牛說大話、奉承迎合的人（柯是個手拿大棒，隨時準備整人的人）。當然，譚老闆放炮不準，但勇於負責，還是很喜歡的。黃克誠這樣比較偏於穩重、多看困難的人，就很不喜歡。我又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雲覆雨」嗎？小舟也認為這個講話，

是「一百八十度轉變」，使人轉不過彎來。他特別激動，想三人一起到毛澤東處辯論一頓，爭吵一頓也好。我認為從講話來看，正在氣頭上，去也沒法談。於是小舟要去找黃克誠談。這時，我倒有個心眼，覺得這樣去談，不就變成「小組織活動」了？會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過小舟。他撥通電話，黃克誠不同意我們去。由於小舟的堅持，黃克誠只好說：「你們要來就來吧。」於是就發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夜事件」。

當然，黃克誠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極為沉重的。開完會回來後，他和彭德懷都吃不下飯，也都沒說話。小舟將斯大林晚年的話講了。說袁世凱稱帝前，圍着袁那些人，專門印一種報紙給袁看，意謂毛澤東受了蒙蔽。我說了一句很憤激的話：他不能一手遮天。黃克誠勸我們不要激動，說毛澤東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體領導很好；自己有錯誤，多想想，可以作檢討。黃克誠最後勸慰我們，有意見還是當面去見主席談談。周惠很少說話。這樣，我們才平靜下來。小舟又談了些湖南當前抗旱等一些工作問題。這時已經近10點鐘了。將起身走時，彭德懷到黃克誠的房間來了。他們住在一棟平房的兩頭。小舟見彭德懷進來，即說：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說，着急有甚麼用。我見房內無多餘的椅子，都站起來了，就催小舟：太晚了，該回去了。我們三人即走了出來。由於住處方向不同，我單獨一人走了。回頭看見小舟正在路邊碰見羅瑞卿，向羅瑞卿打招呼。

在秦城獄中，回憶廬山舊事，常常懷着自責的心情，7月23日夜發生的事，更追悔無已。《廬山吟》第六首，記「7月23日夜」：

山中夏夜鬼纏身，號角鳴金耳不聞。
心事滿腔何處訴，已無緣再讓交心。

批評與檢討

7月23日下午開始，六個小組開會討論毛澤東上午的講話。7月26日之前，發言的人態度都還是比較冷靜的，語氣也比較緩和，會議的氣氛還是比較正常的。對彭德懷的信的批評也基本沒有脫離信的本身。不過說法輕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數人調子比較高。許多人的發言還着重做了自我批評。

還有一個情況，可說明講話後仍在按正常程序辦事。就在23日上午散會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同彭德懷的對話很能說明問題，周恩來還在談形勢的困難，還在安慰彭德懷。

周：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同洩氣區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比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甚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甚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那個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

也很好。

彭：共產黨裏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有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儲備。六個月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80萬人。按「一五」經驗，1元貨幣比9.6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年，1：8.8就緊張了。

彭：這些情況為甚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洩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吸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樣兩方面都說了的。

這是周恩來當時真實的心情。這裏還可以插敘這樣一件事。周恩來對鋼鐵生產的情況是一直不放心的，懷疑指標是否真落實了。上廬山之前的5月19日，他派陸定一和他的秘書許明並一位專家，沿津浦線南下到上海，一路實地考察。陸定一在《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刊《光明日報》1979年3月6日）文中回憶道：「從北京出發，經濟南、薛城、棗莊、徐州、南京，到達上海，然後經蘇州、無錫、常州回京。在這些地方，我們親眼看見所謂『小土群』或『小洋群』辦法煉鋼鐵是極大的浪費。煉鐵要焦炭，沒有煉焦爐，就堆在地上燒，結果大部份煉焦煤被白白燒掉，只有中間一小部份能作為焦炭用。所謂『小高爐』，很多是用磚砌的，煉不出鐵，煉出鐵來也不合格，已經棄置不用。開礦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沒有地方住，

在地上挖個方坑，在坑裏鋪上地鋪，被褥都是濕的。弄虛作假的現象也很嚴重，例如，煉出的鐵含硫量高，不能用，卻充好鐵計算生產數字。我們到了上海，當時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柯慶施和市委管工業的書記馬天水不敢見我們。他們派了一個人向我們說大話，說1962年上海要年產1,000萬噸鋼。我們一計算，單是為了運輸煤炭、礦石和生鐵，上海的車站和碼頭就不夠用，且不說其他了。」回到北京向總理彙報時，「總理只是仔細傾聽我的彙報，沒有談他的看法，也沒有批評我思想右傾」。陸定一曾同我在一個組，他較少發言，只記得大家批判我時，他只有一句較重的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大概這也是迫於不得已說的。在文章中，陸定一還談到，從北京去廬山的火車上，他同彭德懷談話時，也把對總理的話對彭說了。於是在山上也有人說他右傾。

26日這天，傳達了毛澤東新的指示：對事也要對人。印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及長篇批示。會議就進一步升級加溫，就不只是信的問題，而且是人的問題了；就不是無組織，無準備的了，而是有組織，有準備，有綱領地向黨進攻了；而且還是「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的問題了。

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說大躍進是靠熱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還談糧食緊張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如果不能節約糧食，小食堂就比大食堂好。農民私有制慣啦，分散消費，還能節省一些。」又談到手工業問題，去年擠掉了一些，很多升了級，升級國家揹上了包袱。「沒有私有制不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自生活，這也是個經濟核算制。」25日，他在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首先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

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合乎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嚴重。他最後說：「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只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朱德同彭德懷是三十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但還是很尊重彭德懷的，總怕過份傷了老朋友的心。

這時許多人在發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檢討。談到彭德懷的信時，作這樣一些表態：開始只當做一般文件看待，並未引起重視，聽到主席講話後，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對信的認識，有個變化過程。開初只覺得有些提法、詞句不當，但精神是好的，沒有意識到這是根本方向問題等等。原來發言基本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精神的人，當然更要作較明確的表態。

要說彭德懷這次是有準備、有組織地反黨、反毛澤東的活動，這個彎是不容易轉的。

譚震林在第五組，26日黃克誠檢討之後，他接着發言。說主席講話之後，他思想沉重。自己重犯「一觸即跳」的老毛病。他認為去年颳「共產風」，「這是我要負責的，過去作過的檢討一律不算，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都是應當的，我毫不推脫這個責任。這一條，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地批評了這種『左』傾錯誤。問題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其次談到去年農村工作確實有一個大錯誤，就是估產偏高，又沒有抓好過日子問題。相反還提倡「放開

肚皮吃飯」。[這個錯誤我應該負責任，要批判，要處分，應該由我承擔。]隨即說，認識了錯誤，又改正了錯誤，可不可以將「功」折「罪」呢？或者說「戴罪立功」呢？最後談到，心頭還有點火氣，並非檢討不誠懇，就是因為彭德懷的那封信。「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同志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些誰都是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也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一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一切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在將來再作出的成績。」

譚震林對彭德懷的信嚴重性的看法，雖然同朱德有質的不同，但這兩位井岡山時代同彭德懷一起浴血苦鬥過來的人，在這種時刻，對彭德懷的過去和為人的耿直，仍然作如此評價，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也是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的。可是過了兩天，當人們批評他講的這段話時，懾於外來的壓力，心直口快的譚震林，不得不收回他講的這番話。而且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7月23日下午，李井泉在小組（第四組）作了檢討。他說，並不怕講缺點，只是對把缺點講得過份有點抵觸。他承議去年頭腦確有發熱；也有官僚主義；鋼鐵說有把握完成，實際沒辦到；農業產量上報數字過多；農村勞動力也動員過多。但「以鋼為綱」，一馬當先，帶動萬馬，今天看來仍是正確的。主要是鋼鐵質量問題，但對於小土群加小洋群是不懷疑的。毛主席在公社化和全民辦鋼這兩件事上，有着具有歷史意義的貢獻，不是兩條大罪狀，而是兩條大功勞。他這次發言還沒有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問題。26日，李井泉對彭德懷的信作了長篇批評發言。他

說，彭總信本質上的錯誤，是沒有站在1.5億至3.5億的貧苦農民和9,000萬辦鋼鐵群眾的感情與要求方面來看問題。說彭總沒有一點群眾觀點也不是事實，但彭總在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對運動的看法是有問題的。主席常教導我們應從階級分析看問題。去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曾聽到主席說過我們黨的階級基礎是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我認為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既是黨的階級基礎，又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可靠的階級隊伍，也是我們觀察問題的落腳點。在執行總路線中出現的群眾性的兩件大事（一是大辦鋼鐵運動，一是公社化運動），是歷史上空前沒有過的，而彭總的信中批評的鋒芒恰好針對着這方面。很明顯，對去年大躍進的看法，如果從同情1.5億至3.5億貧苦農民和9,000萬大煉鋼鐵群眾的態度出發，那就會做出正確估計；如果離開了他們，那就一定會做出錯誤的結論。主席批評那些方向錯誤和動搖的人，本質上的錯誤，就是離開了偉大運動中的群眾。彭總信的錯誤也在此。李井泉還談到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和大辦鋼鐵的看法：彭總多次說公社不辦、遲點辦更好，很不贊成「吃飯不要錢」的口號。這是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認識不足，特別是對貧苦農民要求解決貧困的迫切心情缺乏同情感，因而對公社化的看法也是錯誤的。彭總信對小土群的看法，前後在意見書中也有錯誤的。信中一段話的主詞是在前面肯定了浪費，而把巨大的成就卻估計得不夠。後面只說雖是浪費，是「有失有得」，這種估計是不恰當的。彭總這封信只能使人們感到我們在公社化、大躍進中犯了一個了不起的大錯誤，甚至犯了路線性質的錯誤。實際上起了否定總路線的作用。

柯慶施在24日、26日兩次長篇發言，《簡報》一次刊出時，約五、六千字。他說，「我決不是不承認缺點、錯誤的人，但即使在一兩件事情上有怕痛、護短的情況，也是不應該的」。「現

在有人只衷心高興第二句話（問題不少），到處擴大缺點。」他着重談了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這封信的整個內容，應當肯定是錯誤的。」尤其是信中說的工、農各階層間關係緊張是政治性的，浮誇風吹遍各地，「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易犯「左」的錯誤，糾「左」比糾右難等，實質上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總路線的正確。於是談到路線錯誤問題：「從黨的歷史上看，只要路線錯誤，就非要改造黨的領導機關不可，因為歷史證明，凡是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柯慶施的這兩次發言，是開始批鬥彭德懷時，小組討論中最早的「畫龍點睛」之筆。

王任重於24日的發言中談到了如何對待群眾運動中的「偏差」問題。他說，建設中的群眾運動有其不同的特點，但一切群眾運動都是一樣，要麼就不起來，冷冷清清；要麼起來了，就出些「亂子」，出些「偏差」。對於這些亂子和偏差，應當怎麼看法，怎麼解決，這在我們是有過無數次教訓的！抗戰期間有過反「左」潑冷水的教訓。1947年的土改出過「左」的偏差，主席及時糾正了。三反、五反、鎮反都有過某些「左」的錯誤，也都及時糾正了，沒有潑冷水。1956年躍進剛起來，來了個「反冒進」，主席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1958年是更大的躍進。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採取甚麼態度，是肯定成績、糾正錯誤、鞏固勝利、繼續躍進呢？還是潑冷水？王任重說，關於全民大辦鋼鐵和人民公社化是兩大功績，不是兩大罪狀。執行當中有缺點錯誤，是暫時性質的。有許多問題都是事先預料不到的。碰了釘子知道回頭，挨了餓學會過日子，不值得大驚小怪，憂心如焚。右派攻擊我們是「衛道者」、「歌德派」、「教條主義者」，我們就是要保衛總路線，歌人民之功，頌人民之德，絕不能動搖。

我20日的發言，曾點名批評了王任重兩件不慎重的事。23

日講話之後，他向大會秘書組寫了一封信，刊登在《簡報》上。他說：「李銳同志在小組會的發言中，說我在三峽科學研究幾百人的會議上講，成都會議的決議都是促進的，惟有三峽的決議是促退的。我要說明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中央關於修建大壩的決定，我參加過討論，我是十分擁護的。我只是說過有的同志希望時間更提早一些，要求科學家們鼓足幹勁，想辦法能使三峽大壩的修建提前完成。我寫《毛主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夠慎重的。但是我決不會在那樣的場合說中央的某一個決議是促退的。那樣說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的。」由於形勢的發展，我沒有就此事再饒舌了。不過，「促退」之語是確確實實說了的，這是參加會議的機械部主管電機製造的負責人告訴我的，當時他們被將軍將得很厲害。

康生在第四組，24日也作了長篇發言。他說：「主席提到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張國燾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事件等歷史教訓。我昨晚初步回想了一下，在立三路線時，沒有犯錯誤。在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我是執行過這個路線，犯過錯誤的，在第一次整風時曾經作過檢討。張國燾路線時，我不在國內。在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事件、整風反右以及現在執行黨的總路線中，由於在主席和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沒有動搖過，沒有犯過大的錯誤。」在這一番表白之後，康生說：「我認為主席所說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的兩大『罪狀』，是從反面來講的，是從敵人、右派、黨內反黨分子的看法來講的。從我們、從全黨、從全國人民來講，這不僅不是『罪狀』，而是兩次偉大的功績。這不僅是對加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大貢獻，而且，歷史將會證明，這對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也是重大的貢獻。在具體工作上有一些缺點錯誤這是暫時的、局部的、難免的，而且是不難糾正的。實際上，從去年鄭州會議以來，即已經得到糾正。把

我們經濟生活上的某些比例失調現象，誇大成為影響整個社會各階級關係的錯誤，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對大躍進中的某些缺點錯誤，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應當多負一點責任。譬如說，主席提到十五年內讓所有的人進大學的想法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不應由主席負責，而且也不應由柯老負責，主要應當由我們管教育工作的同志特別是我自己要負責。北戴河會議關於教育工作的決議中雖然提到這個問題，但也不是說讓所有的人都進大學，而是說在普及中學後，凡是有條件的青年和成年能夠受到高等教育。同時規定了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共需三十年時間。現在看來，十五年普及可能要求過急了一些。但這種問題的性質，並不屬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一類。」關於彭德懷的信，康生說，「首先引起的一個感覺是『彭總為甚麼要寫這封信』？覺得意見書前後矛盾，不合邏輯。前面肯定，後面否定；前面說『是』，後面又說『不是』。看了這信，會引起人的思想混亂。意見書不是文字問題，而是思想方向問題」。康生還說彭德懷不要一再解釋說，這封信原來是只給主席看的，沒有想到會印出來。

24日，曾希聖、陳正人（都在第三組）的發言，都談到當前資產階級動搖性，其實質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貫徹執行總路線的鬥爭，是同現階段繼續存在的階級鬥爭分不開的。賀龍的發言，提到洛川會議問題，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這時對彭德懷還沒有作過多的批評。

這裏可以提一下陳伯達其人在廬山的表現。我們的閒談他參加過，觀點是比較一致的。因此有前述23日主席講話後四人散步之事。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他曾兩次長篇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要擺事實，講道理等等。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

作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份地區緊張。又說到他受騙、吃苦藥之事：「我去年在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按：范縣曾宣傳兩年進入共產主義）所看到、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份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佈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回過福建家鄉作調查，「因為是本地人，我自認為比較了解到一些真實情況」。他反映了許多福建的問題。23日之後，在小組會上，陳伯達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他着急修改原來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又連忙長篇大論批判彭德懷的信。並且擺出理論家的架勢：「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基本上是錯誤的。從意見書中，說明彭德懷同志的主要觀點是錯誤的。彭德懷同志形容大躍進的情況，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很明顯的錯誤。在大躍進當中，人民群眾的那種沖天幹勁很感動人。沖天幹勁，是馬克思先用過的句子。主席在講話中，說到巴黎公社的例子。馬克思就是用沖天的英勇精神，來形容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動。列寧在他的言論中，發揮了這種精神。1905年革命以後，列寧同普列漢諾夫發生了根本分歧，他經常用巴黎公社的例子來批評普列漢諾夫。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難道可以說巴黎公社是甚麼『小資產階級專政』或甚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專政嗎？我們去年大躍進的行動，是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全國人民的沖天的英勇精神。用巴黎公社的例子同大躍進相比，是兩種不同的事情，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無產階級的沖天幹勁是相同的。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的那種沖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沖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

點。去年的大躍進，是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的，是非常廣泛的群眾運動，決不是少數人憑自己的主觀想法搞起來的。彭德懷同志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並且說『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我認為，這個估計是錯誤的。」陳伯達還說彭德懷意見書裏邊的觀點，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意見書既然說『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過的』，可是又要使大躍進『四平八穩』，那就難了。列寧在臨死前最後一篇文章中，曾經引證了拿破崙的一句話，來駁斥第二國際的沒有文化不要搞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拿破崙說過：『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再看分曉。』列寧說：『我們為甚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這句話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692頁）我們搞大躍進也是這樣的。可是彭德懷同志的話卻自相矛盾，他既承認工農業增長的速度史無前例，又要不發生一些毛病，那怎麼可能呢？這是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是片面性。意見書中說：『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這個估計也過份了，是言過其實。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中又說：『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懷同志把我們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提到這樣政治性的高度，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對階級關係緊張的看法，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在計劃工作中，有些比例失調是事實；市場情況，有個時期也相當緊張。這是在大躍進當中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我們的困難已經渡過了高點。小麥收下來了，早稻收下來了，困難的頂點就過了。當然這不是說沒有困難了。可是彭德懷同志卻把困

難誇大了，說全國都是緊張狀態，甚至階級關係很緊張，這種估計是錯誤的。」

由於在鄭州會議上剛挨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人們對這位理論家就不大留情面了。不論他怎樣表態，怎樣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人們還是不放過他。田家英告訴我：在8月初最緊張、尖銳的鬥爭開始後，「這位老夫子就躺倒裝病，不參加會議了」。接着在10月間，這位理論家就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清算「同路人」彭德懷「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老賬了；來批判「彭、黃、張、周反黨聯盟」的資產階級復辟慾望了。

張聞天在第二組。就在23日下午討論毛澤東的講話時，張聞天還在小組會上說：「為了總結經驗，指出缺點，原是符合中央方針的，但可能把缺點講得多了，講走了邊。」24日，柯慶施指責張聞天在發言中提出多從主觀主義、片面性方面來檢查總結大躍進，「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之後，他還是坦然的，發言時仍講出心裏的話：「由於工作崗位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對問題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樣。我沒有經驗，是從旁看的，與整個群眾運動聯繫得不夠。同時，覺得你們不大願意聽；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經常講出來，經過爭論，認識一致了，問題就解決了。這樣的會開得很有味道。現在有顧慮的人還是不不少的，彭總寫了一封信，引起大家爭論，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柯慶施同志今天就講了好幾條，這樣交換意見是很好的。不怕扣帽子，不亂扣帽子，不怕爭議，有話就講，大家認識一致了，沒有負擔了，這就是心情舒暢。有甚麼講甚麼，就沒有甚麼緊張了。我有時也想，不關我的事，我講不講，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講了以後還有些後悔，我何必講呢。緊張狀態的確是存在的，養

成民主風氣很重要。這裏都是負責同志，下面更嚴重些。」

在7月26日的小組討論會上，張聞天再次作了檢討。他首先還是重申，參加廬山會議以前，「對黨的總路線的正確，大躍進的偉大成績，以及缺點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向來是沒有懷疑的」。然後談到，參加廬山會議後，逐漸有些不滿，是因為感覺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歡講成績，一講到缺點，就要講成績；一講缺點，似乎就對大躍進的成績估計不足。「因此在小組會上，在肯定了大躍進和總路線以後就大講了一通缺點，還批評了一些不願意講缺點的論點。我當時自以為這樣做是出於責任感，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並不懷疑自己的立場有甚麼問題。」

「對彭總的信，當時也以為基本上好，對大躍進的成績和總路線的正確是肯定的，只是對於缺點的有些提法還可考慮，但也關係不大，只要把問題提出來就好，也不認為有立場問題。」即便是主席23日講話後，開始時對主席所說的立場問題、動搖問題體會也不是那麼深刻。「現在，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和自己反覆考慮，才認識到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很深刻、很重要。」可見，張聞天思想的轉彎受着外部的巨大壓力和內心的痛苦折磨，但他這時還是沒有「上綱上線」地責備自己。只是檢討說：「對某些同志們怕講缺點、怕自我批評的疑心，是不合實際的，是不對的。」「有些缺點和問題，是有那麼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片面強調了或誇大了這些缺點，使人得到印象是問題很多，成績不大。事實上，我所提的許多問題和缺點，許多已經解決，有的正在解決，有的正要去解決。」張聞天向自己提出一連串的「為甚麼」：「為甚麼不去研究甚麼是當前形勢的主要問題？為甚麼不強調全面地去總結經驗，首先是正面的經驗？為甚麼不強調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思想？為甚麼不強調要繼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而偏要片面地強調或誇大缺點，強調總結反面的經驗？」對「左」的錯誤有切

膚之痛的張聞天，根本無法解開這些「為甚麼」，只好歸結為：對大躍進偉大成就估計不足，對總路線還有某種程度的搖擺，積極支持不夠，幹勁不夠，表現不夠堅定。他承認：「主席說到立場問題、動搖問題，我是有這個問題的。」「看到了我的問題，我也就想到彭總的信，也是有這個問題的。我認為主席在這方面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張聞天提到錯誤產生的原因：首先是沒有直接參加大躍進運動，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體會不深，對國內當前的主要政治動向認識不清；其次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條主義，誇誇其談的老毛病還沒有完全克服。在結束檢討發言時，張聞天表示：願意撤回在上次小組會上帶有錯誤偏向的發言。

26日，經過兩天反覆思考，黃克誠（在第五組）作了檢討。他說，自己19日發言的缺點，還不在於多講了已經過去了的缺點，而在於對當前黨內思想的主要危險完全沒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覺不靈。聽主席的講話，受到極大的、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去年具體工作中的那些缺點，應由全黨來負責。絕不應該由主席負責。「我是中央書記處的一員，有我應該負的責任。」上山後，才看到彭總的信。我同他說：你有意見寫信告訴主席，是好的。但信中對某些問題的提法和用詞不妥當，特別是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提法很不好。對信中所述意見的錯誤性質認識則不明確，沒認識到其思想具有當前開始露頭的右傾代表性，總的精神是錯誤的。黃克誠最後談到他曾經反覆考慮過建設速度的快和慢的問題，認為在沒有掌握建設經驗的時候，雖然慢點可能少出些亂子，快點可能多出些亂子。但根據主客觀形勢和條件，寧可承擔些亂子，把速度放快點比慢點好。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個極大的毛病，一個問題或一事物到我面前的時候，常常把困難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對有利方面想得不夠，因而在實際行動

中，常常謹慎有餘，進取不足。這也是對黨內發生某些「左」的現象比較敏感，對右傾偏向嗅覺不靈的重要原因。

周小舟在第二組，直到27日，他才作長篇發言，他的「覺悟」較慢，他仍較多地回顧去年湖南的具體情況。因此，人們頻頻插話，柯慶施更不斷質疑，追問周小舟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周小舟則講他對總路線從未動搖，也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頭，自問沒有把三句話割裂開來。主席講話，自己毫無思想準備。對彭總的信，原說總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詞句可以斟酌。聽了主席講話，才認識到是方向問題，立場問題，才感到這封信是不對的。最後承認上次發言是錯誤的。人們對周小舟的發言極為不滿。

23日之後，彭德懷就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時，他遇到聶榮臻，聶榮臻問他對毛澤東講話的感想，他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這是他對過去許多歷史誤會一貫持有的態度。聶榮臻勸他認真考慮，要作檢討，對黨有利。他反覆考慮，毛澤東講得那麼嚴重，不作檢討是不行的，否則彎轉不過來。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覺得不合實際。因為信中並沒有反對大躍進和總路線，許多問題講得並不錯。24日下午在第四組的討論中，彭德懷有一些插話。他說「對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正確，我是不懷疑的。對小土爐問題，我本意是想批判『得不償失』的說法，但未寫清楚。我也想把工業搞得快一點，但看到范縣的文件，感到搞得急了，又聽說山東耕牛死了1/4，濟寧專區的災荒我也很關心，在捷克時還打電話回國問情況，對這些情況，我又確有點憂慮，思想上發展了片面性，失去了主要的方面。」談到寫信的事：「開初，對把信印出來有點不高興。我曾想：我與主席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這封信是寫給主席一個人看，請他指示的，如

要印發作為意見書，我就要仔細斟酌一下。晚上想想，發下來作為反面教材有甚麼不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讓大家鬥一下，把模糊的東西搞清楚一點。爭論印不印，是不對的。我的這封信，印出來有好作用，也有壞作用。壞的方面，如果領導不強，會有很多人被迷惑，會打擊積極性。當然，由於有毛主席的領導，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信中缺點寫得很多，缺乏分析，意思沒寫清楚，不是因為倉促，是思想方法有問題。」彭德懷還說：「為甚麼寫這信給主席？華北會議我得到一條重要的教訓：我這個人是舊軍官出身，有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對此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寫信給主席。」這些插話半是檢討，半是解釋，他顯然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

彭德懷請了兩天假，反省過去的種種問題。儘管內心矛盾重重，26日，他還是違心地作了檢討，承認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對如何肯定大躍進的成績，以及研究經驗教訓的看法，是有錯誤的。關於寫信的原因，他說：「我寫這封信時，是希望在這次會議上能夠深刻地研究和總結一下經驗教訓，使我們的建設工作搞得更好一些。這是出發點和動機，因而就過多強調了困難和缺點方面，對於全國情況缺乏具體分析，提出了一些錯誤的看法。這種錯誤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經濟建設中快和慢的搖擺。」

「我的思想落後於實際，對全國情況了解甚少。當時只感到截至13日的小組會中，對經驗教訓探討得還很不夠。從會議的《簡報》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見。空氣有些沉悶。思想上有點急躁情緒。擔心有些缺點可能要重複，不利於今後的躍進。為了提起主席注意這一情況，就在13日寫了一封給主席參考的信。那時又聽說小組會在15日就要結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謝主席的嚴正批評，糾正了我的錯誤。」他堅持說：「這封信，當時考慮只

是供主席參考用的。信中不合邏輯、字句不妥之處甚多，提出了一些問題，也沒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錯誤的。」他最後說：「這次會議意義十分重大。對我教育很大。現在會議快要結束了，建議會後收回我7月14日給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檔案，作為我今後思想檢查的資料。」

彭德懷發言之後，在場的朱德放下心來，寬慰地說道：「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彭總的發言中有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做包袱揹起來了。」

可以說，當時大家都把事情看簡單了，都以為只要當事者基本承認了錯誤，問題就可以告一段落，還以為會議就快結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風暴，更激烈的「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鬥爭還在後面。

彭德懷後來在筆記中追敘了當時的心情：「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組會。對我7月14日信內『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作了檢討。主要說明這個提法是對革命群眾潑了冷水，對浮誇風吹遍各地區、各部門，『比例失調』，也講得嚴重了些。其實這些檢討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組會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檢討之後，心情十分不安，多麼難過啊！真像萬箭穿心似的。」他的難過，並非個人得失，而是擔心這樣下去，對國家經濟形勢的發展，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澤東當面辯論一次：當前形勢決不是甚麼一個指頭的問題，切不可由於他作了檢討，而放

鬆對缺點、錯誤的糾正。由於主客觀懸殊之勢已成，他也只能這樣想想而已。這些思想痕跡，他都在後來追記的筆記中保留了下來。彭德懷萬萬沒有料到的是，26日的檢討如萬箭穿心，今後還必須作比這更十倍違心、十倍萬箭穿心的檢討啊！

我是列席會議的工作人員，可是也被作為重點，在小組會上受到嚴厲批評。我在第一組，有北京的幾位部長同在一組。20日的發言，我曾談到鋼鐵翻番和1959年高指標，同華東計劃會議有關，這當然刺痛了柯慶施。小組會上有人揭發我在火車上說過：1958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我這是轉述胡喬木的一種比喻。我的發言和我當時的思想，也決不是這個意思。這時我就一口咬定，這是我自己打過的一種比喻（從而撇開了喬木，有延安的經驗，有事自己承當，不牽連別人）。我說車不按軌道走是要出軌的，只是講綜合平衡中出了問題。這位揭發的同志當時並不在火車上，我就追問，那麼是聽見誰說的呢？他說是柯老說的。我就說，這更奇怪了，柯老又不在火車上。當時這位同志就收回了「李銳說大躍進翻了車」這句話。當時我太不冷靜，太少年氣盛，不該接着說這樣傷人的話：「我同你今後只能談風花雪月。」從此，「李銳說去年翻了車」就講不清了。那時我必須極力辯明自己是贊成總路線、大躍進的。我跟柯慶施「結怨」，還有這麼件事：1958年3月成都會議時，冶金部的報告很受毛澤東的讚賞。柯慶施在南寧會議很得恩寵，是當時的大紅人，也急着想寫一篇東西，以便在會上印發。他找我起草，但他談不出多少東西，我難為「無米之炊」。只記得他有過這類豪言壯語：十五年內，全國人人都要當大學生，那時他正應聘為復旦大學講課。我費力湊了兩千多字。結果此文沒有在會上印發，他大失所望。後來田家英告訴我，柯慶施向他埋怨：李銳的文章沒有寫好。（以後中央開會，他必帶張春橋，廬山會議也帶了去。）這天中

午吃飯時，柯慶施知道了我們小組會的情況，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過來要跟我乾杯。我就大聲說：柯老，你是看見過列寧的人，何必跟我們後生小子過不去。滿餐廳幾桌人都聽見我這句話，見到這個場面：我硬不乾杯，轉回餐桌不予理會，使得這位柯老下不了台。這個細節一方面說明，我這個人何等「少不更事」，同時也說明當時的情況，還只對事沒對人，會議的空氣還允許我如此放肆。但柯慶施這個人我是忘記不了的。《龍膽紫集》「戊己辭」九首最後一首：詠某「戰友」，就是寫此人的：

「人皆學士」此雄心，福至心靈沐主恩。
應命捉刀難補意，語人落第乃輸文。
未能合唱法螺調，因得常攀牛鬼親。
一跌風波吾老矣，蓋棺「戰友」典型存。

26日，我作第一次檢討（《簡報》都刊出的），首先檢討了上次態度的不好。隨着簡單說到一年多來的思想情況：從我本身的工作（水電）來說，從來是覺得可以多快好省的（長期為此爭取過），對總路線、大躍進是認真貫徹執行的。去年以來，同主席的接觸和向主席寫過三封信，主要是談當時鋼鐵指標定得過高，其他難以平衡；以及對計劃工作等方面的意見；總的精神是如何更好地實現大躍進和貫徹總路線，對鶴壽同志（王鶴壽也在第一組）和冶金部的意見，從來也只是說指標定得過高了，左鄰右舍有困難。對於把「成績說夠，缺點說透」，我有一種想法，認為像廬山這樣的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缺點和問題談清楚。對於彭總的信，我是有過同情的。剛一看到時，感到作為對立面提出來是好的，當時還同別的同志說過，彭總偉大（果然後來有人揭發）；以後又看了一遍，也只是感

到一些詞句和一些提法上，例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問題，上次我講了（記錄沒有寫上）。至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對總路線的懷疑、搖擺，由於自己的思想狀況，根本沒有這樣的嗅覺。聽到主席講話後，對許多問題比過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大家認為我沒有敞開思想，有的人對我的發言不滿意，我那時還完全沒有意識到大難即將臨頭。還把我在小組會上同別人爭論的情況，以及不跟柯慶施乾杯之事，得意地告訴周小舟和周惠。他們聽了，也頗為高興。

對事，也要對人

7月26日是廬山會議的一個關鍵日：反黨定性；批鬥升級；犯錯誤的同志不單是思想認識問題，而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問題。這天各小組都傳達了毛澤東的幾句話，我的記錄本上是這樣記的：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話只有這樣幾句，各種傳聞就複雜多了。

7月23日夜，我們三人到黃克誠住處這件事，被傳播開來，傳到了毛澤東耳中。我擔憂的人家會懷疑是「小組組織活動」，竟然真的出現了。黃克誠和彭德懷又是住在一起的。人們自然疑心：你們聽了講話後，晚上還聚到一起，究竟要幹甚麼？

26日印發的作為7月23日講話的續篇，《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即對李雲仲信的批示）有的放矢，說得極為清楚：「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評論》號召那些「得失相當」論的中間派，不要再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評論》最後說：「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於團結不利，於黨於個人都不利。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樣。」

關鍵就在「右傾活動」、「猖狂進攻」8個字；誰還敢「搖擺」呢？誰還敢當「中間」派呢？

就在發出對李雲仲信的批示的第二天，毛澤東還批發了另外兩個材料，一個是《國務院秘書廳學習簡報》，一個是《江西省中級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這兩個材料的內容，前面已作過介紹，都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見。

我的記錄本上，還記有7月26日上午周恩來的一個長篇講話的要點，是向北京來的各部委負責同志苦口婆心作關照，要接受當前這個突然發生的他也沒有料到的嚴峻形勢，怎樣渡過今後難關——既要反右傾，又要把工作做好。要點如下：

談政治方向與工作態度兩個問題。弄清政治方向，劃清界限。思想問題，路線問題，如對後者有所懷疑，就是根本立場問題。兩者有聯繫，又有區別。會議形勢的發展，事前我也無思想準備。也許有人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四個星期會議的發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簡單的經驗總結，而發現是方向問題，是一場政治鬥爭。黨內思想動態不能不反映黨外思想動態。到了時機成熟時，主席才講明這個問題。主席一開始就講過「得失論」。

去年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總路線為群眾所掌握，9,000萬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國。懷疑者認為得不償失。黨外以龍雲為代表；黨內有天津幹部、江西黨校的議論，東北李雲仲的信。會內是另一種形勢，懷疑總路線，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論十大關係，1956年提出多快好省，已經奠定了總路線的基礎。現代方法，簡易方法，不斷發展、轉化，兩條腿走路以前者為主導。不能單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局部與全局，還

有當前與長遠，得失要算總賬。去年絕非得不償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於群眾運動的熱潮，還是對之潑冷水？每一個單位煉鋼、煉鐵得不償失，都登報，行不行？算總賬，划得來。說「左」了，實際是說「左」的人右了。

總路線同群眾要求必須結合在一起。說總路線「基本正確」，是懷疑總路線。現在要回答的問題是：總路線是否正確？

補貼幾十億划不划得來？這是李先念提出來的。我說划得來。李先念是不懷疑總路線的。落實指標，落到可靠程度，是否是機會主義？大家「焦頭爛額」、「精疲力竭」，算了四個禮拜的賬，是否是機會主義。（周恩來在會議期間，一直抓計委和各工交部算細賬，落實1959、1960兩年的主要指標。）

落實以後繼續前進，決不是機會主義。這就是政治態度。洩氣思想是動搖總路線。我們只是去掉一部份虛氣。

動搖總路線有兩種表現：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洩了氣，沒有看到廣大群眾的積極性。

另一種偏向是，盡說些空話，看到許多問題不去解決，熟視無睹，放心得下。這同樣是右傾。表面積極，總責備下面，光說空話，這實際是幫助了懷疑派。否認失調，否認緊張。這也是一類工作態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貨膨脹？

會議初期要回答這些問題。會議中期，許多意見提出來了；懷疑、動搖出現了。中央領導同志中也出現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日講話之後，會議進入第三階段。究竟站在甚麼方向。還是採取批評、團結的方針。彭總在主席處講過匈牙利事件（李井泉同志警告過他）。個別地方可能出現，但整個國家決不會出

現，出了偏差，中央馬上糾正了。

綜合平衡，蘇聯搞了二十多年，農業幾十年未能平衡。

執行總路線過程中發生的偏差，不是路線問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是主觀、客觀相結合。今年850萬噸鋼材，最後算賬只700萬噸。也不要被此嚇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兩條腿要走穩當，如意算盤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鶴壽的桌子，各部是否有這類事？

幾十萬條錯誤，不能動搖總路線。問題只是偏差與不力，有的人碰到一個問題出現，就又懷疑一番；只看到個別現象，又忘記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另外一種態度，是站在局外指手畫腳，做旁觀者，中間派。儘管有的指責是對的，但根本問題是方向，包括立場與目的。兩種目的，兩種態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劃清界限。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況作回答。北京來的人佔一半多，當此緊急關頭，要表態。北京來的人，在會議中哇啦哇啦。

第二個問題講工作態度。要正確算賬，把賬算清楚。地平線上出現了右派進攻，還不到猖狂程度。公佈了落實的指標，最高國務會，人大常委會開後，必定議論紛紛，會發生各種懷疑，甚至反對總路線。鄭州會議後，糾正了許多偏向，局部地區還有夏荒問題。

6月13日分配了850萬噸鋼材，加進口52萬噸，但國內實際只有700萬噸，將影響多方面的工作。對這些問題，應當採取既嚴肅又積極的態度，不要被嚇倒了。

財政信貸、物資、勞動三平衡，即貨幣總發行額同商品總額相除，這是公式，不是教條。一切要同中國實際結合。面對客觀事實，提出解決辦法。商品跟貨幣流通的矛盾，承認商品、商場的緊張。去年不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節約。

我不安了半年，並非對總路線動搖。但決不可盲目樂觀。鋼材訂貨，找不到廠長，心裏着實難過的。總之，積極負責，不說空話，面對鐵的事實。從武昌會議至今已八個月了，大家在小組會上要作適當自我批評，不要怪地方。

基建用鋼材要減32%，共250萬噸。生產用鋼材減52萬噸，減9.2%。

從不切實際到切實際。對遠景，要增強信心。要保持二五躍進速度。實幹、苦幹、巧幹。落實各項指標與措施。大家想辦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難。

周恩來是當家人，他不能空談總路線正確，空談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在廬山自始至終務實。他知道北京來的人的心理：着急的是今年指標如何落實、如何完成。他對此是一直不安的，也可說是憂心如焚的。這篇講話，言詞之間，可以見到內心的矛盾。值此批鬥升級、對事又對人之際，他一方面要保衛總路線，遵從毛澤東的指示和意圖；另一方面要保證工作正常進行。既要務虛，又要務實；既要正視困難，又不能為困難嚇倒。他已感到即將出現他不願出現的巨大風暴，要大家把工作做好。

周恩來講話，最後才談到血淋淋的事實：當年鋼材要砍掉302萬噸！這是那些煽動鬥彭反右的人，不屑顧及的區區小事。

「黨內右派在猖狂進攻。」毛澤東一聲令下，「要劃清界限」！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着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開始聯繫歷史上的幾次錯誤路線：立三路線、一次王明路線、二次王明路線、高饒事件，認為凡緊要關頭彭德懷都是動搖的，總是站在錯誤路線方面。這次反對總路線，有其歷史根源。

——思想上是個人英雄主義。說彭德懷自以為「有骨氣，不信邪」，以犯上為榮。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還有人提到會理會議，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指揮問題。

——重提延安華北座談會總結的彭德懷的四大錯誤：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毛主席，打百團大戰；執行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歷來對群眾運動潑冷水；鬧獨立性。

——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等共同特點，都是說黨內不能講話。

——彭德懷說，他批評的具體對象是冶金部、農村工作部和宣傳部，這三個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張聞天說「好大喜功」，這指的是誰？還不是毛主席。

——猖狂進攻已經到來，不僅是立場問題，動機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是別有用心，是要在黨內掀起一場鬥爭，反對總路線，攻擊毛主席。彭、張等看到氣候已經合適，認為抓住了辮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賬。

——而且還有個組織問題：此次彭德懷是元帥，張聞天是副帥。一封信，一個發言，都帶有反黨綱領性質。鋒芒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向黨的挑戰書。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海會議上都講過，要防止黨的分裂問題。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懷。

——「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有「甚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彭德懷這些話是講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攻得厲害。他在小組會上還講過「脫褲子」，「要脫大家都脫」。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與彭德懷是一根紅線串起來的。有的人還質問周惠：你是擁護總路線、毛主席，還是擁護周小舟？

因為這時人們對周小舟的檢討很不滿意。周惠還為之說了公道話。

——「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係？」「是否到國外取了甚麼經回來了？」這一類所謂「裏通外國」的問題，也開始有人提了出來。

最為嚴重的是小組會外的種種議論和傳言，「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的說法傳開了。總之，空氣越來越緊張，人人都在摩拳擦掌，投入戰鬥。周恩來講的「工作態度」問題，再沒有人顧及了。

除了對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那些贊成和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或同彭德懷看法接近的人，在小組討論中也無不遭到嚴厲指責。27日的第二組討論中，有人發言指責陶魯笏「態度不老實」，說他前幾次的發言實際是同意彭德懷的意見的，並且有所發揮；在食堂問題上，他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是猖狂的，他不同意「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還另外提了他自己的一條方針；在某些問題上為彭德懷的意見書作了補充和說明。還說陶在緊要關頭有搖擺，至今仍掩蓋自己的錯誤根源，躲躲閃閃，隱蔽自己的政治態度。同一天第四組的會上，有人提出黃克誠的問題：黃的發言是與彭德懷有共同之點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第二次發言已經作了初步檢查，並且講到彭總徵求他的意見，這是誠懇的。但有一個矛盾使人難以了解，一方面說他當時對彭德懷的若干觀點，表示有不同意見；另一方面，他在發言時，差不多與彭德懷意見書的精神相同，而且對人民公社問題講得很突出，認為可辦可不辦時不如遲辦幾年，認為農業成績估計過高是造成緊張的主導原因，並且把目前緊張情況及黨的威信估計得過於嚴重。對於這些問題黃克誠在第二次發言中沒有談到，也就是還不接觸思想。這個組討論中還點了田家英，有人說田家

英幾次為彭德懷解釋，並替彭德懷意見書中所說的階級關係發展成為政治性問題找根據，要求田家英談談自己的思想。

前面談到，26日的小組會上，有人對我的檢討發言不滿意，大家認為我沒有敞開思想。27日、28日的小組會，在批評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仍繼續提到我的問題，除於追查討論中的發言，還查到了火車上說的「比例失調，好像火車出軌」等話。28日小組討論一開始，就要我檢查三件事：發言中說過毛主席提出1,070（鋼產量翻番）的任務後，王鶴壽曾表示為難；還說過從主席提出「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以後，北京在去年很長時期人們只講突破平衡，不敢說平衡，是甚麼意思；關於「綜合平衡，比例失調，好像火車出了軌」的說法。討論中，又扯出了在中南組發言時說的，「以綱為綱」這句話是否不用為好的話，以及說過的感覺會議有壓力，「像空氣一樣看不到，摸不到」的話。我在討論中作了些解釋，被說成「思想方法沒有擺對」，要我「不要一句一句地對」，意思是不要去對說過的話一一作說明。從《簡報》上得知，其他組在討論中也牽扯到我。第五組27日的會上，羅瑞卿插話：「李銳同志曾向我們——在座的有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劉建勛、周小舟、周惠、李銳和我——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今年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所有制問題，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別人提出來，會不會戴右傾帽子？李銳同志這樣提出問題不知是甚麼意思？據我看，李銳在會議前一階段表示了很多錯誤觀點，而且發展到了相當狂妄。」28日有人發言說：「還要對幾位同志提些意見，如張聞天同志、李銳同志等，讀了他們的發言深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感。他們以彭總意見書為綱，有的加以發揮，有的遙相呼應。」「這些同志或從人民公社和農業估產偏高入手大做文章；或從大煉鋼鐵造成所謂比例失調發議論，把緊張說成像老虎一樣嚇人！這無非使人相信，工農業並舉

這條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搞壞了。他們共同之處是：口誅筆伐，火氣旺盛。但都喊着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但不論怎樣說，畢竟市場有限。人們相信主席的話，嗅出這正是在內外敵人來攻的緊急關頭黨內一些人的搖擺罷了。」

當時受到指責的還有賈拓夫。他在26日第三組作檢討，說對彭德懷的信原覺總的精神是好的，沒有想到是路線問題。就有人插話：彭德懷的信上說，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難以決斷，是不是計委的個別同志向彭德懷訴過苦？會外的傳說，是賈拓夫向彭德懷提供了炮彈。因此賈拓夫一直較緊張，後來在全會批彭德懷時，他把去過彭德懷家幾次這些生活瑣事都被迫作了交代。萬毅也曾經表示基本同意彭信的意見，也感到會議上談缺點時有壓力。26日作長篇檢討時，他還是解釋為甚麼感到壓力問題，是由於鄧潔發言談缺點時，組長即說，專找缺點一千條、一萬條也有。使人難於講話。

7月23日到29日之間，我同周小舟、周惠還是有些來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聯繫。有天晚上，田家英來到我的住處特意告訴我，在起草反黨集團文件，周小舟在內，讓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謹慎。田家英還告訴我，問過總理，沒有我的名字，這期間，田家英還告訴我一些重要情況：在毛澤東住處召開的大區負責人會上，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納吉。毛澤東獨自在房間時，林克（英文秘書）在旁，對林克說：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個右派。

這種狂風暴雨的黨內鬥爭，周小舟大概是第一次經歷，他有一種很悲觀的思想，同我談過，很想「掛冠」，去搞個農場，甚至說，不如「出家」。修改自己的發言稿時，他改不下去。譴責彭德懷的信，「良心上過不去」，欲哭無淚。周小舟已感到此次在劫難逃，同周惠談到傷心處時，他向周惠託孤，惹得周惠

也大哭一場。周惠特別不滿意柯慶施等整我們這些「小人物」，同我談過，認為我們這次太無防人之心，「防禦工事沒做好」。周小舟也曾想一人去找毛澤東，交代清楚「二十三日夜」之事，同黃克誠、周惠、李銳三人無關。我向二周轉告了田家英的關照之後，覺得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了。約定三人之間所談的種種「危險」的東西，如同燒掉一般，任何情況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況說不清楚，搞得越來越複雜。

這個期間，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毛澤東還找周惠單獨談過，大概是覺得周小舟已「無可救藥」，而周惠尚可「爭取」吧。周惠沒有承認自己是彭德懷的「牆腳」，但承認「是有點翹尾巴」。後來在8月11日的大會上，毛澤東果然對周惠區別對待，說「這個人據我看，與『俱樂部』的人只是沾了一點邊，你說他是『俱樂部』的正式成員，我不相信。周惠這個人有缺點，但是比小舟好」。

為了促動彭德懷作檢討，毛澤東讓聶榮臻、葉劍英去進行勸說。7月30日上午，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在彭德懷後來寫的筆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和他自己當時沉痛的心情：「他們來勸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嘛。今天當着自己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更加深『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三十年之後，我抄完這段話，不禁潸然淚下。)

8月3日在小組會上，聶榮臻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況：「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

儘管廬山會議已經轉向，由糾「左」變為反右；儘管7月26日開始批判升級，既對事又對人，作為總理，周恩來還是一直在抓指標調整的工作。26日這天，他召集各部部長、副部長開座談會，中心仍然是落實上半年一直在醞釀調整的指標。

周恩來說：6月13日中央定了這個方針數字（1,300萬噸），我們6月13日分配的指標，鋼材850萬噸，國內只能是700萬噸，進口52萬噸，就是752萬噸。「二五」計劃商品生產要增加，主席在鄭州會議上說了，戰術上要用認真的態度對待困難，克服困難。現在，不只市場問題，在鋼材上有問題，想不動搖1,300萬噸鋼的指標，昨天才知道鋼材700萬噸、商品630億元。主席今天的信上也說克服困難繼續前進糾正缺點。缺鋼材150萬噸要研究。我們的缺點是武昌會議、上海會議，6月13日以後有一部份放心的心理。不出半年，我不是對總路線動搖。怎麼這麼安心？既然數字下降，總是有虛的、不落實的地方。我作為一個總理，我總有點責任。生鐵、鋼材問題，所謂小洋群、轉爐也不可能出那麼多鋼。毫無準備就參加上海會議，連個文件都沒有，講話時叫主席問了一些問題，回答不上來。4月以後陳雲同志摸了，才定了6月13日指標（1,300萬噸）。在座的在小組會上應作些自我批評，責任不在地方，6月15日才下放的，不到一年，如少150萬噸鋼材，基建要減少32%，這完全是粗線條的，讓大家想這個問題。生產鋼材三五牌，基建250萬。現在基建減80萬。這只是鋼材，這樣一減，基建影響較少，對生產影響較大。總希望這個指標在月底定下來。主席說過數字少點不要緊，數字是我們畫的，我們

要確保總路線執行得好。我們今年耽誤了八個月，不像主席糾正公社和農業的偏差。市場，主席在上海也抓了一下。工業交通抓得不緊，就耽擱了，現在只剩五個月了。現在廬山必須把方針定了，再有措施。本來應今年速度放慢一點，但因沒有經驗，去年只有四個月大躍進。我們設想農業增一倍，工業增兩倍左右，大大超過八大建議。1957年工業產值704億元，增兩倍2,100億元；農業（產值）537億元，增一倍1,074億元。我們要為總路線勝利努力，要實幹、苦幹、巧幹。這三個口號對我們具體業務關係更大。要採取這樣的工作態度。主席說十年來沒有一個人向他提計劃上這麼多困難。這難道是說的計委？我做總理的不能這樣想。我們都參與計劃，我們是計劃的一部份，大家有責，為甚麼不把困難提到主席那裏？這次廬山會議我們取得了經驗教訓。

兩天後，7月28日，周恩來再次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講了七個問題，內容還是落實指標。

（1）落實問題。鋼鐵指標，基建項目過大，出現一些不平衡，出現一些比例失調現象，所以現在削下來。上半月開神仙會，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反對「得不償失」論，反對好像落實就是洩氣的想法。7月16日以後出現新的意見（比如彭總的信），小組會爭論起來，現在到白熱化了，這就使落實增加了力量。

（2）鋼材的安排，應努力達到898或894（萬噸），但不等於都分配，還按870（萬噸）分配。三道防線，生產900萬噸，分配860（萬噸）加進口60萬噸。結果國內生產800萬噸，減少30萬噸就是770萬噸，爭取力保550萬噸生產。

（3）生產會有些參差不齊。要同心同德，不要指手畫腳。你們7月底回去。

（4）基建，788拿到投料，拿不到等着。

(5) 品種。

(6) 在反右鬥爭下，在落實的基礎上提三個口號：實幹、苦幹、巧幹。實幹是實事求是，同心同德，不再作檢討。

(7) 組織工作。要在這裏搞好再下山，準備30日開全體會，我還要講。秦始皇專政講半年多了，還是專得不好。第一書記掛帥，還沒掛得很好。

總理是當家人，儘管他也談到彭德懷的問題，但他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將降下來的指標落實下去的問題。當然在一片「反右傾」的批判聲中，他的聲音顯得微弱，他的努力顯得艱難。

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與 毛澤東第三次召見

這時最後一批中央委員已經上山。7月29日開了大區負責人會，研究會議形勢。毛澤東大概講了不要壓來壓去，要允許相互交鋒的話。決定立即宣佈召開八中全會。大區區長會開完後，開了大會。毛澤東講了下面這篇短話：

考慮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問題，正式中央委員已到者過半數。會議開了近一個月，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了兩件事：

(1) 更改指標，上海會議改得不徹底。武昌會議定的指標達不到，但人代會通過了。為更改指標，應由八中全會作決定，向人大常委會建議通過。去年的事情，全世界議論紛紛。蘇聯無非三種人：覺得有些可惜，改了為好；應當用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們完成；歷來不相信講怪話的。西方早說達不到，並說去年實際產量沒那麼多。英國和日本比較講了些實話：並非大豐產。同我們現在議論的一套差不多，我們跟這些資本家有某些相通。

(2) 路線問題，究竟採取哪一條好？扯了很久，開全會再扯幾天，差不多了，雙方都開門見山，不搞外交辭令，橫直講老實話。疙瘩不解開，不好工作，多少時候了，不解開，當面不扯。解開了，以利團結和工作。

此外，還有些業務問題，到8月1日搞完。

《議定記錄》文件，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實際，有利團結、

工作。起草是個過程。一稿被攻倒（主要指「關於形勢和任務」部份），二稿作者本人不滿意，現在三稿準備發表（實際上後來打入冷宮了）。全會發表個公報。修改指標。下半年要鼓勁。公社怎麼辦，解散還是維持？用公報的形式來回答。內部扯的一套，不上公報。每天《簡報》這麼多，有些問題不宜發表。形成一個全會決議。

有些同志發議論，民主不夠，談得不充份。想把民主搞夠一點。一個月開次中央全會也難，一年四季，一季開一次完全可以。有些事沒有充份說，確有問題。8月上旬開全會。全會方式還是分開開小組會。

當時各小組討論中，有人追問23號晚上我們三個人到黃克誠住處之事。「湖南集團」的指責即由此而來。為了消除毛澤東的疑慮，田家英轉告胡喬木一個主意，讓我給毛澤東寫一信，以釋去23號夜晚的猜疑，即「右傾活動」。胡喬木大概是考慮到毛澤東原來對我的好感，剛開過的上海中央全會上，因為我又給他寫了一封信（第三封信），我還是受到當眾表揚的人。

30日一早，得到通知，毛澤東找黃克誠、周小舟、周惠和我去談話，談了一個上午。應當說，氣氛還是比較緩和的。毛澤東首先說，他過去不了解黃克誠的歷史，不了解彭黃之間的關係。談了一些一軍團與三軍團的歷史問題，還提出人們慣言他們兩人是「父子關係」。黃克誠談了他在三軍團工作初期的一些情況，在江西被懷疑成AB團，幾乎遭殺害時，是彭總救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關係始終很好。由此就談到，儘管如此，但在某些政治或思想問題上，同彭常有爭論，有不一致處。毛澤東就說，政治、思想、感情是統一的東西，「我自己的理智與感情總是一致的」。隨後毛澤東又談到「政治參謀長」問題。黃克誠說，

我這個總參謀長，當時是主席，是你提名要我當的，並不是彭德懷提名的，「我同彭總的工作關係是正常的」。毛澤東於是說，這些疙瘩要解開。（意指過去不大了解黃克誠的歷史及彭黃關係。）後來就提到人們有「湖南集團」的說法，同我們幾個人不通心，同周小舟尤格格不入，希望周小舟「不遠而復」，快點回頭。我們又都談了些會議情況，當前空氣太緊張，許多問題難以分辯。毛澤東說，要容許交鋒，容許自由辯論。我們對「湖南集團」的說法，很不以為然，這樣，一些老熟人的往來，都成為問題了。毛澤東說，這是一種誤會，要我們不必介意。然後又跟我們談長征舊事，在遵義會議之前，怎樣先將張聞天和王稼祥爭取過來，否則遵義會議也難開好。還講到張國燾逼迫南進時，幸虧葉劍英接到電報，先告訴中央，「要永遠記住劍英這一功勞」。

毛澤東找我們四人談話，無疑是要我們不要再受彭德懷的影響，談起長征舊事，意味尤其深遠。這一點，我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

談完話出來，遇見田家英，我頗有點輕鬆之感，將「解疙瘩」、「湖南集團」是誤會等告訴他。田家英說：決不要輕信，大難還在後面。當然他們知道內情，我也不便多問。這時，田家英還告訴我他們的幾點看法：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沒有開會討論，就讓小組去批鬥，太不應當了。慨歎毛澤東這樣獨斷專行，晚節不終。他們還擔心總理也被牽扯上。田家英還激動地說：這些黨的元勳，應當受到保護。由於《議定記錄》草稿同時挨批，他們也有自危之感。

28日第一組的小組會，仍集中批評我，主要還是追究「出軌、翻車」之話。這時，彭濤談了此事的經過：「在火車上的議論，記得當時李銳同志這樣說：比例失調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般的不平衡，好像開車的開得有點歪；一種是嚴重失調，就好像

出了軌。出軌與翻車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後來你在小組發言，還引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話說，資本主義經濟失調，受害的只是少數資本家；社會主義經濟失調，就要影響工農關係。這些話代表你對大躍進的看法。認為大躍進出了軌，認為比例失調已經影響到階級關係。」這種批評還是近情理的。批評我反對「以鋼為綱」這些言論時，也還沒有戴大帽子。

這天我作了第二次檢討，承認迷失了方向，承認20日的發言精神不對頭，「實際上對彭總的信可說起了呼應的作用。習仲勛同志說我是中間派，這說得輕了，我是中間派偏到右邊去了的」。說自己會議初期讀書，看材料，搞比例關係，鑽綜合平衡問題，以及大躍進到底以何種速度為宜等問題，「這完全是一種書呆子氣息」。

關於1,070萬噸鋼的問題，我談到去年6月「主席找我去談問題，問到鋼的情況，我說鋼不夠用。主席說，既然不夠用，今年鋼能不能翻一番呢？第二天遇見王鶴壽同志，把主席意見轉告，鶴壽同志當時感到有些困難」。下面是王鶴壽的插話，也刊在《簡報》上。這是一段重要史料：

有這麼回事。開始我們計劃1958年搞800萬噸。後來，我們看到各省很積極，各省幹起來啦，感到有辦法，就是搞小土群，認為搞土鐵沒有問題，能上得去。鐵上去了，煉鋼搞小轉爐。所以，後來主席問我時，我說，行，上得去。因為我當時確實認為能夠上得去。這個事情由我負責。我還找到林鐵同志說，華東能搞600萬噸，你華北條件好，更應多搞點。我確是認為行，並不是認為不行，故意說行。主席對這事很慎重，曾經幾次問我。這事主要是我們缺乏經驗，對

問題估計不足，反映情況有片面性，應由我們負責。

30日晚上，反覆考慮之後，接受胡喬木的意見，向毛澤東寫了下面這封信。當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問題，我隱瞞了，而且用「政治生命」這樣的重話作保證，想取得他的相信。現在回憶，仍覺得是終生恨事。

今天上午您同我們談話後，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來，我參加了多次中央的會議，直接聽到您的許多講話，許多指示。您還同我作過好多次談話，我應當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針，更多領會您的精神。可是，這次廬山會議期間，我同情彭總的信；在小組會的發言，精神和方向不對頭；還亂講了一些話。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傾根子和嚴重的自由主義。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書」的身份來參加中央的會議，犯了這種錯誤，更是痛疚無已。

您今天談到交心的問題，過去我常覺得我是願意將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從您第一次找我談話起，我就覺得我在您面前並不拘束，沒有甚麼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願意聽也很尊重下面幹部意見的。因此，提意見逐漸更隨便一些，有些話還是脫口而出的。現在檢查起來，一方面，我過去對您講過一些錯話；另一方面，我不是還有些意見，有些想法，有些怕講錯了的話，沒有向您講出呢？當然還是有的，這方面也還有顧慮。今後我當做到，心裏有話，只要認為有必要，就向您講出。但我也請求，如果有些話講錯了特別是錯得厲害

時，您能夠及時指出、糾正甚或處分。還想說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團」的事。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無刻能安。下面講一下同我有關的情況：

我同彭總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車去廣州開會，他才認識我。彭總歷史上的問題，我只知道百團大戰這樣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對黃克誠同志是尊敬的，信賴的，敢同他說一些心裏話（譬如1950年、1952年我曾兩次大膽地向他談過對高崗的意見）。到北京後，每年要到他家裏去一兩次。自從兼任您的「秘書」名義後，我沒有到他家去過。這次他上廬山後，大概是7月18日早晨，總理召集大會，大會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們談了些湖南的事情。臨出來時，彭總來了（彭總同黃住在一棟房子）。記得黃老談到彭總的信，說內容上有些問題，就一起去開會了。

聽了主席23日講話後，我的心情緊張起來。晚上到小舟、周惠處扯談，周小舟也很緊張，想去找黃老談談。電話約後，三人就一起去了。談了下我們的心情，黃老要我們不要緊張，有錯誤老老實實檢查好了。說彭總的信一細看，問題很多。周惠又談了一些湖南糧食等情況。臨走時，彭總進來了，我們都站起來（房中沒有多餘的凳子）。彭總講了一下他寫信的過程。沒談幾句，我們就走了。（出來時在山坡上望見羅瑞卿同志，小舟二人過去打招呼，我從另一條路回我的住處——說明這一細節，是聽說有小組追問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識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談。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認識。這次開會，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組，對於這次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將一些問題和缺點擺清楚，對於所謂壓力問題的感觸，氣味是相投的。

情況就是如此。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

這封信由毛澤東的保衛副官王敬先連夜送與毛澤東。也許這是7月31日常委會議我們四人列席旁聽的原因之一。因為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說：李銳的信已送與常委看了。

《廬山吟》九首中的第七首，即是寫的「三登樓」後，當時自己的一種迷惘心境：

不似東風不似春，山中風雨與風雲。
永懷不遠而復語，撲朔迷離假與真。

7月31日常委會

1980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我的關於廬山會議的發言，內中簡要談到的8月1日常委會，實是7月31日常委會，那時我還沒有找出8月1日的另一個記錄本子，而誤以兩次常委會為一次。兩次常委會都由毛澤東主持，參加者：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旁聽。7月31日上午10點50分開到下午5點，8月1日上午10點開到下午5點，中午沒有休息，吃的是包子。地點在毛澤東住處的樓上。開會時無人作記錄，彭真要我作記錄。我們四人都坐在一圈沙發的後面，是普通靠背椅，旁邊亦無茶几，我沒有帶自己平時用的記錄本和鋼筆去，隨手在房中找到兩個信箋本和鉛筆（這是開會時一般房間都備有的）。根據我的記憶，第一次常委會的記錄，回到住處後，我將要點抄錄在自己的記錄本上（與隨後逐日記的其他記錄時序是銜接的）；而第二次常委會記錄，由於時間關係或心緒不佳，沒有將要點再轉錄。因此，第二次常委會記錄的用鉛筆的信箋本，得以另外保存下來（信箋本已交中央檔案館保存）。這也就是第一次會記得簡略、第二次會記得詳細之故。第二次會雖記得較詳細，但由於當時心情關係，字跡極為潦草，又是自己慣用的簡化語詞，難以辨認的只得從略。這兩次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算了彭德懷的歷史總賬。

前一部份，毛澤東漫談上井冈山以後，幾次歷史路線，軍事

鬥爭情況。然後說：李銳的信已收到，轉發常委看了。現在是保護群眾革命性問題，要反右傾機會主義。

彭德懷：出亂子時擔憂。有個思想方法、立場、屁股坐在哪一面的問題。信中所反映的是局部問題。

毛澤東：失、得之說，反映靈魂深處如何？（又回顧了黨的歷史上的幾條路線。）小土群方針，不傷心。9,000萬人上陣煉鋼，比6,000萬人要好。有一點損失，我也一點不痛心，橫直沒有經驗。從根本上說，是得多於失。沒有失，哪來的得？總的失少得大。9,000萬人上陣，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設速度大大提高了。軍隊靠紀律化。每個單位都去責備，不能解決問題。總的估計是：勝敗兵家常事，尤其是打敗仗之後，要鼓勵，不能潑冷水。否則官兵都不滿。我就打過好幾次敗仗，如水口戰役……所謂敗仗，就是說沒有解決戰鬥。立三路線，要打南昌、打九江，說要切斷長江。長江又如何能夠切得斷？周以栗來，厲害得很。

彭德懷：王明博古路線，1934年一、二月間，我自己就已經轉過來了，認為仍舊由老毛領導好。這是過去事實證明了的。這話我同黃克誠說過。

毛澤東：抗戰時華北局受長江局領導，你是聽王明的話。李立三多長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糾「左」比糾右難嗎？（意思是說糾右同樣難？）從歷史看，提到原則上來，共有五次右傾路線：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事件。王明至今不認錯。高崗自己死了。瞿秋白的「左」傾錯誤較輕。立三路線持續也只幾個月，白區受到損失，蘇區可說是沒有損失，紅軍在這期間還發展了。你說得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當然，說「百出」是誇大之詞。建黨三十八年以來的經驗：右傾聯繫資產階級，「左」傾聯繫小資產階級。說整右容易，請包辦整王明。高饒能改？伯恩斯坦、考茨

基、普列漢諾夫能改？「左」傾成為路線了，也不容易改。路線本身不能改，要讓別人來改。五次右傾路線，三次「左」傾路線，自己都不能改，因路線已經成了系統。颯「共產風」是容易改的。比例失調，調整的時間要長一點。有人分散資財，也不要緊，物質不減嘛。建設項目確定為788項，明年投資總額200億以上，今年不應搞大躍進了，再搞也不恰當。在幾次路線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裏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

（彭德懷插話：我61歲了。）

〔我的記錄本的頂端記有毛澤東以下一句話：殺豬放銃，記憶深得很。（這大概是指彭德懷當年缺乏建設根據地的思想。）〕

毛澤東：你彭德懷不願上落後地區，不願上山。1956年躍進很有必要，但同時也必定帶來各種不協調。不用反冒進就好了。收縮是對的。今年基建148個億減到127個億，第二年的日子好過。今年上半年攤子鋪大了，颯「共產風」，比例失調，是在大群眾運動中發生的。群眾興高采烈，叫下馬，血淋淋的，群眾想不通。氣可鼓不可洩，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

彭德懷：我對此領會不深。（林彪插話：氣難鼓易洩，洩了便難鼓。）

毛澤東：虛氣要洩，鼓實氣；在鼓氣之內。前途光明，暫時回家。「一平二調三收款。」三收款不過兩個億；群眾不滿的主要是一平二調，搞平均主義，太性急了。無非是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拿來作為資金。人家的東西，不按等價交換，誰願意幹？去年11月前沒有劃清這條界限。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條線。以為反正是集體的，幾級所有制，隨便破壞，不堪設想。我腦中的印象：高級社還是生產單位，不會破壞的。春節前後才暴露出糧食不夠。反瞞產有理由，

站在農民這一邊，就不能反瞞產。你無代價調撥，不瞞產，生活就危險。山東呂鴻賓社，翻箱倒櫃也找不到糧食。戴保守主義帽子也不怕，認為這是黔驢之技而已。一張佈告就是一把鑰匙、一張樓梯，就解決了問題：讓瞞產的下樓，經過冀魯豫三省，召集今年2月鄭州會議。我說民心不安，軍心不安。會議中第二批六省一來，似乎不懂世事：社員瞞產私分合法嗎？痛苦一晚，第二天想通了。「左」傾問題幾個鐘頭就解決了。過去說北方沒有馬克思主義，道德品質低；南方有馬克思主義，道德品質高。我是不相信的。冀魯豫三省已經同意改變所有制了。3月份集中整頓人民公社；參加了兩次六級幹部大會，那一個月我寫了將近兩萬字。4月份沒有管，開人代會。接着西藏問題來了。6月15日北京開會，21日從北京出來。對於右傾，我也給了些影響，我說過食堂留一半、留1/3也好的話。出現了兩種傳話，先念傳達的是1/3，吳芝圃傳達的是100%。到鄭州，還有人以為我是不主張辦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個大隊書記下令解散，第二天群眾又自動集合辦起來。赫魯曉夫很不喜歡公社，總有一天給張樓梯讓他下來，出一張佈告。赫魯曉夫講公社，是講蘇聯的歷史。所謂辦公社的物質基礎問題，西方國家物質基礎雄厚，波蘭等國家也不錯，但他們要辦食堂、辦公社就難。赫魯曉夫只講物質條件，不講政治條件。我們的物質條件就是人。因為一切都太少，就要組織起來。他們物質條件好，但不出政治覺悟。中國人多，擠得很，東部有幾億人，土地少，對組織社會化，農業合作化，比較容易辦好。如果稀稀拉拉就難辦。蘇聯地廣人稀，如入無人之境，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一路上都是這個印象。去年北戴河會議，高興中埋伏了不高興。去年11月後退，今年5月停止後退，指標不能再落了。比例問題，5月份已經解決。現在是集中搞（限額以上）788項，計劃外的項目也作了安排。共產黨一

條，就是開會，抓，形勢就較快改變。軍隊的經驗，頭天開會，無結果，睡一覺，辦法就出來了。人的認識是逐步發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樣，事先安排定錦囊妙計。原來談十八個問題。沒有提反右傾。北京就有人說情緒越落越低，氣越洩。彭德懷的信和《會議記錄》稿，很有功勞。小舟等人主要鋒芒，對着除自己以外廬山會議所有的人，要發牢騷，要出氣，要講失調原因。被插了白旗。你們一點氣也沒有？

周小舟：並不是出氣問題。

毛澤東：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不能說湖南沒幹勁。

彭真：湖南的幹勁後一步跟上來。

毛澤東：湖南工作不錯。可是政治、情緒上感覺壓抑，同大多數省情緒不同。講點苦水，即被攻擊，感覺有壓力。不許人家講話不好，高幹會嘛。開會方法要改變，不能壓來壓去（昨天大區區長常委會也談了。大會我只講了15分鐘，沒氣力了），這是不正常情況。

彭德懷：批評陶魯筋有品質問題（指陶在小組發言，支持彭德懷的信，後要求修改發言稿），傷感情。我61歲了，不要緊，耳已順了。

毛澤東：胡琴拉得太緊，弦要斷。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弛就是右傾、保守。弓箭時代，弦要解下。開弓如滿月，箭發似流星。拉緊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辯證法。休息兩天，換換空氣。不要一句話不對，就是甚麼甚麼。要容許申辯。思想不通，服從組織，實行黨章很不容易。（有人插話：閒談總有走火的。）要聽對方意見。

彭德懷：我講話都要先寫個稿子，怕講錯了挨整。

毛澤東：（面對着彭德懷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懷：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了解。跟不上，掉隊遠，這種分歧多。許多歷史事件，我一生無筆記，文件全燒了。對立三路線我是動搖的，1929年曾向中央寫萬言報告，主張建立羅霄山脈銅鼓、萬載間根據地，向南昌包圍。

毛澤東：王首道那麼小個，攻得好厲害，那麼大神氣，要打長沙（第二次打長沙），不贊成的就說是機會主義。

彭德懷：他們要打武漢，我贊成根據地建立在銅鼓、萬載之間。

毛澤東：湖南是吳尚，地方武裝很厲害；江西是朱培德，客軍好對付，你也喜歡江西。

彭德懷：去打武昌，無法渡湖，後來轉打岳州後，乘虛攻入長沙。上井岡山同紅四軍會合，我在五軍講話有決定性。同四軍會合後，我當副軍長，沒有爭論。後來三軍團，內部不純，沒有經過古田會議整頓。二次打長沙後就有分裂。我入黨是1928年，原以為黨內純極，這才知道黨內有名堂。鄧乾元很不好，說我有五大罪狀。當時的爭論，使得滕代遠哭了。統歸一方面軍時，三軍團內部有分歧，我是少數派。打吉安、九江，我並不太積極。要我負責找渡船，其實這事完全可交別人去辦。我沒有參加會，以為是毛決定的。當時三軍團有人說，過贛江是右傾路線；我說先過了，再爭論，我一個人也要過。在平江時，有人問：何時革命勝利？我說：鬍子白了總要勝利，因而挨鬥。我對執行立三路線並不那樣堅決，但也沒有反對。我主張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富田書記說：打吉安，不打九江，是斷送革命高潮，我對此說很懷疑。（以下談到富田事變。）張輝瓚搞反革命佈告，散傳單，「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我斷定是反革命搞的。我沒有整套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方法，現在難學了。主席過去曾經送我兩本

書，《「左」派幼稚病》和《兩個策略》，批語都記得，一直帶着。（接着又談打贛州事）

毛澤東：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彭德懷：黃紹竑很早意識到了。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毛澤東：三個師只32,000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

彭德懷：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我入黨以後是贊成統一的。「張飛」這個綽號是主席取的。在團結知識分子方面，看做關公投降，無禮貌。在敵我鬥爭時，我是堅決的。思想路線容易動搖，馬克思主義沒有學通，盲從也不行。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關係對半開），有農民的無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習慣。進北京後，跟主席處打過八、九次電話，找不到，面談機會少，得不到具體幫助。多年養成孤僻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

毛澤東：抗美援朝，如果打敗了，哪一天我也可以打過去，這樣主動。另一決心，建立在南朝鮮偽軍身上；美國軍火力量也調查了一下。方針應以大打小，集小勝為大勝，持久戰。斯大林反對這個方針，要求大打。我們吃小仗飯，吃偽軍飯。

彭德懷：為了打漢城，追向南朝鮮這事，同朝方有很大爭論，爭了一晚。

毛澤東：抗美援朝，對朝鮮三原則：尊重朝鮮人民，尊重朝鮮黨和金日成同志的領導。他們路線正確：打擊美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講國際主義。

彭德懷：這次我向主席寫的信，強調了局部缺點。

毛澤東：總路線有所修改，你還滿意的。照信的後部份估計，前部份是動搖的。

彭德懷：我對土高爐的損失有點顧慮。

毛澤東：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插話，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彭德懷：《內參》有影響，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看得較重。

彭真：國際上，兄弟國家不談公社，就是對我們的懷疑。

毛澤東：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甚麼這次要上萬言書？挑撥性的話要頂回去。一個山頭內部說話融洽。山頭主義，即山寨主思想。這一回反映了你對待困難的態度問題。

彭德懷：過去在江西時，對中央也上過萬言書。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有思想革命。

毛澤東：會議交換意見，取得認識一致，要有個過程。

彭德懷：我這次的事，同過去有聯繫，要搞通。群眾起來之後，如何保護其積極性的問題，認識很不夠。抗戰時華北的群眾運動，三次都是從反右開始，反「左」結束，冷冷清清。片面性同立場有關，出了點亂子就動搖，要慢慢深入，弄清思想。

毛澤東：別人意見有講得不對的，要硬着頭皮頂住。

彭德懷：重溫教訓很重要。（接着毛澤東又講了中國農民容易合作化的道理。）

彭真：去年公社化等不到由點到面。

彭德懷：一定說我代表中農，難以接受。還是對農民，老貧農，9,000萬人上陣發生的問題，出了點亂子，不可避免的偏差、缺點等，看得過於嚴重。一定要站在保護的立場，採取保護的態度。這是教訓。

毛澤東：罷工失敗了，不要批評，不要潑冷水。《內參》不可不看，決不可盡信。有人民大學林希翎事件為證。《內參》是專搞黑暗的。

8月1日常委會

8月1日常委會，仍然大多數時間由毛澤東講話，進一步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賬。毛澤東講的內容很廣泛，從江西到廬山，從軍事到哲學，從馬克思到列寧，幾次路線鬥爭等等。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特別是關鍵問題時，有不少對話。周恩來只問過一件事，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甚麼話。劉少奇也只問過，長征時在三軍團一件不關緊要的事，直到最後才講了一篇話。彭真解釋過延安整風時，平江暴動士兵委員會成員受審查事，表示歉意。

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話。接着是林彪發言。（我的記錄本上沒有朱德的發言，也沒有林彪最先講的幾句。也許是當時沒記，也許是前面丟失了一兩頁。）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當然是搬來的「救兵」。可能已決定讓林接管軍委工作，但這次會上還沒有同意彭德懷辭職。林彪開始只講了幾句話，可謂「擊中要害」。為整個即將召開的全會和鬥彭綱領定了調子。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當英雄。他講這幾句話時是聲色俱厲的。

毛澤東：無動於衷，不懂世事，麻木。（這幾句話大概是對

朱德發言「一般化」說的）收那麼點材料（指彭德懷的信）。李銳怕「湖南集團」，我加入。（對彭德懷說）老死不相往來，這麼多隔閡。結疙瘩要解開，辦法是談開；傾箱倒櫃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覺，不觸及靈魂深處不行。中央蘇區整我，也睡不着覺。整我狹隘經驗主義，山上無馬克思主義，這是第一次反「圍剿」後，我們這些人早幾天也在城市的。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毛、謝是炮筒子，他們對教條主義起名「洋房子先生」、「本本主義」。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狹隘經驗主義，給我很大刺激，因而讀了幾本書，到後來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這是政治結論。

（對彭德懷）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後再通，我們不是蘇聯那一套（指黨內鬥爭），我們有自己的一套。

昨天沒有講完。你這個同志（指彭德懷），經驗主義，承認的？就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華北座談會後，也想搞點馬克思主義。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對我有很大幫助，讀了幾本書，很感謝他。德波林的《歐洲哲學史》就是打水口期間讀的。原來不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甚麼東西。兩者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基礎不懂，必出亂子。你是另一種世界觀，經驗主義也是一種世界觀、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首先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客觀存在決定主觀意識。客觀物質世界經過自己大腦，形成概念、判斷、思維、理論、政治綱領。客觀影響主觀。人的思想從哪裏來的？你不懂，也許懂幾個名詞。不承認這一條（客觀存在決定主觀意識），永世搞不好。客觀世界要不斷反覆，才能進入主觀。如商品的二重性，人們天天買東西，幾千年，天天買，等價交換，形成社會關係。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以前即形成的。商品是對立統一，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客觀世界決定主觀世界。客

觀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觀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不受人的意識影響。精神是第二位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用於社會，即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兩個對立面相統一，人與工具，勞動力與生產手段，構成生產力；生產力再和生產關係統一。生產關係有三部份：所有制，人們相互關係，分配關係。（對彭德懷）你這個同志事務繁瑣，事務太多。我也如此，讀書少，後來，養成讀書興趣，一拿就是歷史、小說、筆記，這些較柔和。理論書太硬。《政治經濟學》我就沒讀過，陳伯達也沒有讀過。要養成讀書習慣，各種書都讀，包括文學、歷史、法學、心理學、李森科、摩爾根。李森科又恢復名譽（赫魯曉夫吹的），不能不預聞它。政治局委員不懂些理論，做工作難。你這個同志，世界觀是經驗主義，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又名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總名歷史唯物主義。有社會世界，還有自然世界。辯證唯物主義講自然世界。物質世界包括人類，統名客觀世界。開始從自然世界起，然後形成統一，客觀主觀對立應用於人類，就有了歷史唯物主義。

（談到這裏，劉少奇進來。）

我說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基礎不懂，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你如果承認是經驗主義，那就是同馬克思主義敵對，是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現在好像講經驗主義舒服點。但這是宇宙觀、方法論，不好隨便承認的。如任弼時講的，說我是狹隘經驗主義，我就不承認。你如果承認，但還不知道經驗主義是何物，以為做點工作，有點經驗就叫經驗主義？但在哲學體系上，並不是這樣理解的。不懂得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本書，就是列寧批判馬赫的，不容易讀，然而必須讀。此書反對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他們悲觀失望。1905年黨渙散，列寧自己長期研究多少

年，才寫出來的。因為理論基礎不一致。我也不懂多少理論，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讀很多書。我書讀得少，是些甚麼意思，大體懂一點。如杜威主義，不懂，太複雜；簡單意思懂一點。柏格森主義、無政府主義、唯心論、哲學史，看過一些，沒有作過深入研究。看書和研究是兩回事。馮友蘭有研究，才寫出《中國哲學史》。看了，不等於研究。因此，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你並不清楚，即基礎不懂。根據這個基礎的另外一些學問，也就不了解。

（彭德懷又談到在江西時，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兩種策略》兩本書，至今還保存着。）

這兩本書是階級鬥爭作品。階級鬥爭是歷史唯物主義範疇。從古代講到現在，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門學問。考茨基專門寫過《階級鬥爭》，翻譯是惲代英的功勞，但譯得很不好，讀了很得益。考茨基是大馬克思主義者，同普列漢諾夫差不多，後來變成反革命，同伯恩施坦不同。伯恩施坦跟恩格斯做事，是銀行小職員，無理論修養，得到恩格斯信任，逐步發展，站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恩格斯死後，他背離馬克思主義，為第二國際首領。伯死後接替的是考茨基。列寧同考茨基決裂，成立第三國際。

馬克思、列寧是鬧獨立性的。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分裂出來後，同資產階級哲學決裂，創造了無產階級的哲學。列寧領導下的社會民主工黨從第二國際中分裂出來。這種獨立性是必須鬧的。第二國際變成資產階級政黨，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我們現在鬧獨立性，則是同馬克思主義政黨鬧。黨即使有錯誤，也是部份錯誤；即使有路線錯誤，也應採取合法態度。歷史上黨同陳獨秀、羅章龍、李立三、王明等作鬥爭，都是合法鬥爭。王明路線一定時期在黨內佔優勢，我是少數派，保留意見，

服從組織，嚴格執行組織紀律。你（指彭德懷）不那麼嚴格，黨性、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你有個理論：為了革命。多次聽你講過，井岡山時期，一二三次反「圍剿」都聽見過：有利於革命，專之（專擅）可也。如打朱懷冰，不可能請示，沒有辦法，專之可也。各根據地除重要問題外，次要問題不必事事請示，不然應當統一。特別是發生爭論時，領導集團意見不對時，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蘇區，一個謠言，想開除我黨籍，開會時捅進去。當幾個月民主人士。寫信給中央，開除黨籍不對，現在何等時候，講不清楚，不要開會。後來遵義會議，是合法鬥爭。四與三之比（指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間的爭論），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是理論家，這次犯錯誤。洛甫那時幾次動搖，後來被說服。每次開會，四比三，我服從，不同第四人談。到黎平，才改變了戰略，爭取群眾，公開講，博古贊成（這以後長征才避免了逃跑主義）。採取合法手段、合法態度解決問題，等一等，比採取非法手段好。這是講領導機關犯了錯誤情況之下，要改變其錯誤而言。六大後的中央委員沒有幾個：周恩來、毛澤東、任弼時、朱德、項英、李立三、鄧發（補的）、陳潭秋、關向應、張國燾、瞿秋白（按：朱德、陳潭秋不是六大選出的中委），後來有四中全會選的，五中全會選的，王明提議六中全會補選的。中央主要領導班子還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的。王明提拔的人，多數轉變過來。如果沒有相當的時間和適當的政策，就不行，轉不過來，從遵義會議到七大，用了十年時間；政策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否則轉不過來。楊家嶺大會，陳奇涵建議不要選王明、博古。還有王盛榮的揭發（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選王明，勢必團結不起來。洛甫、任弼時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兩條路線》一擺出，即解除武裝。那些文件我許多沒有看過。會理時期，華北時期，（對彭

德懷) 你鬧獨主性，有電報，重大問題自己幹自己的，可執行可不執行。可執行者，自己意見同上級相同的；不執行者，即不相同的。(談到會理會議時，因當事人面對面，林彪不能不說實話：他當時寫信給中央，要毛、朱、周離開軍事指揮崗位，由彭德懷指揮作戰，事前並沒有同彭德懷商量過，與彭德懷無關。這使彭德懷得到點安慰：總算澄清了二十多年的一個誤會。) 洛川會議作了決議也不服從中央方針，到華北軍委分會另發指示。軍委是一個部門，不能鬧獨立，不服從可以申述理由；何況華北軍分會作的是根本違背中央方針的決定。我對軍分會小冊子批的話，首先給彭看，後給王明看，講文件本身責任由軍分會負，總而言之不對。解決黨內問題，一萬年都要講合法方式。沒有鐵的紀律，無產階級的任務不能完成。這是一條規律，寫在《「左」派幼稚病》內。如何能形成鐵的紀律？列寧講了三條：一條是政治路線正確，打敗仗就難說了。一條是善於聯繫群眾。你跟人的關係搞不好，十個元帥，除自己外，都對你有意見，工作怎能做好？對於元帥，你如此看待：一個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個在眼下？十個大將更不在話下。這種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政黨、階級鬥爭、黨的學說格格不入。黨的內部關係、黨與人民的關係，你沒有搞清楚，解決的辦法只一條：自己革命。你說：一半對一半（毛澤東說，同彭德懷的關係三七開，彭德懷堅決不同意，說對半開），總有點功勞。就搞這一條，你多次講過，為了革命，專之可也：決策不請示。各人都用此理論，那怎麼辦？現在有無線電、電話、汽車，還可以步行、騎馬嘛。封建時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遠，遇緊急措施，專之可也。馬援打常德五蠻、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無辦法，少數民族厲害得很。漢兵無紀律，內部矛盾，將領之間，硬無辦法，只好妥協。用皇帝詔書宣撫，講和，赦免。洛陽太遠，假傳聖旨。這種

事可做，所謂矯詔。對此歷史家有各種評論，可以，不可以。沒有可能請示時，可以矯詔，用上級命令名義。

同在北京城，十年九次電話，一年不到一次。我的責任是官僚主義。比較注意及時或隔一時間答覆。九次無下文，我有我的不對。積九次，老子跟你往來。（彭德懷插話：你可以寫個條子。）條子也是個辦法。黃克誠兩次想找我談（在前兩天毛澤東找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時，黃曾談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兩次請毛澤東約談話，終於沒能如願），沒有下文，這是我的責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應當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衛員說未起床，睡晏覺，你於是拂袖而去。閩西時我有責任，那時個別談得少，公事公辦，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別人講得不多，違反原則事即鬥，必須立即當眾回答。橫直公事公辦，那時方式太生硬。後來慢慢學會一條：談話。現在方法又少了。談話，小型會議，像這次廬山會議，少了，要麼大型會議。華北座談會幾十人，事先沒有好好談通。在延安勸過賀龍，跟一些將軍搞不來，互不喜歡。向他建議，辦法是沿門拜客，如伯承、德懷、林彪、向前，他都拜了。靈得很，沿門一拜，是個好方法。我也不沿門拜。延安也拜過，如少奇回來，我拜過。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難處，十人拜五個，其他五個不高興。總司令全拜，十個人都拜。後來就官僚主義，一個都不拜。（彭德懷：我也一個不拜，孤僻。）不交換意見，跟你談過，孤僻，林彪更如此，賀龍好些。（彭德懷：賀、葉好，林也好些。我無事不上三寶殿。）積了許多問題、疙瘩，互相不通。許多形式主義，召集開會，由我包辦。應開這樣的會，有開腔的可能；腔不開，有甚麼辦法。人一多，講問題去了。今天這樣的會就好。

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許多學說、政黨、階級鬥爭、經濟學

說、政治、上層建築、政法、意識形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馬克思主義原則基礎上處理工作就難了。

韓進（抗戰時在華北局工作，做過彭德懷的秘書）跟你寫一通，是封建主義思想，用你的名義發表申明。講統一戰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講自由、平等、博愛，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舊社會流行的成語，是封建主義騙人的，從古以來未有過的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犯法不同，哪有甚麼同罪？這是不懂歷史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也不懂。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甚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擴大，自己消滅，當然不是，要擴大，而且施之於人，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對民族資產階級亦是如此。公開講有條件，給定息，讓做事。羅隆基聽不進去，發火了，1957年發了「五一」整風指示，「樑上君子，皮已不存，毛將焉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所有制，五皮不存，統統滅亡，已滅三張，剩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正在滅亡；經過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識分子靠那五張皮吃飯，毛亂飛，到樑上變君子，栽秧一樣栽毛，國有制，集體所有制。天天

樑上君子，聽過之後，右派猖狂進攻。說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你階級分析也不會，此次錯誤，也是不會這一條。如三億五農民、一億五老貧農，總數佔70%。一億五較貧苦，9,000萬人煉鋼，也有老小上陣，主要是男女勞力壯丁，牽動人可多了。

昨天講的有不妥當。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你的經驗主義、宇宙觀、世界觀，你的政策，同我們是兩個政策：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還沒有提出來。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份說總路線正確，其實毫無感情，全部感情在後部份。就是說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的說法，是說過參加革命做大事。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這都是客氣話。先生，學生，是講集體、勞動人民是先生。尊勞動人民為先生的思想，你沒有建立。華北群眾運動三起三落。劉建勛講得很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舟的話閃閃爍爍，馬克思主義不多。

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鄭州會議你未參加。武昌會議，亂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三個月「共產風」，比例失調，只發現在農業、輕工業。至於重工業、基建方面的問題，到上海會議才暴露。上海會議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總司令可能鬧亂子，但他只是個招牌（組織不起隊伍）。我同你歷史關係，這麼多次，你每次動搖，昨天朋友，今天敵人。根本不認識，就跑過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沒見

過，後來追上來，新來乍到。這回重心是彭，不是總司令，總司令這回態度好。

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

6億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是假的。我們的合作是三七開。（一、二、三次反「圍剿」，反張國燾，抗戰，解放戰爭合作。）但整個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其他時間你獨立自主。個別原則問題，如對朝鮮勞動黨關係，有次戰役，電報打了（戰役已開始），照你的辦。（這時彭德懷插話，講到朝鮮戰爭五次戰役教訓，是聽從主席的命令。）總起來三七開。英雄所見，大體略同，合作大概是這種時候。歷來覺得你這人大可改進，不能同張國燾比，是勞動人民出身，有階級基礎。立三路線鬧彗扭，一了解，我們一拍即合。朝鮮戰爭談得來。北京軍事整風（整蕭克、粟裕），找我談，並沒衝突起來。有時互相客客氣氣。蕭克的事合作很好，這因為跟你有利，需要幫忙。（彭德懷：這不是我個人事。）你是軍委負責的。這幾個同志犯大錯誤，應予處理。這回蕭克、粟裕可能有功，他們發言權不多。

基本話就是這些。不能強加於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學基礎，那是虛的。特別是野心家也難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這是一個側面；另一側面是可以改造，要把這一面擴大起來，洗腦筋，錯誤的東西慢慢刮掉，刮起來不容易，很痛。「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要做到這一條，這句話源於齊景公的一則故事。齊景公70歲了，小兒子七、八歲，同他玩耍，學牽牛，拿條繩子。娃娃拉一端，齊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齊景公掉了幾顆牙。「孺子牛」故事是這麼來的。

彭德懷：出國，實在不想去。國防部長也不想當。說我出國搞了資本嗎？（毛澤東：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在羅馬尼亞見了國防部長，我談了公社是集體所有制，還有少數個體所有制，五保戶（還有超支戶、分空戶）。談了分配制度，餵雞屬個人。他們了解，但擔心共產。羅國防部長來過中國，談話時大使參加。除此以外，都撇開了，沒談。在保加利亞談，說對他們有幫助的，手施人畜肥。他們地多，氣候好，有糧，對方也是國防部長。有關政策問題只談這些。

昨天一談，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國每天宴會，也不願講話。

我那封信，有兩方面不成熟：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工農等幾種關係，是政治性問題，並沒有把握。寫信時，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過。（7月23日後的小組會，都追問寫信是誰幫的忙，主要懷疑周小舟。彭德懷最怕牽連別人，一直堅持說是他一人連夜寫成的。）開始是寫主觀主義，片面性，從哪裏來？小組發言也是謹慎的，正需要鼓勁之時，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對局勢，我是樂觀的，信的前一部份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傾苗頭，我看是樂觀派。過去經驗，認為應好好總結。樂觀還是悲觀兩個角度看局勢，這是我們之間的距離。（毛澤東：信公開發表，所有反動派歡呼。）信是交給你的，覺得會議就要結束了，寫個信，此件請審閱、批示。我寫信原意是，有無參考價值，請斟酌。

毛澤東：此話不真實，張飛是我封的。你認為不好說的，你不交心。一個心交，一個心不交。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偽有矛盾。不能說全部假，對敵鬥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不拿出來。

彭德懷：上海會議是觀察時期。西藏問題一來，搞西藏去

了，這是真事。平時瑣事多，忙於事務，大事確未考慮，聽聽報告而已。

毛澤東：觀察從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開始。

彭德懷：武昌會議我有書面發言。

毛澤東：逐步形成你這些觀念。你不是樂觀，是悲觀的。

彭德懷：過去的事可檢查一下。

毛澤東：當前突出矛盾是甚麼？「共產風」，指標落空，項目下馬，浮誇風，這些都已解決。現在是另一種論點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傾在發展。言為心聲，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份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

彭德懷：我是直接寫信對你講的，沒有搞非組織活動。

毛澤東：有右傾活動。

彭真：你在西北小組講：人人有責，包括毛主席，個人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說毛主席的話亂傳一氣，盲目服從。說到處第一書記掛帥，削弱集體領導。1,070萬噸鋼的指標是個人決定。說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這些箭靶子射誰？

毛澤東：你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沒有看見？小舟，你上了當，搞合股公司，拉過去了。

周小舟：我對彭總說，有意見，應同主席談，但莫起衝突。講了三遍，不能起衝突。

毛澤東：你還說不是。散佈空氣，無民主自由。我們講了九個月，批判了九個月。你們批判的那些，難道超過了我們講的？放衛星好，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真理與假理比較，才有真理。無謬論，哪有真理？

彭德懷：百分之九十九你對，也有一回不對。為了帶號兵，

挨罵，過去了好多年，還記得。（這大概是當年江西反「圍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資產階級意識，黃克誠批評我對主席有成見。華北會議批評，忍了幾年。

毛澤東：鄧小平在你面前有顧慮，對你並非沒有意見。

彭德懷：小平幾次不當軍分會主席，說我有英雄主義。

毛澤東：是說資產階級英雄主義。無產階級英雄主義是好的。個人英雄主義很危險，野心即出在這裏。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組織隊伍。

劉少奇：李井泉也感覺你在拉他。說四川沒放衛星好。

彭德懷：問題提出後，各人有各人的感覺嘛。

林彪：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後拉，先拉後打，舊軍閥的辦法。

賀龍：對主席成見深，信中有歷史成見。

林彪：發洩積憤，市場也不大。

毛澤東：是否小舟永遠被拉過去，看小舟的態度，這個人不覺悟，「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緊張」他都接受；「得失相當」，「『左』難糾」，這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觀點。小舟，你馬克思主義觀點少一點。這是對領導，不是對群眾說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嘗不知道，可以原諒；同意綱領不簡單，是氣味相投；甚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幾億人民的群眾運動，此乃馬克思主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書記，同任何一個人非議過彭德懷沒有？同我講彭不好的，統統擋回去，要當面講，不當面講非英雄豪傑。如羅瑞卿，要當面講。

周小舟：聯繫過去那些歷史看，我不了解彭過去如何對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澤東：重點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來：方向是對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指向總路線。

毛澤東：出18個題目，就是要總結經驗。不能暢所欲言，就是湖南派；7月20日組長會上，反映有同志說，現在不能暢所欲言。有人對彭信，23日前沒有表態，只對常委談。他們對大煉鋼鐵、公社化、比例失調不滿，可能比你們還多。如計委，從不下毛毛雨，四時八節逼着簽字，十年改不過來，橫直不讓了解情況。「設計院」不在常委、書記處，而在財經機關，那些人臉皮之厚可觀，出來的東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這種批評還要繼續下去。信中說，「種種原因，雖有安排，難於決斷」。這些話呼應一大批人，說責任在上面。計委有甚麼安排？5月已經作了決斷，計委官僚主義厲害，難推脫，但計委拉不過去。計委沒有安排？歷來用一大本，一千多頁，從來不請求來談談。

政治掛帥，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觀點，即黨的領導。你就是說中央鬧了亂子，得檢討，鄭州會議等不算數。

直接向下面寫信（彭德懷曾批評毛澤東以個人名義向全黨寫信，不甚妥當），以後還要用此方式。

田家英歷來比較偏右，如批《紅樓夢》、《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生鬧風潮，《零訊》啟事等；其實他講給林克（毛澤東的英文秘書）聽，林克又講給我聽的，「雙百」方針，長期共存，田不贊成（形「左」實右）。我同李濟深講，黨內有人不贊成，用田來嚇民主人士。十人中可能7個或9個不贊成處理內部風潮。沒有幾個省委書記贊成。一同準備作思想鬥爭，準備鬧事。就是牛鬼蛇神不讓放。說我們無民主，只獨裁；讓放，還不民主？只你這省（指湖南）提出，六個問題難辦，中央通知，不適合情況可頂回，緊急的先斬後奏。

自我批評了九個月，沒起瓦解作用。你是立場不同，多年的黨員，還是政治局委員。洛甫的馬克思主義哪裏去了？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7月23日講話）說得不準確，說是無計劃、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只差50米了。

李銳動搖，去年11月到蘇聯，同留學生談話，說大躍進搞糟了。（按：這是外交部反映的一個材料，同事實有出入，我當時向會議秘書處寫了說明，但《簡報》不發表。）

有過教訓，這回又搞這一手。而且這些事都辦了；糾正了，批判了9個月。為甚麼搞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領導，瓦解總路線，以為有大批群眾集合於你的旗下。

（周恩來插話：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

船要沉了，老鼠趕快離開船。批「小資產階級狂熱」，另搞一套。大躍進你們沒有參與，沒有責任？北戴河會議沒有反對，武昌會議、上海會議時都贊成的。

對計委絕不原諒，十年了，還說沒有經驗。挖掉牆腳，證明沒有經驗，完全做官。王鶴壽那個部，8個月搞計劃；鞍鋼還搞計劃，不着急。要切实批判，毫不要妥協，一句好話也不講。當然還不是反革命，還是想把經濟搞好。光是動口，矛盾不動手，橫直拖拉，團團轉，互相依靠（指計委與冶金部），都靠不住。南寧會議後，承認我掛帥。（在江西時）司令部惹不得，黨委不能討論，不然叫越權。經過長期鬥爭，古田會議後，逐步形成黨委可管大事。還是舊軍隊東西，名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軍事。打到一個地方，以雞吃盡為原則，吃光再走；根據地建立不建立不在乎，無建根據地思想，叫流寇主義。現在經濟部門即如此。蔣門神一派，不能收稅。我當武松。軍委對中央敷衍，搞形式；情況如何，沒展開討論。我也有責任。抗美援朝

後，沒有管軍委。對政治的理解（不懂政治掛帥），經驗主義，只習慣老一套。這種運動（指大躍進）不會搞。相信群眾的覺悟程度，要保護積極性。批評可以，但不能挫傷，從實踐中得到教育，階級鬥爭靠廣大群眾。革命標誌：單靠先鋒隊覺悟不夠，還要有階級覺悟，還要同盟者，小資產階級過不下去，這是馬克思主義起義的原則。中國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已經惶惶不可終日，條件完全成熟。

你還是缺政治掛帥，卻批評政治掛帥，不是政治家。（彭德懷：軍種、技術科學那樣複雜，不勝任。辭職現在不提，過去提過好多回。）黨委抓起來，要有政治空氣，技術服從政治。

彭德懷：中央的東西，軍委由總政傳達。

林彪：「小權集中，大權下放。」人家就是這樣形容軍委的。

毛澤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參加中央的會，等於沒參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開始不順從，他是老將軍，同當右軍都督。你為何不能容納這些元帥，無非亂中求治，（賀龍：元帥老的還交換意見，並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來。）沒有周瑜那種氣概，年齡比周瑜大，經驗也多。其他元帥經驗不見得比你多，也沒有程普那麼老。元帥團結在自己周圍，疙瘩解開。八個元帥有意見。也不能搞傾盆大雨，發生逆流。（彭德懷：發脾氣多得很。）（周恩來：想用此壓服。）對別人要求民主，對自己要求獨裁。「共產黨不是毛氏宗祠。」（按：此語是毛澤東當年對毛澤覃大發脾氣，要打人時，毛澤覃說的。——幾天前，同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時，毛澤東曾談到這個故事。）學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實行民主，這回決定開中央委員會。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大鳴大放。《簡報》是中字報。今天談這些，並非幾

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許不適合你的情況，我這不是個人意見，而是相當多同志的意見。甚至廬山會議後，你還可保留。批評不能接受，可以頂回。論點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頭接耳，扎根串連，都可以。

劉少奇：根本問題，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種想法，革命要革的，社會主義要搞的。但如何革法，過這個革命關，社會主義如何搞法，腦子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總是有些不同。對我們的搞法，總是不滿意；至少不全是像我們這樣的黨。積極要求實現自己的願望，批評人，然後也合作。我們長征中認識，認為你爽直，對同志、友鄰部隊都照顧，感覺政治開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並不勇敢。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毛澤東：電報張飛會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見向下講，不向上講。組織原則問題。）以後想極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別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毛澤東：交不親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擊時，是敵對態度；當然也不總是採取敵對。（毛澤東：對抗性有幾種：橫直不合作，敵視，有意見不講；另一種即敵我階級鬥爭。前者意識形態不同，觀點不同，談不來，客客氣氣敷衍，談得來無所不談。）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毛澤東：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作報告，怕作不好，對他不利。小範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為好。有人要求彭去黨校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會，也勢必作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麼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賬掛在我身

上。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着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毛澤東：關向應講中了，你這人是搞派別活動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滿並沒有講出來，延安整風審幹，也不滿意我。（毛澤東：這是我的責任，好、壞都負責，九條方針沒有照辦，相當長時期下面未執行。北京後來審幹反右，自殺也幾十個。還是犯「左」的錯誤，羅瑞卿他們負責的。）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當面講這些話。

林彪：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毛澤東：以真話形式出現的假話。）長征時講過，入黨前，救中國捨我其誰。入黨後，情形不同，應該談出來。在黨內也有藐視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個東西杠起，有思想、願望、目的，總覺自己行，有個路線、綱領、世界觀，自視很高。（彭德懷：也有自卑感。）弱點，是腰桿不硬。應利用此弱點，慢慢轉過來。你看風使舵，沒有張國燾蠢，是聰明人，看到不行，採取主動轉彎。六中全會時，你趕快撇開了王明。六中全會你很不愉快。王明船快沉了，趕快上岸，拿石頭打船，以示區別。黃老是老實人，你如果變了，為何不在黨委幹部會上講，只給黃老一個人說（指擁護主席的話）。一個東西不對，一定要批，馬日事變要來的，統一戰線要破裂的。韓進起草的東西要批。瘡疾原蟲沒根絕。根本問題從世界觀解決，經驗主義世界觀，雖無著作。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周恩來：相反，很驕傲，犯上。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是另外一個黨性、派性。（周恩來：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

是犯上。) 魯迅是馬克思主義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話合乎辯證法的。你混同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個人野心，政治方向，靈魂深處，沒有脫胎換骨，危險在此。是個不馴服的黨員。三七開，如何形成？入黨後即獨立為王。滕代遠是老黨員，你說了算，長期獨斷專行。從平江到長征，黨的生活中很大獨立性。陝甘支隊一年，（毛澤東：出臘子口到岷縣，幾次想打，急躁情緒，簡單概念。）對上級、同級不尊重，對下看不起。項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這不是從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組織觀念、黨的觀念一套，你沒有建立起來。革命的動機是否全為群眾服務？這種成份有；但想在革命事業中成功成名，出風頭，也有的。長期籠統印象，是舊內容，新形式，舊的，也有新的。個人主義是舊的，新的有革命內容。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詞，就是野心，派頭氣勢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並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猾，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不好敞開談。）前年同我談話，簡直像準備好發言稿，機關槍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談話，有戒備。（毛澤東：形式主義的，並非徵求意見。）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一貫跟劉談不來。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猾的本質。（毛澤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裝好意。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這樣多的話要說，為何不來談。信有一二三稿（指有人幫忙起草信稿，當時傳得很廣），想定案，黨內外颯風。（彭德懷：就是一稿。）大躍進與副作用，賬沒有算清。沒有大躍進，沒有總路線，領導就成問題了。正面作用與副作用沒有弄清楚。國內外都颯風，以為好時機到了。這些（副作

用)事情已經過去了,廬山不應再潑冷水。去年全做錯了,很着急。(彭德懷:老實話,成績是肯定的。)(毛澤東:馬後炮不靈了。)一方面肯定成績基本,缺點次要,思想裏卻是缺點基本,成績次要。矛盾有兩面,哪面主要?(毛澤東:掛一筆賬,你們錯了。有此一信。抗戰時獨立王國,你搞你的,並沒有寫信;抗美援朝也沒有信;北戴河、武昌、鄭州會議都沒有信。這次抓到一個機會,打着無產階級旗幟,攻擊「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以為萬無一失。國內外、黨內外議論紛紛,乘此機會。你是個投機分子。)表面似好意,實際要抓辮子。地下檔案,控告書,告黨狀。發表以爭取群眾,不發則存檔。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單獨政治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幾十年不寫信,哪有如此簡單(毛澤東:經過小舟造空氣,說甚麼講話不自由),攻擊主席,今後動機搞單純一些,相信黨、相信毛主席,增強黨性,把相信自己減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內容與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實辦法,學毛主席著作。馬克思主義著作與毛主席著作是聯繫實際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為有正確東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確,用這一套正確指導革命。不搞理論,興趣不高,也非嗜好,這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哲學、世界觀、政治,要學現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強組織觀念最重要。拋掉個人過份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來。這種雄心、信心沒有;缺點是有暮氣。主席講元帥中有暮氣。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澤東:66歲了,隨時準備打交道,準備後事。)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緊防止自信、個人英雄,否則

就不能尊重黨，尊重馬克思主義，更不能相信元帥。罵兒子樣罵幹部，似本能，你是這麼個人。個人英雄主義，有新有舊，迷惑手段。相處過多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內心根本東西不去掉，就是個特殊人物。

周恩來：一改二幫，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劉少奇：表面講的不是真心話。要挖一下記仇、記恨事。高崗事件後，本想找你談一次，怕扯開一談，談不進，沒有談，怕擋回去。

毛澤東：兩次聲明，要收回信，《簡報》上說的，我不相信。

彭真：開始對你信仰高，慢慢感覺不對頭，跟中央不對頭。搶先思想，組織觀念得要。為何要對全國性、世界性的問題講話？（毛澤東：發了這個指示？）發現鬧獨立性，動搖對你的信心。1937年開始我逐漸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對。首先是你的黨性，同中央搶先。1937年12月傳達王明的東西，我強調奪取領導權。這次在火車上講匈牙利事變。（毛澤東：思想之混亂可觀，我們怎麼能同匈牙利比？）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一部份，目標是毛主席。

毛澤東：從打擊斯大林後，佩服赫魯曉夫。

劉少奇：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沒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人大決定不要，又反對。

彭德懷：你們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陰謀，兩面性。每回唱三個歌……

周恩來：感情問題。

彭真：反對個人崇拜，有無此想法？你有大功勞，但一切功勞離不開黨和群眾。否則，頂大當個唐生智、程潛。毛主席的路線已得到證明，基本上已證明總路線的正確，也應服從。（劉少奇：彭的功勞也是來自這條路線。）反過來，過去幾次路線按照你的辦，現在可試驗，原來是狂熱性，可以設想是甚麼結果。這樣一提，個人東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談就拗起來。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應肝膽相照。這麼多元帥支持你，是由於主席，但換不出你一條心。張飛，能換心的。歸根結柢，宇宙觀和黨性的根本分歧。

黃克誠：這都是赤膽忠心幫助。我們相處久了，被另外一種感覺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過意見。今天這樣講，談及個人品質，使我認識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決；個人英雄主義有感覺，也感到想表現自己。華北同志意見很多。我們之間談話交心，扯過很多問題，如歷史上中央蘇區的問題。關於主席的問題沒有談過。談過請毛主席出來領導。六中全會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後，覺得對毛主席態度有改變。到北京後，具體表現的對毛主席的不滿，也談過。我要他到主席處談談。心是否都對我交了？還不敢說。對幹部關係有成見，對羅瑞卿，我批評過他。對賀老總，沒同我講過好或壞。對幹部一拉一打，有些個別現象；是否整個如此，還難判斷。交心問題，從前考慮過，不能完全講出來。（林彪：是偽君子。）也可以這樣批評，裝模作樣，並非完全內容與形式那麼一致。（毛澤東：全部偽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於兩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這樣苦口婆心，應當感動，不是主席領導，多少年採取組織決定，怎麼能有今日局面，這樣教育、幫助，應當感動，是幫助。

毛澤東：歷來估計兩面。好的一面擴張，可能改。也有可

能不能改。（黃克誠：好好檢查，雖然60歲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眾，關係好一點，改改，一時改不好不要緊。

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風、洗腦筋。

彭德懷：改造思想贊成。總路線擁護。工作有消極面。

毛澤東：我們黨是三山五嶽，是個聯合會。

彭德懷：管軍隊要純的人。我沒提過任何一個人，無任何私人來往，也沒有私人信件。了解了為何又不願幹？軍委應當掌握在一個得力同志手上。（我下來）這次不公佈。提議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務。國防部同外國不同，外國是一長制。

毛澤東：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

彭德懷：也不是以此來抵抗。朝鮮回國後，就不想幹。軍隊複雜，科學技術，不摸也不行，不好下決心。早有此意，並非不服從，希望諒解。承認要思想改造，學點馬克思主義。讀書沒讀通。具體事務一來，學習又放下。32年來，沒有真正坐下讀過一本書。英雄主義思想還有根源。今天講的事，好多忘了，當年事，容易忘。軍隊要培養新人，準備打仗。我這人隨便，越熟越馬虎。這次會本不想來。個人英雄主義，還加無政府主義思想。華北會議作過檢討。洗腦筋不容易，還要發作的。不守紀律，現在好一點。這次寫信，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沒同別人談過。是否是備個案，是否如大家講的如此系統，現在還難接受。說我想發表，不能接受。我是贊成總路線、大躍進的。看到困難，動搖搖擺是有的。講我不要這兩個東西，沒有的事。這樣說，發展下去就危險了，小資產階級奪無產階級的權。主席23日不講話，會發生混亂（有1/3人動搖）。承認思想混亂，立場不穩，有搖擺。

毛澤東：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這一次又

可搖過來，看環境形勢。對你寄託希望。

彭德懷：這兩天兩次談話，很感謝。不抵觸。

毛澤東：可以繼續申辯。平時不往來，是一種觀察現象。本質如何，現象不一定準確。會理時，我毫無顧慮。那時靠劍英，不忘記（劍英大功勞）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三次反「圍剿」戰爭，我們非常融洽。後來年紀大起來，積累了許多東西。

彭德懷：信中也講無產階級，也下了決心的。

毛澤東：你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

彭德懷：經驗主義肯定，靠自己幾十年經驗辦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東西。我只讀過兩年舊書，裝的很多東西，都洗盡不容易。是被動地跟着幹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這次會議的話，走到另一條路，也不會的。

毛澤東：採納你的意見，會混亂一時期，又要來糾正。

林彪：會出現大馬鞍形。

彭德懷：三句話，出在第二句，問題不少。

毛澤東：現在右傾情緒，右傾增長，不是颳「共產風」、壓指標那些問題。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覺悟。鶴壽談有鬆勁情緒，也不摸底。這十天，較有底。問題不少，不在老問題，現在是新問題，是指標越落越好；以信為代表，以及相當部份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鑄、周小舟。新問題是要反擊右傾進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周惠：看不到信有問題，還是堅定不堅定問題。湖南要鼓勁，矛盾情況，下面新的右傾也早發現。對譚老闆我提得尖銳，要反「左」防右。食堂問題，譚主張解散。（毛澤東：譚老闆也搖擺。）小舟來電報，也偏右，與譚老闆談，算賬，鬆勁，要反「左」防右，我的思想情況不是右傾的。

毛澤東：吳起鎮講話，長征勝利，取得經驗，有七千骨幹，前途光明，當時只七千多人。很多人不贊成這樣講，說吹牛皮。

周恩來：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劉少奇：元帥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難道都怪這些人，你就那麼好？中間有個問題，把你那套丟開，服從黨，野心拋掉。是大家的野心，無產階級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個人野心。黨內好好合作，求同存異。原則問題要鬥爭。團結——批評——團結。

毛澤東：九個元帥、十個大將，圍在你周圍豈不好？人少好還是人多好？

劉少奇：還要一個改造過程。

彭德懷：四十天來，有兩面，有恨，也接受。當元帥不行。當副手，剛愎自用。

朱德：順着無問題，不順成問題。投降無產階級，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遠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確也是個名的問題。

毛澤東：做真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政治犯錯誤，變成反黨，擁護祖國。將來是好遺產。都可搞錯的。心裏雖是馬克思主義，總有部份不純，以無產階級之名引誘彭，不一定行。

朱德：好話，叫罵娘，聽不進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徹底改。

毛澤東：一下改不可能。洗腦問題，照顧他的特點，不能急於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黃老，有缺點，慢慢改。

彭德懷：近幾年有些改。意見不合，強迫實行，抵觸厲害。主觀還想搞甚麼，則不是。命令對，自己不通，不盲從，執行時

動搖；碰死釘子，進步一點。打贛州後，還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樣改變。有人說我投機，很反感。話可以講，實際問題一來抵觸大。打會理也不願意，傷兵沒法處理。

毛澤東：張國燾一條好處，慢。

彭德懷：十一、二歲看牛，十三、四歲開礦，17歲當兵。四十天會議，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沒吃過虧。

毛澤東：井岡山，中央蘇區，槍桿子主義。對我幫助大。

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觀。偉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幾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過份自負，想當個大英雄，個人英雄主義不改。

（記得談話的最後階段，彭德懷還急得講過這樣三句話：可以放心，不會自殺，不會當反革命，可以種地參加勞動。記錄本上未記下。但不是最後講的。）

兩次常委會後，毛澤東都把我們列席的四個人留下來，又談了一陣。讓我們列席會議，當然是為了教育我們：不要再受彭德懷的信和彭德懷其人的影響。毛澤東對周小舟「爭取」看得重一些，希望他「不遠而復」，「迷途知返」，不要「走遠」了。毛澤東問他：是不是當了彭德懷的宣傳員？8月1日晚上，毛澤東給周小舟寫了一封信，並給他寄去了《丘遲與陳伯之書》。8月2日夜，周小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感情激動的信。這信第二天就印發了。他在信中從自己的出身和思想、立場，分析為甚麼同情彭德懷的信，承認為彭德懷提供了材料，當了義務宣傳員。

這兩次會後談話，我的記錄本上甚麼也沒記下來。我那時還很天真，以為真是還「允許交鋒」，可以「繼續申辯」的。於是在同毛澤東對談時，我竟說：1958年鋼搞800萬噸就好了。毛馬上說：你這個人太斤斤計較，你的發言，傾向不好。這樣，我才

沒繼續講了。這一細節，是從《簡報》上別人批評我的發言中，我才記起來的。

這兩次常委會的場景，我終生難忘，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和各人的神情，乃至某些動作，我都記得。特別是彭德懷，對話時他並沒有激動過，似乎過於冷靜，面部表情非常嚴肅，痛苦的感情藏得很深，但還是使人能感覺到一點，我就坐在他的斜後面。我的手常不聽指揮；心裏非常痛苦，主要還是為彭德懷痛苦。因此字跡潦草得至今看來有的如天書。

在秦城做懷舊詩詞，這《廬山吟》第八首，題目為《記8月1日會議》，是專寫毛澤東批彭德懷的：

山雨已來風撼樓，重溫舊事溯源流。
輕看游擊藐邊界，急欲興師下省州。
延水岸邊無舸檣，太行脊上有山頭。
春秋三十匆匆過，風雨來時不一舟。

兩天常委會的傳達

8月2日毛澤東在全會的講話比較簡短，提到張聞天舊病復發，沒有具體談彭德懷的情況。參加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最後一批是8月1日才上山的。他們只知道會議形勢的大致變化，並不知詳情，尤其不知道兩次常委會批彭的內容。8月4日晚上，根據毛澤東和中央常委的意見，由劉少奇主持，幾位常委參加，向晚上山的人傳達這兩天談話的情況，說明哪些人參加了會：是常委和彭真、賀龍，「找彭、黃、周、周、李談話」。首先由林彪講話。

林彪說，他前一段沒參加，是半路上山的。會議半中腰出現新的思想上的分歧，路線上的分歧，中央決定展開這個爭論。要做思想鬥爭，在思想領域裏開戰。「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大家都看到彭的信，驟然一看，還不容易看得出其精神和用意。信發出來後，在會議中引起了思想上的不一致。過細一讀，有很嚴重的錯誤。除信以外，他還在小組會裏講了很多暴露觀點的荒謬言論，還有會外的活動。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是誇大缺點，否定成績的，對於大辦鋼鐵、辦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態度。他散佈的情緒和言論都是潑冷水的、鬆勁的。他雖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裏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毛主席，反對黨的領袖。對於總路線，他只是講「基本正確」。黨內習慣用法，說基本對，那麼就還有不對。這樣的話絕不是衝口而出，而是很有分寸的。

在這些話裏，埋伏要修改總路線、動搖總路線、推翻總路線的觀點。我們說總路線正確，大躍進成績很大，辦人民公社、辦鋼鐵辦得好。這中間當然在某些具體措施上面有些不恰當的地方。從去年9月起，一次一次的中央會議，毛主席的信，這些部份不妥當的地方，中央都及時糾正了。可是他卻認為我們認識過遲了，而且沒有及時調整。這些問題的發生，他不認為是我們一些機關工作的責任，而把責任完全推到黨中央身上。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計委雖然有安排，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難予決斷。」這個話就有伏筆。計委之上還有誰呢？領導經濟建設的當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這裏很顯然是影射毛主席。他還說「有得有失」，哪裏是有失有得呢？他說的其實主要是失。我們說主要是得，部份損失。所以他這樣倒過來說，是有文章的。他在小組會中很多插話都是散佈右傾思想，覺得還不夠，所以要寫信。說廬山會議討論不夠，民主不夠，他要發動討論。實際上他在會外講，華北座談會操他四十天娘，這次他不可以操二十天娘嗎？所以總的目的是為了操娘，為了罵黨，罵中央，罵毛主席。他把我們一時的局部失調，誇張得很大，認為影響到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各階層之間、甚麼甚麼之間的關係，而且是政治性的，是政治路線的錯誤。他誇大了各地的浮誇作風和所受損失。對於去年我們廣大的群眾運動，他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實際上這樣廣大的群眾運動是中國一窮二白的真正產物，是廣大人民在黨領導下想翻身的一種產物，這是必然的產物。他是打着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旗幟，來向黨進攻，向毛主席進攻。還說我們只搞政治掛帥，不講經濟法則，認為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左傾」，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這樣看法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有部份失調的地方，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基本形勢已經好轉了。現在的問題是右傾抬頭，無論黨內黨外，以至國

外，都有這種反映。如果按照他的方向反「左」，那就不是鼓足幹勁，而是洩掉幹勁；不是鼓氣，而是洩氣。如果這種思想傳播下去，不但要產生馬鞍形，而且要產生很大的馬鞍形，那就會動搖總路線，影響今年指標的完成；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領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會大大受到損失，受到挫折。他說1,070萬噸的指標沒有經過中央討論就決定了，這顯然是反對毛主席的。他還說，公社化引起的問題，是主席應該負責的。他還說，我們得意忘形，頭腦發熱，毛主席在上海也作了檢討的。他說廬山會議有壓力，大家不敢講話。他說，幾個月不供給油，是主觀主義的。他還說，第一書記掛帥，這也掛帥，那也掛帥，他實際上是反對第一書記掛帥，反對黨的領導。他不僅僅是指的各省，實際上也是指的中央，指着毛主席。他發信之前，跟人說，這封信對毛主席是有刺的。可見，他主要是要刺激毛主席。他說很多同志在會議中不勇敢發言，這是軟弱。照他的意見，照他的辦法，就是要拚命向黨進攻；不向黨進攻，就是軟弱。寫信正是為了公佈他的政治綱領。所說要提倡勇敢講話，是要提倡赫魯曉夫的精神；要脫褲子，並且要自己脫，不要人家脫。以上就是他在信內、會內會外所表現的東西。

林彪接着說，常委同彭談話時，主席、少奇、恩來、朱德、彭真、賀龍發了言，我也講了一點。主席講話的內容，林彪作如下概括介紹：

主要是講他的世界觀。主席說，他有另外一種世界觀。發現他有另外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另外的革命方法，另外的搞社會主義的辦法，另外的建黨的辦法。而且發現他參加革命有另外的用意。無論從他的思想意識上、思想方法上，還是政治綱領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這一套是隱藏着的，沒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觀就是一種經驗主義的世界觀，狹隘的經驗論的世界觀。經

驗主義表現的另外一種形態，就是實用主義。在政治方面，少奇也講他有另一套綱領，另一套做法。社會主義他是幹的，革命也是幹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產黨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搞家長式的黨。他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他自己的面貌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反映，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改造我們的黨，改造黨的路線，改造黨的作風。

林彪說，我們幾個人的意見大體差不多，就是揭發他思想意識方面的東西，他個人品質方面的東西，包括組織觀念方面的東西。他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意識。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當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主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留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個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的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但是他太自不量力了。他這個人是功歸於己，過諛諸人。他平時擺出張飛的面貌，坦率的面貌。在生活上比較樸素，比較檢點，這是他的長處。大家看問題容易從小的方面看，在這方面，他是迷惑了人的。毛主席說，跟他的關係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開。我在長征時看得很清楚。當時他一肚子意見，到處同人講，同他的政委講，在司令部講，還同底下的人講。要他報告中央，寫好電報，他又不簽字。毛主席說，他是老於世故。他說自己有時說話走火，也說自己是老奸巨猾。

毛主席這次對他的問題，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這一套，在這次會議暴露出來，是我們黨內一種右傾的政治危險，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那會動搖、破壞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另一方面從長遠來說，他是我們黨裏面的一個隱患。毛主席說，去年5月間講黨的分裂問題，主要是指他。

這個晚上的通氣會，從7點30分到11點，林彪講話佔了一多半時間。通篇沒有稱呼一個「彭德懷同志」，只以「他」代替。其他三個常委都稱「彭德懷同志」。從這個細節，可見林彪把界線劃得何等分明。關於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這是林彪在常委會上定的調子。這時卻不直接講出，而是說，其他常委有這樣的看法。

朱德接着講了約10分鐘的話。說會議前一段是要把成績說夠，缺點講透，好安排工作。原以為可以散會了，不料發生了這封信的問題。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不大完善，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我們常委開了兩天會，跟他算了一個賬。主席跟他算賬，三十年，是三七開，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擁護中央，擁護主席。主席把這個三七開，前前後後講得很清楚。英雄主義，經驗主義，現在彭自己也承認了。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在這裏。

周恩來的講話也比較長。主要介紹了廬山會議的經過，前後兩個階段的情況。說大躍進搞了一年，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廬山來總結經驗，順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據湖南省委的三句話，將「經驗很多」改成「問題不少」，提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樣概括的三句話，並提出了十八個問題。前十五天分組開會，有時開點彙報會。準備解決十一、二個問題，

起草一個會議記錄，不叫決議。工業方面指標比較落實了，但是具體佈置還有些問題如鐵、鋼、木材、運輸、糧食等，在山上順便同部長們解決。當然還有個別失調，部份緊張，一定要解決，抓緊起來，大家努力，就會好轉的。

關於「得不償失」的議論，山上山下，黨內黨外，都有這種說法。我們說成績是主要的，駁右的說法。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要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同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裏彙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第二次在主席處彙報，他又說，工業的大躍進，是農業的浮誇搞起來的。歸罪於農業，也是不對的。大躍進是工業躍進在先。農業是主席直接領導的。他攻擊譚震林，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原來的安排，確是想把十幾個問題解決好，寫入會議記錄，15、16日下山的。德懷同志寫出一封信，就影響了一些人，形勢就起了變化。

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彭在政治局會議上總是冷言冷語，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見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點，搜集材料。在主席處兩次彙報，關於公社問題，主席頂了他，說當然公社不辦，遲幾年也未嘗不可；但是現在辦了，就應辦下去。別人也有同他爭的，他覺得他的話總是有人聽，所以在西北小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虜了一些人。他覺得他的話有市場，有影響。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黃克誠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們一起談時，林彪同志駁了「得不償失」。，黃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組會上，

就是批「左」的東西，還氣勢洶洶，跟譚震林吵架。張聞天同志急於表態，7月10日以後，找糧食部、銀行和商業部同志了解情況。他講了三個鐘頭。「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

正如主席在8月2日全會開幕時說的，原來設想的問題不少，是說大躍進、公社化、總路線偉大成績中，有個別偏差和不好的地方，那些已基本糾正了，只是留有一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大家上山來，談一談，解決一下。比如市場問題，上山後，馬上批了一個文件下去。糧食問題，馬上討論解決。財政、工交方面的問題，都在討論，以求逐步解決。這是原來的設想。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所謂問題不少，不是這些問題了，變成鬆勁、洩氣、悲觀這類東西；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內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的分裂而鬥爭。問題的本質是這麼一件事。

關於彭德懷同志錯誤的根源。彭做過許多有益於人民的事，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這方面自覺性很低，常從實際利益中認識，不是從思想上認識黨的路線和政策。凡是黨內發生路線錯誤時，他幾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後又分開。分開常常是突然的分開，不是從痛苦的認識中，把思想弄清，以後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來說，也犯過兩次比較大的路線錯誤：一次王明「左」傾路線，一次王明右傾路線，在延安整風時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長期地檢查，認識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條叫我們讀書。彭是從利害關係看，沒從思想上挖根。抗戰初王明的右傾路線，他在華北是宣傳了的。一到1938年，在橋兒溝六中全

會時，他一上台就反王明，話講得最尖銳。主席那時覺得不必要那麼尖銳。他的經驗主義根深蒂固，還有二元論思想，認為主客觀可以並列。如對毛主席、對領袖、對黨，他說思想通了，感情不通。思想、意志與感情總是統一的。他說他逐步服了主席，但不盲從。他對主席講，他對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對個人崇拜，說偶像崇拜不對。他在政治局說，不要唱《東方紅》。他沒有領袖觀點，自己也說，有無政府主義。華北座談會說他是個人英雄主義，他罵娘，不服。說操了他四十天，他現在要操二十天。主席說，好，予以滿足，咱們現在也來個四十天。他沒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他對待群眾，也是二元論思想，群眾起來之後，站在外面，指手畫腳。

關於歷史根源，彭德懷同志自己承認入黨前有個人英雄主義，入黨以後改了。他說在舊社會敢於犯上，在黨內也敢於犯上，不是無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黨性。他對別人說，你們不敢寫信，沒有骨氣；你有黨性，沒有骨氣。他要把舊社會的骨氣帶到黨內，犯上作亂。主席自己說得很感慨：我現在66歲了，要準備後事了，如果我有三長兩短，誰還管得住你？主席說這話時，他是不動聲色的，不受感動的。他說他孤僻，剛直，有離群索居的味道，這是反集體主義的。說他欣賞彭玉麟，別號為彭剛直。對黨剛，而不是馴。這些根子要挖，否則難改造。德懷同志承認了四點：思想體系經驗主義；有個人英雄主義；同主席關係三七開；這次動搖總路線。但有四個不承認：不承認要拿他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不承認是個人野心家；不承認是偽君子；不承認這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我們認為前四個承認和後四個不承認是相關聯的。

不僅對彭德懷同志，對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幫助。過去覺得黃克誠同志不錯，人很好。這回也要刺痛他。這次黃同彭的關

係，表現他對人不公，黨性不純，如他同譚震林吵了架，到處講。張聞天同志，主席說他是楚太子的病。他在小組會的這篇檢討，還是讓別人唸的。

劉少奇最後講話不長，講了些三軍團的歷史情況，說彭德懷同志發生這樣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檢討，談到黨內發生錯誤路線時，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小組會的發言裏，有同志說，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異己性，總是有刺，有時候就發牢騷，就罵。毛主席看出他的問題，因他是政治局委員，過去沒談過。這次在常委會上，毛主席講，你這個人就是要鬧分裂的，去年5月講防止黨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懷同志。說，這個人那麼難於合作。主席講三七開，是這樣講的：一二三次反「圍剿」是合作的；長征中反張國燾，除個別問題外，是合作的；解放戰爭時，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開有些問題外，基本是合作的；整個八年抗戰是不合作的，有些時候是合作的。彭德懷同志有可能改造過來，他有動搖性。他這次要算大躍進的總賬，不講就不講，一講一大堆。因此，這次對他算總賬，很有必要。

中央全會召開時的講話與文件批語

兩次常委會批判彭德懷，定性為野心家、偽君子、陰謀家，算歷史總賬，挖根子，三七開，招兵買馬，組織軍事俱樂部等，很快就傳開了。

8月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大家開了個短會，宣佈8月2日開全會，由毛主席講話。周恩來的講話，我的記錄本上只有這麼一小段，大概只講這麼一點：

彭德懷、張聞天的《意見書》出來後，「問題不少」已出現右傾思想，懷疑和動搖總路線，會議動態逐漸明朗。「問題不少」，即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進攻。他們打着所謂無產階級旗幟，向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這有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他們是有綱領體系，有右傾活動的。

18日，毛主席本擬講總路線是否正確，是否「得不償失」，以及如何落實指標，增產節約等問題。但那時說，嫌早一點。

犯錯誤的同志這次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謝謝彭德懷同志。

據彭德懷的秘書說，8月1日晚上，彭德懷在走廊坐着乘涼，向秘書們談起這兩天常委會議的情況，極其痛心地说：「主席批評我這次寫信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有目的地向黨進攻，我實在難以接受。」不過到了這時，他已經完全看清了會議的趨向，因而也最後定下了決心。在8月2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正

式開始的那天，他抱着難以名狀的心情自言自語地說：「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消除我的影響。」說完，就大步出門開會去了。

全會會場即原來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舊址。大家坐藤椅子，散着坐，大體有前、中、後排之分，因為毛澤東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在這種場合，我照例悄悄坐在最後面。後來六個小組併為三個小組，集中批判彭德懷的第四組，也用的這個會場。

以下是我記錄的，8月2日毛澤東在全會的講話：

同志們，開會。八屆八中全會，中委、候補中委共191人，到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

會議議程，討論兩個問題：修改指標和路線問題。

修改指標問題。武昌六中全會決定的今年幾個指標，上海七中全會時有人主張改，多數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徹底。今年還有5個月，改了好，向人大常委會建議。高指標已成為一種負擔，自己立的菩薩自己拜。現在得破除迷信，將菩薩打爛，重新確定合乎實際的指標。就是鋼1,300萬噸，鐵2,000萬噸，7,000萬噸鐵礦石，煤3.4億噸，以及糧、棉等等，這是5月間曾經定了的。這一次會議所以召開，就是改指標。

另一個問題，就是路線問題。現在有些同志發生懷疑，究竟對不對？路線是八大二次會定的。發生了問題，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後，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講說話不自由，有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當時都不清楚甚麼問題，不知是甚麼事。摸不着頭腦，甚麼問題覺得不敢講話。其實上山起初半個月是神仙會，閒談一陣，沒有甚麼鬥爭，並無緊張局勢。後來才了解，為甚麼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點緊張局勢。因為

那種鬆鬆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還不得要領，還不過癮，要攻擊、破壞總路線，要有批判總路線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為主，也批評今年，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9個月，中央批評了颯「共產風」、高指標，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收款」，逐步落實三級所有制等。九個月來這些工作，他們都看不進去，要求重新議過。他們要一種空氣，要民主，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認為政治局擴大會不過癮，討論不夠。現在開中央全會，請大家來，民主大些。他們可能還要擴大些，我們還有辦法嘛，還可以開黨代表大會嘛。明春準備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9月、10月開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嗎？現在要求民主，這種形勢，開頭沒摸清楚，看來是這麼回事。廬山會議已開了一個月，今天開全會。新來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回事。開幾天小組會，再開幾天大會，最後作出決議。

就是這兩個議事日程。一個改指標，一個路線問題。

開會方法，歷來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我們是希望分裂，還是團結？中央委員會，我們這個團體，關係着中國之命運、社會主義之命運。在我們看來，我們應該團結。現在有一種分裂傾向。去年八大二次會我講過，危險無非是兩個：世界大戰，黨的分裂。那時並無顯著的跡象，現有此顯著跡象。要分裂我們這個團體。我們應該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可以改，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這種方針，已行之幾十年，比較有效。對犯錯誤的同志要給條路走。不要像《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滿意，就是那個甚麼趙太爺不許別人革命。過去和今後，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繼續革命。團結起來，從這個願望出發，對犯錯誤同志一看二幫，幫他改。只看不幫，不做工作是不好的。

我們是否歡迎錯誤？當然不歡迎。錯誤是一種毒藥，尤其重大錯誤，吃了不得了，要鬧肚子，甚至要死人，以遠離為好。因而要有批評、鬥爭。錯誤的東西，跟我們離得越遠越好。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加分析，還是有希望的。無非兩種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謂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謂幫，就是幫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時跑到那邊去了，經過批評、教育，加上客觀形勢的改變，可以改變過來。如立三路線，贊成的人很多，後來都脫離了。王明路線，那麼積極，經過4年實踐，遵義會議糾正過來。從遵義會議到七大，經過十年，中間經過4年整風，長時間等待，到1945年開七大，有的人才改正過來。一個人改正錯誤哪能那麼快，經過長期等待是必要的，強迫接受，那是不行的。馬克思說，商品二重性，經過幾百次交換，才認識的。何止幾百次，古代到現代，才認識商品為何物。經過十年很必要，並且要有材料才能說服。洛甫那時不承認錯誤，《兩條路線》書一出，就承認了，解除了武裝。王明始終沒改。洛甫好像改了，這次舊病復發，打擺子，瘧原蟲在體內作怪，潛伏下來，有機會就出來，如今年夏天氣候。我要寫封信給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聲，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誰人無錯誤、缺點。就路線錯誤來說，大多數都改好了。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個別人。我們要盡人事，努力幫助，對人要有情。對錯誤的東西要無情，那是毒藥，要深惡痛絕。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學李逵粗野。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松、魯智深，這三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他們缺點是好殺人，不講策略，不會做政治思想工作。總之，要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至於有時候兇一點，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辯論嘛。現在我出大字報，《簡報》是中字報。

路線問題，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換過一條，請大家討論。因有同志提出懷疑。一上山，講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後來問題就出在「問題不少」上，發生了問題。他們想改換一下題目是可以的，就是甚麼問題？現在叫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問題，而不是別的。如颯「共產風」，三級所有制，落實指標等問題，還有沒有？基本上不是這方面問題了；不是指標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為我們反了9個月「左」傾了。現在廬山會議，這個時候，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傾，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領導機關、向6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猖狂進攻的問題。錯誤、缺點確實多，已經改了，但那不算數。他們抓住那麼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想把結論引導到路線錯誤方面去。此話是否說得對？請大家討論。7月開一個月會，大體情況如此。詳細經過，恐怕要組長、副組長介紹一下。一個議事日程問題，一個開會方法問題，我就講兩點。你們有甚麼意見，講一講。沒有不同意見，就照兩點進行工作。

關於張聞天的「舊病復發」，毛澤東在全會講話中已經談到，但是「有組織的」進攻問題，還沒有點明。於是就在當天寫了一封《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了。信中正式提出「軍事俱樂部」這個名稱。信的開頭就說：「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裏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說道：「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在人們的議論中，早就說甚麼這次有「武班子」，還有「文班子」。這封信發出之後，此說更加合法。討論中的發言，「主帥、副帥」的稱號也都出來了。這封信極盡嬉笑怒罵、諷刺挖苦之能事：「你這次安的是甚

麼主意？那樣四方八面，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昔人詠瘧疾詞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痛時節痛的天靈破，戰時節戰的牙關挫。真是個害殺人也麼哥，真是個害殺人也麼哥，真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信中說，張聞天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建議病人一讀枚乘《七發》，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恣然汗出，霍然病已」。8月16日，毛澤東還寫了一篇〈關於枚乘《七發》〉，介紹漢文帝這位文學侍臣的騷賦名篇，認為治楚太子病的方法，同當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者方法，用說服而不用壓服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是很相似的。「我們應當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斯大林、李大釗、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寧『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

毛澤東用這樣的「要言妙道」，推動了廬山會議；這場向右傾機會主義者——「軍事俱樂部」的批判鬥爭，於是進入最後高潮。

此外，從全會前夕直到會議結束時，毛澤東還一連批發了與這場鬥爭有關的許多文件，可以舉出如下一些例子。其中的批語，無不直接起着如鼓風機對高爐升溫的作用。

遼寧省委轉上鞍山市委報告：鞍鋼工作有了很大改進，群眾運動比過去更加廣泛深入開展起來。7月31日批語中說：「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

平江縣一個大隊（2,163人）63個食堂散伙後，二十多天後又辦起89個食堂。8月5日寫了三百多字批語，認為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也不可能的。孫中山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長沙一個郊區公社的調查報告：《目前農村中「閒話」較多的是哪些人？》說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農，對「拉平」意見多，要求算賬；沒錢用，嫌工資少；懷疑大躍進成績。真正反對我們的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8月6日的批語說：「這同目前在廬山講閒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聯繫的。」

江西黨校黨委隨後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說，學員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認識的分歧，經過大辯論後，認識已經統一。8月7日的批語：「開頭一陣烏雲，結果一片青天。廬山會議上辯論的情況，和江西黨校何其相似？江西黨校持否定態度的在82人中有6個人，我們這裏也是五、六個人。我們這裏持肯定態度的人比江西黨校多得多，持模糊態度的也比江西黨校較少，這兩點是不同的。兩處辯論的問題全然相同，都是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陣線也相同，都分左、中、右。」「請同志們學江西的樣，在省地縣三級分批舉行，一律照此大辯一場。」「每一批時間兩個月，讀書與辯論並行，作一次新的整風運動，定有極大利益。」

也就在8月7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

危險」。稱那些多談錯誤和缺點，「非難人民公社，非難大辦鋼鐵，非難大躍進」的人為「右傾保守分子」，號召「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徹底加以批判和克服」。

關於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之事，8月4日省委有一個專門報告送交在廬山開會的第一書記曾希聖。8月10日（就是「斯大林晚年」問題被揭發之日），所作的批語極為嚴厲，上綱上線，驚心動魄。不僅影響山上的批鬥升級，對全國影響，尤為深遠。批語全文如下：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顯明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目的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

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正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北京中央書記處送來一份毛澤東和列寧有關怎樣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語錄。題目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8月15日為此而作的長達八百多字的批語，題名為《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認為這是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發射一大堆連珠炮彈的機關槍和迫擊炮。至今讀來，還感到聲音何等憤怒：

「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做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傢伙，你們哪裏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於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麼，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相比較，哪一個好一點呢？還有，1958—1959年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1919年、1921年列寧寫那兩篇文

章的時候的情況相較，哪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於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佈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麼樣？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邊的朋友們，都愛好馬列主義，那麼，我建議：將這個集納文件提供全黨討論一次。我想，他們大概不會反對吧？」

當北戴河會議和武昌會議作出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和全國開展公社化運動時，蘇聯的報紙隻字不提，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九國情報局機關刊物也是堅決不刊登後一個決議。當時，蘇聯和東歐各國對我們的公社化運動等顯然有不同看法。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發表演說時，講了一下關於蘇聯當年成立公社的情況，波蘭報紙發表時，刪掉了這一段。蘇聯《真理報》於21日刊登了講演全文，包括這一段話在內。美國的《紐約時報》和國民黨中央社等對此都有反映。《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說：「蘇聯發現，通過公社來走上社會主義化的道路，這種辦法是錯誤的。」赫魯曉夫這番話「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共產黨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說法而言的。中國共產黨人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赫魯曉夫這一段原話如下：「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

們為共產主義奮鬥，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按：俄文「共產主義」和「公社」兩個詞根相同）。』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甚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盡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甚麼成績。於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裏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漸鞏固起來了。」

這個《內參》件是胡喬木7月28日送上去的。毛澤東於8月1日批轉王稼祥，批語中說：「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此件上還向全會各同志寫了以下批語：「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甚麼。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做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問題不在同赫魯曉夫之間的爭論，而在上廬山之前，彭德懷和張聞天都去過東歐，都經過蘇聯，彭德懷還同赫魯曉夫碰過面。「是不是從外國取了經回來了？」這正是討論時，有人射向彭德懷的一枝惡箭。後來回到北京，9月份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就正式變成「裏通外國」的問題了，張聞天在外交系統的批判大會上，也遇到同樣的責難。「裏通外國」，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罪名。

康生是會議中最積極的分子之一。8月3日，他將《斯大林論蘇共黨內的右傾危險》兩份摘錄（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兩個演說）送交毛澤東，「可供我們這次反右傾鬥爭的參考」。他還將列寧引證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議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德文這個字與法文「公社」相當）的話，說，「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以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

斯大林當時同「布哈林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反對派」的分歧，正是在工業發展速度、農村政策以及城鄉結合形式等方面。斯大林認為當時蘇聯面臨的困難，「是高潮過程中的困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困難」。他講了遇見大風浪時漁夫的故事：「一種漁夫，一遇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叫苦連天，使自己隊伍的精神頹廢。」斯大林說：「其實我們中間是有兩條路線的。一條是黨的總路線，是我們黨實行的革命的列寧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線。」如果在黨內「容許右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而這些分子是企圖使黨廢弛，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國建設事業困難面前投降的——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就會是說明甚麼呢？這不就會是說明我們想漸漸消滅革命，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分子麼？布哈林集團是不是懂得，拒絕反右傾鬥爭，就是叛變工人階級、叛變革命呢？」

此件，毛澤東沒有加批語，於8月4日只批「印發各同志」。也可能是對斯大林其人及其當年作為持某種保留態度。但既然印

發了，康生就可以借布哈林來批鬥彭德懷了。他在後來的小組發言中，果然提到布哈林。

這些批語及其文件，真也如同機關槍和迫擊炮一樣，發到參加全會的一百六十多人的手上，至於子彈和炮彈，每個人手裏或多或少都是現成的，還可以互相供給。於是從8月3日到15日，「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那五、六個人），乒乒乓乓地發射起來」！

揭發批判「軍事俱樂部」（上）

8月3日起，按照毛澤東講話精神和常委會定的基調，六個小組進入揭批「軍事俱樂部」的新的階段。4日晚上，聽到常委傳達尤其是林彪的講話之後，當然更深入到「實質性」的問題：「武文合璧」，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地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要按照「右傾機會主義」的面貌改造黨；彭德懷這個人是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歷史上一貫犯錯誤，同毛主席三七開，這次要算歷史總賬。

可是，不少人在揭批那些「實質性」問題之前，還是講了一些心裏話。8月3日第四組（彭德懷在這一組）會上，董必武說，他因事於7月23日回到北京，同陳毅、王稼祥、劉瀾濤幾個同志談過，彭德懷的信只是有幾個論點不大對。下山時，完全沒有意識到有甚麼路線、方針問題，根本沒想到誰對總路線有甚麼動搖。對於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自然不是每個人都感到的，而人們感觸到的只是糧食、蔬菜、副食和某些日用品的緊張。

楊勇說，他8月1日下午才上山。從小參加革命、參加軍隊，就在彭德懷領導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太怕他。對他的思想、工作作風是有意見的。他經常罵人，我在團裏工作時，挨過兩次罵。他同我們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甚麼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去年軍委擴大會議，我指名貼了他的大字報，可是他後來表示，楊勇提意見是善意的。楊勇認為彭德懷有兩大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為功勞大。關於大躍進的看法，楊勇以下意見當時有代表性：大躍進同打仗的道理一樣，不

能沒有傷亡；勝仗越大，傷亡也相對增大。如果對大躍進一大堆批評，對勇敢作戰部隊扣一大堆帽子，這就會瓦解士氣，沒有人再勇敢作戰了。

第四組8月7日的小組會上，李志民說，認識彭德懷三十年了，在他直接領導下有16年。過去對他總的印象是好的，有感情，也有些迷信。以往總是優點看的多，缺點看的少。即令看到一些缺點，也只是認為主要是領導方式簡單生硬，主觀傲慢，以及工作上有些保守。1930年過贛江，三軍團軍師級幹部抵觸情緒嚴重，公開發表反對過江的言論，當時有分裂危險。李志民說，不過最後彭德懷同志講了話，執行了過江的決定。這一次如不參加會議，憑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覺，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的。

張愛萍在第二組，8月5日發言中談到，在彭德懷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外表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橫蠻態度和事務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過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志，也是被他罵的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閒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個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張愛萍還談到過去對黃克誠的看法，也是認為黃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則性，生活的嚴謹、艱苦樸素，這些印象很深。但從這次揭露的問題，才提高認識、提高警惕。

王震也在第四組。發言中也說，彭德懷是有功勞的，在解放戰爭西北戰場時期，他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認他是一個民

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作為一個組來說，只有歐陽欽任組長的第六組在8月3日的會上，批判調子仍是比較平和的。歐陽欽等人的發言，主要介紹會議的情況，沒有提甚麼「軍事俱樂部」，只是一般地批「右傾思想」、「右傾情緒」、「右傾活動」。歐陽欽以組長身份特別提出，小組會的討論內容，最主要是圍繞路線問題討論，以及調整指標的意見；還是要採取交換意見的方式，有甚麼講甚麼，着重分析思想觀點和方法立場問題，應本着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的「團結——批評——團結」的精神來進行。思想批判，要看，也要幫；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會外多互相往來，自由交談。

可是，這些比較客觀、比較公允的發言，是越來越跟整個會議的氣氛不相適應了。更多人的發言可以說是深文周納。例如，在8月3日至6日的《簡報》上，可以看到這樣一些「誅心之論」：

——他反對政治掛帥，第一書記掛帥，並不是對我們的，正是對毛澤東同志的。（按：由於彭德懷在常委會上說，不習慣稱「主席」，毛澤東即讓發通知，一律改稱同志，此後《簡報》即照此辦理。）

——彭德懷同志否定總路線，就是否定中央領導。彭德懷的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就是特殊的還要追究責任。既然領導錯了，路線錯了，就得改組領導。不過這下半句他沒有寫出來罷了。如果他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他就會提出來的。

——彭德懷同志不是在會議上而是在各種場合下，常表示對毛澤東同志不滿，這是一個組織原則問題。

——他們意見書和發言都偏偏強調缺點，加以誇大，無視事實，滿眼黑暗，是甚麼思想意識，從甚麼立場出發的？是不是從

個人有甚麼打算出發來看問題？應該挖挖根子。尤其是彭德懷同志拿匈牙利事件作比，是甚麼思想？

——彭德懷同志拿匈牙利作比是嚴重的，可怕得很。因為他是國防部長，意思就是說：人民起來鬧事，我軍隊就不跟中央，不歸中央了，你們去請紅軍吧。

——彭德懷同志的信，到處是伏筆，它們是惡意的，是反上的惡意。中國革命歷史上，每次大風浪都是毛澤東同志掌舵渡過的。可是現在居然有人對毛澤東同志起不良之心，真不可想像。

——張聞天同志的發言，和香港報紙及右派言論差不多，甚麼「困難」、「緊張」、「毛澤東下台」等等。所不同的是，香港報紙及右派是懷疑，張聞天同志是肯定。

——他們懷有個人野心，企圖按照他們的面貌來改組中央，改組黨，自然也改組軍隊。

——彭德懷同志為甚麼說過去都錯了？實際上是說毛澤東同志錯了，總路線錯了。

——彭德懷同志的信與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是一個向總路線進攻的綱領，他們企圖以這個綱領來代替黨的正確的總路線；他們的鋒芒是直接對着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的團結，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所以，這次黨內的爭論實際上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彭德懷同志與張聞天同志代表着黨內的一小部份具有右傾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動搖分子，與黨外的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彭德懷同志的信，不僅不是倉促寫成，而且是經過周密預謀的，整個矛頭是指向毛澤東同志的。

——意見書是一枝箭，是射向黨中央，射向總路線的。

——彭德懷同志這次出國訪問中，是否向外國同志透露了他自己的觀點，以致赫魯曉夫在波蘭公開講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

對彭德懷，小組會上人們是諸如此類的分析，上綱上線。會外，也有人去做他的工作，啟發他提高認識：為甚麼要寫這封信？這封信是甚麼性質的錯誤？為甚麼總是在緊急關頭都要搞一下？彭德懷急了，說：是不是要逼我承認有甚麼企圖呢？終於他承認：從客觀上看，也可以說影響了一些人，起了拉人下水的作用。

下面從《簡報》上錄出幾則批判彭德懷（和兼批黃克誠）的發言，以見這幾天人們的情緒和會議的氣氛。

賀龍在8月3日第三組會上的發言，開頭就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着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至於張聞天同志，他現在倒說黨內沒民主，怕殺頭，這完全是污蔑。其實他過去搞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蘇區時代不知殺了多少好同志，他講這樣的話難道不感到良心的苛責嗎？彭德懷同志在檢討中，只承認自己是舊軍人出身，是無組織、無紀律，是「犯上」問題。並且說他和毛澤東同志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不過是個調皮的學生。我覺得他這樣的解釋是不好的。他也承認自己是經驗主義，但是看來他的靈魂深處的東西並沒有掏出來。

羅瑞卿在8月3日第五組的討論中說：我記得華北座談會上同志說，彭德懷同志生活上學馮玉祥，觸到了他的痛處，因為這揭發了他的偽君子的一個側面。但是，他確能迷惑一部份人。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得了政治上的慾望）他的政治慾望很大，許多好事都記在自己賬上，壞事都推給人家，就是證明。他是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他的生活、為人很多都是

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又有甚麼用處？羅瑞卿還說：昨天開全會時，我看見了彭德懷同志，我向他說：「華北會議你還不服，我看你怎麼也賴不掉。因為我們批評你的四大錯誤：反對洛川會議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執行王明路線，對群眾運動潑冷水，鬧獨立王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怎樣也抹不掉的。」我又說：「遵義會議以前你反對毛澤東同志，也許還可以說你有認識不清的問題，還可以給予若干原諒，遵義會議以後，一有機會，你還是反，直到現在你還要反，這是為甚麼？」羅瑞卿發言中提到黃克誠：克誠同志剛才講，你同彭有些鬥爭，我相信是真的，你跟彭也有區別。可是剛才你說「偽君子」、「投機」又像又不像，說明你界線還是沒有劃清。你的感情還在彭的方面。在別人發言中，羅瑞卿插話說：歷史上凡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彭德懷同志多半都參加，三成合作有些還是看形勢，搞投機的，有些是合乎他的口味才合作的。

李井泉在8月4日第四組討論中插話說：從這十多天來德懷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我感覺有許多地方不老實，不像是張飛，直言不諱。如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你無數次地說是給毛澤東同志參考的，不準備印出來，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過，是倉促寫成的，聽說快散會了才寫的，犯了急性病等等。事實並非如此，他的意見書是早有準備的，由來已久。同志們想想，我們自己寫一個發言稿，哪一次不是要經過幾天時間的反覆推敲而成的。他自己說過的可能出匈牙利事件，拒絕講歷史問題的話也想否認，昨天還說他保證沒有同任何人有私人聯繫。這些都是不老實的地方。現在來看，可以說德懷同志這次向黨進攻，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信中有很多暗語。有的同志說他拙於暴露自己，實際上不見得。（蕭華插話：

他是敢於暴露人家，不暴露自己，兩面手法。）（康生插話：華北會議批評他個人野心，把黨看成是股份公司，他當股東，他還不服。）

當蘇振華發言說彭德懷認為時機到了，乘機向黨進攻時，李井泉插話：是不是洋人的影響？對他有支持和促進的作用？在他出國期間，恰巧我們的外國朋友對人民公社有意見，對大躍進有的懷疑，有的惋惜，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蕭華插話：他這也是「拿來主義」。這次是總暴露，沒有意見書，他這次還可能溜掉的。）

黃永勝在8月4日下午第一組會上也作了長篇發言，揭發彭德懷在軍隊系統的錯誤，包括「軍閥主義」、「目中無人」、「個人主義」等等。他說：從歷史上看，我對他能夠徹底改正錯誤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彭德懷同志歷次犯錯誤都沒有下決心改正，直到這次會議，他於7月3日上午在西北小組發言中只承認四個錯誤（百團大戰還說沒有作結論），其他各次路線錯誤一字未提。這次也有可能同以往一樣，看形勢不對，就隱蔽退卻，待機再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帶着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另外，洛甫同志的發言惡毒極了。他不僅把彭德懷同志的反黨綱領更有系統地加以發揮，特別是把毛澤東同志的很多話加以歪曲，拿來攻擊毛澤東同志。洛甫同志應該捫心自問，你對中國革命做了多少好事？我看好事做得不多，壞事倒做得不少。你對黨、對人民欠了很多的債。

蘇振華在8月4日第四組會上的發言中總結了四個特點：這次以彭德懷同志為主帥、張聞天同志為副帥發動的向黨的猖狂進攻和分裂黨的活動，我認為有這麼幾個特點：（1）軍人掛帥，文人當軍師，明目張膽地發表反黨的政治綱領；（2）鋒芒是直接對着黨的總路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3）教條主義與經

驗主義重新結合，捲土重來，但主帥是經驗主義者；（4）選擇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大有猖狂進攻之勢的時候，也就是在黨遇到暫時的、局部的困難的時候，進行反黨分裂活動。

蘇振華還說：彭德懷同志長期把自己裝成一個君子，在軍隊和部份群眾中是有一定影響的；同時，黨的威信、毛澤東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徹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質，不把他偽君子的畫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份人的。（蕭華插話：直到現在，我們軍隊裏還有一些人怕鬼，怕將來工作不好做，怕抓小辮子。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還怕鬼，是值得注意的。怕甚麼？有鬼就捉它嘛。）

張平化8月5日在第一組會上說：這次事件，彭德懷同志是主帥，黃克誠、張聞天兩同志是兩相，興師動眾，向着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猖狂進攻，這是一次非常惡毒的篡黨陰謀。毛澤東同志說過，對這次事件「不要估計過高，也不要估計過低」。是的，我們不要估計過高，黨不會翻船，垮不了，保衛總路線、保衛黨中央、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分裂的鬥爭一定會勝利。可能「因禍得福」，把壞事變成好事。但也不能估計過低，如看不到篡黨陰謀的危害性，不堅決揭露和粉碎這種陰謀，對重病不下重藥，不改造這些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分子，而照樣地把他們留在黨內，留在黨中央，並且讓他們繼續掌握軍權，後患如何，就很值得警惕。篡黨，要有資本，沒有資本不行。彭入黨31年，31年他積累了點資本。他入黨後，凡有錯誤路線，他都要跟着走一段，而且走得相當遠。為甚麼要跟着走？因為，一方面他要反對毛澤東同志，另一方面是自己資本不足，所以他就借立三的資本，兩次借王明的資本，借高饒的資本（有人插話：貸款），跟着幹，幹好了，有我一股，幹不好，就「見機而作」。見形勢不

好，就轉過來；他不是從思想上轉，而是突如其來地轉。（有人插話：如同申公豹，身子轉過來了，腦袋沒轉過來。）這一次，他自以為資本雄厚了，看到目前的「行市」還不錯，國內外、黨內外議論紛紛，於是就發出他的廣告：「意見書」是第一張廣告。發出後再看看行市的情況，在適當時機，再採取第二、第三步驟。他這次反黨是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軍事俱樂部加上武文合璧，不但有共同的綱領，而且有紀律的約束，如黃克誠同志對彭的活動一直向黨保守秘密。黃對彭的情況是了解的，彭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具體事實知道很多，但未向中央報告）、有活動、有目的。

在毛澤東定下「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口徑之後，人們一般都不談對彭德懷等人的組織處理問題。只有張平化的這次發言，提出了「把他們留在黨內」的「後患」問題，似乎是處理也必須從嚴了。廬山會議之後，張平化就接替被罷黜的周小舟，出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了。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會上發言：對彭德懷同志，我過去不大熟悉。近幾年來，從參加中央一些會議接觸到的和聽到的，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牢騷話不少，情緒不正常。我幾次聽他說，他要辭國防部長的職，說他自己年過60，該退休回家種田了。為甚麼要辭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辭職不是真的，發洩牢騷才是真的。他對毛澤東同志服不服？這回我第一次和黃克誠同志談話，他說彭對主席的領導服是服了，就是還有點成見，這顯然是為彭打掩護的說法，我看他根本沒有服，而且發展到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同志咬牙切齒。你看他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甚麼認識過遲，說甚麼打金門與平定西藏叛亂得心應手，搞鋼鐵得不償失，頭腦發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左」比右難於糾正等，顯然是對着毛澤東

同志說的。這不過是公開放的箭，在背後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現在看來，他經常說的辭職的一類話，只不過是放空氣、向中央「示威」而已。

陶鑄說：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總是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同志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難道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時期有民主嗎？教條主義錯誤那樣嚴重，根本批評不得，說他一下，動輒撤職，開除黨籍，甚至把你當做反革命殺掉。反過來看，自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之後，黨內民主又是怎樣？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制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的民主有了充份的保證。

陶鑄說：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在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幹。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那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所希望的匈牙利事件，不是今年才開始有的。我記得二中全會（1956年底）時，他在會上說過，搞得不好，我們也會出匈牙利事件。當時我們小組討論中多數同志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與群眾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我們的解放軍是極為鞏固、強大的，所有這些，就使得我國不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當然部份地區出些小亂子是可能的。彭德懷同志說這種話，當時只覺得是偏激之詞，現在看來不是偶然的，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

陶鑄還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毛澤東同志講十個元帥九個不合作，十個大將也是九個不合作，我看原因就在這裏。彭德懷同志的為人

就是這樣：從他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陶鑄發言最後提到了黃克誠。他說：對黃克誠同志，我過去一直認為這個人還好，比較耿直，敢於與黨內的不良現象作鬥爭，只是覺得他看陰暗面多一點，強調困難多一點，意思上右一些。在主席講話前，我還說過對他有好感的話，現在看來，這是我看人不深的錯誤。毛澤東同志講話後，他找我談過話，我深深感到他與彭的關係很深，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是「父子關係」，在思想上反對總路線的立場、觀點，我認為和彭是一致的。像我這樣對黃克誠同志為人有錯誤認識的同志不少，我們小組需要很好揭露黃克誠同志的問題，不要受其迷惑。

陳正人在8月6日第五組的討論中說：我對黃克誠同志過去的印象是好的。但從高崗反黨事件揭露以後，沒有聽他作過自我批評，我的看法就有不同了。這次他又是反黨的軍事俱樂部的一個重要人物，說明黃克誠同志的黨性是大有問題的。我認為黃克誠同志現在有三道防線。第一道是不承認有甚麼大錯誤，現在第一道已破了，戴了一些帽子，但不多講事實，說明對黨還不忠誠。第二道是如果講事實，只是講過去的，而且是人們已經知道的，今天上午講的一些都是《簡報》上的材料。第三道是這次反黨的軍事俱樂部，卻閉口不談。你說跟彭德懷同志的反黨活動毫無關係，是講不過去的。為甚麼一上廬山第三天，就大講一套，而且和彭德懷同志基本一樣呢？

羅瑞卿在8月6日第五組會上給黃克誠提了幾個問題？（1）彭同中央、毛澤東同志只有三分合作（三分合作有些還是投機）、七分不合作，你的看法怎樣？發言時沒有明確回答，可否明確回答一下？（黃克誠說：我同意三七開，彭講對半開，我給他說是三七開）（2）偽君子 and 投機問題，那天你講又像又

不像，為甚麼這次不講？講明確一點吧，不要躲躲閃閃，羞羞答答，不痛快。羅瑞卿接着說：黃克誠同志17日上山，19日第一次參加小組會，第一個發言就明確得很。為甚麼這次他批評彭就這樣不明確？我不相信你和彭的觀點彼此都是孤立的，互不影響。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是第一顆炸彈，黃克誠同志在19日小組會上的發言是第二顆炸彈，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是第三顆炸彈。譚震林於是說：你說你看彭的信沒看出問題來，事先我給你講過，但你第二天還是講了那麼一大篇，你有甚麼野心？說彭德懷同志是野心家，你黃克誠不是？我不相信。

這裏要着重講一下康生其人在廬山的情況。小組會上，此人不只是長篇大論地發言，而且常常在別人發言的時候插話，他的插話，即使只不過三言兩語，也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例如，當有人說彭德懷在歷史上有過偉大功勞，康生就插話：「正因為有功勞，自己不服才更危險。」有人說張聞天是幸災樂禍，康生就插話：「我看德懷同志也不是憂心如焚。」當有人提到軍委開會時彭德懷拍桌子罵人，康生就插話：「他不是要民主嗎？」當有人提到彭德懷說過「陳雲對經濟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就插話：「他先講一套缺點，然後慨歎：現在看來還是陳雲對經濟工作摸得深。他這話不是拿陳雲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澤東同志不行，這是挑撥。」當有人講到彭目空一切，瞧不起人，康生插話：「他以反毛澤東同志為榮。」當王震說他承認彭德懷是一個民族英雄時，康生插話：「對民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英雄豪傑，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領袖毛澤東同志是可以領導的。如果不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下，也是不能成為民族英雄的。」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組作更長篇發言。他擺出理論權威的架勢，一開頭就講經濟學，講聯共黨史。極有深心的是，他把彭德懷、

張聞天和布哈林相提並論。他說：「蘇聯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出了布哈林右派，我們勝利十年後出了彭、張右傾路線。我們現在的情況、條件、環境與蘇聯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問題，也是工業發展速度與農村集體化生產的問題。」前述康生把當年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兩篇文章摘錄了幾段，送給毛主席，說是「可供我們這次反右傾鬥爭的參考」。斯大林說：「正因為我國所有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停頓過程的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應當有甚麼特別的危險。」「為了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破右傾危險。」「機會主義者的慣用手段，就是藉口說在實行正確政策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這些話，康生當然認為當時毛主席是必定聽得進去的。在小組會的長篇發言中，康生也講斯大林的這些意見，也引葉尼塞河上的漁夫為例，說在大風浪中不要灰心喪氣，而要鼓足幹勁勇往直前。斯大林講到了機會主義者想用機會主義路線代替正確路線；康生也說彭德懷和張聞天，「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令人很懷疑」。因為彭信中提出要「明辨是非」，「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張聞天的發言說「擋住了『共產風』的人，現在證明是有的。」《簡報》刊出記錄稿上加的這兩處着重號，可以看出康生的深心：「一般的」不追究，個別的還是要追究，可以解釋為要追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現在證明」的，是已經有了比毛澤東更正確的人物了。這樣掀風鼓浪的發言，對大家有怎樣的刺激作用，就不必說了。

8月4日，康生在小組會上又大談了一通理論：我談點經驗主義的問題。經驗，是個好名詞。我們不是也說建設中有缺點是缺乏經驗嗎？照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經驗」是包括人們社會實踐的全部總和，人們對於客觀存在是通過感覺來認識的，但是客

觀存在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對於經驗的看法，一種是唯物的，一種是唯心的。唯心主義者認為一切事物是通過我的經驗而存在。他們認為環境與自我、非我與自我是不可分離的，必須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如果客觀存在離開了感覺，或者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不可知。不是存在第一，而是自我第一，客觀存在成了第二性的。哲學史上有唯物主義經驗論和唯心主義經驗論。不是經驗不好，而是你用甚麼世界觀去看經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既反對唯心主義的經驗論、唯我論，也排除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義經驗論者的輕視科學理論的片面性；既認為感性經驗是一切認識的基礎，也承認「理性認識」的重大作用；既重視實踐，也重視理論，並把二者統一起來。我看這次彭、張提出的反黨文件，很清楚是有個人目的的。為甚麼只喜歡缺點而不喜歡優點？這是從他們的世界觀出發。彭德懷同志的經驗主義，其實質就是唯我主義。他們心裏想：你們過去整我，這次你們可犯了錯誤，報復的時機已來到了，利用廬山會議，要狠狠地進攻。他們把一切事物都集中在唯我這一點上。唯我獨尊，就是唯我主義。彭德懷同志要先把自我與右傾路線錯誤分開，把錯誤當做客觀存在，把個人問題丟開。希望你先別想國防部長、軍委委員等個人得失，先想如果照彭、張的右傾錯誤路線搞下去，中國會成甚麼樣子，對社會主義會有多大害處？康生這番講話，為批判彭、張的理由塗了一層所謂「理論」色彩，也確有些唬人。

8月6日上午，彭德懷在第四組會上作檢討。下午，康生又作長篇發言，咄咄逼人地提出六個問題，要求彭德懷答覆：

(1) 彭德懷同志在小組會上說過：你不滿意毛澤東同志在上海會議時對你的批評，對毛澤東同志說要掛帥，你也不滿意，你認為說要掛帥，就似乎是丟開了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這樣嚴重的錯誤，為何今天檢討時不講？另外，你在小組會上，還說過

毛澤東同志在上海會議的講話，似乎是「挑撥」。這到底是甚麼意思？請你一併考慮答覆。

(2) 彭德懷同志說：出國回來之後，約有半月時間，看了許多情況緊張、工作缺點的材料。這證明了毛澤東同志說的，你這次反黨活動，是有準備的。你對這一點是否同意？

(3) 你說來廬山開會後，覺得小組會上沒有展開批評錯誤，而「會內會外空氣又不一樣」，你在西北小組會上的插話，又得不到反映等等，所以才寫了7月14日的信，這證明毛澤東同志所講的，你這次反黨是有計劃的。你對這一點，如何看法，請答覆。

(4) 彭德懷同志說，你信中所謂被虛報蒙蔽因而不了解實際情況；認為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了，可以放手搞工業；只給指標，沒有具體措施；這些都是針對毛澤東同志說的。同時你又聲明說，關於處理經濟問題不如金門打炮、西藏平叛那樣「得心應手」，不是指的毛澤東同志。我們認為這句話恰恰是針對着毛澤東同志的。我們暫且不去爭辯這個問題。即使就你所承認的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你這次右傾反黨活動是有目的的。彭德懷同志如何看法？

(5) 毛澤東同志還說過，你們這次反黨活動是有組織的。
(李井泉插話：彭德懷同志講，有人擁護他的信，幫他把「主觀主義片面性」改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幫了倒忙。但沒有講下文，是誰幫了忙？彭德懷說：是我自己改的。旁邊有人說，我們都聽見你講過有人幫忙的話。彭德懷說：我是講意見書寫成後找人看。)我聽得很清楚，你是說，擁護你的人幫了倒忙，如井泉同志所說的一樣。因此，請問你事先到底是否與別人商量過、談過、修改過？你是否承認這次反黨活動是有組織的？請你考慮答覆。

(6) 前幾天，我們說你拒絕了檢討歷史根源的要求，你堅決聲辯沒有拒絕。今天你承認拒絕過，而且是有反感的。這使人覺得你對同志是不誠實的。蕭勁光同志和我們一致認為你是一個像饒漱石那樣的「偽君子」，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你對這種看法，認為如何？康生說，我要開門見山地說：你是將許多根本的問題劃定了一個防線，現在自己不想也還不願別人幫助將最痛的地方突破。康生提完問題之後，進一步就彭德懷檢討中所談的歷史部份、這次反黨錯誤部份、思想部份這三個方面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深文周納，「分析批判」。

第四組大概是火力最旺盛的一個組。及今回顧，那種激烈場面，人聲鼎沸，我自己心顫不已，實難以淡忘。彭德懷同大家已經對話、對抗多天。7日下午第四組開會中，彭德懷同批判他的與會者發生了正面衝突。

康生：上午彭德懷同志說我們有片面性，斷章取義，我們大家不同意。如果說有缺點，就是沒有抓緊對你的批判和質問。請問彭德懷同志：「計委雖有安排，但因種種原因難於決斷」，作何解釋？對賈拓夫同志說：「一方面批評你們，一方面支持了你們」，又作如何交代？（賈拓夫就在第四組，他被迫作了許多交代，連去過彭家幾次，彭送過他一個照相機這樣的事，都如實講清楚。）

彭德懷：「難於決斷」，我是指李富春同志說的，計委雖然作了許多努力，但富春同志（我說他是好人）抓不緊，抓不穩，各部門情況不同，一下又不好決定問題。

康生：那麼說這不是講毛澤東同志？

彭德懷：是的，我對計委工作不滿意，它們沒有做好綜合平衡的工作，我那個提法是告計委的狀！講毛澤東同志的也有。糧食產量是否有那樣多？我那封信是13日晚上寫的，很倉促，我那

封信是講錯了的，但當時沒有考慮周到。

彭德懷接着說：我在西北小組講糧食去年增產30%是肯定的，「一面批評，一面是支持」，也不是要刺毛澤東同志。我說過不唱《東方紅》，那是在常委會上提出的。在朝鮮我也和金日成同志說過，不要修「毛澤東廣場」。難道我還不清楚，毛澤東同志不僅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而且是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領袖嗎？毛澤東同志一再反對人家歌頌他，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也曾就這些問題作過決議，這一點，我們都清楚嘛！現在，如果把毛澤東趕走，我上台，你們能舉手嗎？

康生、李井泉：你並沒有回答對你的意見書中我們提出的問題。

彭德懷：在這封信裏，我並不是攻擊毛澤東同志！

康生：你堅持你的看法，我們保留我們的看法。很明顯麼。這還騙得了人？我問你，你那封信是否給人看過？

彭德懷：給小參謀抄過。

李井泉：你不是說，贊成你的人，看了你的信，給你幫了倒忙嗎？

彭德懷：我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我可不能那麼講。

康生：我們也不這麼天真，你騙人也不行！

（與會者指責彭德懷，為甚麼發脾氣？）

彭德懷：我的信沒有說清楚。第一部份講工業，把對地方的意見也寫了進去，沒有罵毛澤東同志的意思。我承認，這封信總的方面是錯的。發脾氣是不對的，請原諒我這一點。

李井泉：信到底如何產生的？

有人問：你前天明明說，有人看了改了，為甚麼今天又矢口否認呢？

李井泉：大家都聽見了嘛！那時感覺你還老實一點，怎麼今天連說過的，也不承認了？

彭德懷：我沒有律師辯護，你們像法庭審判。

安子文：你鬥爭我們的時候，暴跳如雷，大家好心好意地問你，你竟說是審判，講不講理？

康生：一方面說是這次會議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現在又說成是法庭審判，這是一種甚麼樣的心理狀態？

眾：為甚麼如此態度？

彭德懷：我，說錯了！你們這樣問，我不好答覆嘛！

康生：我們問你：

(1) 信是如何產生的？

(2) 講講和高饒的關係；

(3) 出國時講過哪些關於人民公社的話？你按實講就是嘛！

彭德懷：在國外沒有談過甚麼公社問題，在阿爾巴尼亞會過兩次赫魯曉夫，只談了些阿爾巴尼亞的重要性和建立基地問題。在羅馬尼亞會過崔庸健，談過10分鐘，係拜會性質。在羅、保都談過一些農業問題，他們都說要向中國學習……這些問題回來我向常委會匯報了。

蘇振華：你說你保證同軍隊中沒有任何個人關係，是不是都是一視同仁？

彭德懷：工作關係是有的……私人關係沒有。……

……

賀龍：有些歷史問題，不講也算了，請彭德懷同志談談和高饒關係問題，交代一下那封信的問題。

李井泉：請彭德懷同志就賀龍同志說的兩個問題加以考慮，老老實實地向黨交心。德懷同志今天小組會的態度是不好的。要

端正態度。

8月9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着唸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

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李井泉：有同志提出四個問題，請彭德懷同志考慮：

（1）你與黃克誠在高饒問題上，有不可避免的聯繫，請說明。

（2）那封信究竟誰幫了倒忙，請答覆一下。

（3）你說毛澤東同志個人說了算，是指的甚麼問題？

彭德懷：我作過兩次書面檢討了，我還要再作一次，你們不同意，我再搞一次。我要搞深一點，搞乾淨一點。這樣的小組會上，你一句，他一句，有點氣憤，有些事我又沒有考慮，一時想不起來。

李井泉：請彭德懷同志說明與幹部拉拉扯扯的關係。

揭發批判「軍事俱樂部」(下)

不只是對彭德懷和張聞天，就是對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康生也不放過。8月6日彭德懷在小組會上作檢查，講到他同高崗關係的時候，說「高崗到朝鮮去了兩次，談到彭真，對延安審幹有意見」。康生就插話：「彭真同志在延安審幹是正確的，高崗想利用這個口號打擊彭真同志，利用一些對延安審幹不滿的人，團結起來反對彭真同志，李銳就是一個。」康生在延安就說我有殺父之仇，此刻仍繼續造謠。就在8月6日這一天，我在小組作檢討時，外組的一位同志走進來，指着我說：這個湖南老鄉的歷史要審查一下，他的家庭有被鎮壓的，延安坐過牢，高崗把他從熱河帶到東北去。因此，我不得不寫一封信辯誣。我聲明：（1）我的家庭。共四口人，母親，兩個姐姐，均健在。從我出生不久直到高中畢業，四人都在長沙。二姐是1938年黨員，大姐是中學教員，同情分子。兩個姐夫是黨員。我的父親是老同盟會員，1922年病逝以前是孫中山一派的國會議員，與李六如、方維夏是好朋友。我在延安被審查時，就有人說父親是被紅軍殺掉的，當即由李六如作證澄清。（2）我在延安被審查情況。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我在保安處被審查，原因是有人誣告，有一時弄不清楚的歷史上的問題。做了沒有政治問題的結論之後（還由於周恩來同志的關心），1944年6月釋放，仍返《解放日報》工作。我是當時保安處幾百人中最早放出來的一個。我對黨從沒有埋怨情緒。（3）我同高崗的關係。1947年秋高崗到熱河。我當時管報社，同他接觸較多，替他整理過報告，並被派到農村去了解情

況。1948年他回東北，我同車一起走，是為了看愛人和小孩。後來他留我做政治秘書，同住在一起。接觸多了，覺得他對幹部有打有拉，工作不負責，靠左右去做，根本不學習，生活腐化，覺得此人不好，甚至有可怕的印象。留了半年多，堅決要求離開。瀋陽解放時，我就隨陳雲同志參加接管瀋陽的工作了。康生的插話是登在《簡報》上的，因此我要求《簡報》上登一個更正，刪去「李銳就是一個」這句話。這時，我已被劃入「軍事俱樂部」，是要打擊的對象，當然不會聽取我要求更正的請求了。

形勢已經是動員全體與會者揭批「軍事俱樂部」了，人人表態，萬箭齊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都在小組會上作了檢查，周惠和我也作了檢查。開始，都不承認有一個甚麼「軍事俱樂部」。大家如實說明了這幾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於對形勢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這也不是有意串連的結果。黃克誠在小組會上甚至很激動地說：把他說成是彭德懷的走狗，砍了他的頭也不承認。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找他個別談了話，他終於禁不起大家的耐心幫助，最後還是承認了「我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廬山軍事俱樂部的重要一員，絕不是偶然的」。他甚至還承認了「我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對周小舟、李銳等同志有較深的影響。……他們捲入軍事俱樂部，實際上我是起了橋樑作用的」。黃克誠在檢討中，不止一次說了「不管我主觀願望如何」這話，表明他的過頭的檢查是言不由衷的。

張聞天與黃克誠一樣，在檢討中幾次說過「不管主觀怎麼想」這類話，他甚至這樣說：「第一次檢討說是動搖，同志們說，這樣檢討還不夠，這是反黨反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我想了很久，主觀上是沒有這樣想的。後來想，光從主觀說是不夠的，我開始感到同志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後來想」是批判、逼迫的結果。從他檢討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不承

認有甚麼「軍事俱樂部」，只是思想上有共同點罷了。比如，他說：「過去我同彭德懷同志是很少來往的。武漢會議、上海會議很少見面。在工作中也沒有甚麼聯繫。在北京時，有時在中南海見到，沒有談甚麼。……到廬山，開始是神仙會，遊山玩水。中央發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唸了社會主義部份，後來會議快結束時，他說對缺點、總結缺點的經驗談得不夠，應該強調一下，以便引起注意。這方面是有過些交談。來往也就多了一些。但也是飯前飯後，時間不長。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後，大約到25日止，我同彭德懷同志又談過兩次。以後問題嚴重了，就沒有來往了。」張聞天這番同彭關係的「交代」，細細一體味，是否定所謂「軍事俱樂部」的說法的。即使是「有限的來往」，張聞天也坦誠地說清了原因：「為甚麼同他來往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點：感到為甚麼不能講缺點，感到總結缺點經驗談得少了，希望把缺點的經驗談得深刻一點，以後可以不犯。這個思想有共同點。」解釋原因的這番話，同樣是對着「軍事俱樂部」這頂帽子去的。

周小舟也是這樣。他在小組會上作檢討，開始只承認「實際上起着給彭德懷同志提供材料的作用。我和我的觀點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接着還要撇開一筆：「當然，他的另外一套東西是與我無關的。」經過十多天的幫助，他終於承認了「我陷入了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成為這個集團的成員之一」。要他承認這一點，真是痛苦不堪的事。8月13日他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推論結果，我必然是反黨、反中央、反主席的俱樂部成員之一，同時我有許多右傾思想和觀點，推論結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結論。……而解剖我們自己，披肝瀝膽，又感覺與實際情況確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這樣兩頂帽子，我對主席、中央、全黨、湖南黨員和人民，甚至對自己的老

婆和孩子，都必須說我犯了反黨、反中央、反主席、反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兩條錯誤，然後再說下去，勢必淚潛潛下，不盡欲言。」這一篇聲淚俱下的陳情表，並沒有能夠感動毛澤東。由於小舟這封信中反映了我同田家英、胡喬木等接觸的情況，毛澤東在這上面批的是：「印發各同志。全篇挑撥離間，主要是要把幾個秀才劃進他們的圈子裏去，並且挑撥中央內部。」

惟有「軍事俱樂部」的當然領袖彭德懷，卻始終不承認有這樣一個「俱樂部」，甚至對於那些「批判」也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可舉出8月4日下午第四組會上的一段對話：

彭德懷：我不喜歡李白的詩，喜歡杜甫的詩。（他應當知道毛澤東喜歡李白，而不喜歡杜甫的詩，是否以此說明他是不喜歡浪漫主義的呢？）我有我一些看法，我還是要革命的。人家鬥我我受得住。你鬥，不開除黨籍和殺頭就行。就是撤職、開除黨籍，我可以勞動生產。

蘇振華：百團大戰的後果應該想一想。

彭德懷：過去沒有了解到中國戰爭的規律性。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農村包圍城市的問題，沒有解決。

李井泉：彭德懷同志不老實，總是講你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是不準備印出的，是倉促寫的。那信決不是13日晚上寫、14日完稿的，許多材料在腦子裏積累了很久。（彭德懷：這是真的，參考消息裝得太多了。毛澤東同志講，參考消息不可不看，不可盡看。）因此，你的信是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寫的。彭德懷同志講三種可能性，說要革命，只要不殺頭，也不會自殺，開除黨籍，還可勞動生產，我是不贊成的。因為這不是積極的態度。

彭德懷：這是過去說的。

康生：我懷疑。這是一種向中央的對抗，完全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勸彭德懷同志嚴肅對待這個問題。我想起延安整風、華北會議，你經常說不會當反革命。當時我是社會部長，對我刺激很大，誰想你會當反革命？這完全是造謠的手段，來拒絕自己改正錯誤。

有人說：今天是中央委員會開會，是不是對中央全會不信任？

康生：毛澤東同志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小組也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精神進行批評。我們的批評只有不足，沒有過份。你這樣提法是企圖堵着別人的嘴，使人不敢講話。你的想法影響你進步，越走越遠，很危險的。

李井泉：彭德懷同志還是從個人出發來看黨對他們的態度，設想自己會撤職、開除黨籍、坐牢，勢必使自己對治自己的病放鬆，馬馬虎虎地過去。你為甚麼翻來覆去有那麼多的錯誤，這應當從社會根源、思想根源去尋找，這是客觀存在，犯錯誤的原因應從這方面找起。為甚麼犯了一次又一次，華北會議四十多天沒解決問題，原因也在這裏。

彭德懷：去年人大大會後，政治局幾個同志在一起，我提出不當國防部長，毛澤東同志說：現在備案，以後不准提。這次是前幾天我向毛澤東同志提出的。

康生：你的思想總是從個人打算出發，當你犯路線錯誤的時候，不徹底地檢討錯誤，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到底是何動機？

彭德懷：我的這封信是路線問題，發下去像刺猥一樣，傷很多人，傷群眾、傷毛澤東同志。只是一封信，如打仗要流血的。

李井泉：我們對你確實是好意，沒有個人恩怨，沒有報復的目的。這叫過五關，五次了，你應當忍痛過去。

彭德懷：我沒有那樣想，那樣想就不來開會了。

彭德懷在八中全會上發言，雖然也說了「這次錯誤的嚴重性，還因為它不是我一個人的偶然錯誤，而是一種有準備、有組織的行動。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軍事俱樂部』，就是發動這次進攻的『司令部』」。但這只是在高壓之下不得已的表態，完全是言不由衷的。他接着說俱樂部的「具體事實，就表現在我和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關係上」。從他敘述的這些具體事實中，人們實在得不一個有組織的「俱樂部」的印象。如果說，在廬山，他還這麼應付了一兩句，那麼，在緊接廬山會議後北京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就完全不能接受「軍事俱樂部」這個提法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有人逼他老實交代「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他火了，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後來，彭說過自己的心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作，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着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甚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作，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為了動員有關的人出來揭發彭德懷，會內會外都有人做工作。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

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這種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於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為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甚麼事不能做呢？

批判升級之後，我受到的壓力也隨之升級了。3日下午的小組會上，一開始組長就要我對上次會上所提的意見作交代。我還很糾纏，「思想不通」，說：去年大躍進，最根本的是解決了速度問題，沒有群眾的發動，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速度。我從來是這樣看法。

有人說：我承認你講過速度問題，但是你舉例說湖南小高爐得不償失，人民公社發展快了。

有人說：李銳對速度是懷疑的，你現在說是解決了速度問題，實際上你談的「出軌」、比例失調、數量與質量等等，都是在實際上懷疑發展速度。

我解釋說，第一次發言我談了許多正面問題。曾以電力的發展為例，八大規定的指標今年就接近完成了。認為總的速度至少可比八大的指標快一倍。當然，我也說了，去年對一些過高的指標，我一直是有懷疑的。

關於「以鋼為綱」口號，我說，在武昌會議時，我同別人談過；沒有這口號，群眾不能發動，但這口號不完整。鋼容易上去，小土群容易上去，機械可是難辦，問題多。在廬山，我在小組會上談過，今後以不用「以鋼為綱」口號為好。對「1070」我也想過，以為少一點，例如800萬噸，可能情況會好些。我認為這並不是對大辦鋼鐵持否定態度。

我談到，今年五、六月間到四川、貴州、廣西、湖南等地，看到的農村情況是好的。只是聯繫到本部門工作的情況，感到有

些緊張。上山前腦子裏裝了許多問題，例如哈爾濱電機廠由於讓路，積壓各種成品半成品8,000萬元，而全廠資財總值為1.1億元。比例問題，平衡問題等等，腦子裏裝得多些。

有人問我：你說廬山會議不讓講缺點，對講缺點有壓力，究竟怎樣想的？

我說：我是從這一件具體事來說的。田家英在小組會上談到他在四川所見到的公社工作中的缺點，被組長批評了兩次，有一次批評得還很嚴厲。

有人問：你是代表田家英講話？

我答：這樣說也可以。

有人問：你去年對中央的方針實際上是懷疑的，是不是這樣？你必須從思想上真正弄清楚。

一下午的對話，我沒有來得及回答大家的所有批評和問題。第二天上午接着開小組會，我說，上山時，思想是混亂的，對總路線的看法有矛盾。在具體工作中遇到一堆具體的問題，如指標過高，屢次下降，造成被動。對冶金部的意見多些，感到一機部的困難很多；但實際上對冶金部的情況並不清楚，冶金部也有困難，擔子重。昨天我講過1,070萬噸是否少一點為好？我對「以鋼為綱」口號是有懷疑的。至於浮誇風氣，在自己的工作中感到並不那麼嚴重。上山後，聽到這方面一些事情。對綜合平衡，比例速度，認為應當有個框框；沒有想到，總路線的執行只有一年，到底應當有個甚麼速度，還要在繼續貫徹總路線的過程中來解決。但總感到速度應當有個框框，否則計劃不好安排。

關於質量與數量的問題，在第一次發言中，有一個想法：總認為質量、品種、規格不解決，有數量也不完全解決問題，這是從我親身工作中體會到的。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我的腦子裏還沒有全部解決。算小賬的思想很多。離開北京時，聽說由於去

年計劃幾次變動，產品不成套，暫時不能使用的產品，所費材料上百萬噸。這些問題在我腦子裏很混亂，很矛盾。上山時，希望在這次會議上得到解決。鶴壽同志對毛澤東同志說過，當前有鬆勁危險，我是毫無所感的。對幾個月來各省的同志向群眾、向黨內作了多次檢討，我也沒有去了解。去年「以鋼為綱」，1,100萬噸，幾千萬人上陣，解決了大躍進的速度問題，推動了全黨辦經濟，管工業，推動了公社的發展，地方工業的發展，小土群推動了小洋群的發展。這些道理過去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在思想上被那一堆問題、缺點擠下來了，因此我就不像到會的絕大多數同志一樣，站在幾億人民的立場上、總路線的立場上，從繼續鼓足幹勁方面來看問題，而是站在總路線的外頭，對一些已經解決或正在解決的問題，還指手畫腳加以指責。在這樣一個右傾思想抬頭，向黨進攻的緊急關頭，自己動搖起來，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去了。

接着談了同周小舟、周惠的關係問題：南下到湖南後，周小舟同志是宣傳部長，我是副部長；後來他去湘西了，我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同志1940年在延安時就熟的。我們開始都在中南小組。我去小舟那裏打過麻將，扯過談，主要是談些湖南情況。「插紅旗、插白旗」的問題，是小舟跟我說的。插白旗的省糧食多些，插紅旗的省倒少些。小舟談過，去年冬天，鄭州會議之後，關於糧食問題，他同王任重同志有過爭論，要麼你是官僚主義，要麼我是官僚主義，一個估產高些，一個估產低些。當時毛澤東同志也在場，也談過高指標是上面壓下來的。還有密植問題，四川較密，湖南較稀。在會議過程中，也談過有壓力的問題。這一點，田家英同志在四川的經歷以及同李井泉同志的爭論和受到嚴厲批評，使我產生這種感覺。關於7月11日、17日，毛主席找我們談過兩次話的情況，為了避免受到「歪曲毛主席意

圖」的指責，我是這樣分析和說明的：毛澤東同志發現我們的情緒不正常，因而鼓勵我們講話，實際上就是讓我們思想上的牛鬼蛇神放出來。我承認，第一次的發言有怨氣，情緒是根本不對的。對已經解決的問題，對冶金部、對計委、對華東600萬噸大加指責，這與整個會議精神是不對頭的。

於是就有許多人插話：毛澤東同志說牛鬼蛇神（實際上毛澤東並沒有說），你恐怕有，有就講出來，要講徹底些等等。

我繼續說：講一下對彭德懷同志的信的意見。我對彭德懷同志是一般的認識，在延安有過一次接觸，為《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去楊家嶺找過他。當時他問起我本人的一些情況，因我剛從保安處放出來不久。記得他講過一句話：「光榮的孤立是很難的」，印象很深。去年去廣州開會，在漢口時與彭在一個地方住，晚飯後和他一起散步，我並沒有提起在延安找過他之事，他問起我哪兒人，我說是平江人，他就講了平江暴動的經過。我與彭德懷同志單獨接觸就這兩次。在我的感覺中，彭有樸素英雄的印象。對彭的歷史只曉得百團大戰的事。對彭的信，接到後，曾在兩個地方閒談過，同田家英談，他們是覺得信有問題的。說彭偉大是在周小舟處講的，旁邊有人聽到。意思是彭將問題尖銳提出，覺得總的精神是好意。只是覺得這信詞句上提法上有些地方不妥當。主要是信中有不少與自己思想共鳴的東西。如雖不同意浮誇風吹遍各部門，但覺得去年浮誇風是一個問題，去年有些東西是「左」了，對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具體領導，也覺得是個問題。如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還沒有很好解決，以及應當系統總結經驗。我的第一次發言，只講了彭德懷的信作為對立面提出，引起深入討論，精神是好的，內容上有些問題。說彭偉大，說我基本同意此信，是後來作檢討，暴露自己思想時提出來的。

接着談同黃克誠同志的關係。黃是南下後湖南的省委書記，

我在他領導下工作3年，感到他謹慎、樸素，印象很深。我調北京後，每年到他那裏看望一、二次。最近一、二年來，工作忙，沒去過。18日晨恩來同志召開大會前，接到小舟電話，約我去看望黃老。我去得較晚，小舟、周惠已在，大概談了會議中的壓力問題。彭德懷與黃克誠住同一所房子，去開會之前，彭走進房來，談到他的信，黃提了一下：「你的信問題很多，漏洞很多。」（有人插話：不是漏洞很多，是觀點一致。）彭說：我的信是獨立創作，假如你來了，我會跟你商量一下。

23日聽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思想很震動，才知道彭德懷的信是嚴重政治性問題。那天晚上我在小舟、周惠處，大家心情沉重。小舟一下不能轉過彎來，還說問題是不是那樣嚴重？我的思想比較混亂，但問題到底怎麼樣，也不太清楚，感覺要經過鬥爭，才能解決問題。小舟情緒有些緊張，打電話約黃老談談，我們三個就到黃那裏去了。黃說：「你們不要緊張，彭的信是有問題，你們的錯誤應該檢查。」後來又扯到湖南糧食問題。正要走，彭德懷進來了。房子裏凳子不夠，我們都站了起來。彭說：「我的信是寫給毛澤東同志看的，不是要他發的。」講了一下當天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散會出來，他們碰到時談話的情況。這時我心裏有些緊張。聽彭談了幾句，大概十點多鐘，我們就走了。這種行動是會引起懷疑的。30日毛澤東同志又找黃克誠、小舟、周惠和我談了一次話。

我在廬山的思想過程大體如此。對彭德懷的信，有兩個階段：23日以前是共鳴；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我列席了31日的常委會和8月1日常委會，聽了常委同志對彭的本質的徹底揭露，我才知道彭是怎樣一個人。一年多來，我擔任了毛澤東同志的兼職秘書，中央會議參加得比較多，毛澤東同志也多次同我談話，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精神，應當了解得較多的。但

是由於自己思想上的右傾根子，在這次大風浪中嚴重搖擺，對去年大躍進，對偉大群眾運動潑冷水，錯誤是非常嚴重的。這點非常痛苦。毛澤東同志這次一共和我們談了五次，為了教育我們，用心很深。但到8月1日那次談話，我還向毛澤東同志說，去年1,070萬噸是否少一點為好，可見我之頑固、動搖到何種程度。當時他嚴厲批評了我，說我斤斤計較。現在我對彭信的看法同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這是對大躍進的攻擊，對總路線的攻擊，對黨、對中央、對毛澤東同志的攻擊。我這一次的動搖，根本的問題是：我雖入黨時間比較長，但我是一個未經過很好改造、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沒有經過群眾運動的鍛煉。不要說在廣大群眾中，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也沒有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同「左派」同志呼吸與共。

我平時在工作中，看困難的一面多一些。最嚴重的是常自以為是，對總路線實際上沒有一個完整的了解。總路線的根本問題，是發動群眾，鼓足幹勁的問題，多快好省是與群眾路線分不開的。只有鼓足幹勁，發動群眾，才能力爭上游。自己總覺得多快與好省有矛盾。自己在這方面是並不通的，對總路線這個根本的問題，體會得很不夠。對數量與質量的問題，也還沒有完全通，認為可以在今後計委的會議上再去解決。特別向鶴壽同志提一下，去年鋼材與鋼是不大成比例的。鋼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長66%，而鋼材只增長26.2%。第一個五年計劃鋼的成材率是79%，而去年是56%，今年上半年是67%。（這時還講這些具體問題，可見我的「頑固立場」。）

最後，我說：我誠懇接受同志們的幫助，願意進一步作檢討。

我說完以後，小組共有十五位同志相繼發言，對我提出批評和問題。據《簡報》的綜合，他們的意見可以概括為這樣四點：

(1) 說我開始暴露了一些思想，有進步，但暴露得很不夠，檢查得很不深刻，沒有接觸到根本的本質的問題，對我的發言是不能滿意的，還不能過關。

(2) 說我的錯誤歸根到柢是個立場問題。廬山會議是大是大非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我是站在錯誤的一面的，已經離開總路線走得很遠了，而且已上了反總路線的陣，已陷入「軍事俱樂部」而不能自拔。在這方面我還沒有劃清界線。

(3) 說我驕氣很重，態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對抗情緒，怨氣很大。自以為頗有先見之明，但沒有被重視，被接受。還有人說我有宗派情緒，甚麼插紅旗的省指湖北問題多，插白旗的省實際上是指湖南問題倒少。

(4) 說我的檢查總糾纏在一些具體的枝節的問題上，對思想、活動躲躲閃閃、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態度不老實，不誠懇。還說我聽了毛澤東的兩次講話，毛又找我們談了三次，我又列席了兩次常委會，小組對我又花了很多時間，可以說是苦口婆心，仁至義盡了，應該放下架子，老老實實把思想活動和盤托出，站在黨的立場，劃清界線，徹底檢查交代。

8月6日上午繼續開小組會。首先是我發言，回答前天會上對我的意見和批評。我說：上廬山以後，前一個階段在中南小組，與周小舟、周惠有些接觸。上次會上已談了一些情況。紅旗、白旗，是從他們那裏聽到的，他們告訴我，是譚震林在廣州一次會上給湖南插的白旗。

剛說到這裏，就被人打斷了，說：你今天第一句話精神就不對。不是因為同在一個小組裏，你才和小舟、周惠有接觸。

有人接着問：廬山會議的前一段，你經常與周小舟同志來往，並放出廬山會議有壓力的空氣。究竟你們都講了些甚麼？當中彭德懷同志曾與周小舟兩次談話，他們講了些甚麼？黃克誠同

志頭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們就在黃那裏聚會，又講了些甚麼？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你們感到很緊張，當天晚上又在黃克誠那裏聚會，這兩次彭德懷都參加的，都講了些甚麼？要交代清楚。

我接着交代：關於湖南的情況。現在記得起的，他們談過這樣一些事情：去年高指標，湖南鋼鐵高潮是由對糧食估計比較樂觀引起來的。食堂的原則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譚震林曾傾向於自願參加，小舟也是這樣的意見，周惠則有不同意見。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省委稍有不同意見，與中央通了電話，中央同意湖南根據實際情況去辦。對糧食分到戶，他們在做法上也有不同意見。湖南的糧食分到生產隊、食堂，只是指標分到戶，糧食並不分到戶。對會議有壓力，我們幾個談得比較多。周惠同劉建勛等人一起開玩笑，後來傳成省委第一書記有三種人……

接着有人問，是哪三種人？我說：一種是老老實實講假話，一種是對情況不了解，一種是講了假話。周惠對劉建勛開玩笑說，去年廣西放衛星，一天生產20萬噸生鐵，登了《人民日報》，第二天又給中央打電報作檢討，名利雙收。我聽到王任重同志在小組會上檢討，過去老老實實說了假話。以後三個小組都責問周惠。

於是有幾位同志連續向我質問：照你剛才說的話，你聽了周惠說的就相信了。現在要劃清界線，不要這樣解釋了，要和盤托出。

譚震林、曾希聖為這事在恩來同志那裏拍了桌子，追問三類甚麼人。後來就改稱為三部份人。

這話不是開玩笑，這是事後的話。你又不在此，怎麼能說是開玩笑呢？

我說：我記得清的就是這些。當時感到這是開玩笑。後來周

惠為此事受了批評，我錯誤地認為這就是壓力。

我過去與黃克誠同志在湖南一起工作，對黃的印象很好。前幾年，有小事情，如為水電工地要舊汽車，去看過黃一兩次，最近一兩年沒有去過。18日早晨，恩來同志召開大會前，快9點了，到黃那裏，看到小舟、周惠在黃那裏吃早飯。談到瀏陽有人給黃一封信，大概是反映這個縣的幹部作風問題。還說了一些湖南情況。快到開會的時間了，就住在黃對面的彭德懷夾着本子過來了。我又再次說到，黃對彭說，你的信有問題，不能這樣講，漏洞很多。彭德懷說，你如果早上山，我會找你商量的。

23日以前，我已將彭德懷意見書看了兩遍，感到只是在提法上，如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處，有些疑問。這在當時也和別的同志談過。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並不完全是支持。記不清哪一天，到小舟、周惠那裏，在座還有王任重同志，談起彭的信，大家表示了一些同意的看法。我說了一句「彭總偉大」，別人不敢寫這樣的信，信很尖銳，對引起討論有好處。當時還談到了會議的缺點等等。

毛澤東同志於11日找小舟、周惠和我去談話，17日找小舟、喬木、田家英和我去談話。毛澤東同志是知道我們腦子裏有問題的，氣味不對，鼓勵我們有問題就講出來。毛澤東同志還從《三國演義》談到密植，要求不要太密。總路線，如果有30%堅決執行的積極分子，大部份隨大流，也不會有問題。第二次談話時，田家英比較長時間地談了他在四川一個公社工作兩個月的情况，談到毛澤東同志關於產量要落實的一封信，他所在的公社傳達了，周圍的公社卻沒有傳達。有一個四川有名的勞動模範反映，去年產量有虛假。我聽了這些情况，總認為有浮誇風的問題，這對我第一次錯誤發言是有影響的。聽了毛澤東同志23日針對彭德懷的信的講話，我感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我到小舟那裏去，

談到講話，小舟說：問題是否要提得這樣嚴重呢。周惠也談到與小舟在工作中有爭論，小舟保守一些。劉瀾波也對我說過他們同組別人的反映：小舟的發言關於彭信的說法不對。這時我的思想也還是模糊的，因為我也偏到彭信的一邊去過。不過，我想，既然毛澤東同志講話了，當然問題是有這樣嚴重的。

有人插話：對小舟的這種態度，你怎樣表示的？

我接着說：小舟感到有些緊張，想找黃克誠談一談，就給黃打了個電話：可不可以來？李銳、周惠都去，好不好？這已經是9點多鐘，比較晚了。大家去了之後，小舟談了心情，一下轉不過彎，還有抵觸情緒。周惠好一些。我沒有表示甚麼抵觸，就是思想很混亂。黃克誠對我們說，不必緊張，彭的信是有問題，你們發言有錯誤，要檢討。後來又扯到湖南糧食問題，去年鋼鐵指標高，湖南是糧食引起來的。黃克誠在西北小組發言，我當時並不知道是甚麼內容……

有人問：周小舟、李銳兩人都說到鋼鐵指標高是由糧食引起來的，黃克誠的發言也是如此，以前你們是否談過？

我說：我曾錯誤認為，1959年原來的鋼鐵高指標是華東600萬噸帶頭的。過去好像感覺大家覺得糧食無後顧之憂……

有人問：談到比較緊張，怎麼一下子又轉到了糧食問題？我答：記不清楚了。又有人說：一提緊張，又說到糧食問題了。

我接着說：兩次到黃處，記不得哪一次，黃克誠還談過，北戴河會議時，他同柯慶施、王任重、小舟談過公社問題，說公社暫時掛個牌子好了。

又有兩位同志插話：糧食也講了，公社為甚麼不講？

我接着說：我們要走時，彭德懷進來了，黃的房子較小，只兩張沙發，兩張椅子，我們都站起了。彭談到當天散會時他同毛澤東同志談話的經過，說信是寫給毛澤東同志看的，不是要印

發的。我們三個不想再坐下去，就走了。因為不是住在一處，走出門口我們就分了路。一出門小舟就遇見了羅瑞卿。28日我在小組會上作了檢查，說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間派的右邊來了。認為彭的信只是對總路線的懷疑，動搖，還沒有朝反中央、反毛澤東同志這方面去想。同志們對我的檢查不滿意。30日一早，毛澤東同志找黃克誠、小舟、周惠和我談話。主要是問黃克誠一軍團、三軍團的事，黃與彭的關係。毛澤東同志單刀直入，問是否父子關係？黃談了自己在三軍團的歷史，反對過立三路線，被鬥爭過、撤職過。與彭的關係，批評過彭，與彭的意見並不都一致。又說了第二次王明路線時他的情況。又說了在北京工作中，也與彭不完全一致，但兩人感情是好的。毛澤東同志批評了政治與感情可以不統一的說法，指出這樣說是不對的，說人的意志、思想、感情應該是一致的。毛澤東同志還提到「湖南集團」，我們四個聽了感到很緊張。黃解釋說，過去是同事關係。毛澤東同志又談了交心問題，對小舟的意見多一點，說他格格不入。對我的批評是發言的氣味不好。我談了一下自己思想情況，開會前一階段同小舟、周惠談缺點多一點。談話以後，為「湖南集團」問題，我心情很緊張，一夜未睡，向毛澤東同志寫了一信，交代這件事。信中檢討：這一年多來，掛名秘書，參加中央多次會議，毛澤東同志找我談話多次，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精神應當有更多的體會。但到廬山以後，同情彭德懷的信，小組發言的精神不對頭，亂講一些話，嚴重右傾，嚴重自由主義。內心很痛苦。「湖南集團」的事情……

有人插話：是「湖南派」。

我接着說「湖南集團」的事情，我交代同幾個人的關係。同彭德懷的接觸，只是去年去廣州開會面談過一次。同黃克誠的關係，在湖南一起工作，尊重他，信賴他，同他談過兩次心裏話。

一次是1950年，談高崗的幹部政策不好，這是看到韓進被開除黨籍一事引起去談的。1948年我當過高崗半年多政治秘書，由於對這個人不滿意，才堅決要求離開的。黃克誠聽我說了之後，即就幹部政策作了一般的解釋。1953年發表高崗為計委主席，我以為中央如此安排不妥，和愛人議論過，曾想給中央寫信，又不敢寫，就去找黃克誠談。這一回較多地談了我對高的看法。黃克誠說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自從擔任了兼職秘書，工作又忙，即沒有再去過黃克誠那裏。同周小舟的關係，當時在湖南，周是宣傳部長，我是副部長，後來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在延安就認識。這次開會的前一階段，對於要多談些缺點，是氣味相同的。兩次去看黃克誠，彭德懷也去了，談的內容已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上簡單寫了。31日早晨5時，把信送去。上午10時，毛澤東同志召開常委會，談彭德懷問題，黃、二周和我四人列席。毛澤東同志告我：你的信已經給常委傳閱了。會上談彭的歷史情況。散會時毛澤東同志留下「湖南派」（大家覺得「湖南派」比「湖南集團」更如實些，我就馬上改口照講）吃飯。第二次常委會，會後又留我們吃飯，談了一陣。我又提出去年1,070萬噸是否可以少一點，毛澤東同志批評我「斤斤計較」。上次同志們批評我這是向毛澤東同志進攻，從我的內心我覺得不能這樣說。同志們批評我有宗派情緒，紅旗、白旗問題。還有同志向我提過，兩湖水利糾紛，有無這種情緒。這次同小舟、周惠接觸多一些，對湖南事情感情多一點，我承認自覺不自覺有這種宗派情緒。5月4日至6月15日，我到了4個省，原來思想上有病，對去年大躍進中某些事情有懷疑，糾纏在1,070。內心感到人民公社是否快了，會議前一階段感到有壓力，向黨要民主，這一系列右傾思想，形成我對總路線的動搖。我只覺得這次雖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還沒有甚麼個人意圖在內。我是願意暴露思想的，如說「彭總偉大」，基本同

意彭的信，是28日檢討中談的。以前糾纏的出軌或翻車的問題，實質上是對大躍進的懷疑。我的根本問題是立場問題，缺乏無產階級革命熱情，沒有站在幾億人民的立場來看去年的大躍進。這種動搖狀態，碰到彭德懷同志的信，就暴露出來了。經過毛澤東同志的指出，同志們的幫助，我的認識才改變過來。不過我原來根本不了解彭德懷寫信的意圖，是有意向中央、向毛澤東同志進攻。但我的發言確起了呼應的作用。有的同志說，是否在毛澤東同志那裏摸氣候，押寶。我要說明不是這樣的。廬山會議原來要談的十幾個問題，好多就是我思想中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是鼓勵我們有話講出來，他對彭信有甚麼意見我並不知道，也沒去試探。我最近才聽說毛澤東同志第一次找我們談話以後，小舟很高興，同別人談過，我當時是沒有同別人談過的。

我說了這些，馬上就有好幾位與會者搶着發言，分析批判起來：

——感到同我們之間有異己感。從火車上就進攻總路線，不僅上了陣，而且是打先鋒的。「以鋼為綱」，你是不贊成的，幾個「元帥」升帳，你是不贊成的，全黨全民辦這辦那，政治掛帥，這些口號你都反對，1070已經超過，而且拿到手了，你今天還在懷疑，人民公社你也有懷疑。從你的一系列的語言、活動上看，你是系統地反對總路線的。

——已經進了「軍事俱樂部」了，也是反對總路線的，你對人民公社、大躍進、1070、比例關係，都有意見，這一聯繫就聯繫到總路線。這一次來廬山。你說帶來了很多關於比例關係的資料和本本，顯然是準備進攻的。

——彭德懷根本不認識李立三、王明，卻擁護立三、王明路線。你說和彭德懷同志不熟識，卻可以說他偉大。你說你和黃克

誠、小舟很熟，常去看他們，但是還有人也和小舟很熟，給小舟打了幾次電話，小舟就是推故不見，這怎樣解釋？

——你們一次兩次去找黃克誠，為甚麼不找別人？

5日上午的小組會上，還有人發言說，我兩次發言都「沒有把根子挖出來」。而且把我作為這個小組裏的「碉堡」，說我如果不把自己的觀點和問題全部交代出來，那麼「小組裏的碉堡就沒有攻下來」。

以上我將小組會上自己的幾次檢查，如此不厭其煩，囉嗦而重複地錄出，目的就在如實反映過去政治運動中，挨整的人過關之難。

會上耐心幫助的同時，會外也在收集我的材料。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電站截流，我曾應邀率一個代表團去過蘇聯，同留學生有過一次談話。一份駐蘇大使館黨委從留學生那裏得來的反映（大概曾刊外交部的內部通報），8月8日以《李銳同志在蘇聯訪問時的一些言論》為題，作為會議文件發下來了。不到六百字，沒有多少內容，可以跟當時的批判話題扯得上的只有一句話，就是我对留學生說過，「中國現在有點亂糟糟，開始提出1,070萬噸鋼時，中央也是沒有底的」。我當然懂得，發這個文件，目的並不在於揭發我多少材料，而只不過是發一個通告，表示把我列入「軍事俱樂部」了。只是這個幾百字的材料也與事實大有出入（寫這個材料的人是水利部派出去的一位實習生），我看了之後，就向會議秘書處寫了說明，可是也沒有更正。

回憶起來，也有使我至今感動的事情。還在會議初期，一次同工業各部部长遊山，大概是在植物園，大家談到在農村的一些困難情況時，我冒了一句「中國的農民好」，意指要是在東歐，早鬧事了。走在旁邊的煤炭工業部部长張霖之聽到了這話，沒有

做聲。到小組會鬥爭我的高潮中，他將這話悄悄告訴了劉瀾波，卻沒有在會上揭發，顯然是有意包庇。這位保護過我的同志後來於「文革」中慘死。前述回憶劉瀾波的文章，其中也寫到了這件事。

我在1980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的發言中，曾說過這樣的話：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這十多天我沒有再到飯廳去吃過飯，猶如一個病號，飯送到房間裏，吃得很少，任何佳餚美味都食之無味，睡得也少。但我還是堅持每天參加會，勉力作點記錄。我的悲觀情緒，田家英是覺察到了的，以致我常用的安眠藥，後來都受到控制。

關於「斯大林晚年」問題

大概在8月7日以後，六個小組合併成三個「臨時小組」，即第二組（組長柯慶施，曾希聖代，副組長廖魯言），第四組（組長李井泉，副組長王任重、蕭華），第五組（組長張德生，副組長舒同、黃火青）。每個組五十來人。彭德懷在第四組，組員有一半是軍隊同志，老三軍團的幾乎都在這一組。黃克誠在第五組，軍隊同志約比第四組少一半。張聞天、周小舟在第二組，沒有現役部隊同志。這個形勢就是集中力量批鬥彭、黃、張、周四人。我分在第四組，對個人來說，一下子輕鬆了，可以逃脫非常難受的批鬥日子。但是旁聽大家對彭、黃、張、周的那種面對面的尖銳語言，上綱上線的武斷，乃至難堪的人身攻擊，種種可怕的質問，仍然是非常難受的。我的記錄本上這以後的幾天直到8月13日開大會，完全是空白，甚麼也沒有記，可見心情之低沉。現在從《簡報》補充一些這幾天的發言情況。那些過於難聽的攻擊、質問等，《簡報》上也未作反映。

8月8日，陶鑄在合併後的臨時第二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他說給洛甫的檢討發言提三點意見：

（1）洛甫同志與彭德懷同志的關係，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的，並有實際行動的。這一點要肯定，不能含糊。洛甫同志檢討說，彭的信寫好後，內容都講給你聽了，並告訴了你信安了五條刺毛澤東同志的「刺」，只是叫你看，你不看，怕犯宗派。這種避開責任的講法，只不過是玩弄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蠢技而已。彭信一印發出來，你立即發言

擁護，安的刺更多更毒辣。你把發言提綱給彭看，彭讚揚講得全面，你說「這是支持你」。顯然，這些來往已不是一般活動，而是自覺地有組織地反黨宗派活動。

(2) 目的是甚麼？要交代清楚。洛甫同志應當承認，你們的共同目的是反對總路線，反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你們曾商量要中央出來作檢討便是鐵證）彭德懷、洛甫同志專門搜集缺點，誇大缺點，目的就在於要搞垮總路線。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這句話我以為對那些故作危言聳聽、要大講缺點的人，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他們口口聲聲說是擁護毛澤東同志的，但為甚麼不滿，甚至刺毛澤東同志，商量要逼中央出來作檢討呢？

(3) 洛甫同志說他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這個帽子很不合適。洛甫同志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未改造好。據我所知，他當過中學教員，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到過美國、蘇聯，從蘇聯回國後，就擔任黨的領導工作，地位爬得很高，發號施令，沒有在下層做過工作，更沒有經過嚴格的黨的生活鍛煉，當然也沒有經過群眾運動的考驗，所以跌了跤子。跌跤子後，把他以前的位置變動一下是完全合理的，而不應該心懷不滿。可是洛甫同志不是這樣的，他是「不甘寂寞」的，這樣何事不可為！

關於張聞天此時的心境，他的秘書有這樣一段回憶：「8月9日，聞天同志從會場回來，心情沉重，沒有講話，卻又坐上車子，讓開到拈嶺鎮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蒼茫暮色中，他佇立在一塊巨岩邊，望着逐漸暗淡而模糊的遠方。許久，他慢慢回過頭來，說：他們在追『秘密反黨計劃』，好像誰先發言、誰後發言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又說：這種做法危險——沒有甚麼材料，想這樣逼出一個『有計劃有組織』來。他眼中流露出難言的

憤激和疑慮。我看他為自己受錯誤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別的惘然。」

8月8日，周小舟在臨時第二小組會上作長篇檢討發言，包括六個問題：

- (1) 當前形勢和我的基本態度；
- (2) 對彭德懷同志信的認識；
- (3) 我同黃克誠同志的關係及我對黃的看法；
- (4) 我和張聞天同志的一次來往，談了些甚麼；
- (5) 和李銳同志談了些甚麼；
- (6) 我的檢討。

在周發言過程中，與會者不時插話，批判，追問。

柯慶施：你算不算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周小舟：看怎麼說。從思想上說，有些聯繫；但彭是反黨中央、反毛澤東同志和反總路線的，就這方面說，我當然和他們根本不相同。

有幾個人問：你怎麼與他根本不相同？

周小舟：我不是說了嗎，彭是反黨、反毛澤東同志、反總路線的，我怎麼會同他根本相同？

柯慶施：毛澤東同志講話後，你還跟我講：毛澤東同志對彭的批評是否過重了些？

周小舟：我不是那麼說的。

曾希聖：那天我坐在你旁邊，聽見說了。

張仲良：你對他的信參謀過沒有？

周小舟：沒有。

曾希聖：講的話要人家相信，你不要自欺欺人，你們思想相同，而且你到他那裏去過幾次，他的信怎麼會不給你看？

周小舟：他的信我沒有看。

張仲良：彭上午講了，寫信前與你商量過，你告訴他不要寫信。

周小舟：你記錯了，不是這回事。

……

陶鑄：你乾脆把提綱丟掉，不要好了，就講你對這封信起了甚麼作用？你在俱樂部處在甚麼位置？你的問題沒有彭、張、黃那麼嚴重，交代清楚了就行了嘛！本來你是陷得不深的，現在越陷越深。

……

周小舟：你們要戴大帽子，甚麼帽子都可以戴。

廖承志：你這個話就厲害了。

廖魯言：每個人都要戴帽子，問題在於戴甚麼樣的帽子合適。別人不給戴，自己也應該戴。

李立三：你想戴個和彭德懷同志根本不同的帽子，這合適嗎？

周小舟：我怎麼會與他相同？

柯慶施：第一，你基本上同意他的信；第二，你認為毛澤東同志批評得太重了；第三，毛澤東同志說黃克誠同志感情和理智分家，你是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你只相信黃克誠，而不相信毛澤東同志。

陶鑄：你不戴帽子不行，這次會大家不會給你戴的。許多問題你是同意彭德懷同志意見的。……

……

柯慶施：原來你不是頭，現在你成了維護錯誤路線的最後一個人了。

周小舟最後連他準備的第二個問題也沒有講完，就被與會者以上述這些問話打斷了。

8月9日，羅瑞卿在臨時第二小組發言，內容主要是揭批周小舟。他說想講兩方面的問題：首先要問小舟同志，你們在毛澤東同志那裏談話之後（時間大約是7月10日），好像得了彩一樣，並且迫不及待地打電話找我談話，以後又由周惠同志當面約我要談一次，打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是不是想借此宣傳我，影響我？或者對我施加壓力，要我不要阻撓你們大談特談大躍進的缺點呢？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為甚麼不再找我申明一下，說「上次對你宣傳錯了，應該更正一下」。為甚麼不作這個申明呢？從23日到今天，我已經等了17天了，周小舟同志你根本不想更正，請問是甚麼道理？

接着羅瑞卿詳細揭發了周小舟、周惠跟他談話的情況，並提出如下問題：

(1) 你（周小舟）同彭、黃、張的基本觀點那樣一致，難道你沒有參與軍事俱樂部的機密？

(2) 你對彭德懷同志急於發難，在彭對形勢的估計分析上，起過甚麼作用？

(3) 你到彭德懷同志那裏究竟議論過一些甚麼？23日毛澤東同志剛才講過話，晚上你和周惠、李銳二同志又去了，議論過一些甚麼？據你們說是去黃克誠同志處吹牛皮，沒有到彭那裏。不過據我看，到彭那裏、到黃那裏都是一樣。這裏應該附帶說明，你到彭處我碰到過兩次，其中一次就是23日晚上。我從含鄱口看月亮回來，晚上10點30分了，碰着你們，老實說，我是懷疑的。

(4) 到我處宣傳，用心何在？拉我入「軍事俱樂部」？大概不會。因為我是彭的眼中釘。但是是否有壓我一下的意思，以便使我不阻撓你們在小組會上大講特講大躍進的所謂缺點呢？

(5) 這次到廬山來，你同周惠、李銳同志三人結合一起，

觀點一致，形影不離，這是甚麼原因？這不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麼？你們在一起議論過甚麼？

羅瑞卿最後說：我要勸一勸周小舟同志。我們希望你迅速地從「軍事俱樂部」拔出腳來，不要越陷越深。毛澤東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那樣苦口婆心、仁至義盡地向你做工作，同你們四個人幾次談話，兩次常委會同彭德懷同志談判，批評他，又請你們四人列席，又寫信給你，送書給你。為甚麼這樣？無非是想挽救你，要你同那個「軍事俱樂部」決裂。這一切一切，難道你都無動於衷麼？你的心肝難道不是肉做的？你究竟要的甚麼主意？你要抵抗到甚麼時候？你還有沒有一點黨性？你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那算交得了賬嗎？你那個東西太低能了，像我這種人都看得出一點，你還能騙得過毛澤東同志？騙得過中央其他同志？騙得過全會的同志？真有點太不自量了吧。……如果想蒙混過關去，躲藏起來，圖謀再起，這是不可能的。休得妄想！不要說你，我看就是你們「軍事俱樂部」的領袖，要想這樣，也是辦不到的。這一次是被徹底地暴露了！

8月10日上午，第二臨時小組開會，繼續重點批周小舟。因為就他還沒有「繳械」、「認罪」，還在「頑抗」。

會一開始，周小舟表示上次會上自己的態度有點不好，這次「把整個觀點說一說」。

曾希聖：你要講和彭德懷同志的觀點，有哪些相同之處，不要講不一致的地方。

周小舟：我現在講嘛，我講同志們不聽！

柯慶施：毛澤東同志送書給你，找你談話，他是那麼幫助你，你是黨員，講些黨員話嘛！

譚震林：你說講缺點有壓力，大家不願聽缺點的話，根據何在？彭的信出來以後，你來一個基本同意，張聞天來一個長篇演

說，……你們配合得那麼好，你說沒有關係，鬼才相信！

周小舟：我沒有講沒有關係嘛！

有人問：你說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是甚麼意思？

周小舟：會議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先提出十五個問題，以後提出十八個問題，肯定「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在這個前提之下，把成績說夠，缺點講透。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完全反過來了，提出一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我對此認為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陶鑄：你擁護彭的綱領沒有？

周小舟：我當然不擁護彭的路線；我曾經擁護過，我當時沒有認識到彭的信是反黨綱領，現在認識到是反黨綱領。我有一個認識過程。

譚震林：你同意彭的信，不是在某些方面，而是整個同意彭的觀點。你在湖南省委提出的十個問題，總的觀點是代表富裕中農的。

柯慶施：據有同志說，你整個思想是右傾的，在土改、鎮反、合作化、反右鬥爭，各項工作都是如此。

周小舟：這個我同意。我有右傾思想，在主要問題上有右傾思想，但不是全部。

譚震林：湖南的糧食問題是不是右傾，湖南省委是有爭論的。這個問題，你以為自己正確。去年煉鐵高潮的時候，你要停下來，省委反對。

孔原：你講講在哪些地方擁護彭，有哪些觀點和彭有相同之處？

周小舟：第一，我也認為去年糧食估產高了，因此鋼鐵就帶上去了，這是我和他觀點一致的地方。但我講的是湖南，沒有講全國。第二，公社問題，高級社的優越性還沒有發揮完，我開

始主張聯社的辦法。中央既已決定要辦，就按照中央的方針定下來，把公社搞起來。去年春天群眾就有併社的要求，公社是必然的趨勢，但對供給制、「共產風」，我當然有意見。

曾希聖：你是不是認為公社搞早了？

周小舟：不完全是這樣，你不能這樣推論。

孔原：你現在講，在哪些地方擁護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陶鑄：你擁護彭，是有你自己的右傾根子。你認為農業要不要報那麼多，有懷疑；鋼鐵要不要搞那麼多，也有懷疑；公社問題，認為高級社的優越性沒有發揮完，實際上是說公社辦早了，你這不是反對總路線是甚麼？

……

柯慶施：你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講同意彭的信，同彭談過話，起了提供材料的作用。提供了甚麼材料？

周小舟：我和彭談話，是把我看到的壞東西給他講了，沒有作全面的分析。8月3日給毛澤東同志的信……到廬山來後，我和彭談了十個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右的，不過彭比我更右……毛澤東同志經常講缺點為甚麼不能談？當時我感到會議有壓力。我在和彭講話時，說社會主義建設要有一個經濟核算觀點……

柯慶施唸了8月3日周小舟給毛澤東的信以後，問道：既然說到毛澤東偉大，為甚麼又要警惕？

孔原：就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要警惕，就是這個意思嘛！

周小舟：我只是吹吹牛皮嘛！

譚震林說：你是矛盾百出，這個問題你怎麼能吹牛皮？要講老實的。

……

曾希聖：你回答兩個問題：你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軍事

俱樂部」裏，擔任甚麼角色？你在「軍事俱樂部」裏搞了甚麼？

周小舟：我開始不知道有這麼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但我有右傾思想，在人民公社、糧食、大辦鋼鐵、講缺點、黨內有壓力等問題上，與彭德懷的觀點有一致之處。浮誇也認為有，說吹遍各地區各部門，我沒有同意過。我與彭、黃見過兩次面，談過兩次話，就是談這些。和張聞天也談過一次話。我受到彭的影響，犯了錯誤，是「軍事俱樂部」之一員，這有甚麼可講的！

譚震林：你寫信給毛澤東同志講「軍事俱樂部」有五、六人，你是在五人之中，還是六人之中？

周小舟：我是在五人之中。

有人問：你說和彭有一致之處，是在主要方面一致，還是次要方面一致？

周小舟：在右傾思想方面，主要點有一致之處。說事先商量過，有計劃，那一點也沒有！

譚震林：你說過，反右傾這樣反下去，有嚴重危險，這句話你說過沒有？

周小舟：沒有講過「嚴重」兩字。我當時的想法，通過廬山會議，把一年來的工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都總結清楚。肯定成績，指出缺點，提出辦法，這時我們會有提高。至於對外、對下面幹部怎麼說，是另外一回事。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反右，是必要的。如果沒有肯定成績，總結經驗，而提出反右，是有危險的。毛澤東同志那次講話，沒有提十八個問題，只說一個反右傾，我認為這樣發展下去，會出亂子的。這是我23日聽到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的感覺，現在我認識到反右傾是必要的，贊成反右傾。

譚震林：你到底是立場問題，還是認識問題？

周小舟：那時是立場問題和認識問題，現在認識清楚了。
(全場哄笑)

8月9日，第五組開會。會上先由黃克誠作檢討發言。之後，與會者紛紛批判、揭發和質問。

羅瑞卿（羅三個小組都去）說：我提幾個問題：

（1）彭德懷同志從國外回來，給毛澤東同志送壞的方面的材料，是否比過去多？過去送過沒有？（黃克誠：比過去多，過去也送過。）

（2）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周小舟、李銳等三人到你那裏說毛澤東同志講話是一百八十度轉彎，你當時講：「不要緊張，不要那麼恐慌，毛澤東同志說『左』派要，中間派也要。」這是甚麼意思？（黃克誠：毛澤東同志講話後，他們說毛澤東同志講話為甚麼變了呢？距離那麼遠。我講：你們體會錯了。隨後周小舟同志同我談了毛澤東同志給他的談話內容。）你給彭德懷同志談了沒有？（黃克誠：給彭談了。）

（3）蔣幹的故事談了沒有？（黃克誠：沒有，）張平化問：你和周小舟、李銳等同志談話，兩次談話中間彭德懷同志都來了，是不是那個情況？（黃克誠：是的，彭來了。）張德生問：周小舟同志對毛澤東同志的談話如何理解？（黃克誠：記不清了，印象是毛澤東同志講：有話就講，不要怕。）吳芝圃發言說：黃克誠同志今天下午的發言，在對於彭德懷同志的認識上比前幾次發言有進步，但對於他自己在「軍事俱樂部」究竟起甚麼作用，卻仍沒有談清楚。勸告克誠同志把由不謀而合到謀而合的真相說出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軍事俱樂部」的形成，也不外乎這個道理。起初可能是一些臭味相投的同志不謀而合，「手心中各寫一個『火』字」，拿出來相視而笑；後來就用各種方式交換意見，互通情報，形成不一定掛招牌，但卻是在政治路線上、政策綱領上、言論行動上有意識地相結合的「俱樂部」了。到廬山後，這種結合是更加明顯了。說進攻就一齊打炮，連

說話的神氣都一模一樣。李銳同志舉高揚同志的例子，說只准說好，不准說壞；克誠同志也舉高揚同志的例子，說只准說多，不准說少。參加「俱樂部」的幾位同志一致說，人民公社辦早了，經濟情況緊張得很，已經影響了階級關係，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一致說在廬山會議上要講缺點，但感覺有壓力。並且在毛澤東同志7月23日講話之後，還往來密商對策，小將有些驚慌，大將說「不要緊張」。可是，他們一致避重就輕，守口如瓶。這難道是不謀而合嗎？

8月10日一早，接到會議秘書處通知，讓我到黃克誠組去對證一件事。有人寫信揭發，說我曾兩次同黃克誠談過高崗的問題，黃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1950年在湖南，1953年初（高崗剛被任命國家計委主席時）在北京，我確兩次同黃談過高崗的問題。1948年我曾當過高崗8個月的政治秘書，住在他家裏，根據直觀，對高崗的思想、作風、用人的生活等方面，很有些看法。第二次尤大膽談到中央這樣安排不當。黃克誠和高崗的關係，正是大家追究的題目之一。關於23日夜我們三人到黃克誠處活動之事，當時都認為是一個沒有「突破」的口子，如上面《簡報》中的反映，對黃克誠和周小舟都逼得很厲害。

這個組裏有人一直追逼，說黃克誠沒談甚麼新材料，並以張聞天已經交代了一些新東西，作為逼黃的理由，說黃克誠知道的應當比張聞天多，應老實講出來。所謂「張聞天交代」一事，是8月9日下午第二組的會上，關於同彭德懷交談過甚麼，張聞天被逼作了這樣一些「交代」：彭德懷談到中央常委會上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講得多，別人很少講話，他一個人說了算。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對反冒進的同志，是否一定要採取那麼個鬥爭方法，是否只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沒有注意集體威信。還講過要注意斯大林後期的危險（說到這裏，會場頓時驚訝不已），以及毛澤東讀中

國的舊書很多，熟悉舊社會對付人的那套辦法，很厲害。

黃克誠被一再追逼，突然看見我走進會場（而且我後面還跟着羅瑞卿），我又不是這個組的，他當然馬上產生這樣的錯覺：李銳一定和盤托出。黃克誠只好講了以下幾點：

（1）主席在上海會議講話後，彭德懷給他說過「主席要掛帥，難道過去不是他掛帥嗎？」但說，彭德懷沒有講「犯了錯誤不認賬」這句話。

（2）彭德懷給他談過：「集體領導問題」，但沒有講「常委會都是主席一人講話」。

（3）彭德懷過去曾給他談過：「主席說要下毛毛雨，但給送去文件又不看。」

（4）彭德懷沒有同他說過，「去年9月以來出了『左』的錯誤」，只說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的話，說不清是彭談的，還是自己講的。

（5）彭德懷給他說過，「各省都給主席蓋房子」的話。

黃克誠說，關於「斯大林晚年」的話，彭德懷沒有同我談過，別的同志說過。於是立即被追問：「是誰？」黃克誠說：「李銳。在23日講話後那天晚上，他們三人來我處時，李銳問過我：『現在我們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說：『不能相比。』」這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嘩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雖沒有精神準備，但由於多日來已驚心動魄慣了，算是沉住了氣，就一五一十將23日夜的情況講了一遍。特別強調了黃如何批評我們，認為我們情緒不對頭，有錯誤就應當好好檢討。「斯大林晚年」這話卻不是我說的。（「一手遮天」這4個字我仍沒有交代出來，大家也都忘記了。）我說我並不想逃避責任。黃克誠沒有記錯。肯定是我們三人中有人說了。

就在我講的過程中，不斷有人施加壓力，說甚麼「防線守不住了，已經有的材料也可以做結論了。現在看你們的態度，你趁早痛痛快快講了算了」。「你們在黨面前講話這樣困難，你們在一起就無所不談，你們還有一點黨性嗎？」「你們不保護黨，就只想如何保護你們那個小集團，這樣究竟對你們有甚麼好處？你們想訂攻守同盟，自以為很鞏固，其實哪能守得住！不信，就看吧。」

我講完之後，陳正人馬上到周小舟所在組，問周小舟：黃克誠已交代，你們三個人23日晚上談了現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會出亂子，你說了沒有？小舟答：「我說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黨集團的成員，肯定是個錯誤。」李富春、廖魯言都問：「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甚麼？」小舟說：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從反「左」到反右。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陳正人隨即回來，說周小舟承認了，這話是周講的。這時，薄一波為我解了個圍：李銳的問題，由我們組織工交幾個部的同志來解決。

在黃克誠和我作交代時，會上不斷對我們批判和揭發。羅瑞卿講了一大段話（我特別記得他對黃克誠疾言厲色的神態）：你們是不是把彭德懷、黃克誠同志那裏變成了反黨司令部，變成搞陰謀活動的地方？毛澤東同志講過：「蘇聯鞭死屍（指斯大林問題），我們這裏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黃克誠同志，你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甚麼不氣憤？為甚麼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甚麼不反映？你們究竟要搞甚麼鬼？你們不是正人君子、一貫正確嗎？周小舟剛才在那個小組會上講，他們在你家裏議論過現在像斯大林晚年，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險。可是他還騙我們說，他雖然說毛澤東同志是晚年斯大林，他還是愛護毛主席、

擁護毛主席的。我頂他：你說這些話，臉都不紅一紅嗎？像你這樣的擁護者，如果多了幾個，那還得了！克誠同志，你說你給他們潑冷水，這就是你的正確嗎？是不是說他們：你們別把我這司令部暴露了。你的黨性哪裏去了？周小舟剛才講，承認他們分裂黨，周惠承認他們訂了攻守同盟（24日或25日訂的）。李銳你們幾個要到毛澤東同志那裏去，是不是要「逼宮」？有人說，李銳的尾巴有1萬公尺長，我看至少有15,000公尺。以前我對你印象好，但感到你有一股氣味「逼人」，那麼驕傲，狂妄，連毛澤東同志都不放在眼裏。

8月10日這一天，是揭批「軍事俱樂部」中突破最後「堡壘」的一天，在三個臨時小組中，都是上午開始揭開所謂「斯大林晚年」這個問題的。

8月10日下午和晚上，臨時第二小組組織少數人繼續開會追逼周小舟同「俱樂部」主帥的關係，以及「斯大林晚年」問題。

陶鑄、廖魯言等問周小舟：你說基本同意彭的信，又說與他基本不一致，彭的信中提到糧食與鋼鐵的關係，全民辦鋼鐵，人民公社搞早了，不講缺點，有壓力，民主不夠，浮誇作風，認識過遲，「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糾「左」比糾右難，你同意哪條？

周小舟：前五條基本同意，後三條不同意。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講一部份幹部我同意，講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我不同意。

陳正人：黃克誠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銳三同志說，現在是不是達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沒有集體領導，現在反右會不會出亂子？這些話你都說了沒有？

周小舟：我說了。23日晚上到黃克誠同志那裏，我心情緊張，李銳和我講得多，周惠講得少。講到毛澤東同志這樣講，是

甚麼道理？這樣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認為廬山會議原來提出十八個問題，現在不提了，只提反右，並提彭的信是反總路線的綱領，我有抵觸。還講到黨有分裂的危險；主席對彭這樣的態度，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中間有甚麼原因？是不是毛澤東同志一時的憤慨？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見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決定的，還是主席一個人決定的？是否會造成黨的分裂，影響毛澤東同志的威信？當時黃克誠同志說，不能這樣看，主席的話是有道理的。這點黃是對的，正確的。這兩句話不敢講出來，當時有一種心情，準備向毛澤東同志自己講。

有人問：你們想向毛澤東同志講，目的是甚麼？

周小舟：我們是想向主席進忠言，覺得主席的批評過份了。

李富春：就是實際上給彭德懷同志打抱不平。

周小舟：是有這個意思。

羅瑞卿：算不算陰謀司令部？

周小舟：我說不是陰謀司令部。

陳正人：你說不是陰謀司令部，為甚麼在黃克誠同志那裏敢講，而在其他地方不敢講？你回答。毛澤東同志說是反對派、「湖南集團」，是毛澤東同志錯了，還是你錯了？

周小舟：根本不存在反黨集團、「湖南派」，我不是反對派，我是擁護中央、毛主席的。8月7日上午我與周惠同志講過，我們這次犯了錯誤，但我是清白的，我與反黨集團無任何關係。但我與彭、黃、張談過話，我的問題洗不清。第二，我是愛護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如果一時搞不清，我估計關起來，或許殺頭，但我絕對不會自殺的。第三，你回去以後對我的小孩子關照關照。當時周惠同志講不至於如此，問題最後是可以搞清楚的。我的心情是擁護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總路線的。我也有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對毛澤東同志講話有抵觸情緒，認為批評彭德懷

同志的罪名大了、重了。因此，我說毛澤東同志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

廖魯言：你犯了這樣大的錯誤，一點不感到良心的責備，不知是甚麼心情？

周小舟：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黨集團的成員，肯定是錯誤。

李富春、廖魯言等問：「斯大林晚年」是甚麼意思？

周小舟：直接形成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

8月10日臨時第四小組開會，彭德懷首先作檢查，隨後與會者發言，追問彭與張聞天、黃克誠的關係，其間談到「斯大林晚年」問題。

彭德懷：張聞天有兩次到我那裏去，我與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時我們談過幾次，也談論過南寧會議的問題。張聞天說，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甚麼情況也不了解，他不滿意。我對毛澤東同志有成見，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沒有結合在一起，有時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會議批評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問題，是張聞天講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時講的。我聽到講沒有表示態度。我只講了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問題。

有人插話：你講毛澤東同志讀了很多古書，很厲害。

彭德懷：我講過毛澤東同志提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在中國革命中是很厲害的人。這個我講過。張聞天為甚麼到我那裏去？因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為我腦子裏反動的一面升起來了，加上過去的不滿，聯繫在一起。他還講毛澤東同志對中國歷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講的你贊成，你講的他贊成，這不是共同的嗎？

……

李井泉：你與黃克誠究竟談過這些問題沒有？你們的關係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懷：工作關係多，談別的很少。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志厲害，講過是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

小組會還沒有全散，人們還在繼續追問黃克誠時，我跟着薄一波離開會場，由他主持，有劉瀾波、張霖之、彭濤、孫志遠、呂正操等幾位同志參加，聽我的交代。其實有關的種種情況，我同二周與黃老的關係，在山上的來往，這個爆炸性的「晚年」捅出來之後，也沒有甚麼好談的了。我最擔心的是同田家英（也還有胡喬木）的來往，再這樣被追逼下去就複雜而麻煩了。田家英也在第五組，當我退出會場時，我見他是面無人色的。一方面覺得不能再牽連他們，同時也認為，這樣對主席有甚麼好處呢？把我們之間那些議論都揭發出來，主席身邊多年最親近的幾個秘書，對老人家竟有這樣一些看法，這對主席的威信也毫無好處。可是關於我同田、胡間也有活動，第二組的《簡報》上已有反映。於是我就先單獨同薄一波談出我的想法：「禍」是我闖的，一切由我承當，我作交代、作檢討，但人事關係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黃克誠為止，這已是眾所周知的，無可隱諱，決不能再扯寬了。薄一波很同意我的想法，要我「先發制人」。我隨即寫篇自我揭發的檢討。於是解決我的問題的小組會也就無必要開了。11日上午我交出檢討，檢討由薄一波看過。他在「對彭德懷的信起了呼應的作用」之後，加上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句。這是當時毛澤東給張聞天信中用過的話。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勞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輕」、「不徹底」等類指責。題目為《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

內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間交換過的各種意見，直到23日夜晚的活動：「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30日夜晚寫的信，「還欺騙主席，說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擔保寫的」；由於思想、立場相同，有反黨活動，同黃、周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陷入這軍事俱樂部的一員」。同主席的兩次談話，小舟早已同別人並在第五組談過，為了避免引起諸如此類的誤會：難道是主席鼓勵你們鳴放嗎？我是這樣寫的：「主席了解到我們這種不正常的情緒之後，便鼓勵我們發言，實際上就是讓我們將自己的牛鬼蛇神放出來，公之於眾。」這也算是我當時的一點「苦心」吧。從延安起，就受到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說實在的，我對毛主席一直是極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為證（此書寫於1952年，有英、日等外文譯本，為國際公認研究毛澤東早年的必備書）。現在也沒有失去這根本一面，這有《龍膽紫集》為證（這是秦城監獄中8年作的舊詩詞，《廬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從，遇事保持自己的一點獨立思考而已。為了「主客觀」的一致，我一開始就寫道：「在廬山會議的前一階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結合一起，想把會議的方向導致多談缺點，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並對絕大多數貫徹總路線的『左派』同志進行責難，因此散播會議有壓力，有不能暢所欲言的空氣。」不料我這點「苦心」使得小舟極其不滿，因為我曾同他談過一些田、胡同我談過的東西，他認為我「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結果他13日寫的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主席批示：「全篇挑撥離間，主要是要把幾個秀才劃進他們的圈子裏去，並且挑撥中央內部。」這些細節已無關緊要，但也可說明當時情況的複雜。「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種「藝術」，多麼難於掌握啊！「撲朔迷離假與真」，確是自己的深切體會。毛澤東同我們幾個人的頭兩次談

話，小舟曾跟羅瑞卿等人談過，結果後來遭到「假傳聖旨」的指責。

當時將毛澤東同斯大林晚年相提並論，確實引起義憤，一般都認為是一種污蔑，絕對不能接受的。保衛總路線，保衛毛主席，這已是會議中慣用的口號語言。只有我們這些狂妄之徒，如此斗膽私下議論。因此，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參加第二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發言。他已經聽到彭德懷和張聞天之間談過這個話。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的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蔑」。他從六個方面作了比較：

（1）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繫、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麼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2）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少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志們的意見，怎麼能說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說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他要負責任。當時到會的同志大家堅持建議不要這樣往下傳達，以免全黨層層檢討，影響幹部的積極性，毛主席才勉強地接受了這個意見。

（3）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了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4) 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致在蘇共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委、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志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地工作。

(5) 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三十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面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6) 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過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最後，胡喬木從恩格斯《論權威》一文，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

胡喬木發言時，好些人插話。康生插了幾次，有一段這樣的話：「彭德懷同志有反動的一面，有革命的一面。現在是你反動的一面向革命進攻，革命怎能不擊退你這反動的進攻？就是你自己的革命一面，如果不殲滅你這個反動的一面，你還做甚麼共產黨員？」

到了8月13日、14日、15日的大會上，關於「斯大林晚年」

的事，還有些人在追查、批判。14日的大會上，陶鑄又數落了一遍：這是張聞天在「軍事俱樂部」立第一功，後來是黃克誠談的，接着又點周小舟、田家英說過「斯大林晚年」的話。15日的大會上，康生發言說：你們誣衊主席是「斯大林晚年」，信是俱樂部的綱領。彭德懷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指責，辯解說：洛甫沒看我的信，我唸幾句，他就走了，不是共同綱領，沒同周小舟談過。林彪馬上插話說：共同思想就是共同綱領。賀龍接着說：毛澤東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過，廬山可能有兩個司令部，另一個是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反對黨的總路線。他們要中央，更準確地說，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做檢討，因為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同志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這還了得，非改變中央領導不可。這次會議維護了黨的總路線，特別主要的是解決了黨的團結這一百年大計的問題。更不能容忍的是，污衊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到了斯大林晚年的情況，黨中央已沒有集體領導。這些惡毒的攻擊難道不更甚於羅隆基、陳銘樞等右派分子對黨和領袖的攻擊嗎？

「斯大林晚年」這個爆炸性的問題一攻破，人們的「攻堅戰」取得最後勝利，當時我就感覺到，廬山會議可以結束了。

毛澤東8月11日講話

(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

8月11日下午開大會。

我的記錄本上較為詳細地記有毛澤東的長篇講話。講話中提到我的名字：「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聽到這裏，我知道我的不牽連別人的目的已經達到，心裏也就踏實了。

下面是毛澤東的長篇講話：

開了四十天了。《簡報》每天幾本。今天允許我講一點，可不可以？不是講言論自由嗎？要求民主嗎？

(1) 講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所謂人生觀就是講社會觀。所謂世界觀，就是講自然界，恐怕是這麼說的吧。我就不懂甚麼叫人生觀（人生觀外國書上很少）。兩個是一個東西，就是世界觀，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這兩個部份。為了通俗起見，既然大家關心，人生觀談談也可以。這個問題在一部份同志那裏是沒有解決的：是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彭德懷同志是世界觀、人生觀問題，是經驗主義人生觀、世界觀問題。世界觀同時是方法論。中央常委和他們幾位犯錯誤的同志交換了意見，我們說了我們的觀點。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同馬克思主義相違反的，是主觀唯心主義、經驗主義，或唯我主義。外國流派，馬赫主義，盧那察爾斯基，無客觀標準，不是從感覺到理性，而是

主觀唯心主義，一廂情願，單相思。中國的一句話，叫自以為是，不是客觀的實事求是。客觀真理是經過千百次反覆感覺，山水草木，牛馬豬羊，小人老人，才確認清楚。歷來犯錯誤的人，都是唯我主義，極端主觀唯心主義；西方流派，貝克萊：為何有我？由於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錯誤，是世界觀有問題。犯錯誤的人，要改造世界觀，或是部份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說，唯我主義是主觀唯心論的極端。

(2) 跟彭德懷同志個別談過一次；跟黃克誠同志幾位談過兩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懷、黃克誠及其他幾個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銳啊，也還有周惠，一起談過兩次；統統交心，我們的心交出去了，他們也交了一些。我覺得他們三十幾年的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為甚麼沒變？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領袖吧，如彭德懷同志，我感覺到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改變過來。因為資產階級的立場，他這個宇宙觀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從1928年起，31年，因此總跟我們格格不入。所謂三七開者，不是跟我一個人。如只同我一個人有仇，或者我不對，或者他不對，那一個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格格不入。就是說，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

(3)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階段，他們是參加的，他們是積極的，但在方法上也常常搞錯，不「左」即右。立三路線、第一次王明路線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線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還有鬧獨立性，黨性不純嘛，鬧獨立王國這套東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他可以參加，這是我們黨內同盟者，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掛共產主義者的招牌。我說中國

這個黨實際是個聯合會。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是各個山頭結合起來的，山頭中彭、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經驗主義，洛甫是教條主義。我看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他們都是參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至於參加共產黨，他們那個黨員稱號是不合乎他們的實際，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同盟者，帶着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是沒有精神準備的。我記得彭德懷跟我講過，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沒有準備的。黨內一千幾百萬黨員，很多是因為反帝反封建參加黨，後來許多人成為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崗路線，參加高崗集團，以及這一次，我看比那兩次要惡劣，比立三路線那個時候要惡劣。比如講一些話，實在不像是馬克思主義嘛。甚麼糾正右容易些，糾正「左」難些？我說是奇語，「奇文共欣賞」，那是文，他這是語。甚麼「歷史經驗證明糾『左』比糾右難」，這個歷史就不對嘛。陳獨秀究竟好了沒有？羅章龍好了沒有？張國燾跑到哪裏去了？高崗跑到哪裏去了？瞿秋白已英勇犧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線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參加工作。洛甫這次又發生動搖，但王明也沒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對王明還是寄以希望。

我看現在你們猖狂進攻，一部份同志是與西藏事件、全世界罵我們有關係的。從前全世界罵，他們還不注意。西藏問題一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一次大規模的全世界罵我們。罵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歡迎！共產黨不挨罵，算甚麼共產黨？！比如罵人民公社，從杜勒斯起就罵了差不多一年了，國內資產階級、地富反壞罵，富裕中農不贊成，兄弟國家懷疑。對於大躍進，也是懷疑的，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也是懷疑的。過去我們指標又搞高了。甚麼糧食增產100%，棉花增產100%那一套。今年指標也高了，

甚麼3,000萬噸、2,000萬噸，高了。我說只要略有增產，我就是堅定不移。糧食增產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躍進。他們說不止一成，有三成。早兩天，我問彭德懷，他也說有三成。一成就是躍進，可以增產三成，這還得了！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同志沒有精神準備，一來就抵觸。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形成這個集團的時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間，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為甚麼那個情緒一下子反映到那邊去呢？我看要從階級鬥爭來得到解釋，從歷史唯物主義得到解釋。這些同志對地主階級、帝國主義是仇恨的，現在革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體經濟）的命！消滅剝削階級，贖買民族資產階級，對農民、手工業者用集體化辦法。這就觸動幾億人口了。他們不理解。在這個過程裏頭，他們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懷對青年團講話：黨的政策讓他們猖狂（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們說他搶先了，看來他是反對資產階級的。但是我總看，要消滅掉中國的剝削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他是沒有下決心的。這十年，對他們是突如其來的。現在是甚麼時候？是人民公社、大躍進年代，這個公社、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與人民群眾密切相聯。人民公社一來，於是就鬧翻了。

在廬山是兩種氣候，一種，大多數說大躍進、公社化好得很；少數，「俱樂部」的同志就說是糟得很，他們的看法跟羅隆基接近；有些人說他們是有過之無不及，因為羅隆基承認你解放軍，彭德懷連解放軍都不承認了，說可以垮台。

四、歷史上他們參加過多次的分裂組織。第一次王明路線，把黨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機會主義，一部份布爾什維克。我聽張鼎丞講福建問題，把黨權、政權剝奪去，封為「羅明路線」，還有甚麼鄧、毛、謝、古。我被封兩個稱號：「狹隘經驗主義」，

這一下刺激我切實研究了一下馬克思主義哲學。至於政治上，我叫我「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游擊主義」、「上山主義」。這對我幫助很大。至於高饒集團，這是一個大的陰謀活動，是大的分裂活動。好在搞得快，因此搶救了一些同志。再遲半年、年把，我看不曉得怎樣了，就是要按高、彭、饒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即中國這個世界。彭在歷史上最嚴重的是參加高崗集團。張國燾是個分裂運動。陳獨秀是個分裂運動，他搞過「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名「列寧派」，打着列寧的招牌。羅章龍在上海成立另一個「中央委員會」。第二次王明路線，實際是兩個中央，武漢一個，真正掌握實權的是武漢那個，而延安不過是「留守處」。

五、彭這次迫不及待，你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盡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六、去年一年，今年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績，而且有反面成績，如「共產風、浮誇風吹遍全國」，「強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沒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個地方：一個國防部沒有吹遍嘛，一個外交部沒有吹遍，還有一個湖南省沒有吹遍。這些同志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他都是機會主義。還有強迫命令，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經濟、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比例失調，引起城鄉各階級關係緊張，不得了，市場緊張。這一切，據我看都是好東西，大為教育了全黨全民。

七、這些東西在全黨全民中間，在這一年內進行，等於過去幾十年。學會了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平均主義、「一平二調」是不對的，這是個大學校。這是「共產風」。浮誇之風呢？吹一次極有好處。你不吹，總要吹的。就是這一年，大躍進，甚麼放

衛星，放許多假衛星，報紙上登許多，它勢必走向反面，浮誇之風走向實事求是，現在衛星不放了。還有比例失調，3,000萬噸，2,000萬噸，1,650萬噸，這三個階段，對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經濟工作的同志，是極深刻的教育。就是我們搞的嘛！除了「俱樂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確」的，因此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得到經驗。全黨都得到這樣深刻的教訓，叫比例失調，市場緊張。還有甚麼煉鋼鐵，小土群，說湖南有5萬個小土爐，3萬個點了火，2萬個沒點火。都變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別是經過「俱樂部」同志這一罵，四十多天罵，大有好處。

八、確有大躍進，我看可以肯定。我到處問，公社究竟是好，還是壞？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條，必須政治掛帥。政治是上層建築，組織生產。蘇聯的《哲學小辭典》，講同一性，是形而上學，非馬克思主義，否定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生與死有同一性。戰爭與和平無同一性嗎？請問戰爭如何轉為和平？和平如何轉為戰爭？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抗美援朝，對立的東西有同一性。關於經驗，經驗主義，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赫主義，杜威主義；關於政治，自由，必然性與偶然性，自由與必然，這些都可涉獵一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保護經濟的，使經濟合理發展。技術措施是甚麼東西呢？它是生產進行中必須採取的措施。彭德懷講甚麼「自由、平等、博愛」，根本不懂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甚麼叫上層建築，甚麼叫經濟基礎。他就是不懂，又裝懂，發表長篇大論。還有第一書記掛帥，這也是第一書記掛帥，那也是第一書記掛帥，在彭德懷他們看來實在十分討厭，我高興。我看無非是你想掛帥，與其你掛帥，不如我掛帥。你們如通過彭德懷掛帥，我沒有辦法，我服從。你們如通過我掛帥，我就掛。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必須政治掛帥，第一書記掛帥。

九、集體領導還要不要？這是赫魯曉夫特別強調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點經吧！關於集體領導，有沒有？我們中國國內有沒有集體領導？有沒有所謂民主同言論自由？這回要「集體領導」。中央委員會是沒有「集體領導」的，大概省一級除湖南之外也不多。還有，「民主」是沒有的，「自由」也沒有，自由首先是講言論自由。在廬山，我在頭兩個禮拜，鼻子也是不靈的，看到有點問題就是了。有點靈，不是完全不靈。看嘛，提出十八個問題，就沒有團結這個問題。以後拿來一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來一看，我說要加一個團結，這為甚麼？就是對抗那個分裂。因為7月2日那次常委會上，彭德懷同志所表示的那種態度，我就看出這個苗頭，是要颳點甚麼風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個團結問題，變成十九個問題。但是颳的甚麼風，這個廬山是兩個司令部，詳細情況，完全沒有料到。有沒有集體領導，這個東西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事實問題。要派萬人檢查團，或者千人檢查團，或百人檢查團檢查。這回我們開中央委員會，一百多人開會，你檢查究竟有沒有集體領導，這回為甚麼要開會，就是為了滿足同志們要的「集體領導」嘛！這也是第一書記掛帥，那也是第一書記掛帥，好嘛，就不掛帥了嘛。掛還是掛。你們看嘛，一百多人開會，不能我一個人說了算。滿足「集體領導」的要求。以後大家如果贊成，一個月一次中央全會我都幹。一個月開一次，一年十二個月十二次，就是天天開也可以。你不是老說我沒有民主嗎？沒有集體領導嗎？就是個人獨裁嗎？他們那個意見，就是還是你那個獨裁好。現在許多同志講出來，彭德懷同志，你那個軍委會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種甚麼制度？有沒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們現在爭「民主」，爭「自由」，爭「言論自由」，就是他們要搞政治掛帥，要搞第一書記掛帥。他們要搞沒有大躍進，或者很小，小躍進，不躍進。

他們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為達此目的起見，他們要這些東西，一個叫「集體領導」，一個叫要「民主」，一個叫要「自由」。我們現在都沒有做。你說華北會議操了你四十天的娘，你在這裏還只操了二十天，還操不得？現在我說要滿足四十天，不然我們還欠二十天的賬，我還加五天，盡你操，滿足你操娘的願望。但是要指出，他們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要他們來領導，要高饒集團的殘餘分子、漏網分子，還摻雜點別的人來領導。所謂「民主」，就是要反現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說這種「民主」、「集體領導」與「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號。他們所謂「集體領導」與「民主自由」，與我們的是兩種：一種是反動的，一種是革命的。他們所謂「集體領導」，是宗派主義的，不利於黨，不利於民族，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而我們的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的，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照他們那個搞，我看不行。就是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他們的「集體領導」是假的。資產階級也有民主，美國還有國會，你說沒有集體領導？盡是獨裁？可是所謂「民主」，是搞資產階級民主；所謂「言論自由」，是資產階級言論自由，是反無產階級的。他們還要求「民主、自由、博愛」（最近不是發了這個文件嗎？），這些東西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他們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鳴大放。這個口號是章羅聯盟創造出來的，現在轉化為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大鳴大放，要把我們放倒，把我們鳴死，他們就活起來；我們垮台，他們就上台。他們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有自由，無產階級就沒有自由。他們「博愛」，愛甚麼？是博愛右派，我們是愛「左派」：工人、農民。6億人民，除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分子和廬山會議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們都愛。這個右派司令部，我就不愛。我給他們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們把毒素放出來；給自由活動，就是不要禁止

自由活動，要讓毒草長起來，以利拔掉。我向你們交心呀，你講我陰謀，我講給你們聽，就是這個道理。我叫你們放，你說我釣大魚。確實，就是要大魚、小魚一起釣，你不釣不得了。這個大魚叫甚麼魚？是吃人的魚，是鯊魚啊！

有資產階級那種「平等、自由、博愛」，就沒有無產階級這種平等、自由、博愛。這兩個東西是完全對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橫豎是生死鬥爭。這些，我看是「俱樂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們沒有階級觀點，沒有讀過歷史唯物論，或者讀過忘掉了。歷史唯物論是階級鬥爭學說，革命學說，如革命的戰略策略，是如何鬥倒資產階級，包括意識形態方面鬥倒。都是階級鬥爭的學說。

十、這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一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不是有幾位秀才最近倒霉嗎？李銳不是秀才，他是「俱樂部」的人。李銳同志啊，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個會議上取消「湖南集團」稱號嗎，我不大願意取消。不過，叫「湖南集團」不合適，那是我與你們幾個人講的。譬如有張聞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說：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們有區別，這個人據我看，與「俱樂部」的人只是沾了一點邊，你說他是「俱樂部」的正式成員，我不相信。周惠這人有缺點，但是比小舟好。小舟這個人他是不給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見。小舟啊，我就是這麼說的。你們不要妄想，把我們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謂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說我這個人變來變去，我是蝙蝠。開始算是你們「俱樂部」的，後頭又不算「俱樂部」的了，退出你們那個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喲！這也是一個新聞。這是說7月23日。怎麼轉彎的？同志們，你們不是三番四次要求我們開放民主，要言論自由，說是廬山空氣很不正常，

壓迫民主嗎？我很同情你們，我說那還得了，那決不能夠。我們要告訴每一個支部，不要壓制民主，啥話都要讓人家講，無非是講得好，講得壞，放香屁，放臭屁，統統要讓人家放。人長着耳朵是幹甚麼的？是聽話的。至於口，有兩個任務，一個吃飯，一個講話。所以我就答應他們，開組長會，說服這些同志，要聽他們講話，要開放民主。到20日那天我找組長們談過一次，講耳口並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頭皮頂住。鄭州會議，1957年青島會議，就講了硬着頭皮頂住嘛，中央發了指示嘛。今年3月鄭州會議，我講的話，又是說，對於算賬派、觀潮派，讓他們講，硬着頭皮頂住。同時我跟「俱樂部」的同志也說，你們也照辦，橫豎好的就聽進去，不好的就硬着頭皮頂住。你說我不公道嗎？我兩邊都這樣說的。至於你們還有些甚麼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幾次問小舟，你們放甚麼？你們要民主，大鳴大放，受了壓抑，究竟要放甚麼東西？他又不講。聽說他有十大綱領。對我就沒有講，只講了個別問題，比如食堂。後來跟少奇講了。（少奇：是你談的）小舟你那幾條，我就沒有印象，當時我就不記得你第一、二、三、四、五條……因為我跟你談時，不是你一個人，還有別的人在座，就是沒有把你的綱領拿出來。後來才感覺不是個別問題，而是要推倒總路線，要把「俱樂部」合法化，擴大「俱樂部」，招收會員。要合法，這個我就不知道。我同意過你們辦「俱樂部」嗎？我同意過你們推倒總路線、推倒大躍進、推倒人民公社嗎？如果同意過你們，然後又反過來反對你們，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轉彎。我沒有，怎麼叫轉了一百八十度啊？！

十二、今天是11日，下午休會，明天休會一天，後天開大會，請同志們準備講話，我就不講了。因為我今天講過了，好使你們精神有準備，告訴你們我心裏想些甚麼東西，以便你們「俱

樂部」同志去準備講演稿。「俱樂部」的同志們！13日開大會時，最好你們不要寫，那麼謹小慎微，那麼怕人家抓小辮子！我們德懷同志現在極為謹慎。你學我這樣搞點小題目就是。請你準備一下。

十三、辭職的問題。德懷同志提出辭職，不幹這個國防部、軍委工作了。這個問題究竟怎麼辦？過去我們跟彭德懷同志幾次談話，兩次常委會跟他們談話，常委會為一方，「俱樂部」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還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講話。我高興，我說他開始取得主動，表示歡迎。我高興了，就請他來談了一次。他又提出這個問題，我說還是你幹吧！常委會過去我們議論過，還是他們幹。但是究竟如何？還是辭職？還是改換工作好一些？還是照舊不動好？另一個是黃克誠同志的總參謀長。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幹不幹，這兩個我提議討論討論，不然又是我獨裁。你這個常委會，只有這麼幾個人，我又跟彭德懷同志個人說了。不是講要民主，要集體領導嗎？這個問題是個大問題。究竟彭德懷同志幹不幹國防部長？黃克誠同志幹不幹總參謀長？請同志們考慮。工作是要給的。究竟是照樣不動好，還是改換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開一次軍委擴大會？有些同志建議，特別是軍隊方面的同志建議，這個問題今天要解決，如要開就發通知。（周恩來：小組很多同志主張開）我是贊成開的。因為不是講要「民主」嗎？擴大「民主」嗎？「集體領導」嘛！軍隊裏頭散佈這些毒素，「俱樂部」的毒素，不肅清是不好的。我主張開。每個師來兩個人，師長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隊伍來一個適當的人就行了，現在他們很緊張。問題是「俱樂部」的同志們，你們贊成不贊成？你們如不贊成，表示意見。大概最多開半個月，兩個星期或十天，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單純。

十五、現在我們搞三個決議、一個公報。三個決議，就是

一個增產節約，公開發表的，鼓足幹勁，增產節約，爭取下半年完成任務。要反對右傾思想，不要鬆勁，要鼓幹勁。第二個是黨內的，叫「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這個不指名的，發到全黨去討論，分析現在黨內的情況，也不具體指廬山有甚麼「俱樂部」。這是一般的。這兩個今天馬上就付印，發給所有的同志徵求意見。第三個就是關於彭德懷同志的錯誤，要作個決議。這個決議，大體上我先講下方針：就是他犯了錯誤，允許他革命，我們要團結他，幫助他，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這個決議我們準備不要發廣了，發到縣一級、團一級幹部，不在全黨去討論。只要有這樣一個處置，就保障了我們的黨沒有危險。如果他們繼續進行分裂活動，那一直發下去。再開亂子，那麼公開在報紙上發表。「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現在不要發表，在全黨討論。但看他們的情況，他們變不變，轉不轉。如果需要發表的時候，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翻成外文，讓全世界知道，看他們改不改。我也不贊成把他們開除出政治局，更不贊成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有幾個反對派，我看有好處，可惜太少了一點，只有一個半，一個政治局正式委員，一個候補委員。這些都是我們常委會議論過的，我現在代表常委會說話。有許多是組長議論過，還有一些同志參加。再一個公報，講改變指標，以及形勢、情況，無非是鼓足幹勁，確有大躍進，人民公社很好，這一套。這個決議，你們兩方、大家要講話的。草案是少數人起草的，常委會的意見，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們的意見。你們知道一個方向，常委有這麼一套意見。讓對方講話，你們想一想，或贊成，或不贊成。三個決議，一個公報，迅速發出。

十六、這次會議，我建議收場要收得好。廬山會議開頭是神仙會，搞到尾巴上連一點神仙味道都沒有了，也不好啊！要以

團結合作收場，雙方交心通氣，一看二幫，或一批二幫、一鬥二幫，批評之後變成一看二幫，看改不改了，還要幫。我相信全體同志經過這次會議會大進一步。這次會議要收得好，實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個原則。

十七、要估計到那些同志的兩面性，革命性和反動性。他們的歷史證明他們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實。但是他們腦子裏頭，那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不說它是反動的，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組織宗派，進行分裂活動，反對全黨的大多數、全國人民的多數所擁護的總路線。而且跟許多人合作，中央常委六個同志，「俱樂部」的同志沒有一個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對我而已。如果單只反對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個，還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究竟能說得出來的氣味相投的有幾個？我看很少吧。還有元帥，十個元帥，我聽說彭德懷同志跟九個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我跟他本人、跟黃克誠也講過，我說你們怎麼工作法？十個元帥，跟九個不合作。至於大將、上將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將更多了。他們從來不提倡團結的口號。我所以在3號印出來的那個東西中提出團結問題，我就抓這個旗幟，我們大多數要抓團結的旗幟。凡是錯誤路線都是不提團結的口號，因為他們要分裂。我們要團結：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就是不團結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澤、宣統皇帝。至於羅隆基、龍雲他們現在還有官做，那些人實際上是反革命，所以擺他們的位子，無非是以示寬大。因為有三十多萬右派，我們擺他們幾個，那些右派說，唉，我們朝中有人啊！這樣有利於改造這些右派。（安子文：現有45萬）好多？45萬？哈哈，隊伍不少！所以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

反，一個反右。現在為甚麼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鬧不起來？現在紅軍還沒有請？我看幾個原因：第一，共產黨是聯繫群眾的。中國黨沒有拉科西，中國又沒有納吉，你能說周恩來同志是納吉嗎？他是總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這是最主要的。這是路線正確，作風正確，這是聯繫群眾。第二，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只有黃紹竑說我搞壞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萬嘛。所以現在我們黨內，「俱樂部」的同志相當孤立。我說內外夾攻，並非其時。現在是一個太平世界，形勢很好。否則我們為甚麼在廬山開神仙會？那個緊張是你們緊張，我們並不緊張，有甚麼緊張？開會前，我十天走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情況很好，這4個省可以代表全國。以上講的是估計他們的革命性。

我們的會開到今天四十天，7月16日以後到今天，對他們的反動性批判比較着重，現在要注意他們革命性一面，同時還要批判反動性一面。我今天講的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謂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懷同志說過，難道我們三十一年關係，現在就在廬山分手嗎？我們就決裂嗎？我說不，不應該決裂，我們要合作，三十一年關係嘛。這是就我來說。同別的同志呢？長短不一，總司令、林彪有三十一年。總而言之，我們的關係，我認為應當繼續下去，應當搞好，而不應當在這次分手，把他們拋到海裏去，應當把他們留下來，幫助他們，同志式的態度。這就搞兩條：必須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處理從寬，並不包括一點職務都不變動。他們繼續敵對，我們繼續批評，繼續批判從嚴。王明告洋狀，聯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條罪狀告訴我們，他們想把這個瘟神送回中國。我勸這些省委書記，你們不要怕告土狀。秦始皇不是被罵了二千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被罵

了一千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被罵了三千年了。好的講不壞，一時可以講壞，總有一天恢復；壞的講不好。

十八、再講兩句國內國際形勢。據我看非常之好。當然美中有不足，瘋子可以鬧事，但總的國際形勢我看是好的。這是國際形勢。國內形勢，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蔣介石搞了二十年，越反動越好。我的意見：我們中國共產黨就是他們教育出來的，除了馬克思，就是他們教育出來的。沒有他們教育、壓迫我們，能搞起來？我看是不行的。現在國際形勢我看是好的，我們「俱樂部」同志對於國內形勢他們是悲觀的，國際形勢他們也可能是悲觀的。不可能國際形勢是樂觀的，國內形勢是悲觀的。

十九、歡迎最近幾天那些同志的進步。我在這裏表示歡迎。

二十、我要喊一個口號，叫「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

完了。

大會批判

8月11日大會，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之後，13、14、15日三天連開全體大會，由彭、黃、張、周作檢查，大家批評。

根據毛澤東、林彪和常委會定的基調，人們十來天的揭發、批判和幫助，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三人，最後只能「繳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攬起來，除此別無出路，因為必須維護黨的總路線，維護黨的團結一致，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他們做這種違心之事，當然是萬分痛苦的。那又有甚麼法子呢，這是歷史鑄成的共產黨員的天職！黃克誠後來對他的兒女說過，廬山會議後期，他還是違心地認了賬。雖說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長期以來服從集體決定，服從中央的習慣，因而最後像彭總一樣，採取了「要甚麼就給甚麼」的態度，但總覺得自己講了不實事求是的話，心中一直耿耿。正由於這個教訓，在「文化大革命」中寫檢查交代時，他就變得更加「頑固不化」了。（見黃梅：《我心目中的父親黃克誠》）這種大會檢討，我本來不準備再實錄了，錄下來確實沒有任何意義。但再三考慮，還是摘要錄下，讓後人知道，人跟現實可以被扭曲成何種模樣。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三位尊敬的革命前輩，他們的在天之靈，想必也會原諒我這樣做的。

8月13日上午的大會由劉少奇主持。先是張聞天作檢查，他講的第一個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表現

在對去年的群眾運動潑冷水，誣衊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否定成績，誇大缺點，想造成後果嚴重、漆黑一團的印象。對供應緊張等困難表示害怕，希望放慢速度。認為糾「左」比糾右難，所有這些的目的都是為了希望修改總路線，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成了他們的代言人。彭德懷的信和發言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綱領。

張聞天檢查的第二個問題是對彭德懷錯誤的看法，認為這次彭的主要鋒芒是反對毛澤東。他說過，在中央常委會上都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注意了個人威信而沒有注意集體威信，要注意斯大林晚年的危險。彭德懷的信中說的「腦子發起熱來」，「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種種原因難於決斷」，這些話的目的，都是為了推翻毛澤東的領導，按照他個人的面目來改造黨。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有目的，有組織，有準備，有活動的。「我曾經對彭表示過一些和他同樣的看法，未向中央報告，是我的嚴重錯誤。」

張聞天檢討的第三個問題是他自己的錯誤。他說，他是6月間開始陷入「軍事俱樂部」的，7月23日以後逐步退出。他為甚麼會陷入「軍事俱樂部」呢？

(1) 是思想上右傾，過份看重大躍進中不可避免的缺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按勞付酬，共產主義萌芽等等，認為太多太過火，只願意看到缺點，不願意聽說成績，把馬克思主義統統忘記了，看不出彭德懷有野心。由於自己對中央有不滿情緒，就視彭德懷為同道，埋怨人家不聽彭的，以為中央不願聽反面意見，這就完全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俱樂部」這幾個人，思想都右，是「資產階級俱樂部」，資產階級的工具。定要站到中央、毛主席方面來。

(2) 是教條主義的老原蟲復活。(按「老原蟲」一語的來歷：8月2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張聞天，引用了一首詠瘧疾的元曲小令，信中說張聞天「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張聞天即據此調子作檢討。) 我的教條主義思想根源很深，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我就污衊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還攻擊過張鼎丞、譚震林、鄧子恢、邵式平等同志，現在我要再一次向他們道歉，那次錯誤造成很大損失，我負有很大責任。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我對毛澤東同志有一定的尊重，但還有點分庭抗禮，對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惟一領袖還沒有深刻認識。延安整風以後，對毛澤東的思想、領導，開始信服，只對整風審幹中「左」的現象有些不滿。張聞天談到1945年到1955年，他從去東北到調外交部不在中央工作的這十年，檢討了他有時將毛澤東的談話只當做解決具體問題的指示，而沒有及時傳達的問題；檢討了在緊急的轉變關頭站不穩立場的問題。他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路線是已經證明了的惟一正確的路線，不能有任何懷疑。廬山會議證明了誰不跟毛澤東走誰就會犯錯誤。可是由於教條主義的老原蟲復活，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反對總路線、反對毛澤東同志這一點上結合起來，他也就由對總路線懷疑、動搖，走到反黨。今後要老老實實做毛澤東同志的學生。

(3) 由於教條宗派主義的原蟲復活，延安整風後，教條宗派主義的毛病有所克服，但原蟲並未滅絕，在一般情況下，它是潛伏着的，但是遇到中央或中央某個同志對自己的工作提出批評，就容易產生懷疑和不滿，影響工作積極性，也影響到個人同中央不那麼通氣，再加上本人還有高傲情緒。黨中央處理幹部錯誤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正確的，中央過去對我的處理是寬大的、公正的，分配給我的工作也是合適的。事實上不是中央不信任我，而是我對中央不夠信任，有宗派情緒，碰到有同

樣情緒的人就結合起來，不願團結，為人利用。這不但損害黨的利益，也損害自己。我對彭德懷也有不滿，可是由於宗派情緒，終於陷進了「軍事俱樂部」去了。張聞天表示他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威信，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

張聞天最後表示：同志們說他有「五毒」：狹、高、空、怯、私，他也完全接受，表示願意痛改。

張聞天檢討之後，與會者開始發言。譚震林給張聞天提了兩個問題：

(1) 為甚麼說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是破壞集體領導的？你們是怎樣的看法？

(2) 軍事俱樂部的活動是否從上海就開始了？上海會議毛澤東同志講話後，洛甫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就有這些觀點，我們大家是都聽到了的。彭德懷同志從歐洲回國後，他和你在政治局會議上都表示出那樣一種態度，好像別人都錯了，只有你們對。在書記處會議上黃克誠的表現也和你們一樣。

陸定一說，講共產主義快一點來，這是我與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到的。我講共產主義，說中國照那麼樣的速度，每年工業增長15%，就是一百年也到不了共產主義，現在可以快一點。我這樣講，如果有錯，可以檢討的。我這樣講，沒有甚麼了不起。聞天同志是否認為講到共產主義就不得了。共產黨員為甚麼不講共產主義？說共產主義的字眼就不行嗎？那時，我與蘇聯同志的講話，在字句上腦子裏是斟酌了一下的。沒有說共產主義快來了，而是說快一點了，不能講嗎？聞天同志聽到共產主義這幾個字，聽到共產主義快一點來，就不舒服了，好像共產主義是不好的東西。

李富春也提了幾個問題。第一，張聞天同志說加入「軍事

俱樂部」是在6月底。一方面我要問一下：6月底以前，張聞天同志與彭德懷同志就有來往，就議論了很多事情，究竟議論了些甚麼？另一方面，6月底加入「軍事俱樂部」，是有其道理的。6月底，彭德懷同志回國以後，你們在政治局、書記處會議中以及各方面的活動，確實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第二，你今天說，23日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對你是當頭一棒。但是23日以後，聞天同志還與彭德懷同志談了兩次話，還相互交換了小組會上的情況。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對你既是當頭一棒，為甚麼還與彭談了兩次話，談了些甚麼？第三，聞天同志說「警惕斯大林後期危險」，這句話是彭德懷同志講的，彭德懷同志又說是聞天同志講的。究竟是誰講的？還是大家都講了，你們似乎是異口同聲。究竟怎麼提出來的？甚麼叫「斯大林後期」？是甚麼概念？甚麼定義？甚麼內容？請交代一下，我們不懂。第四，聞天同志說，他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和平共處，有時這種思想多一點，有時那種思想多一點。五十加五十等於一百。照這樣檢討，要真正建立起來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是很難的。

康生發言一上來就指責張聞天的檢討空空洞洞，要張聞天講幾個具體問題。（1）你說，你的發言是針對着毛澤東同志的。這是我們已經明顯看到了的，比如你提出的「好大喜功」，這同資產階級右派張奚若是一樣的口吻，而且氣憤很大。你還提出甚麼不怕殺頭，這些顯然也都是針對毛澤東同志講的。除了這些以外，到底還有哪些問題是針對着毛澤東同志的？高饒反黨集團和這一次反黨的軍事俱樂部都是用耍滑頭、搞陰謀的手段，掩蓋你們反黨的本質，希望把你們的皮剝開來給大家看看。（2）大家公認，你和彭德懷同志是長期對黨心懷不滿。毛澤東同志說，你的病毒又發了。你自己解釋，你的病毒是教條主義。我們看，毛澤東同志說的病毒不僅是指教條主義，而且是指你長期對黨、對

毛澤東同志心懷不滿，這次是抓緊時機向黨進攻。你有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有，應該從這一方面徹底揭發一下。（3）你和彭德懷同志到底搞了些甚麼活動？我沒有參加你們的小組會，但是從你在小組會上的發言簡報中給我的印象是你們的活動並沒有徹底交代。這樣看法是有證據的，毛澤東同志23日講話後，你還和彭德懷同志發生過聯繫，你在24日的小組會上的講話還表示不服。特別使人刺目的有這麼一句話：「你們要講成績，我們要講缺點。」顯然，你們把自己同黨是對立起來，分離起來的。我覺得，檢討個人的錯誤應該誠懇坦白，不是做文章，弄上幾條。你今天的發言，組織得蠻好，邏輯性蠻好，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但是沒有真正交心。

康生從字裏行間甚至從「印象」中尋找別人「反黨」、「反毛澤東」、「心懷不滿」的蛛絲馬跡的「本事」，並不是廬山會議才顯露的，延安時期搞「搶救運動」，黨內很多人就已領教他這一套。「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大打出手，憑着這一「本事」置多少人於死地。趙健民就是在「文革」中被康生「憑幾十年革命之經驗」打成「叛徒」的。

曾希聖發言也對張聞天的檢討不滿意，說張的檢討把事實掩蓋住了。帽子是戴了幾頂，但沒有具體事實。他戴了幾頂帽子，但又來了許多原因，把帽子也吹掉了。就是這些帽子，我們也不能同意。他們認為大會只開三天，想馬馬虎虎混下山去，不是真正要暴露和檢討自己的錯誤。

張平化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剛才洛甫同志講與彭德懷在一起很危險，慢慢上了當還不自覺，又說，他看了彭德懷同志的信沒有感覺有反對毛澤東同志、反對黨中央的野心，又說他23號的發言是腦子發熱，胡言亂語。從這些話看來，好像他是完全不自覺的，但又承認他加入「軍事俱樂部」是從6月開始，這就使人

很難理解。這是不是埋下的伏筆，準備反攻？是不是想掩蓋他們的不可告人的反黨目的，掩蓋他們篡黨的野心？第二，彭德懷同志從國外回來同洛甫同志講了些甚麼洋貨？我從他21號發言的神氣看來，很可能和洋貨有關係。因為他在小組會上特別強調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拿來主義」，而且特別舉了斯大林的例子，看來是有意的。在那裏舉這個例子是甚麼意思？為甚麼這個時候這樣強調洋貨？希望不要迴避，要老實交代。第三，張聞天同志再三聲明與高、饒沒有甚麼關係別人又沒有提，你再三聲明我就懷疑，你與高、饒有些甚麼關係，希望交代清楚。

連珠炮似的批判發言進行了個把小時之後，劉少奇讓張聞天先答覆已經提出的問題。儘管無理的批判鋪天蓋地，張聞天仍然聲明他並不想賴掉小組會上已經承認的東西，因為那些東西已經印出來了，一個字也沒有賴掉。他雖然不得不接受會議給他戴上的「分裂黨」、「宗派活動」的帽子，但還是力辯：至於到底有甚麼具體計劃，比如彭德懷同志的信發表以後，黃克誠要發表意見，甚麼人跟上發表意見，或者我發表意見，這樣的安排是沒有的，我發言是我主動要發的。對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帽子，張聞天這樣解釋：所謂加入「俱樂部」，我是這樣理解的，這是個「俱樂部」，我同彭德懷同志談過我的右傾思想的觀點，我談得比較多，這就叫加入了。這個俱樂部的組織怎麼樣，計劃怎麼樣，我所想到的，就是我講的那些東西，具體材料，我都不知道。我同彭德懷同志的關係，就是他在我隔壁，我同他吹一吹，談一些話，我沒有其他甚麼活動。我這次的發言，並不是在加入「俱樂部」以後才有這些思想的，不是同彭德懷同志商量過的。因為我有右傾思想，所以，這一次的發言同彭德懷同志的思想就一樣了。對會上有關他同高、饒關係的指責，張聞天說，像高崗那樣搞甚麼名堂，我從來不知道。彭德懷同志有沒有，我不知

道。我在上海，在小組會上就講過那麼一些意見，我那個時候沒有想到反黨。上海會議以後，我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我稍微提了一下，同志們就把我頂回去了，我心中是有些意見的。對會上提出彭德懷從外國「取經」的事，張聞天說，同彭德懷同志從歐洲回來有沒有關係？許多小組都提到這個問題。我上一次講過，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彭德懷同志講外國（比如波蘭）的一些情況，在我腦筋中間根本沒有甚麼影響。

「斯大林後期」的事仍然是被迫逼得最緊的問題。張聞天承認這個問題是從說毛澤東說了算、不民主、集體領導等問題扯起來的，但會上非逼他說清楚哪句話是誰說的、在哪裏說的。

一陣追逼之後，大會又開始批判發言。彭真說，我看張聞天同志今天的講話有這麼個問題：開始講的態度還值得歡迎，帽子戴得也比較老實，承認是反黨，反中央，反總路線，反毛澤東同志，這些都講了。但一聽到下面，就很不老實了。彭真說，你是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你覺得黨不信任你，對黨不滿。你政治局委員是對全會負責的，你究竟在全會裏表示甚麼態度？你值不值得中央全會信任？你是信任中央全會，還是不信任中央全會？你如果在中央全會採取隱瞞態度，還想把你們的反動根子留着，準備乘機再起，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勸你，既然有了好的開頭，表示願意檢討，承認是反黨、反中央、反總路線、反毛澤東同志，就不要企圖再用欺騙的方法，混過關去。混不過去，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你留着這個毒根子，對你沒好處。你講了，「你們」怎麼樣，「我們」怎麼樣，我們一邊，你們一邊，這就是說，我們之間有一道防線。

宋任窮說：剛才洛甫同志講，從研究工作談到「斯大林晚年」，這就說明，議論已經從工作上轉到組織上了。這個中間究竟議論了些甚麼？你們談到防止「斯大林晚年」，總該有個方案

吧，甚麼方案？彭德懷同志在23日以後，在小組會上講：如果我錯了的話，把我的意見書收回來存檔。我看就是現在不行了，在將來再搞。究竟你們怎樣講的，怎樣活動的，防止的辦法怎樣？

陳正人說：我看張聞天同志錯誤的根源是個人野心，而且這個野心恐怕不算小，不是甚麼個人主義之類的問題。實際上「軍事俱樂部」就是陰謀集團。高崗也是陰謀，但他還要搞一個幌子，你們這一次是明目張膽，公開打起反毛澤東同志的旗幟，要把毛澤東同志搞倒，搞倒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劉寧一發言揭發了三件事。一件是張聞天對他說過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一件是政治局會上張聞天認為取消計件工資不對，一件是武昌會議時張聞天曾問他取消計件工資是否有強迫命令。

錢俊瑞追問：彭德懷同志檢討中，提到意見書是有人提出意見，沒有送給毛澤東同志以前，有人修改了，說是幫倒忙的。問他是甚麼人？是誰修改幫倒忙？矢口不講。請張聞天同志講一下，彭德懷同志的信，他自己說沒有給別人看過，後來又說給張聞天同志看過，看了半截。張聞天同志參加了修改。參加了起草沒有？張聞天同志對彭德懷同志說，信中有刺。你既然知道有刺，21日，你又變本加厲，反黨，反人民，為甚麼？

王鶴壽說，聽張聞天的檢討聽不下去，「斯大林晚年」、中央要檢討等問題，都沒有講清。實際上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這些東西必須在全會上講清楚。有計劃、有準備，不是從上海會議、武昌會議開始的，甚至是在武昌會議以前就開始的。小組會上、大會上，聞天同志對高饒反黨聯盟問題，還是躲躲閃閃。高、饒問題爆發時，聞天同志在蘇聯，拿此來避諱，輕輕滑過去，推說不在國內。其實，張聞天同志與高崗有很久的關係，不能說高、饒問題爆發時，不在國內，就可以溜過去。在小組會上也是避諱的，就是與國外同志沒有說過甚麼。同意張平

化同志意見，你越避諱，越使人懷疑。你說在外國朋友當中沒有講過甚麼。嘴封得很死！要把思想交代一下。

謝富治說：張聞天同志反黨早就有活動了。在上海會議他參加我們的小組，討論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時，他公開要民主、要自由，強調實事求是，公開反對大辦鋼鐵，講外交部煉鋼得不償失，還搜集中央機關煉鋼的一些例子，還批評砸鍋煉鋼等。當然他的發言是沒有市場的，我們正面講了一些問題。井泉同志當時就說他是老右傾，我說他過去是搞「左傾」，現在搞右傾。現在我們正在查上海會議的記錄。我們記的大意是他主要攻擊兩條：一是不民主，二是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謝富治真有鷹犬般的「機靈」：為了批判彭、張，能想到去查以前的會議記錄。無怪乎，廬山會議一開完，他就由雲南調北京，擔任了公安部部長這個要職，而且備受賞識，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青雲直上，進入中央政治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任公安部長，謝富治是幹得最長的，當了差不多十三年。

羅瑞卿發言特別講了「斯大林後期」問題：說毛澤東同志像「斯大林後期」，他們議論很久，現在弄得是誰講的都不清楚了，我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周惠、李銳都講了。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們所以這樣說，無非是毛澤東同志驕傲了、年老了，他們對斯特朗和毛澤東同志談話中，斯特朗說毛澤東同志超過馬恩列斯時，毛澤東同志不吭聲，表示不滿意。23日毛澤東同志講話後，他們說更加證明是「斯大林後期」了，「更加證明」，說明過去就講過。這是他們對形勢的分析，根據這個分析，無非要開「二十次代表大會」來解決。羅瑞卿還說，他們說在廬山會議的發言是沒有計劃的，當然不能先列個程序，但他們是心照不宣的。7月19日黃克誠的發言是那樣的兇，很使我們奇怪。23日毛澤東同志不講話，還不知會有甚麼人跟着

走。23日前，你們是全線進攻，配合得那麼好，你搞了一下，他又來。把人搞得昏頭昏腦，譚老闆就是昏的一個。那樣一種氣氛大有搞了之後就開「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勢。

13日下午的大會由周恩來主持。彭德懷在全體大會上作檢查，他首先表示：一個月來會上的批判，「對我有極深刻的教育意義，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我誠懇地感謝同志們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檢討了他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歷史上犯過的幾次路線錯誤，以及為甚麼歷次對毛澤東的主張不理解，不贊同，或者支持不力，貫徹不力。他檢討了同高崗的關係。他着重檢討的，是這次來廬山以後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承認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他說，我的右傾觀點主要表現在：把黨所領導的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度熱情，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把已經糾正和正在糾正的缺點，片面擴大，說成是「左」的傾向，政治性的錯誤；把9,000萬人大煉鋼鐵的巨大意義，說成是「有失有得」。更錯誤的是採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損害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這次攻擊，正是在黨處於內外夾攻的情況下發起的，這就增加了嚴重的危害性，如果這些謬論傳播出去，將成為敵人打擊我黨的有力武器。從這些分析來看，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言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反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我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錯誤的嚴重性，還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偶然錯誤，而是一種有準備、有組織的行動，毛澤東所指出的「軍事俱樂部」，就是發動這次進攻的「司令部」。於是，彭德懷逐一交代了他和「俱樂部」成員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關係。按照檢討的常規，彭德懷深挖了自己這一回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提到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始終沒有得到改造，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真正確立」這樣的高度，而

且，還檢查了「這次犯錯誤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夾雜有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成見」，還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經驗主義的思想方式等等。

最後，彭德懷表態：「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志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甚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盡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鑒於當時的形勢，彭德懷懂得，僅僅作了這樣的表態還不夠，於是，他請求處分：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有力工具，由我這樣的人來掌握，是非常危險的，我萬分誠懇地提議，撤銷我國防部長和軍委委員職務，並願接受黨的任何處分，請求黨分配我去做黨認為適宜的工作。

彭德懷講完之後，周小舟發言作了一些交代，但被人打斷，沒有講完。接着是李井泉發言。他說：彭德懷同志的發言，我的看法是，同小組會所談的沒有任何新的，除個別的交代，如跟周小舟同志談話的內容外，沒有新的內容。當然，還要承認，比以往，比我們沒有參加過華北會議的同志，看起來，覺得還是有進步的。但發言當中，最重要的問題迴避了！沒有揭露自己的偽君子、野心家，企圖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黨、改造軍隊，迴避了這幾個重大問題。這幾個問題，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憑良心講，我同彭德懷同志是沒有私人恩怨的，我是作為一個黨員，作為全會組成的一員講的。我過去對彭德懷同志有迷信，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等方面也知道一些，甚麼鬧獨立性等方面，我也知道一些；這次我破除了迷信。因為二十幾天的小組會，面對面，我們天天都是聽他欺騙我們，今天說了，明天改，明天說了，後天改，天

天說，天天改，都是迴避事實真相。因此，如果按彭德懷同志這樣的檢討，至少我個人是不放心的。我以為彭德懷同志犯錯誤的危險性、對黨的威脅，我個人腦子裏沒有解除。當然，彭德懷同志寬慰過我們：你們看，經過你們這樣揭露，大家都知道了嘛，以後還有誰聽我的話？彭德懷同志後幾次表示，經過鬥爭，向心力加強了，離心力減弱了，以後跟毛澤東同志會大大接近。但毛澤東同志、彭真同志也講過，你敢不敢簽字，擔保在毛澤東同志死後不造反？他從來沒有說過敢簽字！今天也是這樣表示的。他自己吹他是張飛，是甚麼海瑞，總是以這個自居，迷感人，說自己敢於說話，接着就是說毛澤東同志聽話聽不進去。這些話，這種手法，如果不揭露，不揭露偽君子、野心家，還會來煽惑人的。他自己也知道，黨姑念他的功勞，即使不給他當個國防部長，還可以做這樣，做那樣。我敢肯定，彭德懷同志沒有死心，心沒有死，野心未死。

康生的發言仍然「與眾不同」，他對彭德懷的檢討作了個「一條界線」、「兩面手法」的概括。康生說，所謂一條界線：彭德懷同志聽了23日主席講話，26日上午在小組檢討後，我下午問他：你現在的活動是否是陰謀手段，分裂黨？你是繼續高饒聯盟（也可以說是高、彭、饒聯盟），用陰謀手段分裂黨，而且這次是你親自掛帥，你承認不承認？他在小組會上不答覆，今天在大會上還不講這個問題，一字不提。而且主席那一次講話後，他這一條界線還是保留得很頑固的。26日我們還問他：你承認不承認你是野心家？他的辦法是承認有個人英雄主義，如果將來發展下去，可以成為個人野心家，就是說在邏輯上可能存在。他的公式就是如此。

康生說他對彭德懷這天的檢討發言特別留心聽。他說彭德懷在兩個地方講了：一個地方說，他的思想夾雜着一些個人野心；

另外一個地方說，發展下去，可以成為個人野心家。還是這個公式。野心家這個界線防守的，不准攻破。我跟他說，共產黨裏邊的野心家，必然是偽君子，因為他有許多不可告人的東西，必須用兩面手法掩蓋着，必須要偽裝。他這一次給毛澤東同志寫信，首先穿上張飛衣服，把自己臉譜畫成張飛，用這個臉譜來掩蓋他的偽君子，掩蓋他的陰謀。這種手法多得很。我們認為，野心家、偽君子不是邏輯上的存在，而是過去的存在，現實的存在。我完全同意井泉同志的意見，你不徹底揭發你野心家、偽君子，你叫我們全黨同志怎麼相信你不造反？這就是井泉同志講的，野心不死。

關於「兩面手法」，康生這樣解釋：毛澤東同志11日的講話，說你是個兩面性的人物，有革命性，也有反動性。主席告訴我們，不要忘掉他還有革命性，我們覺得毛澤東同志講得很公平。可是你在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你的革命性是發展了，還是減少了？這個問題很值得你注意。既然你是資產階級立場，資產階級人生觀，在民主革命時期，你還可以積極參加，對社會主義革命你就有很大抵觸。因此，你的革命性三七開也成問題。我不是說你沒有革命性，毛澤東同志說的是對的。我看你的革命性不是一天天增加，而是一天天減少。因為社會主義革命同你的世界觀、人生觀、立場是抵觸的。我不是揣測。你五次犯錯誤，三次是民主革命時代，兩次是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你考慮一下，後兩次比前三次重，還是輕？顯然後兩次比前三次重得多。你參加高、饒的陰謀活動分裂黨，這次自己掛帥分裂黨，你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怎麼放心？你的兩面性不僅是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多得很。你在莊嚴的八中全會上當面撒謊，這樣騙人，說假話，怎麼得了？怎麼叫人相信你呢？其他問題還很多。

康生也在繼續批判彭、張的「斯大林後期」言論。他說：所謂「斯大林後期」，這是你們反黨、分裂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一條綱領，是彭、張、黃以及其他人的另一條共同綱領，也是你們的目的。你們的目的，首先是要毛澤東同志檢討，進一步就是要取而代之。你有一句話，你講：歷代皇帝的第一個皇帝是厲害的。我看你這個話比「斯大林後期」的說法不會輕，你把毛澤東同志比成皇帝！我相信你這個綱領在你們「俱樂部」裏是要宣傳的。

大概是看出了彭德懷仍然在盡量保護黃克誠、周小舟，康生指責道：你今天的講話還是盡量地掩護黃克誠和周小舟。我就不相信你在上海會議時就簡單地講了那麼一句話，黃克誠立刻說你不要出去宣傳，哪有那麼簡單呢？我們希望你真正把這個界線突破，真正放棄你的野心家、偽君子，真正放棄你用陰謀活動篡黨的野心。井泉同志說，你今天的發言，比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除了個別問題之外，沒有進步，我說可能還有些退步。這些基本問題你不突破，我們很難幫。毛澤東同志要不斷革命，彭德懷不要革命，我們是幫你的革命性，首先你要革命。我不是說你是反革命，而是說，你的資產階級思想，到了社會主義時期，你就很大抵觸了，就不要向前發展了。危險在這個地方。

王任重提了幾個問題：彭德懷同志今天的講話，我感覺含含糊糊，似是而非，許多地方避重就輕，前後矛盾。二十多天小組會，全是這樣，凡是人家揭發的東西，事實俱在，無法狡辯的，他就承認下來；只要能狡辯的，他就狡辯過去。比如高饒事件問題，原來他講是義務宣傳員，後來同志們揭發了一些材料，他承認是高饒集團的重要成員。這個事情，他在小組會上含含糊糊，今天還是含含糊糊，似乎只是高崗向他宣傳了甚麼少奇同志想篡黨，甚麼宗派，他只是沒有向中央報告，自己沒有反對。像這樣

的問題，就是想避過去，今天還不脫褲子，為甚麼？關於誹謗毛澤東同志的那些話，上午也質問了張聞天同志，張聞天同志說是彭德懷同志講的，彭德懷同志說是張聞天同志講的。那一天質問這個事情，他說，不管他講的，我講的，我沒有反對，也沒有向中央報告，叫作氣味相投。你到底講了些甚麼東西？是不是只是跟張聞天同志講了？跟別人講了沒有？為甚麼僅僅跟張聞天講？為甚麼這個「俱樂部」的人都有這個看法？沒有商量過？剛才康生同志講了，這是你們的一條共同綱領。

王任重的發言還做了這樣的「剖析」：今天彭德懷同志的發言前後矛盾，有好多地方還是替自己吹噓，擦粉。比如說甚麼他主觀上滿腔熱情想搞共產主義。你甚麼滿腔熱情想搞共產主義？你是滿腔熱情搞陰謀，個人野心。你高饒聯盟是滿腔熱情搞共產主義？你這次搞「俱樂部」，反對總路線，誹謗毛澤東同志，這是主觀滿腔熱情搞共產主義？你也講到你是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可是又講自己是無產階級立場有動搖。你哪裏是無產階級立場有動搖？你是資產階級立場很堅決。你說，你要徹底挖根，向黨靠攏，我看是騙人，我看你不是想挖根，不是想改正錯誤，是想混過關去，以待時機，往後是非有人斷，將來翻案，野心不死。

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宋任窮發言，主要還是說彭德懷的檢討不深刻，沒有觸到痛處。可能是為了使批判顯得更有力，大會特意安排了一些軍隊的人發言，其中劉亞樓的發言頗有代表性。

劉亞樓發言一開始就提出要給彭德懷的問題定質，他說，定量的工作容易搞一些。只是搞量，北京還要開一千多人的軍委擴大會，那可熱鬧了（果然，從廬山下山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對彭、黃的批判更加激烈，甚至逼得彭德懷拍了桌子——著者註）！這樣一個中央全會，這個質恐怕要定。德懷同志的發言裏

面，用一切的方法避開這個質。劉亞樓是這樣定質的：現在擺在我們中央全會面前的是許許多多現象、事實，究竟從甚麼樣一個東西出發的？恐怕要定質。為甚麼你有許多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我看篡黨、要當領袖，就是他的質。如果他參加革命是老資格，我看野心家也是個老資格。不是甚麼將來的野心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得逞而已。但明顯，他所反對的人，通常都是對他要爬上去有妨礙的。他自己喜歡講他的三部曲，大家都知道了：開頭看不起；第二步，差不多；第三步，可能比我高明一點。其實那個第三步還是假的。現在看起來是講「斯大林晚年」。你看，他要反對所有的人。他要把毛澤東同志周圍的主要的人搞下去。因此，我們現在從一切材料裏面很難說明彭德懷同黨中央、主席，同其他人爭論的，究竟是甚麼樣的思想問題。他研究理論，我看不那麼多，他不懂裝懂，實際理論不那麼高。

劉亞樓說，這個人一來的時候就是入股的。毛澤東同志講，李立三、王明你都不認識，一下子就結合起來了，甚麼道理？因為他是股份公司，他是實力派，帶了東西來的。現在我們在全會上不是同彭德懷同志爭論那些次要的事情，你搞這樣多名堂，究竟是不是要實現你的野心？把這一條定下來，才能解釋問題，否則沒有辦法解釋。現在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都在這裏，這個質不定下來不行。幾十年來，你天天在那裏搞篡奪黨的領導權的陰謀，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你把這個問題講出來，很多問題就講清楚了，你為甚麼對這個問題這樣提法，為甚麼對另外一個問題又那樣提法，就解釋通了，否則沒有辦法說通。這一、二十天在這裏開會兜出來的這些事情，證明你的目的就是要奪取黨的領導權，你打擊的這些人是會妨礙你奪取黨的領導權的。當然，七大以後，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一天一天高起來，成了全黨的領袖，成了國際人物，這個時候，你心裏面也想，搞倒毛澤東同志恐怕

很困難，所以，你在這裏也講過幾次硬話。但是一出現這個可能的時候你就來了。你這次以為把毛澤東抓住了，你搞這樣大的事情，甚麼人民公社，甚麼打仗可以，搞建設不行。經濟規律還沒有摸到，這個時候你就吃大魚頭了，你一下就直接開刀了。許多事實向我們說明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全黨如果不揭穿這個東西，那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一方面要把你這個野心家揭掉，另一方面還要警誡別的人。

陳正人發言說彭德懷的檢討只講了一個副題，副題講得也不清楚，主題是沒有講的。主題是當然的邏輯，總路線錯了，當然就要推翻領導了，我們的領導已經是斯大林的後期了嘛！推翻總路線，推翻現在的領導，這是邏輯的結論。既然要推翻總路線，要推翻現在的領導，要反對斯大林的後期，自然而然要形成一個核心，自然而然要形成這個「俱樂部」，就是形成新的反黨聯盟。富春同志說，現在的反黨聯盟是高饒反黨聯盟的繼續，我看這個看法是恰當的，是有根據的。因此，我覺得彭德懷同志今天的發言，從我個人看，的確是痛處不曉得觸到甚麼地方去了，副題也沒有講清楚，主題根本沒有涉及。

最後一個發言的是羅瑞卿。羅瑞卿從歷史講起，講得很長。他說，我看德懷同志同張聞天同志都是跟我們搞疲勞戰術，搞得那麼長，沒有接觸甚麼本質問題，我們就是希望把那個「俱樂部」裏頭（不是叫「俱樂部」嗎？）你們高興的事，得意忘形的事，眉飛色舞的事，也就是想篡位的這樣一些東西，告訴我們大家，有個二十分鐘就行了。

羅瑞卿說，對彭德懷同志，我也是不放心的。有甚麼可以保證他不造反呢？簽字啊？我看簽字也沒有甚麼用處，簽字也可以撕掉的。一定要等到毛澤東同志百年以後才造反哪？不一定！現在毛澤東同志還在他就造反嘛！這次如果不搞清楚，說不定不

等到毛澤東同志百年以後，他還要造反的。我的不放心是有理由的。接着羅瑞卿講了華北會議、高饒事件的問題，然後說到廬山會議：他今天還講周小舟不贊成他寫信。周小舟瞞不住了，因為他跟周惠講了，說出來了，說是周小舟贊成寫信，並且還講，你把西北小組裏面所講的東西統統寫上去。據周惠講，他跟周小舟是定了同盟的，跟周小舟打了招呼。這就是不老實，他今天還騙我們。關於野心家、偽君子，搞分裂，「斯大林後期」，這樣一些最本質的問題都沒有老實交代。23號晚上周小舟可以跑到黃克誠同志那裏發一頓脾氣，說為甚麼一百八十度轉彎？這還不是證明了「斯大林後期」？這樣反右反下去怎麼得了？不是要搞分裂嗎？等等。這些話只是當着黃克誠同志講的嗎？黃克誠同志能不告訴彭德懷同志嗎？我們大家判斷判斷。

羅瑞卿最後還點到張聞天、周小舟：張聞天同志今天上午也是一樣。我們希望「軍事俱樂部」的其他成員同志還是講你們搞得很快樂的那些事情，很舒服的那些事情。至於周小舟，今天在這個地方我和譚震林同志又上了他的當。以為，他是知道內幕的人，鼓勵他來，以為他會到這裏講點甚麼東西。你們的攻守同盟，我看是相當厲害，在這個地方還要騙我們。

下午的大會批判進行了五個小時，到晚上8點才結束。這期間，彭德懷沒有再說話。周恩來最後希望彭德懷同志好好徹底地想一想，並且特別肯定彭德懷說的「他的門沒有關死」；周的幾句話顯得比那些批判發言的調子要溫和一些。

8月14日上午，頭半段各小組開會，討論全會的幾個文件。從10點開始開大會，朱德主持，由黃克誠作檢討。因為已經有人要求他無顧慮地揭發彭德懷的問題（例如前面說過的陶鑄的信），所以他一開頭就說他「逐步認識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逐步認識彭德懷同志的錯誤和野心家、偽君子的真面目」。這樣，

檢查自己和揭發彭德懷就是他這篇發言的兩個內容，而且更加側重的是後者。

黃克誠這樣檢討自己的錯誤：「我7月19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志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進攻。」他接着列舉了發言中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表現：對大躍進的偉大成績估計不足；對大躍進中暫時的局部的缺點看得過重；對缺點所引起的後果看得過於嚴重；把人民公社和「共產風」混淆起來，把整頓後的人民公社和原來的高級合作社的性質等同起來，因而說人民公社遲點辦也可以。「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發言，表面上看，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動搖，實際上是在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中央的進攻。」黃克誠檢討了自己一貫右傾的思想根源：「我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是錯誤的，我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廬山『軍事俱樂部』的重要一員，絕不是偶然的。」黃克誠還檢討了自己同彭德懷的關係：「我對彭德懷同志的私人感情代替了對黨的感情和組織原則。」以這樣一種關係來揭發，那份量自然大不相同。正因為彭、黃之間有如此親密的關係，所以當時對於黃克誠出面揭發彭德懷期望甚大，有常委同志萬鈞壓力的談話，有人寫信懇切動員，而且勸者都曉以大義：這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領袖的威信。這不能不使黃克誠感到無比的痛苦：他從來是把黨的利益看得比甚麼都寶貴的。現在以黨的利益的名義來要求他揭發彭德懷，要求他承認寧願殺頭也不肯承認的事情！既然是黨的利益要求這樣說，就這樣說吧，這是沒有甚麼選擇餘地的事情。可想而知，當時他的心情必定比殺頭還要痛苦。

黃克誠在這篇大會發言中，對彭德懷作了一些這樣一聽就

知道是言不由衷的「揭發」：「我過去和彭德懷同志相處很久，他一貫地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近幾年在軍委一塊工作期間，常常聽到他對毛澤東同志的不滿言論，甚至指桑罵槐的謾罵。」例如，他「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員，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說是『選妃子』，實際是罵毛澤東同志」。對於彭德懷7月14日寫的信，黃克誠說：「信中有不少的地方是含沙射影地攻擊毛澤東同志和中央領導的。」「彭德懷同志寫信的目的，我認為最低限度是逼毛澤東同志作檢查，損害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威信，造成黨內思想混亂，破壞黨內團結，宣揚他的綱領，擴大影響。」

對彭德懷其人的總的評價，黃克誠也不能不跟着即將通過的《決議》說：「彭德懷同志是偽君子，表面上裝做正直無私的樣子，實際是野心勃勃；表面上裝得艱苦樸素，實際是騙取群眾擁護，言行不一。他口頭上常對我說，對毛澤東同志服了，實際上他內心很不服，遇事對抗。直到現在為止，還有嚴重抵觸情緒，並沒有低頭認罪。毛澤東同志23日講話後，還說寫了一封信引起這麼大的問題，以後誰還敢講話，發展下去會變成斯大林晚年的情況，又說這次要把彭德懷搞臭，我已經臭了，再搞也不怕。又說毛澤東同志把一切功勞都歸到自己身上有甚麼好處，還沒有真誠悔過的決心。」

黃克誠檢討之後，開始批判發言。陳伯達打了「頭炮」。這個在毛澤東23日講話之後稱病請假的人，現在卻赤膊上陣了。他先從高饒問題講起：我們現在可以判斷，如果沒有彭德懷同志的活動和他組織的這個攤攤，高崗那個時候是會有所顧慮的。我們聽說那個時候高崗說，軍隊已經沒有問題了。這就是說，他背後有彭德懷同志這個攤攤做他的支柱。彭德懷同志自己現在承認，他是高饒集團的重要成員。當然，這是客氣的，實際上，他

是高饒聯盟主要的一個頭頭。沒有他這個支柱，高崗可能不敢那樣放肆，不敢那樣猖狂。高饒事件以後，根據小組會和大會所揭發出來的事實，彭德懷同志所搞的這個攤攤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的反黨活動就是這個事件的進一步爆發。高饒事件是幾個野心家，主要是高崗這個野心家，和彭德懷同志這個野心家的結合。我同意昨天大家所說的，高饒事件以後，彭德懷同志的野心未死。他的野心未死，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高饒事件是在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爆發出來的，這個事件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反抗。去年在黨的總路線的旗幟下出現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把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標誌着在我們國內資產階級的最後滅亡。彭德懷同志的野心就在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重新爆發出來了。他這個攤攤的根本目的是推翻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核心。他為甚麼要攻擊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以及其他中央的領導同志？很清楚，就是要推翻黨在長時期的鬥爭當中鍛煉和形成起來的中央的領導核心。那一天毛澤東同志為甚麼講這是中國之命運的問題？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核心的領導下進行的，推翻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核心，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進攻。中國之命運就是保衛總路線，就是保衛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保衛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核心。彭德懷同志卻要瓦解這個領導，瓦解這個核心，他想把中國引到哪裏去呢？

陳伯達發言後，軍隊的幾位代表發言。有人說，對彭德懷同志昨天的發言極為不滿。最主要的是他沒有揭露自己錯誤的本質，反黨，反中央，反毛澤東同志，你的目的究竟是甚麼？他在

廬山的這封信是他的前哨戰，這一步如果得到成功，他還有第二步、第三步的，還會有東西拿出來的。他的心沒有完全交出來。黃克誠同志剛才說他是反黨的野心的繼續，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彭德懷同志這次反黨是他反黨的總暴露，是向黨中央，向黨的總路線，向毛主席發起的總的進攻，已經是這樣的行動了。他企圖利用這次會議，抓住我們已經糾正和正在糾正的某些局部、個別的工作中的缺點，抓住這個機會，要把我們的黨搞亂。可是這個問題，彭德懷同志根本沒有交代清楚。彭德懷同志這次的反黨行動，他是親自掛帥的，這是和高饒事件不同的，向前發展了一步。在高饒事件中，他是主要成員之一，而這次是親自掛帥，親自拿出綱領；而且在廬山會議期間，還說了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問題，證明他繼續在鼓勵士氣，進行戰鬥，發動進攻。這個問題，彭德懷同志不做徹底交代，是偽裝退卻，等待機會再起。黃克誠同志剛才的發言，我認為不老實。帽子戴得多，具體事實說得少，仍然對黨採取兩面手法，對我們的全會採取兩面手法。首先，你和彭德懷同志的關係問題沒有交代清楚，你只是借主席講的話，承認了父子關係，歷史上是甚麼關係？老上下級的關係吧？你是借着這個東西掩蓋你自己的錯誤。在高饒事件裏做了些甚麼活動，做了些甚麼壞事？你沒有講。你們兩個人之間對黨搞了些甚麼壞事，沒有交代。你說，你和彭的關係是父子關係。歷史的關係久了，個人的私人感情麻痹了你，因而你長時間受他的蒙蔽。彭搞這麼多反黨活動，背後流言蜚語，誹謗中央這個同志，那個同志，你聽了這些話，你是怎麼想的？你是怎麼看的？這個問題你能沒有嗅覺嗎？我們就承認你有私人感情的關係，把彭的問題包下來了，你不講，瞞着中央，那麼高饒事件呢？你和高的歷史關係不久，為甚麼高饒事件把你拉進去，而你一直到主席談話，你還不向主席交代？這個是歷史關係麻痹了你嗎？是私

人感情麻痹了你嗎？這是你個人有政治野心跟他結合在一塊了，你想利用高崗篡奪黨中央的領導，你不是不謀而合，你是個野心家，是預謀而合。這次你沒有把野心家的目的交代出來。黃克誠同志也是個極危險的人物。

還有人說彭德懷、黃克誠的發言在主要的、帶關鍵性的、本質性的一些問題上避而不談。他對過去的歷史說了很多，都是歸咎於馬列主義水準低，政治水準低，階級觀念模糊。你是我國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一個同路人，今天你到了盡頭了，你現在想走回頭路了。你過去加入共產黨，不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的，而是從封建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的。你贊成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綱領，所以你就加入共產黨。自從加入共產黨以後，你的一切行為表現，有70%是資產階級的，30%是無產階級的。你整個三十多年的歷史，就是為了達到資產階級個人野心的目的。你是從這樣一些願望出發來進行黨的各方面的活動。這次你向黨、向無產階級鬧分裂，所以，這次實際上是兩條階級路線的尖銳的鬥爭。你代表中國已經死亡的或者正在垂亡的資產階級，想挽救他們的殘生，所以你親自出來掛帥，反對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反對黨、反對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當前是兩條路：一條路是社會主義革命，一條路是彭德懷同志所代表的回轉頭來走資產階級的道路。彭德懷同志你所走的，就是從小農經濟開始。你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你就是小農經濟的思想，非常欣賞自食其力、三畝地，小農經濟的生活。因此，現在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的一些重大的方針、原則、政策問題，路線問題，你反對。比如你反對總路線就是很明顯的，你就是要保持小農經濟的政治經濟生活的體制，所以你反對公社，你反對全民的群眾性的大躍進，贊成個體經濟。你希望有個時機到來，來挽救資產階級的殘生。趁這個時機，你親自掛帥，來分裂黨，改變總路線。

發言者還分析了彭德懷成為所謂「野心家」的原因。

(1) 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是舊軍隊裏一個不得寵的舊軍官，當時看到了中國的農民運動蓬勃的發展，正是出頭的時候了，你想利用這個革命達到個人野心的目的。

(2) 唯心主義的宇宙觀。有很大的雄心，要以你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改造黨，改造軍隊。

(3) 在革命鬥爭中積累了資本，自己以為是大大的功臣，包袱也就越背越重，更加發展了你的野心。

(4) 你認為有軍權，你歷來掌握軍隊，你是個實力派，無論是哪一個事件，哪一個重大的關鍵，你就迎頭趕上，生怕落後，跟他們結合在一起。

(5) 你以為你是一個起決定性的砝碼，黨內鬥爭，你這一票就是起決定性的。你覺得，在黨裏面，你這一票是決定黨的路線、政策、方針的一個砝碼。

發言者還說，你是個地道的偽君子，到處耍兩面派的手法。這正是封建資產階級的一種方法和手段，這就是你野心家的一種手法。最突出的是你的宗派觀念、情緒很重，你總要搞你的一攤子，你總怕別人搞掉你的軍隊。歷史上就是這樣。你經常把中央的東西變為合於你心意的東西，從來沒有聽你口裏講過毛澤東同志怎麼講的，中央怎麼講的，總是你的，你是這樣來抬高自己。

發言者說，彭德懷同志應該重新入黨，第一，要入社會主義時期的共產黨。你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共產黨員。第二，要改變你的宇宙觀。第三，要剝奪你的軍權，剝奪你的資本，使你不敢驕傲，不敢鬧獨立性，搞野心。第四，要洗腦筋。

批完彭德懷，發言者又提到黃克誠，說剛才聽了黃老頭的話，我們認為不滿意，對於自己毫無自我批評，沒有把自己作個鑒定，對高饒事件輕描淡寫，對這次俱樂部裏面的這些問題也

是輕描淡寫，沒有說出甚麼本質的重要的問題來。過去認為，黃克誠同志是很好的一個同志，這一次在廬山我才把你的真面目認識了，你是不公不純的，你的野心活動是跟彭德懷同志同流合污的，你同樣是個野心家、偽君子，你的心是很惡毒的。你對於幹部是有偏愛的，有一種宗派的情緒。也很感情用事，盛氣凌人。你是彭德懷同志的政治的總參謀長，是彭德懷同志的靈魂，你們兩個人把持軍委。

這天上午的大會開到下午1點。會議結束時，主持會議的朱德只是宣佈散會，再沒說別的話。

8月14日下午的大會開得很長，從下午3點鐘開始，到晚上9點30分才結束。林彪主持會議，報名發言的有二十多人，其中不少是軍隊的人。

譚震林再次作了發言。他主要是系統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上的意見。一、去年以來，在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方面有些甚麼缺點和錯誤呢？算來算去，只有三件事，這就是「共產風」，估產偏高，秋冬季勞動力沒有作全面安排。這些缺點、錯誤的後果，就是糧食緊張，副食品緊張，市場某些物資不足，農民生產情緒不安，但這些後果也只是部份地區和部份大中城市表現得比較嚴重一些，並不是全國性的。這些缺點、錯誤，很快就被毛澤東同志和中央發現了，抓住了，並且作了嚴肅認真的批判，迅速地克服了。某些副食品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能解決，這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甚麼原則問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對於這些缺點錯誤是不應該負甚麼責任的，中央的任何一個決議指示、文件上都找不到這個方面的材料，指標雖然是經過了六中全會通過的，但是，這是根據我的建議的，是充份信任我的建議而決定的。這些缺點錯誤我應該負全責，我在七中全會作過檢討，在農村工作會議也作過兩次檢討，在這次小組會議上也

作過了檢討，現在我再一次地向全會檢討這個錯誤。但是，我要向全會說明，我這個錯誤不只是在口頭上承認了，也不只是在思想認識上解決了，而且在行動上已經改正了，今後我保證繼續改正這個錯誤。這些缺點錯誤既然克服了，改正了，這些問題彭德懷、黃克誠都是知道的，為甚麼他們還要舊事重提呢？其用意就很清楚了。

譚震林說，我要聲明，我沒有插湖南的白旗，在會議記錄上或文件上都找不到這句話，我對湖南幹勁不足是有意見的。如果從鼓足革命幹勁來講，在全國排到最後的，究竟是誰，我想同志們也是清楚的。這種意見，我只是在談笑話時說過，去年我經常跟小舟談「你真是像個小舟」，這個意思就是說，任憑風浪起，你是穩坐釣魚船。這種說法，在去年5月武漢會議時已經改正了，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幹勁起來了，我就同小舟說：你這個小舟插了兩個翅膀，現在可以飛了。這句話，周小舟是聽懂了的。在廣州會議是否對胡繼宗同志（時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著者註）說過，要他戴白帽子的話，現在記不起來了，即使說了，也只是一句笑話。問題是為甚麼彭德懷、黃克誠兩個同志把這句笑話當做寶貝一樣的重視呢？你們都是看了封神榜，可惜這也不是乾坤圈，也不是乾坤袋，你拿錯了。你們的居心是甚麼？這是一根頭髮絲，不是定海針。當然他們利用這句笑話，也有第二個目的，就是替周小舟吹噓，把湖南吹成是惟一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這股浮誇之風已經吹到西藏去了。真正的馬克思是黃克誠，所以要委任黃克誠管農業了。又是國防部長，又是農業，恐怕還要當總書記。全國只有湖南一省是比較穩定一點的嗎？不，決不是事實。東北三省，內蒙、寧夏、新疆、四川、雲南、浙江、陝西都不比湖南差，而且有些比湖南更好、更穩定，湖南還不是全面的，吹甚麼牛皮？河南、安徽、江蘇、貴州、

江西、廣西、山西，雖然開始有個別問題，但是很快加以調整就全部穩定了，山東、河北、廣東、甘肅、青海這六個單位問題稍多一些，但這些問題都及時抓住了，並且解決了。問題最重的山東省也只有二十多個縣。從全國來說，二千多個縣中，多少有點問題的，不到二百個縣，也就是說，不到10%。在任何一個有問題的縣內也只是一部份有問題，也還有一部份沒有問題，例如問題最大的山東荷澤縣，就有一個段清華生產大隊是沒有問題的，這個縣有二十幾個是段清華這樣的大隊，我們有個材料，主席批了。彭德懷、黃克誠難道沒有看這個材料？不懂？你們利用這個不過10%，或者不到10%的地區缺少糧食問題來向黨進攻，其用意何在也就明白了。

譚震林說，彭德懷、黃克誠兩同志的檢討我是不能滿意的，他們都沒有把心交出來。他們兩人都是進行陰謀活動，來達到攻擊黨，攻擊黨中央，攻擊毛澤東同志的。在陽謀方面，過去的不必說，就在這次會議過程中，彭的信，黃的發言，張聞天的發言，周小舟、周惠、李銳的發言，都是陽謀，都是煙幕彈加毒氣彈。在陰謀方面，除了怕講甚麼缺點錯誤，有壓力等之外，最惡毒的是斯大林後期的危險。這是這次鬥爭中，在最緊張最困難的情況下，才揭穿的。這一點洛甫同志有一點功勞，他先揭穿嘛。黃克誠是在被迫之下不得不講。這樣，這個核心堡壘才最後被攻破。他們形容甚麼毛澤東同志年紀大了，威信高了，沒有集體領導，沒有民主，缺乏自我批評等等。這一切，全部是謊言，全部是污蔑，但他們覺得是得意之作。事實是甚麼呢？毛澤東同志是年歲大了嗎？糊塗了嗎？事實是完全相反的，毛澤東同志是最英明、精力是最充沛的。兩次鄭州會議不是明顯的證據嗎？特別是第二次鄭州會議，同我們談話，我看毛澤東同志那個時候就有點孤立，只有他一個人，他硬堅持，我們幾個人都不同意他的意

見。最後的結果證明他完全正確，我們犯了點錯誤。當然，我們並沒有堅持錯誤，過了不到一個禮拜，就把問題看清楚了。再從總路線來講，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從哪裏來的？就是深刻地總結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特別是總結了斯大林後期的經驗，所謂兩條腿走路，就是從那裏總結出來的。也是深刻地總結了我們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的結果，從這些總結中得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如果沒有充沛的精力，精明的思維力，能夠辦得到嗎？是真的沒有集體領導，沒有民主嗎？事實是完全相反的。事實是這樣：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是經過了反覆商量，反覆研究，許多非中央委員都參加這種商量研究的工作，然後再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決定，而且文件的起草都是大家負責的，有些還經過全會討論決定，這不是民主嗎？這不是集體領導嗎？是的，反黨的民主是不能給的。那天毛澤東同志講了，與其你掛帥，不如毛澤東同志掛帥，這是當仁不讓的。

下面譚震林分別對毛、彭、黃三人做了比較性的總結，聽起來已經不是甚麼一般性的批判。譚說：毛澤東這三個字已經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名字了，它是黨的化身，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東方紅」，「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是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中作了最大的貢獻，他是享受得起的。甚麼「彭德懷萬歲」，狗屁不通，你哪一點配得上萬歲！這不是甚麼個人的威信，也不是甚麼個人崇拜。請彭德懷同志清醒一點吧！想利用這一點來攻擊毛澤東同志，是辦不到的，在座的同志除了個別人以外，都是40歲以上的人了，都是經過了磨煉的，經過了考驗的。彭德懷同志是一個甚麼人呢，是一個野心家，是一個老野心家。這種野心是從平江暴動時就偷偷帶來了，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放棄，今後能否放棄，我是懷疑的，至少我還得看十年，看他是不是在今後十

年中能夠放棄一點點，要他完全放棄，我根本不相信。當然我希望這句話是主觀主義的，但是沒有事實證明，我們不會放心的。這是不是冤枉他呢？不，決不冤枉，這是他自己說的，而且是經常這樣說，如果不參加革命，不是被別人殺頭，便是做總司令，做皇帝，他這種思想一直帶到了今天。黃克誠同志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是一個黨內的危險人物，是陰謀家，野心家，這二十多天的會議已經搞清楚了，現在是定質的時候。我也是被他蒙蔽了的一個，我以為他是個好人，就是有點右傾。這一次才徹底暴露了。只是他的本錢太少了一點，所以他常常只能充當大野心家的軍師。他是高崗的軍師，又是彭德懷的軍師，有人講這個人是彭德懷的靈魂，我看這個話不錯。

蘇振華接着譚震林講了四點意見。第一點，彭德懷同志在小組會上承認有「軍事俱樂部」，承認是主帥。既有俱樂部，就有成員；既有主帥，主帥下面，就有兵將。應該把你們反黨活動的過程，有甚麼成員？有哪些兵將？全部講出來。小組會上，彭德懷同志的反黨綱領中的一條是反對浮誇。但在這一會議上，彭德懷同志用來抵抗我們的倒是浮誇，你要講點實際，要落實，落實到時候了。第二點，彭德懷同志承認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忠實成員，我說而且是主要的成員，很多同志講話中都提到，高崗敢手興風作浪，本事沒有好大。彭德懷同志自己經常說對黨忠心耿耿，為甚麼高崗對你說了中央、少奇同志的許多壞話，你不報告中央？為甚麼你當時不敢對高崗說一句：你要造反。這會使高崗冷了半截。這說明你就是高饒反黨聯盟的台柱，這樣說是不過份的。你在裏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饒反黨聯盟事件，過了五年了，你還瞞到現在。高、饒反黨，高崗是野心家，彭德懷同志是主謀者。結論要你自己作，當黨在困難的時候，你們向黨進行了猖狂的進攻，親自掛帥，你不算野心家，不算造反，算甚麼！第

三點，小組會上，你自己講，在黨內、軍隊裏，除了工作關係以外，沒有任何私人關係。但是有些人在你家裏吃飯，無所不談。這不是私人關係是甚麼？「軍事俱樂部」，不是在廬山成立的，是搬到廬山的，早就有了。人員來往聯繫，多麼親切，保密那麼嚴密。是甚麼關係？第四點，軍隊中，過去幾年，你對蘇聯專家、顧問，有許多怪話，現在有一種感覺，你對蘇聯專家、顧問的態度，比過去好了。在這次會上，你對中國的事情，地方的工作，那樣不滿，但對軍隊的事一事不談，是不是軍隊一點事情也沒有，一點也沒有可以向中央彙報的？對外國人，一兩年來，你的情感有些變化。我個人懷疑，彭德懷同志是否真正願意向黨交心？你要脫胎換骨，把問題講清楚。蘇振華最後說：彭德懷同志為甚麼野心那麼大，膽子那麼大，進行着反黨、反中央、反毛澤東同志的陰謀活動？這麼多年，軍隊是由彭德懷、黃克誠同志把持着的。要把彭德懷同志的這個野心家、偽君子的皮剝掉。彭德懷同志完全估計錯了。軍隊在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的鬥爭，當你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聽話的時候，軍隊是聽話的，但只要把你的野心家、偽君子的面目揭露出來，你就與歷史上張國燾、高崗、饒漱石一樣，身敗名裂。

我的回憶中，周小舟由於思想不通，沒有讓他在大會上作檢討，但在大會上逼過他作交代。他又談到他8月13日給毛澤東信中寫過的，關於我同田家英等來往交談之事，特別是提到田家英準備在離開中南海時向毛澤東的三條進言，全場震動。於是劉少奇問我是怎麼回事。在11日交出的檢討中，我完全撇開了同田家英等的往來，這個決心是決不動搖的。於是我站起來，大聲而從容地說道：這三條意見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無關，大概是小舟聽誤會了，這完全由我負責。劉少奇馬上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會的人，他的問題不在這裏談，另外解決。於是，這個突然

險情總算避開了。

大會批判那種咄咄逼人的緊張氣氛至今讓人記憶猶新。萬毅因贊同彭德懷的意見書，已經在小組會上遭批判。在全會上萬毅爭取到一個發言機會，想解釋一下在小組會的發言。可是剛一開口，主持會議的李井泉就打斷萬毅的話說：「不能叫萬毅發言，他不老實，也不交代他的問題。」萬毅只好坐下。薄一波可能覺得李井泉說話過於生硬，說了一句：「萬毅同志，回到軍委會上去說吧！」算是給萬毅解了窘迫。

同樣贊成彭德懷意見書的賈拓夫，雖然沒被算為「軍事俱樂部」的成員，但是被逼得也在大會上作檢討。賈拓夫檢查說，在毛澤東同志7月23日講話以前，我沒有認識到彭德懷同志給主席的信是一個反對黨的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甚至也沒有認識到這封信是對總路線的動搖，只覺得某些提法有問題，還錯誤地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直到聽了毛澤東同志講話以後，我才覺悟過來。但是，對於彭德懷同志這封信掩藏着反黨、反中央、反毛澤東同志的醜惡陰謀，我認識得更遲一些。而對於「軍事俱樂部」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進行反黨陰謀，對於彭德懷同志是個野心家、偽君子，則又是在鬥爭展開以後，才進一步認識到的。我是在了解了彭德懷同志的歷史情況並且聯想到我自己所親身感受到的一些事實以後，才完全明白過來的。賈拓夫在檢討中不得不交代他與彭德懷的所謂「關係」，甚至連彭送照相機、去彭家吃飯等生活瑣事又再次交代出來了。

毛澤東8月16日講話與五個文件

這個連續開了四十多天的廬山會議，已經到了「大獲全勝」可以閉幕的時刻了，儘管還認為彭德懷並沒有徹底低頭認罪，也不必再在廬山逼他「更深刻的檢查」了。反正廬山會議之後，緊接着還要開軍委擴大會議，總的來說，彭、黃、張、周都已經認了錯，服了輸，八屆八中全會可以圓滿閉幕了。8月16日通過全會公報和兩個決議的會上，毛澤東作了如下長篇講話，我作了詳細記錄：

反右傾機會主義決議，要作充份準備；傳達與討論方式，要好好研究。

看來，這次廬山會議解決了一個大問題，總結經驗應當這樣來總結。會議頭一個階段開得不對頭，是照我們的老規矩。後來才出現對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十八個問題中那些東西，現在是第二位的問題了；第一位是這次會議通過的文件，總結經驗應當像剛才通過的五個文件這樣總結法，鋒芒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反右傾，鼓幹勁。在這件事上，犯錯誤的同志幫了大忙。社會上，黨內，基層，早已發生右傾問題。因為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起，已經八、九個月了，一直搞指標落實，甚麼反對颳「共產風」，等等。開幾級幹部會，不斷地批判，產生了右的傾向。而我們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不在北戴河會議對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北京一月會議、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提意見，而到廬山來提意見，可是氣候並不好，因問題

都已解決了，只剩個尾巴，形勢也已好轉。我說這些同志不會觀察形勢。他們為甚麼不在那麼長的時間裏提意見？因為他們有自己一套東西。如果是站在正確方面，有獨到見解，比我們高明，就在北戴河會議及以後一些會上提出來嘛！不，他們不，等到大部份問題解決了的時候，他們才來提。他們感到這次廬山再不提就沒機會提了，再過幾個月更不利於提了，目的更難達到了，想擴大隊伍，招收黨員，辦不到了。

這是由來已久的，正如決議所講的。這次對彭德懷同志來說，是第五次路線錯誤，總要發作的。這是兩個階級，兩個總路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同志是前一個革命階段入黨的，對後一階段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資本主義、個體經濟，無精神準備。前一個階段兩條路線鬥爭，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反帝反封建是不徹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買了過頭糧，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消滅資產階級，這同共產國際有關；共產國際指示，中國革命如不同時反對資產階級，那麼，反帝反封建任務不能完成，混淆了兩個階段革命。此外，還有方法問題，比如要打大城市，以為城市暴動容易成功，不認識農村包圍城市。那時「左」嘛？「左」派太少了嘛（少奇：二十八個半），但他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左」一陣風。後來中央進入農村，就發生革命快、慢問題，是先奪取城市，還是長期在農村壯大力量等爭論。關於農村階級關係也有爭論，如富農分壞田，組織政策不正確，不從團結大多數出發。這一回對五、六位犯錯誤的同志也要團結。王明告洋狀，說我路線錯誤，說我反對共產國際。我們說，是自己反自己，誰教中國人接受這些東西；鬍子眉毛一把抓，兩個階段舉其功於一役。組織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個人去當太上皇，對「異己者」非搞乾淨不可。高、饒也是狹隘得很，兩個攤攤，都想打

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懷那個也不興旺。過去說北方沒有布爾什維克，當然要團結北方同志。那時我也犯了錯誤，信任高崗。有些同志這麼解釋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時他尚未發展到反黨程度，一般講，他在陝北一段做了好事，問題在東北。這回彭德懷繼承衣鉢。二次王明右傾路線團結了不少人，團結在長江局周圍去了，除陝北外都有影響。因為路線錯誤，1938年對革命有損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轉過來，危害了兩年多。那時候，新四軍在項英手上，八路軍在彭德懷手上，那時一個北方局，一個東南局，還有一個山東分局，甚至連陝西省委都不聽我們的話。所有那些錯誤，都該清算一下。還有同四方面軍關係，張國燾的錯誤引導四方面軍走上錯誤的道路，這個責任在張國燾。張是中央派去的，是階級異己分子，同他作鬥爭，應當在黨內鬥，不能用武力。但長征中彭德懷提議過用武力解決，是在甘肅南部，那個兩省分界地方的時候。這是資產階級、封建集團互相吃掉的辦法，無產階級不能用這個辦法。人家不服怎麼辦？只能等待，這是惟一的辦法，無產階級只能用說服的辦法。

高崗、彭德懷從小局面出發。這次同他們談過，只有洛甫同志沒有參加。開談判會，徹底把牌攤開來。我問過彭德懷個人，究竟有幾個人？彭說有幾個人，十五到二十個人，小組會上意見相合的只有這個數目。現在看來，他把一些人的範圍擴大了，過細一算，一共四個人，加上李銳只有五個人。其他個別同志無非多談了幾句話，不能算「俱樂部」盟員。上榜的，寫在決議上的，四個。為甚麼李銳的名字不寫在決議裏，因為不在中央委員的圈子裏，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補中委，不夠資格，是個別工作人員，無寫上名字的必要，只寫個「追隨者」就可以了，並不是藐視他，也不是開恩。你們圈子那麼狹小，從來不拿團結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線，形式上統一，事

實上分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錯誤的打擊正確的。第二次王明路線，躺在蔣介石身上。馬克思主義忽然幾個月丟了，階級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壯大「左派」，爭取中間，孤立右派；不分清國民黨共產黨兩黨的差別，說都是「優秀青年總匯」，這是王明的口號。王明這一套，居然許多同志相信。

在朝鮮，也是不信任大多數。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5個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學習。那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軍閥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我同賀只見過一面，同你們見過多面。我說，這三條，你總不能駁，對人民有功。彭不從大處看，只幾個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你們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崗成功，也搞不久的。這次廬山你們成了功，黨政軍到你們手裏，我看，頂多年把兩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為你們那麼狹隘嘛。

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這是兩個反黨集團犯錯誤的根本原因。1953年提出總路線，這麼一個綱領，那時他們受不了，他們實際是以資產階級革命派參加黨的。消滅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相當一部份人受不了，富裕中農這個階層，城市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內黨外的），資產階級都受不了。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他們能舒服？他們不舒服的，不願革自己的命。對資產階級採取贖買政策，勉強可以接受，資產階級大多數就是不舒服。這種情況，不僅地富反壞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興。反映在我們一些同志身上，這一關難過。講到這裏為止，是講壞話，講難聽的話，底下要講一些好話，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計他們有可能改造好。歷史上他們做過好事，反帝反封建，對社會主義有模糊願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贊成決議，我很高興。昨天我還相當悲觀。我跟你說過，你是個民主人士，而且是個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潛差一點，與章乃器也許近似，也難說。現在聽說海瑞在你們裏頭。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着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說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只聽一方面的。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兩個側面，第一個主要側面，揭露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矛盾，相當多的同志憂慮的一個問題，這次解決了。並且把當前形勢搞清楚了，當前形勢主要是反右傾，鼓幹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廬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空氣變了。第二個側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黃、張三位，對缺點錯誤有了認識。這麼多人批評，有分析，留有餘地，批評反動的一面，壞的去掉。他們這些同志承認了錯誤，還待實踐，但承認缺點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躍進，已經大躍進了。29天，關係很惡劣，一定要榨出油來不好，容許有思索，有改正的時間。這方面是收穫，表示歡迎，願意同大多數合作團結，願意革命。彭德懷跟大家、跟我說了三條：不當反革命，不自殺，開除了黨籍還可以去耕田。這叫「狷者有所不為」；你還缺一個「狂者進取」，是孔夫子說的。你就是服從命令，不造反，積極方面說，61歲了，最後算賬，以後再說，以前的不算。普列漢諾夫以前大半正確，後來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在講，

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為甚麼能成佛？只要你放棄自己的綱領，真正跟大多數人合作，採取團結態度，你就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會有時覺得光明，有時悲觀。大家要做工作，應該同他們往來，不要老死不相往來。大家要採取熱烈的態度，到他那裏去。不要怕沾甚麼「俱樂部」的邊，你怕「俱樂部」，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幫助害病的人，醫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採取熱烈態度，消極害怕，怕沾邊，這不好。不要緊的，會開了這樣久，才5個人嘛。經過這次會議，大家打了預防針。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連右派都不知道，那怎麼行。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我希望同志們在各地傳達，如你們開十天大會，九天指出錯誤，要強調錯誤那方面；不過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強調，一強調就無事可做了，你就治這個病嘛。到第十天開團結大會，不要把這些人看做沒用的人，要看做是我們的同志，關係要搞好，要幫助他們。這方面要強調一下。（講到這裏，毛澤東對着彭德懷說）三十幾年關係難道就拉倒了？印度話說「巴依依」，英語goodbye。我們不要告別。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過去張國燾、高崗告別了。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勛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願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現在習仲勛表現很好，還有賀晉年、張秀山，也要跟他們搞好關係，他們也表示願意搞好關係。有兩種情況：在黨內一宣佈，覺得不好了，感到驚奇；覺得突如

其來。這可以理解。高、饒、彭、黃這個問題，帶有複雜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禍首。人們覺得不好懂，因不了解歷史變化。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準備，難過關，彭德懷歷史上犯過五次路線錯誤（民主革命時期三次，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兩次），過去沒有宣佈過，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這些，我們過去不講。而當年高崗他們到處講「兩個攤攤」（指劉少奇、周恩來），現在又到處散播，別人都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沒有講過彭，小舟只聽過彭講我。人們不明白歷史曲折情況，自感覺驚奇，這點要講清楚，不足為怪。延安華北工作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一野，抗美援朝，軍委都交給你管。只要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還是幹軍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發轉業費嘛。我們是交不親的朋友。高崗事件時保護過關，但不改舊病。去年要辭職，我們作了決議，要你繼續幹下去。軍委擴大會議鬥爭蕭克，支持你。你卻一切都不放在眼裏。你的很大問題，就是沒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還是兩個：一個可能，一個不可能；一個能轉，一個不能轉。影響範圍縮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轉過來。轉不過來我們也沒有蝕本。採取團結態度，轉過來了，就賺了錢。個把兩個人不轉過來，也無關大局。中國6億人口，每年增加1,300萬，我看天不會塌下來。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高崗沒有轉過來。王明還在莫斯科，洋狀告了3條：反對共產國際，強迫80%的人整風作檢討（其實是100%，這次又是強迫），搞個人獨裁。

我的意見是這樣：如要講個人獨裁的話，如在王明和毛澤東之間選擇時，我投自己的票。因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險主義，第二次是投降主義。在王明、毛澤東之間選擇，彭大約會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較量呢，就會覺得與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義。個人投票不行，還是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改變不改變，兩種可能。應當極力爭取轉變過來。中國人民熱情，有英明熱情的黨。廬山這一場鬥爭同上回鬥爭高崗來比，這五年半裏，我們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給必要時間是可以的。

右派是多少？有45萬。比人家一個黨還多。除了個別的以外（章伯鈞、羅隆基、龍雲是極少數），45萬右派是筆資產，要開個大會，要爭取他們，我曾經講過，至少70%可以爭取過來。其他以資產階級右派去見閻王。這些人再活十年二十年，可能只剩下10%了。白俄還願意回國呢！牛訓練3年才耕田，豈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們社會主義條件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條件下，還有這樣熱情的黨、幹部和人民，應該相信他們（除個別人以外）是可以改過來的。

過去搞鬥爭，總不休止，軍師團營長都鬥，發生恐慌。

（劉少奇插話：陳獨秀抗戰初期曾要求到延安來，如來，看到革命勝利，也可能改）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佈，搞第四國際。現在我們本錢大了。章伯鈞、章乃器也不怕，天天罵我們，還給他官做。中國惟一見過托洛茨基的是劉仁靜，劉仁靜現在做翻譯。（周恩來：羅章龍也在教書）要給人出路。要准許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評，人家就越講，打架打不贏，就說兒子打老子。魯迅描寫不覺悟的勞動人民，本質是好的。

不要抹殺他們歷史上有過好的一面，過去犯了錯誤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時一提起立三路線還得了。我們還要爭取王明，不管他告幾次洋狀。去年武昌會議，他回了一封請假的信，是熱情的。天無絕人之路，馬克思主義者走絕路不好。凡

事要留有餘地，要關懷幫助。因為他們過去做過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這一段話，如早幾天講，決議就做不出來，只能在做了決議後的今天來講，才能講清楚。

中央全會開了15天了。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是一次勝利的會。林彪同志你剛才講的那兩句話，避免了兩個東西：第一，避免了大馬鞍形，如果彭德懷掛帥，天下就要大亂；洩掉幹勁；第二，避免了黨的分裂，及時阻止了黨的分裂。犯錯誤的同志自己還得到了挽救。

當時我心亂如麻，這記錄記得十分雜亂，自然也有脫漏之處，字跡也很潦草。三十年後再來看，不少的字自己也認不出來了，一些句子也不很銜接。我翻過「文革」期間民間編印的幾種毛澤東文錄，毛澤東在廬山的講話都只收有7月23日和8月2日這兩篇。這次趁本書再版，好不容易找到較完整的記錄，得以將毛澤東8月11日和16日的兩次講話，作了增補修訂，這樣就更接近當年的實際了。

毛澤東講完話，通過決議散會之後，周恩來讓我留下來，同我單獨作了次談話，在座有彭真和楊尚昆。4月上海會議時，周恩來知道我連着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說到1959年原定鋼鐵指標絕對不能完成，還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見後，是很高興的，曾在工交系統的小組會上表揚過我。會後，經我動員，我陪周恩來到正在施工的新安江水電站視察了半天，他很滿意，還揮毫題詞：「為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製設備的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勝利建設而歡呼！」一路同坐一輛車，閒談了許多事情，對我們能隨意向毛澤東直抒己見，讚許之中還流露一種安慰之情。這時，總理責備我，為甚麼陷到那個圈子中去了，語氣嚴厲，又帶惋惜，談話的時間不長，最後囑我好好學習。彭真也

講了幾句要改正錯誤的話。在8月10日前的批鬥高潮時，一次碰見尚昆同志，他曾關心地問我：你們同黃克誠談過甚麼私房話沒有？那時我還抱着僥幸過關的想法，一口否定了。

這一天通過了一個公報和四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是當時就發表了的，它告訴全黨、全國和全世界：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這一次全會，卻一字不提這以前在此地開了一個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這座「秀甲東南」的山上一個月裏（從7月14日彭德懷上書算起）鬧得天翻地覆的中心議題，即對彭、黃、張、周的鬥爭，在公報中只是含糊其辭地說了這樣一段話：

「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在某些幹部中滋長着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他們對於那些根據客觀條件和主觀努力本來可以完成的任務，不去千方百計地努力完成。他們對於幾億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估計過低，而對於這兩個運動中由於經驗不足而產生並且已經迅速克服的若干缺點，則估計過於嚴重。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污衊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缺點錯誤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

甚至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彭、黃、張、周的姓名，在公報中也沒有出現，可是細心的讀者不久就從報紙上關於國慶十週年活動的報道中，特別是這次重新發表的國務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名單中，發現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名字已悄悄地（未做任何說明地）消失了（水電系統的同志發現我的名字也消失了）。從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判「自由平等博愛」，批

判得不償失論，批判觀潮派，批判算賬派等的文章中，即使不怎麼敏感的讀者，也能感覺到發生了某種事情。當然，黨內是隨即作了分級傳達的。

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某些意見，在《公報》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彭德懷信中說的「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張聞天在發言中也說了「1958年的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以及今年糧食指標規定高達10,500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發生了問題」。這一點，在《公報》中是這樣說的：「經過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實，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品產量的統計偏高……經過核實，1958年的糧食的實際收穫量為5,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35%；棉花實際收穫量為4,200萬擔，比1957年增長28%。」這是不是承認彭德懷、張聞天也有說對了的地方呢？不，他們還是完全錯誤的。原來統計數字上的過份誇大，已經到了任何巧辯、強辯都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除了「再三核定」之外，已經別無他法了。而且這5,000億斤和4,200萬擔依然是一個有待核定的數字！（經過多次核實，糧食實際只有4,000億斤，只比1957年增長2.5%；棉花只有3,938萬擔，比1957年增長20%。）承認數字「統計偏高」，完全不等於認錯。你看《公報》對此事所做的說明吧：「1958年的農業大豐收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農業統計機關由於對這個空前大豐收的產量估算缺乏經驗，在多數情況下是估得多了；同時由於對秋季大豐收缺乏適當的勞動力安排，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而且，經過「核實」後公佈的新的「統計數字」，仍然是「巨大的躍進」！

《公報》宣佈放棄了原定1959年的過高指標，而公佈了削減後的新指標。這也不過是承認了事實而已，因為不論你是否願意削減，原定指標反正是無法完成了的。《公報》對此是這樣說明的：「八屆八中全會指出，調整後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

是一個繼續躍進的計劃」，它在兩年時間裏，在國民經濟的一些重要方面，要求「完成、超額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原定在1962年完成的指標」。至於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公報》認為可以爭取在十年左右基本實現。

全會通過的《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也是當時就公開發表了的。決議一開頭就肯定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決議公佈了一系列顯示大躍進成就的統計數字，公佈了當年計劃的調整指標，提出了「在兩年內提前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的口號。決議也提到了「在前進過程中當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難，產生一些缺點」，「但是人民群眾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密切指導下，迅速地解決了或者正在迅速地解決着這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問題」。《決議》中最重要的意思是：「全會號召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緊密地團結一致，堅決地克服我們工作中的任何困難和缺點，克服某些不堅定分子的右傾機會主義情緒，並且堅決打擊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為奪取今年的偉大勝利而鬥爭……」某些不堅定分子指的是誰，右傾機會主義情緒又有些甚麼表現，這個決議裏就不再多說一句了。這些，在全會通過的另外一個決議中，是說得明明白白的。

全會還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這個決議在肯定大躍進取得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之後，指出：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

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着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決議說：「他們雖然在口頭上說了不少似乎『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詞句，實質上卻是要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的矛頭，是針對着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着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決議這樣分析國內的階級關係：「我國現在還處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階級依然存在。對於舊的社會經濟制度雖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徹底完成。資本家還拿定息。此外，農村還有一小部份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還有私人活動初級市場（當然，在國家和公社的正確的管理之下，這些成份不會向資本主義發展，而是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還需要很長時期才能徹底克服。地、富、反、壞、右等類分子的改造，離完成還很遠。城鄉資產階級反動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雖經1957年整風反右鬥爭給了一次決定性的打擊，但還遠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反動的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在一部份富裕中農和知識分子中間尚有市場，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蠢動起來。」

決議認為：「資產階級殘餘的思想政治活動既然存在，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而現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們說話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個人野心家；有的是歷史上犯了錯誤、受過批評、心懷不滿的分子；有的是動搖成性的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了資產階級

的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向黨的大多數、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總路線乘機進攻，這種進攻帶着猖狂性質，形成了我們同他們的尖銳矛盾。決議說：「一部份共產黨人的悲觀主義思潮，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是社會上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思潮在黨內的反映。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鬥爭，是波浪式的，高一陣，低一陣，再高一陣，再低一陣，直到這一場鬥爭徹底熄滅為止，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政治影響最後消滅的時候。」

這個決議是發給黨內的文件，雖然沒有點彭、黃、張、周的名，但是他們幾個人實際上已經被其中所說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四種人「對號入座」。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是這次廬山會議最重要的成果，這個決議當時沒有發表，甚至在會議公報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個決議。整整過了八年之後，那時已在「文革」期間，彭德懷已經被紅衛兵從西南揪回北京批鬥過了，1967年8月16日，這《決議》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這個《決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向黨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進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用概括的語言敘述了彭德懷「進攻」的內容，為「反對群眾大辦鋼鐵運動，反對人民公社運動」等等。但是有兩處引用了彭的原話，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要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看來這是最觸犯忌諱的兩點。

《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着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你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決議》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賬：「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份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甚麼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

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注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是因為決策上的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這一段文章，也許是從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公式裏得到了啟示的。

最後，宣佈了對這幾個人的處理：「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仍然可以保留，以觀後效。」這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意思。

實際上全會還通過了一個有關組織處理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決定》說：「黃克誠同志是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主要同謀者之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分裂黨的派別活動的重大錯誤。過去他又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中的重要成員之一，而且長期對黨隱瞞了若干重要的有關事實。鑒於黃克誠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決定撤銷他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並且責成他繼續檢討，向黨作徹底交代。」我至今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當時沒有公佈這個決定。直到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才宣佈撤銷黃克誠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那次與他同時被宣佈撤銷書記處書記職務的，還有當時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

全會後的工作會議

全會閉幕的第二天，8月17日，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先由彭真講人事安排問題，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人事調整的意見。這個意見事先已經跟軍隊的幾位元帥和各大區組長商量過。

人事變動一共有十二項：第一，決定撤銷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第二，決定撤銷黃克誠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的職務；第三，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過去沒有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中央軍委第三副主席；第四，決定羅瑞卿為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委員（過去不是軍委委員）和秘書長，也就是接替黃克誠的職務；第五，決定撤銷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決定撤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保留湖南省委委員職務；第七，決定張平化（原來任湖北省委書記）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委委員，華國鋒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華當時在湖南省委分管財經、政府工作，湖南省委書記處原來是七個人，撤銷周小舟後換上張平化，再加華國鋒，一共是八個；第八，決定成立農業機械部，陳正人為部長，黎玉、沈鴻為副部長；第九，決定成立物資供應部門，人事另外再定；第十，決定免去羅瑞卿的公安部部長職務；第十一，調謝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和公安部部長；第十二，調閻紅彥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彭真講完後，毛澤東講話，主要講如何傳達的問題。毛說：

怎麼樣傳達？昨天不是講過一下嗎？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開六級幹部會，林鐵同志提議的；另一種是別同志提議的，分兩個步驟，先開縣團以上的幹部會，然後再開那個或者六級或者幾級的幹部會。究竟哪一個妥當，還是可以不同。比如林鐵同志，據他說現在需要準備秋收分配，他們現在就準備開六級幹部會議。所謂六級幹部就是生產隊以上，這也算一種辦法。你們就那麼做也可以嘛。（林鐵：我們又研究了一下，這樣搞時間來不及，還是先開縣以上的三級幹部會）分兩次做好，因為縣團這一級以上大概一個省有多少人。（陶鑄：有千把人。楊尚昆：相當的還多。江渭清：有兩千多。）大體的原則是分兩個步驟。頭一步是縣團一級，我提議縣要來兩個人，團也要來兩個人，相當於團的也是來兩個人。因為兩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只來一個人他回去傳達當然也可以，但是恐怕還是來兩個人為好。縣有兩個人，團有兩個人，以及有些相當於縣團的大單位，比如鞍山鋼鐵公司那甚至還不止兩個人。（楊尚昆：它一個車間就等於一個工廠）鞍山鋼鐵公司還得了呀！它十萬人馬（彭真：鞍山二十四萬人呀），這麼多呀！（周恩來：有五萬培訓的）那是個大學校，全國派到那裏去學習鋼鐵的有五萬人之多。先把這些人傳達搞清楚。

至於時間，恐怕至少開兩個星期，有人說要開三個星期，你們自己去決定好不好。太長了，學廬山一樣一開一個半月也不好。廬山其實是多數人沒有（開）一個半月，只有二十天左右，或者只有十幾天。廬山這次會議有個好處，有許多事情就在這裏辦了。我說是中央、地方兩級合署辦公，辦了這麼一個半月。我們這個國家太大，關於管理的形式很值得研究。這是一種管理形式，中央一級，地方一級，在這裏合署辦公一個半月。不僅解決

重大問題，而且處理事務工作。

縣團以上的幹部會議，開會的時機跟公報的發表要配合。有同志說，你們一回去就開個電話會議。昨天閉幕了，大概是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就發表公報。因為到北京要開幹部會，要通知各兄弟國家，民主人士也要通知一下。（周恩來：最高國務會議，國務院會議，還有人大常委）昨天16閉幕，今天17（周恩來：23號發公報），到23號只能有六天，今天不算，明天你們就要走，到家那天也不算。結果六天就除掉了兩天，只有四天。（董必武：明天有些還到不了家）只剩下四天工夫，你們來得及呀！現在你們就要用電話通知，縣團以上的幹部就要集中。通知沒有，還沒有吧。（張德生：我們24號開省委擴大會。周恩來：這個電話會議是通知到縣，要社裏頭打個招呼，是調整指標、落實這類問題，還不是黨內的保衛總路線、反右傾，那個開三級幹部會傳達。）我看還是24號發表公報。（周恩來：25號發表增產節約的決定。）

毛澤東講完後，周恩來講了一些經濟方面的工作安排，接着劉少奇講話。劉少奇講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家怎樣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二是所謂「個人崇拜」問題。

劉少奇的講話，當然一開頭就說：這一次全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的勝利。接着他就談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革命群眾的態度問題，他說：我想，革命的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上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種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眾運動，都總會有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問題，或者八個指頭和兩個指頭，或者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問題：七分成績三分缺點錯誤，或者是八分成績兩分缺

點錯誤，或者是一分、一個指頭，總而言之會有的。劉少奇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運動，談到近兩年有人建議不要再搞運動了，彭、黃、張、周就是反對搞運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應該頂住這種議論。

劉少奇這篇講話最重要的內容是進一步讚揚毛澤東。他說：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如果還不滿意，還要更正確一點，既不「左」，又不右，那麼，請馬克思、列寧來是不是會更好一些？我看也許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見得，也許更壞一些。

劉少奇說：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在我們黨裏面，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有這個意見。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或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甚麼「斯大林後期」，甚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從（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那麼妥當，我想我是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還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國共產黨七大黨章的時候，我們的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黨裏面要有領袖，要有領袖就要有威信。在那個時期彭德懷同志是反對在黨章上寫那一條的。在（蘇共）二十次大會後，他是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的。但是在不久以後，在北戴河討論八大黨章的時候，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沒寫上去，彭德懷同志提議要加上這一條。早不久你在西樓提議，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個人崇拜等等。等一下在北戴河那一條沒寫上去，他又提議寫上去，很明顯你這是

假的。他的那個意思是從反面講的，上一次寫上的時候我就反對的，這一次你們還不是刮掉了？！我現在提議寫上，你們又不寫，那麼至少你們要犯錯誤，要作點檢討。當時我的答覆是這樣，我說七大那個時候有必要寫這一條，八大這個黨章沒有必要了，可以不寫。我想我是積極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我現在還要搞。我現在還要搞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個人崇拜，以後我還會要搞。對彭德懷同志的威信，我也沒有損傷過。如果說他去掉點個人野心，多有點馬克思主義，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點個人崇拜的。我這個人是搞這一行的，是犯這個「錯誤」吧！這不是為了對某一個人好，也不是為了我自己好爭選票。在革命隊伍中間，個人威信跟黨的威信、階級威信是不可分離的。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是通過某些個人崇高的威信表現出來的，在威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很長的一個時期，人家總是看不大起無產階級，因此就要注意這個問題。一個黨的、階級的、革命的、人民的領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處。（毛澤東：現在英國那些國家的黨很困難就是這個道理。）是呀！工黨有威信，共產黨沒有威信。（毛澤東：印度也很困難。）尼赫魯有威信，高士沒有威信，印尼蘇加諾有威信，艾地沒有威信。至於講甚麼在納賽爾那些地方，伊拉克那些地方，都有這個問題。劉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論權威》的文章，恩格斯說了「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佈糊塗觀念，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劉少奇說：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自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是極具

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說，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門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貢獻。劉少奇後來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兩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最後，毛澤東又講了一篇話：

一定要有班長。俄共政治局只有五個人，他們就說你們太專制了。有些中央委員沒有召集開會，忙得很，那些人就說為甚麼不召集我們開會，就發議論了。列寧說會是沒有召集，可是革命勝利了。他說你無非是要你來辦，與其你來辦，不如我們來辦。我們就是五個人，就是這麼一件事。在這個問題上有贊成有反對，看是站在甚麼一個立場，甚麼一個觀點上。現在我們這些人，譬如常委會這幾個人，年紀都大了，按照自然規律，總有一天要辦交代，這是個長久的問題，沒有共產黨，這個問題還存在的，黨沒有了，人類社會要有組織的，不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所以我看是一個反對派的問題，看問題不同。像恩格斯這樣的觀點，這是無產階級我們這一派的人這麼說的，資產階級也是贊成的。人類社會通過幾個階段，這成了常識了，為甚麼又反對這種常識呢？他因為沒有一個破壞，就不能建立我們反對派的那些朋友們登台，就是那麼一個道理。在這種時候，可是不能輕易地把陣地讓出來，在這種時候講謙虛我看是不行的，我這個時候謙虛了，那是危險的。

這一次從彭德懷同志信發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這一個禮拜，並沒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們常委會幾個同志之外），說是辯論這封信的性質，包括幾個組長。我們跟他們談過，可是沒有說辯論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只說過要他們開放言路，擴大民主，讓人家講話。說你們耳朵是聽話的，人

家長口是講話的，無非是放出來的東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頭皮頂住。就是這麼講的。後頭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樣講的。你說我不公平呀！我說你們能夠吃下的吃下，你們不願吃下的硬着頭皮頂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這位同志他是執行硬着頭皮頂住的，硬着頭皮頂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贊成這個決議案了，不曉得真贊成假贊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話：他寫了一個承認是反總路線、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東西。）噯，你怎麼又不頂了呢？

講到這裏為止。同志們，還有甚麼意見？我看這一次會開得好，是逐步發展的。一個初上廬山時期，一個中期，一個後期。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同時工作又沒有耽誤。這一個來月的集會很有必要，這麼一個大國呀，這麼一百多人，我們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集合這麼一個時期。當然有一部份，大概有一半人，只經過半個月，有一半是經過一個月或者一個半月，陸陸續續來的。我們這些人就是從這次會議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誰料到出這樣的亂子呀！我就沒有料到，結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歡迎呀！就可以解決呀！所以講是一次勝利的會議。就如林彪所講的，避免了兩個危害。一個是黨的分裂——黨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經分裂一個時期了，就是一個小集團。以後看他們改不改，無非一個改，一個不改。我們希望他們改，幫助他們。大分裂是避免了。一個是避免了大馬鞍形。中國要搞大躍進，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臨時搞大小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這是形勢的要求，群眾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這個條件。

據我看，總的形勢是好的。國內的政治情況，經濟情況，總的形勢是好的，有些缺點，可以改，並且不難改。抗日時期不準備奪取政權，那我們怎麼辦呢？抗日時期不準備奪取政權，還準

備把政權讓給蔣介石。這跟「和平民主新階段」不是一件事。

「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奪取政權的，哪怕一年兩年也好。結果我們爭得一年時間。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

所以總路線有兩條，那時候搞改革的總路線；現在是建設的總路線，多快好省呀，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呀！凡是路線問題，是要經過考驗的，就是不是那麼安寧，不是那麼太平的，並非太平無事。你看總路線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黨代大會是5月間嘛，現在廬山鬧亂子是7月嘛，一年多一點時間，就覺得不行了嘛。現在經過大家一議，又可以了嘛。你說將來沒有風了？一點風沒有了？我看還會有。你們說從此天下太平，四方無事？那麼今年在廬山開會，才不過隔了一年，所為何來？但是總的趨勢是好的，這個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亂子，代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意志的傾向要佔優勢，它總要佔優勢的；一個時候不佔優勢，另一個時候，它要佔優勢。現在看起來，我們是有保證的，我們的大多數、絕大多數，除極個別少數之外，是團結一致嘛。要建設得快一點，好一點，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國家而奮鬥，這是必然性，現在有保證。但是也要估計到，不會是那麼風平浪靜，要風平浪靜一個時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個時期要準備颶風的。這個政治颶風將來甚麼時候來呢？我就料不到，但有颶風要颶，這可以斷言的，不會沒有的，有階級存在嘛。在一個省，在地方，也有這個問題，要有準備。

通過了《決議》，還開了17日的會，八中全會各項議程即圓滿結束，人們紛紛下山。8月18日上午，張聞天下山前寫信給毛澤東：「我衷心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給予我的幫助。」9月9日，在北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後，彭德懷也寫信給毛澤東：「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許多同志對我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正是毛

澤東希望得到的反應，他對此感到滿意，立即作讚揚批示，通報全黨。

毛澤東下山前一刻，8月19日，給「休想挖走的秀才」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懷疑態度的人們，對於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衊和懷疑起見，必須向這一切人作戰，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請冷西令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將此信討論一次，向各分社立即發出通知，叫他們對人民公社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每個省（市、區）選擇5個典型，特別辦得好的公社，例如廣東省增城的石灘公社、河南省長葛縣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見8月18日《人民日報》）、河北遵化縣的王國藩社，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總之，實事求是，反覆核對，跟縣委和公社黨委認真研究，不適當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紮實又生動，引人入勝。並且要跟地縣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組同志們一道去辦。每省五個社，要派五個有政治、經濟頭腦而又文筆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們認為是否可以辦到呢？請你們接信後，即日動員，一個月，兩個月，至遲三個月交卷。我希望能於三十天、四十天內交來第一批，每省先送一個至兩個典型公社，其餘陸續交來即可，你們看，是否可以辦得到呢？辦不到，即延遲，總以情（情況）文並茂為原則。文字可長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長可萬餘字，平均以七、八千字為適宜。寫好，一律交給我，由我編一本書，例如1955年《農村合作化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那樣，我準備寫一篇萬言長序，痛駁全世界的反對派。請陳伯達同志立即組織幾位熟悉俄國革命初期所辦公社的材料、具體情況（要詳細材料）及其所以崩潰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

析，提出論斷。這也是極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此書出版及我的文章，國慶節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為準備工作來不及。此信你們看後，如以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電報發給各省、地、縣三級及新華社、《人民日報》，指定從事此項工作的記者們，使他們知道我的意向，即為此問題要向世界宣戰。

「要向世界宣戰」，可見其「氣魄」；「一個月、兩個月，至遲三個月交卷」，可見其迫切。這些都是出於毛澤東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堅持「三面紅旗」的決心。這些全國各地的調查材料，後由新華社負責編成《人民公社萬歲》一書，由人民出版社於1960年底印成。終因礙於當時嚴重的困難形勢，這本反右傾的向全世界宣戰的書沒有發行。不過不久以後，果然在國際共運總路線等方面，發生了一場大論戰，中蘇兩黨的矛盾和衝突最後導致兩黨關係中斷。

被毛澤東保護的秀才沒有辜負期望，廬山會議一結束便交出了「答卷」。下山不到兩週，吳冷西就擬訂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關於八屆八中全會的宣傳計劃，還開始積極進行人民公社的調查。他在8月31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關於八屆八中全會的宣傳，都已擬訂了初步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執行。《人民日報》社論計劃中，還增加了兩篇，一是《論十年左右趕上英國》，一是《為甚麼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另外，還陸續補充了一些從理論上論述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文章，將在第7版上發表。關於人民公社的調查，現正在積極進行。各省對此十分熱心，大都書記掛帥，組織大批人馬下去，準備從中選些好的典型材料送給我們。我們也已組織了五十多人下去支援。

胡喬木及時寫出了批判文章，題目是《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甚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近六千字。8月27日中央辦公廳向黨內印發了此文。胡喬木的文章講了五個問題。

(1) 彭德懷同志1959年7月14日寫給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書，實質上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提出的一個反黨的綱領。這個意見書的攻擊鋒芒，上是直接指向着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指向着黨中央和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意見書表面也講了一些大躍進成績偉大、缺點難免、前途光明之類的話，但是這是為了作掩護的，因為彭德懷同志知道，沒有這個掩護，他的反黨面目就暴露得太明顯了。意見書的主體是在所謂總結經驗教訓的部份，特別是所謂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部份。他在把大躍進污衊成是「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以後，進而分析其「社會原因」，提出了一個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的斷語，隨即暗示為黨的歷史上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復活。這樣，他就打着「無產階級」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招牌，打着「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招牌，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展開了猖狂的進攻。而實際上，他卻是站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進攻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是整個意見書的實質。

(2) 彭德懷同志把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描寫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浮誇作風」是極端荒謬的，這是對黨、無產階級和六億五千萬人民的污衊。首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幾億人民的群眾運動，有深刻的經濟和歷史的基礎。這兩個運動不但不是出於甚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恰恰相反，是最後消滅資產階級經濟和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其次，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於這兩個運動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這種馬克思主

義的實事求是的領導，同歷史上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堅持錯誤路線直至鬥爭遭到嚴重失敗的情況，有甚麼相同之點？

(3) 彭德懷同志為了要替他的反黨綱領尋找藉口，為了要煽動右傾分子向黨進攻，故意把幾億人民的偉大運動中的暫時的局部的缺點加以極端誇大。在他的意見書中，沒有一處說到這些缺點在全局中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的問題，決不是偶然的。彭德懷同志誇大缺點錯誤的最反動的言論，就是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這個反動觀點是他在廬山會議以前和廬山會議期間再三宣揚過的，從這句話也最能認識他的意見書中關於形勢估計的真面目。

(4) 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儘管表面上也說了許多擁護總路線、擁護大躍進、擁護人民公社的話，好像只是批評了一些缺點錯誤，實質上他不但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且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也是不同意的。他在小組發言中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雖然表面上說「當然不是鐵托所講的制度上的問題」，實際的觀點卻是相似的。他說甚麼糾正「左」比糾正右難，又說甚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主要要防「左」，更顯然地是為右傾機會主義辯護。去年實際工作中的一些錯誤，主要是由於缺乏經驗而來，根本沒有任何路線性的錯誤，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則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比較，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儘管對於革命事業的損失說來，「左」比右並沒有甚麼好，但是兩種錯誤的社會來源和政治性質是不同的，「左傾」分子還是忠於革命的，而右傾分子卻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影響反映在黨內的結果，他們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別是不要社會主義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有些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還可以積極參加無產階級

領導的民主革命，雖然在方法上也經常要犯錯誤；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些資產階級革命家就代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反對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長期生死鬥爭中的主要危險。他的意見書實質上只是反映了我國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將要徹底勝利、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將要最後滅亡的反抗。

(5) 彭德懷同志自己承認，他在意見書裏是有意對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安了幾根刺」的。他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李銳等人污蔑毛澤東同志像「斯大林的晚年」，攻擊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上海會議，攻擊第一書記掛帥，污蔑中央政治局常委沒有人敢講話，等等。這一系列的惡毒的誹謗和陰謀，無非是為了要破壞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的威信，而樹立彭德懷同志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家、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高崗集團的重要成員的威信，無非是為了分裂黨和人民解放軍，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改造黨和人民解放軍，並且實際上是配合國內外的反動勢力的進攻，破壞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只有從這個背景上，才能深刻地認識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和其他有關反動言論行動的真面目，以及同他相配合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李銳等人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反黨言論和行動的真面目。

陳伯達的批彭文章頗得毛澤東欣賞，原來的題目是《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貌》，毛澤東改為《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世界觀》，文章約一萬四千字。

陳伯達的文章是從彭德懷的歷史來批判的。文章說，我們必須從社會階級鬥爭的現象來看待問題，必須從彭德懷同志參加黨以後的歷史來看待問題。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這些反黨分子，都是在民主革命中帶着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黨的。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參加黨以前，也拖着資產階級世界觀，而在參加黨的時候也還帶

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但是其中的大多數在革命的鬥爭中，願意接受黨的改造，拋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而接受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彭德懷同志和他的同盟者就不是這樣，他們一直沒有接受改造，還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文章把彭德懷在1941至1943年發表的四篇文章作為靶子，系統「剖析」彭德懷的所謂「同黨對抗的綱領」。文章說，彭德懷同志在革命的長時期中，滿腦子都堆了一些資產階級的觀點，甚至是封建階級的觀點。他所以對這些觀點特別感興趣，並且反覆宣傳這些觀點，只是因為它們具有政治欺騙性。而這種欺騙性，適用於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偽君子的政治活動的需要，適用於一個民主革命時期混入無產階級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需要。我們對於彭德懷同志的偽君子的社會本質和政治本質，正應該從這裏去觀察。由於彭德懷同志在我們隊伍裏面，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進行活動。所以，在實際上，他向來有以下三種表現：第一，他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對黨中央的領導，在大部份場合總是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這就是大家知道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第二，他又要群眾，又非常害怕群眾。他在華北工作的時候，那裏的農民運動曾經「三起三落」。就是說，當群眾起來以後，他又給群眾潑冷水，把運動壓下去。這樣反覆了三次。第三，他對於中國革命要走向社會主義，雖然也有些模模糊糊的認識，但是，他對於在抗日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的政治動向和要求，將僅僅是「和平民主」。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性質，竟然這樣武斷地和狂妄地說，「我可以肯定地答是資本主義的，因為經濟制度仍然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由此可見，他對於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這兩大著作幾乎毫無所知。

文章在「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之後，又聯繫到廬山會議作了批判：彭德懷同志這次提出的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相對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黨的領導和黨的領袖。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這兩條都是重複了他的老觀念。反對黨的領導和黨的領袖，反對黨的政治掛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他原來所說的，不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以黨治國」，至於對群眾運動，如果說彭德懷同志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驚慌失措，那麼，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更加驚慌失措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就不能夠充份發揚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就不能夠高速度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實質正是這樣，彭德懷同志的反黨活動，是在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向我們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的一種絕望的進攻。

陳伯達說，在民主革命時期彭德懷同志同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分歧是如何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但是還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點。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後，是還要不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分歧。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堅定地領導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相反，彭德懷卻在實際上要使資本主義復辟。

陳伯達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當年第22期上，12月13日，中央又將此文印發給各級黨委。

胡喬木的文章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只是在黨內傳佈。廬山下來後，我已看不到任何黨內文件，這篇文章是1997年才看到的，得以在本書第3版時補入。從文中可以證實一件事，即廬山通過

「彭德懷反黨集團」決議時，這個集團當時的成員除彭、黃、張、周外，還有李銳這個人。胡這篇長文，更全面地維護了毛澤東和三面紅旗的歷史地位。從文中也可以看到毛澤東有關「左傾」和右傾的這種看法「『左傾』分子還是忠於革命的，而右傾分子卻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影響反映在黨內的結果，他們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別是不要社會主義革命的。」

廬山會議散了，接着的事情是北京開軍委擴大會議深入批判彭德懷和黃克誠；外交部揭批張聞天反黨集團；湖南省委揭批周小舟反黨集團。我雖然只夠資格當一名追隨者，水電部還是先後花了幾個月時間，揭批了「李銳反黨集團」，直到1960年2月才最後結束。隨着我下放北大荒勞動鍛煉，走上此生中最艱難的二十年歷程。

我的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也就到此為止。我個人以後的事情，有無必要再來回憶，很難說定，因為那只不過關係到個人的沉浮，而廬山會議則關係黨和國家的沉浮。我寫出這篇實錄，完全是為了讓後人知道有這一段史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結束語

——廬山會議的教訓

如前所述，在廬山召開的歷時四十六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之後，於1959年8月17日宣佈結束。我的關於會議的回憶也已經結束；下面要說的是我對廬山會議的總的看法。三十年之後作的回顧，也許可以說是比較接近「蓋棺論定」了吧。

在這場驚心動魄、關係黨和國家歷史命運的黨內大鬥爭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敢於凜然直言的彭德懷，作了深刻剖析的張聞天，提出中肯批評的黃克誠、周小舟，被定性為「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隨之，全黨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並根據廬山會議「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全國繼續實行經濟上的持續躍進。廬山會議的結局，不但沒有達到糾「左」的預定目的，反而使「左傾」狂熱如火上加油，愈益熾烈。廬山會議給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後果，從而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向黨內、向中央領導層發展，終於不可避免地導致十年「文革」災難的到來。

上面就我的記錄本和當年保存下來的有關資料，將廬山會議的實況作了一個比較詳細的敘述。特別是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談話要點，以及兩次常委會批彭德懷情況，盡可能如實錄下。這

樣就便於了解會議和毛澤東晚年思想變化的過程。回頭看這段史實，似可歸納為這樣幾點：

第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毛澤東晚年帶有濃厚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實踐。在運動中，毛澤東曾多次談到自己的社會理想。他認為鄉社合一，就是將來共產主義的雛形；工農商學兵，公社甚麼都要管。當時不僅是毛澤東，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人，大都自豪地描述過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總之，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為了實現這樣美妙的前景，還在理論上提出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商品貨幣關係，廢除八級工資制和家庭私有經濟等觀點。毛澤東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視為是一場幾億人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實踐中謀求一步到位，運用戰爭年代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大搞「人海戰術」，「拔白旗、插紅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來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號，成為一時風尚。毛澤東認為中國一窮二白是極大的好事（而不言經濟文化條件太差，起點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難），窮則思變，這是革命的天然基礎；認為中國的農民比西方的工人先進，他們之中蘊藏着一股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他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然而，這個大運動僅僅沸騰了半年，問題便接踵而來：國民經濟各種比例失調，工業生產全面緊張，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氾濫成災，農村生產力和社會生活秩序遭到嚴

重破壞。現實和理想發生了明顯的衝突，迫使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不能不有所冷靜，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廬山會議前的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這半年中的主題就是糾「左」，整頓公社的所有制，對群眾退賠，修改一些過高的指標等，以便解決繼續躍進的問題。

儘管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人民公社化運動沒有按照原來的設想發展下去，可是這一社會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終是毛澤東所執着追求的。「文革」之初發出的「五七指示」，曾作為「建設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國都要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以此達到消滅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差別的理想社會。

第二，當時糾「左」，神仙會階段提出的十八個問題，並不意味全黨上下已清醒地認識了產生「左」的錯誤的思想根源。毛澤東並未放棄對理想社會的執着追求，他將運動中的成績和錯誤做了慣用的形象比喻：九個指頭同一個指頭的關係（這也是當時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躍進、人民公社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不容許懷疑和反對；至於運動中有偏差和問題，則認為不必大驚小怪，是前進中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不斷糾正就是了。如認為公社已整頓得差不多（還要保留公共食堂），工業只須再調整一下指標之類，而最關緊要的是，勁可鼓而不可洩，「三面紅旗」決不允許懷疑，這樣，形勢就會很快好轉起來。毛澤東的認識是黨內大多數高級幹部的共同認識。當時，有誰不願意盡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呢？有誰不嚮往「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呢？當然，也有部份同志在嚴峻的事實面前比較冷靜，對黨內普遍滋長的「左」傾思想憂心忡忡，因此，對糾「左」的認識程

度比一般人深刻一些，這就是「彭黃張周及其追隨者」，以及後來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書言事，對總路線和大躍進還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見，主要是將錯誤出現的原因，歸結為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有問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背離了「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應該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左」的東西。彭德懷尤其張聞天對「左」的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比毛澤東深化了一層，就被認為懷疑「三面紅旗」，當然不能容忍。毛澤東當時說得明白：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廬山會議也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嚆矢。

第三，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着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由此，在反右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還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觀點，就直接引申到了黨內。毛澤東把彭德懷等為更好地糾正大躍進的錯誤而提出的

正確意見，視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而且尖銳到這種程度：他們進攻的實質，就是要代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分裂和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機會主義的派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革命，要按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軍隊、改造世界。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把「階級鬥爭」理論運用於黨內，同他對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狀況判斷錯誤有密切關係。1956年9月黨的八大通過的政治報告，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的形勢，對我國的階級、階級鬥爭和主要矛盾等重大問題，本來作出了正確的估計。八大報告指出：在我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已經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階級正在消滅的過程中；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已經取得基本的勝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後全黨全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毛澤東所同意的八大通過的正確路線，沒能在實踐中得到堅持。第二年，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反右派運動，強化了「階級鬥爭」理論。在195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又重提我國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的錯誤觀點；更為嚴重的是，開始將政治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在毛澤東看來，既然國內還有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剝削階級，他們的反動思想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雖然經過1957年反右派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舞台上消失；通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時刻在製造

輿論，準備復辟；他們必然要在黨內尋找其代理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從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在運動中開展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鬥爭，把社會上的種種對黨不滿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繫起來。（當時在十幾個省的省級幹部中，揪出了「反黨集團」和「右派集團」）一些對運動有疑慮或發表了某種不同意見的講真話的同志，就被認為是打白旗、促退派、觀潮派。從而使「階級鬥爭」理論在廬山會議「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從黨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錯誤批判和處分了大批幹部，許多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過不同意見，講了真話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全國戴帽子的共達三百幾十萬人，大大超過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數量。尤為嚴重的是，經過廬山的鬥爭，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接受了「階級鬥爭」實踐，導致了這一錯誤理論不斷發展，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在這樣一種理論的指引下，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自是當代歷史合乎邏輯的發展。

第四，廬山會議直接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黨和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轉為後期反右，轉折點是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政治局擴

大會議結束後立即召開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對彭德懷等人算歷史舊賬，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

本來，黨內發生原則意見分歧時，如果黨內民主生活正常，黨的領導人謙虛謹慎，大家能暢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見尤其是少數人的意見能得到尊重，即對黨的最高領導的監督和制衡機制健全時，是非自容易辨明，錯誤就可以避免。但經過南寧會議，到廬山會議時，黨內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謂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於一個人的意志。廬山會議的形勢，說到底，就是對毛澤東批評不得，尤其是有過「舊怨」的人批評不得。那時就已經感到「全黨共誅之」的氣勢了。

劉少奇在八大作政治報告，「黨的領導」一節，有這樣一段關於發揚黨的民主生活的話：「為了力求黨的領導工作符合於客觀實際，便利於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意見，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都要在適當的集體中經過充份的討論，容許不同觀點的無拘束的爭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黨內外群眾的各種意見，也就是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側面。每個領導者都必須善於耐心地聽取和從容地考慮反對的意見，堅決地接受合理的反對意見或者反對意見中的合理部份；對於由正確動機、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的任何同志，必須繼續和睦無間地共事，絕不要採取排斥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體領導，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黨內團結，黨的組織和事業也才會日益興旺。」八大隔了3年了，這段話人們可能被忘了；可是4月上海會議才過去兩個月，關於提倡海瑞精神——敢於犯上直言，關於「有時真理掌握在一個人手裏」，關於「李銳怕鬼」（實際是讚揚李銳上書，但膽子還不大，要將副本送李富春，內容還寫得太簡略）的話，

都還言猶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無常。戴上一頂「敵對階級」、「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這些全黨剛剛聽到的話，就統統不作數了！

第五，廬山會議還推動了個人崇拜的發展。在延安時期，新中國成立前後，毛澤東曾比較注意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盲目迷信權威。1956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曾科學地總結了斯大林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造成的錯誤，指出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關於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特別說到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將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對於各國共產黨員產生了巨大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繫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歷史的不幸是，幾年之間，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鬥爭，都沒有遇到甚麼抵抗，順利進行，真可說是「接二連三的勝利」，使毛澤東日漸驕傲起來。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過這樣一些話：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甚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個人相互混淆，毛澤東的這種說法，實際上為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延安整風運動之後，由於毛澤東多年來領導的正

確，他對中國革命的豐功偉績，為全黨所公認。也由於客觀環境需要樹立黨的領袖的威信，在宣傳上我們確實長期習慣於把黨的領袖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而從來不講領袖是一個集體；把中國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說成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貢獻，而不講也包含集體智慧的結晶；把一切成就歸功於毛澤東個人，少講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把領袖說成是絕對正確的，更不講領袖也會有缺點，也可能犯錯誤，等等。長期這樣宣傳的結果，個人崇拜就自然成為順理成章之事。當然，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宗法倫理觀念和小農經濟的影響，幾十年農村環境和農民戰爭的影響，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理所當然把毛澤東看做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誰都衷心樂意高唱《東方紅》。包括從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統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們的革命意識中也難免受傳統倫理思想的束縛。更何況那些別有用心的人。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當時華東協作區負責人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正確的個人崇拜」，自然得到黨內高級幹部的贊同，可以說，當時都以推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榮。7月23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發言中，講到「始作俑者」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情，深感彭德懷上書言事傷害了毛主席。老師勸說彭德懷作檢討時，這樣說道：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這種黨內以個人是非為是非，不提倡獨立思考，講義氣而不講真理，大家確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天，劉少奇又向全體與會者專門講了對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和個人崇拜的問題，說蘇共二十大後，我們黨內也有人學赫魯曉夫，搞反對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從而批評了彭德懷，認為這實際上是對於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力。

「神仙會」階段，儘管對「左傾」錯誤認識的深度不同，但當時頭腦清醒的人包括大區負責人，應當說是佔多數的。不僅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都發了言，表了態。直到7月23日前，周恩來一直召集國務院各部分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開會，算細賬，抓調整。除開毛澤東立意要反彭德懷的右傾，翦除這一「歷史隱患」之外，以柯慶施、康生為首的一些人，都觸動不得，一觸即跳：他們決不服輸，過於護短，過於保護自己；他們還到毛澤東面前進讒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綱，說「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這也就促成毛澤東的主觀武斷，以為彭德懷這回要「掛帥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後，雖講話次數不多，也沒有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張牙舞爪，但他三言兩語，起了批彭定調的作用。廬山會議後，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之後，就進一步推動個人崇拜的發展，終於使這個野心家在「文革」期間有大肆活動的機會。無情的歷史說明：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後果，是一旦領袖犯了錯誤，就必然導致全黨跟着犯錯誤，造成長期的全局性的錯誤。

第六，廬山會議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當年比給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為直接。在「反右傾、鼓幹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使國民經濟日益緊張，造成嚴重的饑荒。突出表現為：農業生產大倒退。根據後來的統計，1959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13.6%，糧食實際產量只有3,400億斤，比上年減產600億斤，僅為最後調整計劃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豬等主要農產品也都大幅度減產。重工業繼續追求高指標。1959年，重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8%以上。鋼產量達1,387萬噸，比上年增長73.4%；生鐵達到2,191萬噸，增長

60%。原煤、機床、發電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8%；與此相反，農業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設戰線進一步拉長。1959年全國基建投資在上年急劇膨脹的基礎上，又增加了81億元，增長30%，總投資規模達到350億元。由於基本建設戰線長，投資效果差，新增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資效果已經相當差的1958年還低5.6%，積累率異常膨脹，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年。積累額增加致使消費額比上年減少了22億元。人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1959年，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15%；而糧食徵購量卻比上年增加14.7%，農民口糧大幅度減少。全年人均消費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

1959年底，國民經濟已經步入嚴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傾」冒進狂熱的人們，看不到也不願意承認嚴峻的現實。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仍然估計，當年將是一個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計劃完成鋼產量1,840萬噸，並提出了八年完成農村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國家計委編制的1960年計劃，仍然以大躍進為基本指導思想，提出繼續進行「反右傾鬥爭」，爭取國民經濟的不斷躍進。然而，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和客觀經濟規律，企圖用主觀意志推動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的急於求成的「左」的指導方針，只能導致更為慘重的失敗。1960年，農業繼續減產，總產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主要農產品都比上年大幅度減產。其中糧食減產530億斤，棉花減產1,292萬擔，油料減產52.7%，生豬頭數減少32%。輕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棉紗、食糖、捲煙等主要輕工業生產嚴重萎縮的情況下，重工業總產值卻比上年增長了25.9%。許多重工業產品產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鋼產量

達到1,866萬噸，比上年增加479萬噸。基本建設戰線繼續拉長，積累率一直維持很高的水平。1960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到388.7億元，比上年增加了39億元。基建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達31%，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年。國民經濟各部門正常比例關係嚴重失調，農業、輕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出現赤字81.8億元，貨幣發行過多；商品零售價格上漲，市場供應十分緊張，人民生活日益困難。從1960年第二季度開始，許多大城市糧食庫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糧缺布，全國被迫壓低口糧標準，實行「低標準」、「瓜菜代」，減少民用棉花的供應定量。主要商品都實行憑票憑證限量供應。全民營養不良，體質下降，造成成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據《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淨增率為10.19‰；1960年，人口減少1,100萬，淨增率為-45.7‰；1961年，繼續減少348萬，淨增率為-3.78‰。

由於廬山會議錯誤的「反右傾鬥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如前所述，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展，終於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廬山會議是全黨和整個民族的歷史悲劇。值得慶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黨和民族是決不忌諱自己前進中經歷過的挫折和犯過的錯誤的。失敗是成功之母。正視失敗，才能從失敗中得到啟發，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廬山會議的是非功過作出公正的結論，從而走上撥亂反正的大道。歷史證明，我們的民族，我們的黨，是經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敗的；一切沉重的歷史包袱，我們已經和正在卸去，我們會更輕裝前進的。

附錄 1：

讀《彭德懷自述》

一口氣讀完《彭德懷自述》（以下簡稱《自述》），思緒萬千，感慨無窮。歷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運，十年動亂之後，終於能讀到這樣一本驚心動魄、震古爍今的《自述》。

1966年12月，彭老總從成都被揪到北京批鬥遊街，毒打致殘，此後又被囚於暗室，專案審查，直到1974年11月29日去世。去世前已癱瘓，他對最後被允許看望他的侄女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癱了，可我的案子還沒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為對「專案審查」者的提問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實實交代。」這些多年反覆交代的材料是為了弄清所謂「案子」而問而寫的。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卻是一部中國紅軍建軍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十年革命戰爭史；又是一個舊軍隊的士兵，如何畢生征戰，終於成長為幾百萬革命部隊統帥的歷史；一個農民的兒子，怎樣立志救貧，秘密結社，勤奮自學，終於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總之，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個真正的人的歷史。

彭老總一生的經歷和成就，主要是領導打仗，《自述》寫的也主要是軍事鬥爭。他的對手最早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軍閥，後來是日本的將軍，最後是美國的上將。槍林彈雨，出生入死，何止身經百戰。他起義參加紅軍前，從士兵到當班、排、連、營、團長，打了十二年仗。他是紅軍當年最有實戰經驗的軍事家之一（還是紅軍中第一個會打大炮的炮手）。他一生打敗仗不

多，戰場上犯的重大錯誤也寥寥無幾；讀完「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兩章，使人更加感到這是中外古今戰爭史上少有的統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聯軍總司令克拉克曾對他的僚屬說：「美國上將在一個沒有打勝的停戰書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第一次。」（引自《自述》。以下引文均引自《自述》）

1958年4月從武昌到廣州開會時，我同彭總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江人後，曾同我詳細談了平江起義的經過，還特別談到他的一個心願：今後想編寫戰史。戰爭是他的職業，他最心愛之物，一生心血傾注於此；往事，故人，戰場，無不銘記於心。因此，儘管手邊毫無可供參考的材料，身心又遭受如此嚴酷的摧殘且獨居暗室，想看見窗外一絲陽光而不可得，他卻能將三、四十年的戰爭經歷、戎馬生涯寫得這樣清楚，乃至許許多多地名、日期都準確無誤。作為一部歷史文獻，尤其是那些無其他人能提供的歷史事件細節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為人們所珍視，治史的人更會孜孜研究。讀完全書之後，我首先想到的則是所謂「野心家」、「偽君子」以及「一貫反毛主席」的問題。這是1959年廬山會議時，林彪、康生等人對彭老總的誣讟、批鬥的主題，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鎖。在廬山時，雖然彭總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觸也很有限，但同許多同志一樣，絕對不能接受這種對他的誣讟。我也被迫作檢討時，坦然承認說過這樣的話：彭總偉大，只有他敢於寫這樣的信。其實，當時這種認識只是晚輩的一種感覺；現在讀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歷史關節之後，我才真正知道彭總偉大在何處。

從《自述》中，可以舉出紅軍初創時期的三件事，以說明彭總是一個何等赤膽忠心、照顧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岡山。1928年11月間，平江起義開闢了湘鄂贛根據地，成立邊區特委之後，彭總和滕代遠等率領紅五軍

中的五個大隊（有七、八百人），前往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當時湘贛兩省反動軍隊準備再次「圍剿」井岡山。紅四軍約5,000人，草鞋單衣，沒鹽吃，糧食很困難，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生存、發展。可是上千的傷病殘人員和婦幼無法安置，又不可能帶走，勢必派隊留守。四軍前委多次開會討論，最後決定由五軍這五個大隊留守井岡山，讓彭總兼任四軍副軍長。這是一個極其嚴重而冒險的任務。除彭、滕二人外，五軍其他幹部都不贊成留下，認為「我們是來取聯絡的，任務已完成，應立即回湘鄂贛邊區，傳達『六大』決議」。彭、滕「說服了不同意見同志，準備犧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發展」。當時敵人有兩三萬人，敵我力量懸殊達三、四十倍。激戰三晝夜之後，五路陣地有三路被敵突破，彭總集合三個大隊約500人，帶領傷病殘員突圍。「時值嚴寒，天下大雪，高山積雪尺許，我的乾糧袋炒米丟失了，我不願別人知道，兩天未吃一粒米，飢餓疲乏，真有寸步難行之勢。可是槍聲一響，勁又不知從哪兒來的。」突圍後又遇伏擊，在贛南邊界幾縣轉戰兩個多月，鞏固擴大了部隊，打下瑞金，才跟四軍重又會合。「我向四軍前委彙報了撤出井岡山的經過。毛黨代表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決定你們留守井岡山。」當時，毛澤東是有自我批評的。

第二件事，反對一、三軍團分家。彭總領導的三軍團原是獨立發展起來的，1930年8月第二次打長沙，才同一軍團聯合成立一方面軍。《自述》欣慰地寫道：「從此以後，我即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總前委領導之下進行工作了。」這之前，中央2月來信，對形勢估計錯誤，要朱、毛離開紅軍，當時，彭總就給中央寫信，表示不同意：「時局緊張，主要負責人不能離開部隊。」「信是由四軍前委轉的，原稿留毛主席處。」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圍剿」開始時，因三軍團所部多是平江、瀏陽與陽新、大

治人，有地方觀念的幹部反對過贛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東西而陣，各發展各的地區。而當時只有兩個軍團合起來，才有可能吃掉敵一個整師。《自述》說：「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朱、毛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一、三軍團不再分開。我這一票在當時是起相當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佔優勢。」彭總分析形勢，說明留在湘鄂贛的地方部隊，可以堅持並擴大。「有意見到河東討論，但不能妨礙行動，更不能說一、三軍團分家。」毫無疑問，這是關係到第一次（及以後幾次）反「圍剿」能否勝利的大關節。

第三件事，揭露偽造信件。第一次反「圍剿」是空前大戰；毛澤東制定的方針是「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即把敵人引到根據地內來打。當時，地方正打AB團，三軍團轉向中心地帶，以至連帶路的嚮導也找不到。原來江西省委中有人懷疑毛澤東這一軍事方針，說是右傾機會主義、退卻路線，他們提出要「打到南昌去」。於是發生封鎖紅軍，散發傳單，寫大標語「擁護朱、彭、黃，打倒毛澤東」等情況。這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動。這時彭總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體的署名毛澤東的偽造信件，用以挑撥毛、彭之間關係。他根據自己的認識，立即斷定：「毛澤東同志決不是一個陰謀家，而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這封信是偽造的，這是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險惡陰謀。」（這時發生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情況極為複雜，有待重新作歷史總結。）他當天就召開三軍團緊急前委會議，親筆寫了一個簡短的三軍團宣言，堅決擁護毛政委、擁護總前委的領導，即刻將宣言和假信送到總前委。第二天，三軍團開到離總前委15里的地方，「我親自去請毛政委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使三軍團幹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紅軍初創之時，黨中央遠在上海，各地紅軍揭竿而起，八

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說有「野心家」，這正是歷代農民戰爭最容易發生「火併」之時。然而從以上三件事，我們能從彭總身上看到一絲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嗎？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顧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徹底服從全局。他自從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品質和正確領導之後，就敬佩之、服從之。當然，他不是一個喜歡盲從的人，對某種主張還沒有認識清楚時，也許要保留一時；某些具體問題，也許一直有爭論。但縱觀全部《自述》，彭總在整個革命戰爭時期是執行了黨的正確路線的。在決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央緊急會議上，在大家着重談了出兵不利的情況之後，彭總（從蘭州飛來）進入會場晚了一點，聽到別的同志轉述了毛澤東講的這一段話：「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接着讀下面這段《自述》，能不感動嗎？「我剛到，未發言，內心想是應該出兵，救援朝鮮。散會後，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飯店。當晚怎麼也睡不着，我以為是沙發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之後）「把主席的四句話，反覆唸了幾十遍，體會到這是一個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指示。……我想到這裏，認為出兵援朝是正確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決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擁護主席這一英明決策。」這就使人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後，「這一票」又是相當重要的。

彭總的老戰友、老部下所寫的懷念文章，不約而同多用這一類的標題：「丹心昭日月，剛正垂千秋」，「神威不滅，浩氣長存」，「忠心耿耿，鐵骨錚錚」，「英雄氣魄垂千古，國際精神召萬民」……這自然是他們幾十年的親身感受和發自內心的由衷讚美。

可是，廬山會議卻說彭總同毛主席的關係三七開（三分合

作，七分對抗），說他執行了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自述》對後者有如實的說明。1930年傳達立三路線，命令打武昌。彭總精通軍事：「前有堅城，後無退路，側長江，背南湖。」真要打，「有全軍覆滅的危險」，因此拒不執行。後來「妥協」一下：割據鄂南6縣，打開岳州。7月，何鍵派三個旅進攻平江，三軍團以8,000人對3萬之敵，三天打四仗，追殲潰敵，迅雷不及掩耳攻佔長沙。「這在軍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總卻作了檢討：「由於紅三軍團攻佔長沙的勝利，對於立三路線，也起了支援作用。」8月，成立一方面軍的會議上，經過討論，總前委決定第二次打長沙。當時三軍團半年內擴大了6倍，連續作戰，沒有休整。彭總說：「我未發言。從三軍團本身來說，迫切需要短期整訓。」結果圍攻長沙月餘未下，後來經過毛澤東、朱德的說服，才撤出戰鬥，佯攻南昌，巧奪吉安。對此，彭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的。他是一個謙遜的人，從不掩飾自己的過失。在第四次反「圍剿」前後，由於執行了當時中央領導的打贛州等錯誤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檢討。他是一個剛直不阿的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尤其遇到重大關鍵問題，決不計較個人得失而率直陳言。第五次反「圍剿」前後，他已逐漸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從軍事到政治，有過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打電報，其間還寫過長信，只是從未得到過答覆。彭總被人看做是張飛，他也以此自詡，有時不免脾氣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誰沒有個脾氣？由於不斷唱反調，他被撤掉軍委副主席職務。形勢越來越嚴重，對比以前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彭總對當時中央的錯誤看得更加清楚了。1934年春廣昌戰役時，中央領導人親自到前線督戰，強迫三軍團打陣地戰，固守廣昌，遭到慘重損失。在指揮所裏，面對面爭執，彭總「大膽地準備個人的不幸」，歷數指揮的錯誤，指着鼻子痛斥他們「是圖上作業的戰術

家」，「崽賣爺田心不痛」。請看《自述》中正氣凜然的記述：「那次，我把那套舊軍衣揸在包裹，準備隨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慮了。」

抗日戰爭初期，彭總是否執行了王明路線呢？請看《自述》：「至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條，原來思想上就沒有準備實行。在當時，我們想，在日軍佔領區，蔣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們，一切還是照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辦。到1938年秋六中全會時，八路軍已發展到25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這些從未通過國民黨，如要通過它，一個也不會准。」

從長征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許多重大歷史關節，彭總起過甚麼作用，眾所周知，毋庸贅述。所有這些，《自述》都有記載。但也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例如1939年冬彭總過西安，在程潛（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處當面大罵何紹南：「再去綏德當專員，老百姓抓了你公審！」何未敢再去，綏德從此成為陝甘寧邊區的一部份。他還對程說：「今天誰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槍，我們立即放第二槍，這就叫做禮尚往來，還要放第三槍。」1940年第一次反磨擦戰役，全殲朱懷冰兩個師。當時處境嚴重，彭總來不及事先請示。「事後報告了中央，得到了認可。」又如，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敵我兵力十比一，這時是彭總自動請纓的。

彭老總自幼沒有讀過多少書，在舊軍隊中靠自學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時，他曾覺得自己理論知識不夠，頗有點「自卑感」。從童年起，他認識社會，體會人事，都是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來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不是從書本中來的。也許由於這些緣故，他似乎很不習慣，更不善於為自己辯護。這可舉長征時的會理會議為證。由於林彪想要改變軍事領導的一封

信，會議對彭總發生了誤會。彭總並不知道寫信之事。雖然「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我就沒有申明……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廬山會議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總結了這種不愛申辯的教訓：「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這是一個多麼純樸、多麼過份自潔人啊！

直到廬山會議，儘管種種誣譏、斥責、非難鋪天蓋地而來，彭總仍然是照顧大局，不願多作申辯。其實，大躍進時的種種問題，他早有察覺，部隊中反映的有關材料，都及時給毛澤東送去。1958年12月，武昌會議公佈糧產7,500億斤，他有所懷疑。隨後到湖南視察，到了自己的家鄉，情況更加清楚。他擔心群眾餓肚子，立即給中央打電報，認為不能徵購1,200億斤，只能900億斤。會議初期，在小組七次發言，想找毛澤東面談未果，才親自口述筆改寫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觀彭總一生言行、性格和為人，不難了解，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況信中還肯定了大躍進的「偉大成績」。《自述》最後這一段話，真是令人不忍卒讀：「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甚麼就給甚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惟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有一次：「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我只能毀滅自

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同所謂「野心家」是誣讟之詞一樣，所謂「偽君子」，主要是對彭老總出名的生活儉樸、厭惡奢侈的一種故意顛倒黑白的誣讟。彭總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討米、餓飯、砍柴、挖煤、當堤工這樣苦難的生活中過來的。他的一個弟弟是活活餓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帶着三個小孫子出去討米，「我立在門限上，我不願去，討米受人欺侮。祖母說，不去怎麼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七十的老太婆，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着兩個孫孫（我三弟還不到4歲），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寫這些「交代材料」時，寫到傷心的時候，我們威震寰宇的統帥，常常寫哭了，眼淚打濕了紙張。「他們走遠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賣了十文錢，兌了一小包鹽。砍柴時發現枯樹兜上一大堆寒菌，檢回來煮了一鍋，我和父親、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們黃昏才回來，討了一袋飯，還有三升米。祖母把飯倒在菌湯內，叫伯祖、父親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說：『討回來的飯，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沒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今天還是這樣。不寫了！」「在我的生活中，這樣的傷心遭遇，何止幾百次！」

彭總一生不忘本，一生關心、熱愛勞動人民，始終保持最樸素的階級感情，尤其嚴格要求自己，這同他童年的苦難生活分不開。「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常常回憶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

在廬山時，彭總說過，他一生不保留筆記與文字材料。可是他卻為後代保留了這樣一本《自述》。彭總很喜歡《離騷》中的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與《自

述》相距兩千多年，內容與價值自然不同；但兩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志潔行廉，為後人之楷模，可與日月爭光，則是相同的。這本《自述》應當向每一個青年、每一個共產黨員推薦；這是一部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個真正的人的教科書。

1982年2月

（原載1982年《人民日報》）

附錄 2：

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

——我認識的黃克誠

第一次見到黃克誠，是1948年3月在東北局平分土地運動的總結會上，那時我剛從熱河調來。哈爾濱是後方，大家衣著都比較整潔，不那麼土氣了，只有黃穿一身枯黃色舊軍裝，特別顯眼。至今留在記憶中的是會上他同凱豐的激烈爭論。高崗去了熱河半年，這段時期由凱豐主持，許多地方執行政策「左」，「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侵犯了中農，殺人也過多。黃的純粹湘南土音，我是每句都聽得清楚的，有一句話記得最清楚，他最後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左」得跟江西差不多，這種嚴重錯誤，是被戰爭的勝利掩蓋了。

會開完後，黃即調到熱河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這是一個艱苦地區，我原在該區任報社社長。後來南下時聽報社的同志說，黃一到熱河，處事雷厲風行，如幹部一律吃大灶，分局負責同志只有個別有腸胃病的例外。報社班子隨黃進天津，後又南下湖南。在湖南三年中，我先後主持報社和省委宣傳部的工作，省委的大小會議始終參加，還常去黃的家中，同他逐漸無話不談。在湖南，大家親切地叫他「黃老」，他時年不到五十，大概由於高度近視，人又顯得蒼老，這個稱號沿用已久。我入黨之後，經過抗戰前後地下黨時期，延安六年，熱河東北四年，以及在湖南這三年，上下級和工作關係中，熟識的老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不在少數；但敢於沒遮攔，隨便交心，明明知道對方不會同意，

也敢於表達、敢於堅持己見的，黃老是頭一個。大家知道，多年來風風雨雨，同頂頭上司建立這種信任，多麼不易！為甚麼能夠這樣做到？不擺架子，平易近人，為人耿直等，這種優點，不少老同志都具備，但光有這些，還不一定能建立上述這種關係。同窗老友見了面，往往可以隨便交談，不怕走火；但上下級之間，總是戒心多一些。一同黃老接近，就使人從骨子裏感到，他是一點領導氣、官氣（俗話叫「首長架子」）都沒有的，是一個從思想作風到生活小節，在待人接物上，非常隨便隨和，真正平等待人，也從不掩飾自己觀點的人。他身上既沒有農民習氣，也沒有知識分子習氣和軍隊幹部習氣，是一個甚麼「氣」都沒有的人。在他面前，百無禁忌，使你敢於直言，敢於頂撞。

湖南剛解放，是新區，報紙的作用大，天天有社論，社會重視，群眾關心，那時還有民主黨派的報紙。朝鮮戰爭爆發時，群眾關心國際形勢，疑問極多，尤其害怕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對此報紙不能緘默不言，尤其對同行還有個輿論導向問題。可是，按照慣例，地方報紙對國際形勢無發言權。鑒於廣大讀者的迫切需要，不及等待中央報紙的聲音，我接連發表了許多篇由自己執筆的社論和評論，這也同平時省委對我的信任和放手有關。但關於三次大戰等問題，我同省委領導也同黃老發生了很大爭論。於是，只好向中央請示。中央宣傳部隨即回電：同意報社的做法。記得黃老將回電給我看時，笑着向我說：李銳，你勝利了。還有一回，在他家裏，談起我軍剛到東北時的困難形勢。他率領三萬五千華中部隊，長途跋涉，歷時兩月，出山海關到遼西時，部隊已非常疲憊，還有減員，不休整無以作戰。關於當時東北的戰略方針，他認為必先建根據地，站穩腳跟，作長期準備，不能急於求成；沒有鞏固的後方，不能作戰。他將這些看法和當時困難情況，兩次電告中央，同當時林彪、高崗等人意見不謀而合。於是

就議論到高崗其人。根據自己在熱河和哈爾濱時（住在高的家中），同高密切接觸中的印象，我談起高的嚴重缺點，其中一條是用人有親疏、有小圈子。黃雖不以為然，但也並不介意於我。剛到湖南時，省委內部人事關係，有過個別不協調之事。由於黃老威信高，沒有發生甚麼問題。

在學生時代，我雖然讀工科，但對歷史一直有興趣。在延安經過整風搶救，很想多了解些黨內鬥爭的歷史情況。於是同黃老的談話中，常問及這方面的問題，如「AB團」到底怎麼回事。還問過這樣的問題：在江西反「圍剿」時，毛主席威信高，為甚麼王明路線一來，奪了他的權，中央高層中無人挺身支持他？黃談到黨內「左」的病根很深，大家慣於盲目服從，也談到毛的性格脾氣以及用人缺點，因此失掉一部份人心。關於用人缺點，《黃克誠回憶錄》（上）有一段這樣的記載：有一個原反對毛的一軍團的幹部何篤才，下放到三軍團黃那個師當宣傳科長，何很稱讚毛的本事，沒有人能超過。「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甚麼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甚麼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使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何篤才選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李會順從，騙取了信任，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李韶九可謂江西時期的康生，此人採用逼供信，大肆捕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因而激起富田事變，造成大打「AB團」的錯誤肅反。

這種記不清次數的漫談中，黃老談過他自己一生中的重要

經歷，說他被批判為「右傾」、「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受降職處分等，總不下十來次。這些情況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較詳細的敘述。在過去漫長的戰爭年代，由於「左傾」盲動、立三路線，尤其王明路線的長期干擾，同時黨有紀律約束，必須服從上級的形勢下，使得人們慣於服從，不敢講真話。可是，不論教訓有過多少次，吃過多少虧，黃克誠始終是一個一貫敢於講真話的人；如果碰上一個不整人的上級，意見不一，他就會爭論不已，吵架不休。

早在大革命失敗後，黃離開唐生智部，輾轉回到家鄉湘南永興縣時，特別支部決定組織暴動，奪取縣城。他以為力量過於單薄，主張先發動群眾，準備條件。儘管事實上暴動沒能起來，他還是受到嚴厲批判。這是他第一次被說成右傾機會主義。那時湘南特委積極推行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命令各縣大燒大殺，不僅要燒掉縣城和土豪劣紳的房屋，還要將沿衡陽至廣東樂昌間大路兩側村莊，統統燒掉。黃不願縣委領導批他右傾機會主義，還是設法保住了永興縣城，沒有燒掉。他的哥哥是老實農民，很不贊成燒房子，說地主房子為甚麼不能分給窮人呢？他深知農民群眾對亂燒濫殺，非常反感。從井岡山回來的人說毛澤東也是不贊成燒殺的，這使他對自己的看法更加堅定，於是將不許燒房子，規定為部隊的一條紀律。當時由於堅決反對亂殺無辜的做法，黃還一再同縣委領導唱反調。縣委開會批判他右傾，責令檢討，他拒不認錯，於是被撤銷縣委委員職務，不准他參加黨的會議，只讓他帶兵守城。

朱、毛在井岡山會師後，湘南五縣共有8,000農民武裝撤退到井岡山，後因環境困難而倉促決定，將這8,000子弟兵編成四路游擊隊，仍分散回到敵強我弱的湘南各縣去打游擊，黃任第二路司令。領導無經驗，農民戀故土，這支初出茅廬的隊伍，除開保留

少數幹部和人員外，很快就被敵人全部打垮了，並且遭致各縣的大屠殺，一片白色恐怖。黃克誠與一個同伴從永興孤身出走，浪跡四方，求食宿，找組織。從1928年10月到1930年春，他從武漢到上海到天津一帶，最後又回到上海。其間目睹大革命失敗後，大城市中黨組織慘遭破壞的情況，自己飽嘗流浪孤獨之苦。這一段生活，使他深深感到敵我力量的懸殊，沒有根據地做依託，不能發展武裝力量，革命很難前進，連個人的生存都成問題。最後在上海接上組織關係後，中央軍委派他到紅三軍團工作。

這時立三路線提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計劃，傳達到三軍團。黃克誠預感到情況不妙，以為拿現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無異以卵擊石。於是給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寫信，陳述自己的看法。三軍團打下平江之後，討論下一步的行動，黃再次提出反對攻打大城市的意見。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知道城市決不可能舉行暴動，根本不具備奪取武漢的條件。他也不贊成暴動奪取長沙的主張，以為只能相機智取。黃的這些意見受到嚴厲批評，認為他不宜擔任重要領導工作，撤銷了原要委他為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

1932年初，蘇區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面軍奪取贛州，黃時任三軍團一師政委，為主攻部隊。事前他極力反對打贛州。後來贛州久攻未克，傷亡重大，敵軍反攻，始被迫撤圍。戰役進行中，黃曾數次建議撤退，並批評彭德懷為「半立三路線」，敵反攻時，未接命令，主動撤走，幸未追究。後來開會批判，被認為對抗中央路線，還說他一貫右傾，如反對中央的土地政策，支持打「土圍子」擴大蘇區（這都是毛澤東的主張）等，黃不服氣。部隊過贛江西岸之後，一路行軍，一路挨批判，黃也就同批判他的軍政治委員賀昌爭吵了一路，拒不作檢討，並表示要同他們爭論二十年。這次沒有受處分。這年10月，開了批判毛澤東的寧都會議之後，

三軍團隨即在廣昌開會，貫徹寧都會議精神。因為黃支持毛的路線，就把他拉出來批判，會後撤銷了他第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

長征途中，黃一直做三軍團先頭部隊第四師的政委，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斬關奪隘，浴血奮戰，先後兩位師長陣亡，一位師長重傷，他幾度遇險，千鈞一髮，倖免於難。在第二次佔領遵義後，他看到主力紅軍受到如此重大削弱，再也經不起消耗了，便向領導同志提出：當前保存革命力量為第一重要，應當盡量避免打硬仗。他還具體談到有幾次戰鬥，其實是不必打的。黃的這次談話，又一次被認為是右傾和缺乏信心的表現，只認為他已不宜於帶兵打仗，調離所在部隊，回軍團司令部試用。後經他懇求分配點工作，才任命為司令部偵察科長。在會理會議之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時，黃雖已不擔任領導工作，由於是「老右傾」，又被當做靶子，被批判了一通。

紅軍出了草地之後，從一軍團調了幾名領導幹部到三軍團。黃不改好提意見的秉性，依舊照常向新來的領導提意見，並堅持自己的看法。於是被認為「狂妄」，「目無組織」，甚至有這種說法：像黃克誠這樣的人，年紀大了（當時他不過三十來歲），又不中用，當個普通戰士都不夠格，還怕他掉隊，落入敵手以成後患。這說明他當時處在一種相當危險的境地。三軍團多年來在彭德懷言傳身教的影響下，不論環境如何變化，始終保持艱苦樸素本色，上下一致，伙食一律，無人搞特殊化。對新來的領導聚在一起改善伙食，幹部和戰士看不慣，難免講些怪話，加以個別戰士有違反紀律的行為，值此部隊極端疲憊和減員之時，新來領導準備審查幹部、整頓紀律，要處理所謂問題嚴重的人。黃於是又找領導談：經過千辛萬苦，剛走出草地，有問題應以教育為主，不能再搞這等脫離群眾之事。軍團領導本來準備安排黃擔任縱隊組織部長之職，也因此而告吹了。

在軍事行動方面，黃克誠「一貫右傾」；在肅反鬥爭方面，黃克誠也「一貫右傾」。中央蘇區開始打「AB團」的肅反運動時，黃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最初他也盲從過，雖然比較保守，但也肅掉了一些。上邊一號召，下邊一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對『AB團』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內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頸上這一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黃克誠是一個真正不二過的人。

第三次反「圍剿」之前，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運動。黃時任第三師政委，上邊命令抓捕所謂「AB團」分子，他就拒絕執行了。可是當時肅反委員會權力太大，三師中還是殺掉了一批幹部，其中有不少是很優秀的幹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篤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師範學生，參加過南昌起義，對一軍團的情況很熟悉，黃同他相處中，無所不談。以後再要抓人，黃就硬着頭皮頂住，堅決不從，還對肅反委員會的人說：你們要抓的人中，並沒有一個地主、富農分子。後來實在頂不住了，就悄悄通知名單上的人上山躲藏起來，打仗時再下山參加戰鬥。但最後這些人還是被找到殺掉了。他為此無限痛心，悲憤地質問肅反委員會，為甚麼濫殺無辜？同他們大吵了一通。因此黃也被懷疑是「AB團」，「托陳取消派」，決定將他抓起來「審查」。在三軍團，黃同彭德懷之間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關係，有時吵了架也相安無事。這時幸虧彭深深信任這位打仗和進言都勇敢的部下，

進行了干預，他才得免於難。但仍然被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撤掉了他三師政委的職務，分配到軍團司令部當秘書。他對彭德懷的干預從來不知道，彭也從未跟他談過此事。後來廬山會議上受批判時，說他支持彭的《意見書》，是為了報救命之恩，他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原委。1959年廬山會議8月1日常委會後，毛澤東留我們旁聽的四個人吃飯時，就曾問過黃、彭「父子關係」的說法。1931年12月，開始糾正肅反「擴大化」之後，黃才又被起用，任一師政委。一上任就趕上前面談到的打贛州。

1935年9月，長征的紅軍向陝北作最後的進軍。指戰員體力消耗很大，傷病員很多，行軍時掉隊的人仍一路不斷。保衛部門懷疑這些人情緒不振，會投敵叛變，決定嚴辦。當時黃已降職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對這些同志實在不忍處理，有一位受過重傷的管理科長，只因過草地時丟掉幾名傷兵，也要交付審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卻遭到了狠狠的訓斥，撤掉了他所長的職務。總結了這些沉痛的教訓，抗日戰爭中他在新四軍時，在華中局擴大會上作報告，談到審幹和鋤奸問題，提出了「寧可錯放，不可錯殺」的主張。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毛澤東和中央的正確領導，在華中新四軍的戰鬥歲月中，黃克誠的處境比過去內戰時期大不相同，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為蘇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他的嚴格的實事求是精神，遇事多從困難處着眼的作風，在實踐中自有新的發展；他的好提意見並堅持己見的性格，自然也絲毫沒有改變。因此，也發生過同華中局領導意見相左之事。1940年，同國民黨軍韓德勤部的反「磨擦」戰役，取得黃橋勝利之後，12月的曹甸之戰，從政治到軍事，黃都是不同意打的，尤其在水網地區攻堅作戰，於我十分不利。後來在打法上，根據歷史上的作戰經驗，黃還作過具體建議，未被採納。曹甸戰役終於沒有打好，他卻被認

為右傾，撤了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保留政治委員職務，司令員由陳毅兼。陳不能到任，實際上黃仍是一身二任。1941年夏，日軍大「掃蕩」，他又同華中局領導發生「保衛鹽城」之爭，又被認為不服從指揮，開幹部會對他進行批評。他不服，堅持自己戰前所提意見的正確，戰役未達預期目的，不是他不服從指揮，而是上級指揮不當。當時華中局和軍部都在鹽城，在日軍「掃蕩」開始時，他建議及早撤離，跳出敵包圍圈，分散游擊，伺機反擊。鹽城終於未能守住，倉促撤退，造成損失。他聯繫上次打曹甸戰役，認為兩次都是上級處置有誤。由於爭論相持不下，黃便電告中央，中央將電報轉回華中局，仍爭論不已。雖然意見未變，黃感到這樣下去，極不利於團結對敵大局，於是委屈到底，服從組織決定，在華中局會議和幹部會議上作了檢討，還向毛主席發電作了自我批評。事後，他同陳毅交心，終於消除一些誤會。1942年陳毅總結曹甸戰役時，從政治到軍事，都承認有不當之處。這以後，黃率領的新四軍第三師，在蘇北頻繁作戰，不斷勝利，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日本投降之後，他認為這是我軍進軍東北的大好時機，不顧饒漱石的阻撓，他以自己的名義，向中央發了一份一千幾百字的長電，陳述對當時形勢的看法，如何在軍事上經略華北、山東，收縮華中，調5萬最好10萬主力出關爭取東北。後來中央的方針和實踐，證明了這份電報的起草者確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我曾同黃老談過我在延安被「搶救」，關了一年多監牢的情況。他就談到他當年是如何抵制這一運動的。1943年四、五月間，華中局奉中央令開展「搶救運動」時，黃就建議，要接受打「AB團」的教訓，不要執行，以免發生逼供信的錯誤。可是，華中局不能不執行。他沒有辦法，只好在自己所屬的第七旅，親自去搞試點。有幾個人硬逼時極不正常，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

氣，不着邊際了。黃於是立即命令停止「搶救」，將被「搶救」的人統統釋放，做好善後工作；同時立即通知所屬部隊和管轄地區，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從而在蘇北和三師避免了這場災難。他的《回憶錄》中，還談到在華中局彙報審幹和「搶救」運動情況時，他如何及時解救了曾希聖（第七師政委、黃在衡陽第三師範的老同學）的被打成「特務」的愛人，從而發現「人證」所在的譚震林第二師，每個團都「搶救」了百把人。於是，饒漱石同意黃的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

1952年春，得知即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就以在大學學工科為由，向省委堅決要求轉業到工業系統。自己在宣傳和新聞工作崗位十來年，深感坐而論道，眼高手低的空疏之病，應當去做點實際工作了。可是，我是本地人，省委以為我應留在湖南，黃老甚至認為我應向理論方面發展。後來他自己也奉命調中央，最後省委才同意我的要求。到北京後，同黃老仍保持來往，每年總要去看望他兩三次，同他漫談，獲得教益。在水電總局創業之初，為爭取部隊的轉業幹部，向他求過援。黃河規劃醞釀三門峽方案時，他曾表示過懷疑。1958年1月，參加中央南寧會議討論三峽問題後，回來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特去黃老家，告訴他我的意外遭遇（三峽問題採納了我的意見，毛主席命我當他的兼職秘書），自己非常不安，怕以後出事。記得調離湖南時，黃老曾告訴我：發言權不要太高。我還向他反映了胡喬木的一種看法，毛主席這時有一種類似抗戰初期的興奮心態。大躍進期間，忙得團團轉，同黃老很少接觸。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我從西南各省轉到長沙時，同周小舟有過一次長談，交換對大躍進各種問題的看法。小舟告訴我，黃老3月間來過湖南，到瀏陽等地看過小高爐煉鐵，認為這樣煉鐵，浪費資源，勞民傷財，太不划算了；這種不講經濟不講科學的蠢做法，是得不償失的。他肯定湖南沒

有強迫推廣密植做得對，糧打得多一些，不像湖北、廣東，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餓肚子。小舟還告訴我，北戴河會議時，通過了全國搞人民公社的決議後，黃老曾向他談過（在座有陶鑄、王任重等），人民公社掛個牌子算了。黃老這次走了幾個省，深深感到，到下面了解真實情況，已很困難。3月2日，他在邵陽對陪同他的地委正副書記和軍分區政委，講了這樣一段話：「近年來，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幹部中，有一種反常現象，不敢說真話；說真話的受壓制打擊，看風說假話的反被提拔重用。有些假話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瞎指揮，下面怕戴『右傾』帽子，就大放『衛星』，講糧食畝產幾萬斤，一個縣講生產鋼鐵多少萬噸。」他最後說：「我見到甚麼問題，喜歡一吐為快，敢講真話，實事求是。正面的意見，反面的意見我都聽，不主觀武斷，不無理壓服別人。」（《湖南黨史月刊》1988年第1期）

1959年廬山會議，黃老是7月17日上山的。這時彭德懷的《意見書》已經印發。18日一早，周小舟、周惠和我去看望他。我們都談到，在小組會上還有不能多談缺點的壓力。黃說，在書記處的會議上他也講過，我黃克誠總還算一個敢講點真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好講了。談到彭總的信，黃說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按照實際情況，缺點還可以說得更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說。他明明知道會議對大躍進的看法，還有分歧；他尤其清楚毛、彭之間存在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有些老疙瘩一直沒有解開；他也知道這時要他上山來，自有特殊原因；但他還是在19日的小組會講了真話，以支持彭的意見。他大談大躍進中的缺點，說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當時河南最早放煉鐵「衛星」，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長高揚去調查，向中央報告了真實情況，河南省委大為光火。他說，這就是報喜高興，報憂就不愉快。他用這樣一句話結束他的發言：毛主席講過開動腦

筋，放下包袱，缺點不講，總是個包袱。

關於廬山會議的情況，其中彭、黃、張、周和我這個「追隨者」的詳情，我已如實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交代。這裏只重提兩件事。一是7月23日毛主席批彭講話後，當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談；這已是很不應當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黃老一談，我說了這樣擔心的話，「人家會說我們還有小組活動」，也未能阻止住，黃老只好同意我們去。黃一直勸導我們，有意見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談清楚。小舟和我仍激動，小舟說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後被捅開，當然更是火上加油，定案成「反黨集團」。弄成這個局面，23日夜之事有很大關係，至今仍感到內疚無已。二是，我們三個人（我與二周）幾次作檢討寫交代，關於黃老，我們都無一字一句貶語，都是實事求是地講他為人處世的長處，尤其民主作風好，對幹部寬厚，以及我們對他的敬重等。這是至今感到的一種寬慰。廬山會議最後階段，迫於形勢，必須維護黨的總路線，維護黨的團結一致，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彭德懷、黃克誠和張聞天只能「繳械投降」，「要甚麼給甚麼」，把一切都兜攬起來。他們做這種違心之事，當然痛苦萬分。那又有甚麼法子呢，這是歷史鑄成的。黃老後來對他的兒女說過，廬山會議後期，他還是違心地認了賬，雖說這是萬不得已，出於服從決定、服從上級的慣性，但總覺得自己講了不實事求是的話，心中一直耿耿。正由於這個教訓，在「文化大革命」中寫檢討交代時，他就變得更加「頑固不化」了。這裏我想附帶說一下黃老的家風，他是怎樣教育四個兒女的。他的「家訓」有：「你們要靠自己的努力奮鬥成才，不要靠我的甚麼『關係』『後門』，我黃克誠是沒有甚麼後門可走的。」「你們要學革命，不要學世故。千萬不可不學革命，卻把世故學會了。」（《新觀察》1987年第15期）這四

個兒女我都認識，且小有往來，他們作風樸實，都是「尋常百姓」，都有「乃父之風」。

1979年初回到北京恢復工作後，仍然同50年代一樣，每年總要去看望黃老幾次，回憶舊事，評論人物，更多的是議論形勢，關心國家大局。有時仍然免不了爭論，乃至相持不下。1980年尾討論《歷史決議》前後，我們也談過毛主席的功過評價問題，對我教益很大。他的《回憶錄》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篇附錄，從歷史上許多重大關節之處，來闡述毛澤東無可替代的功勳；說明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就不可能誕生一個新中國。他也實事求是地談到毛晚年的錯誤，但反對以輕薄的態度、感情用事的態度來評價。最後從古往今來的歷史出發，得出結論；必須捍衛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的精神武器。這篇文章發表後，對全黨和全國人民正確地認識毛澤東的一生及其功過，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年黃老病重時，我幾次去醫院看望。最後病危時，他反對再進行搶救，認為毫無意義，要拔掉身上那些管子，經過醫護人員保護才止住。1979年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他時，他就談到彭老總去世前的種種慘狀，這時他又不免又想起彭老總來，說自己也不料能活到84歲。病危時我去過醫院兩次，已只能隔窗探視，病床周圍架滿各種醫療器械，不得近前。醫生說：獨心臟堅強，尚能搏動。隔約半月，12月28日正午，電話中得知噩耗，趕到醫院，入病室，始見瘦削面容，在遺體前久久佇立，不禁悲從中來；近四十年來可以交心的人，從茲永訣！

這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吟得八句，以寄哀思，並在《人民日報》刊出：

可以交心人永訣，難於握管我傷情。

忘年道誼兼師友，憶昔狂潮共醉醒。

九畹貞風當世仰，一身正氣有公評。
更聆教誨今無及，時下何堪失直聲。

幾年來，一直想寫篇文章懷念黃老，來稍稍說明詩中的意思。今年是黃老90歲誕辰，不能再拖了。上面所寫的這些瑣瑣碎碎，也只是主要從講真話這個側面，來介紹黃克誠這個不是鳳毛麟角，也是難於遇見的真正共產黨人、真正的人。不講真話，聽不到真話，我們曾經付出過多麼巨大的代價；大家都知道，其原因主要在我們一直缺乏應有的民主生活。如果今後能夠做到，大家都願意都能夠講真話了，相信我們的黃老定會含笑九泉。

1992年10月下旬
(原載1992年12月25日《文匯報》)

附錄 3：

重讀張聞天的《廬山發言》

去年9月劉英同志來信說，「聞天同志含冤去世已經8年多了。明年是他的85週年誕辰，有關方面計劃為他出版一本紀念文集。你和聞天同志在廬山受難，很希望你能寫一篇文章」。不久前，《張聞天選集》編輯工作小組將《選集》文章送了一套與我，其中就有張聞天在廬山的那篇有名的長篇發言。重讀之後，一方面引起往事的回憶，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對張聞天的敬重。

大家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的後期，批判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時，張聞天被目為「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副帥」，受衝擊也是極為嚴重的。攻擊的靶子就是這篇講了三個小時的《發言》。此時此刻，張聞天為甚麼要作這樣一個長篇的發言呢？

廬山會議的前期是所謂「神仙會」，原來只準備開十幾天，產生一個會議的《紀要》就結束的。會議的基本精神是毛澤東對當時形勢估計的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大家遵循劉少奇的兩句話：「成績講夠，缺點講透。」各抒己見，有的講成績多些或者大話還多些，有的着重講了缺點或面臨的困難。總之，無甚拘束，開始確有點像「神仙會」的味道：白天開會遊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7月15日左右，《紀要》草稿和彭總的信印發之後，形勢就向緊張方面變化了。這時，有些同志認為颯「共產風」等問題已作過檢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願意多談、多聽缺點，怕因此「洩氣」，今後難以維持繼續大躍

進的局面。有些同志則感覺還有一種「壓力」，即難以將缺點講透，認為不把事實和後果擺清楚，找出其根源，認真總結好經驗教訓，就不利於今後的工作。多數人的觀點比較持中，都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決定鋼翻一番之後，張聞天就密切注意大躍進發展的形勢了。外交部機關煉鋼，由於沒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1959年3月在兩廣參觀時，他作了很多調查研究，注意到勞動力和運輸的緊張，許多小高爐並未點火，也還遇到浮誇以及糧食和副食短缺的情況。在廬山會議前的兩次政治局會議上，他一再陳述自己的意見，認為在宣傳中要承認缺點和錯誤。他同彭德懷在會前和會議期間（他們住處靠近）有過接觸，許多觀點相似，「意氣相投」。他還找計委和財貿部門的負責同志了解情況，也找地方的負責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談。他對大躍進有一套看法，確是憂心忡忡的。彭德懷的信印發之後，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處，我們一夥談得來的人聚到一起（有胡喬木、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和我，還有陳伯達），正談論信的內容時，張聞天進來了，同我們一起議論起來。記得我還開過一句玩笑，說我們這是「低調俱樂部」（所幸者，這個如追究其名稱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鬥高潮時未揭發、坦白出來）。喬木馬上接着說：不是，不是，我們這是馬克思主義俱樂部。這個細節可以說明我們之間談話的傾向。這是在廬山會議時，我同張聞天主要的一次接觸，因為我們沒有編在一個小組。

我沒有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下工作過。1948年2月，我從熱河調到哈爾濱，在東北局工作。5月間，張聞天離開合江到東北局任常委兼組織部長。我曾列名於他所領導的巡視團為巡視員，但一直沒有參加具體工作，只是在列席東北局的會議時常聽他的發言。這個期間，張聞天着意研究經濟問題，曾對東北各種經濟成份的歷史和現狀進行過多次細緻的調查，常率領巡視組深入

基層，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國解放後的經濟建設方針。1948年8月，他受東北局委託，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作了總結，接着又為東北局寫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科學地分析了當時東北存在的5種經濟成份（國營、合作化、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小商品）及其相互關係，並據此提出了黨對經濟建設應該採取的方針路線。應當指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統分析的文件，《提綱》在當時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其中的許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文件中。到1949年7月這個期間，張聞天還先後就供銷合作社的方針、土改後農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對待私人資本主義政策等問題，向中央和東北局寫了四個文件。其中允許少數新富農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等意見，曾受到過非難，但他並沒有輕易放棄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1954年電力代表團到蘇聯參觀時，他在大使館接見過劉瀾波和我，那天見到李德倫來使館，知道他當時在學點音樂，因此使我產生了一種他在蘇聯時頗有「閒情」的感覺。在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同我們幾個人的一次談話中，談到遵義會議召開前，先將張聞天、王稼祥爭取過來的故事，還說到派張到蘇聯當大使，來不及事先徵求他的意見之事。這就使我證實了當年的這種感覺：張聞天還是想在國內做事的，而且仍然對經濟有執着的興趣。1956年反急躁冒進後，他就在駐外使館談過，國內有冒進，供應緊張，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觀主義，忘記了國家還很落後。他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准講反冒進是有抵觸情緒的。因此，他在廬山作長篇發言，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大躍進提出全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他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實際情況，又有經濟理論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何況他是過來人，過去犯過嚴重

的「左傾」錯誤，按照他後來檢討時說的，對「左」的東西特別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在這樣重要的歷史關鍵時刻，有責任向黨中央闡明自己的看法。

這個長篇《發言》是7月21日在華東小組會作的（組長是柯慶施），距離毛澤東7月23日作反右報告，只有兩天。這時對《紀要》特別是對彭德懷的信，非難已經很多，如說這封信的矛頭是「針對主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是『左傾』路線錯誤了」，「路線錯誤那就要更換領導了」，種種說法都在傳開，形勢已經比較緊張。正是在這樣嚴重的時刻，張聞天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以鮮明的態度，確鑿的事實，科學的語言，冒險犯難，極言直諫，完全支持已經遭到非難的《紀要》和彭的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後來批鬥他時，說他的發言對彭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小組會的發言，《簡報》中一般只刊要點。7月23日之後，這個「副帥」的《發言》記錄稿就全文印發下來。批判時有人統計：全文八千多字，而成績只有二百七十餘字；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紀要》講了大躍進三個方面的缺點，即比例失調、「共產風」，虛報浮誇和強迫命令，但沒有對這些缺點展開論述。《發言》說是對《紀要》所談缺點補充一些意見，實際是對大躍進作的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總結：對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點，引起的嚴重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作了系統的論述；對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三種所有制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根本問題，作了理論的探討；最後歸結到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

當時討論中有一種較為普遍的意見，即前述多談缺點，就會洩氣，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發言》針鋒相對地說，缺點定要講透。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我們那時犯盲動主義，毛主席就經常講，所以對缺點要採取鄭重的態度，不要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增產數字報了那麼多，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馬克思說過，革命時容易辦蠢事。列寧也說，要正視這些蠢事。

《發言》指出，關於缺點的原因可以講得具體一些：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講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如鋼鐵指標太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太長，「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二千多萬，人浮於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不能實現價值；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等等。從而造成大量資金和物資浪費、積壓，市場供應緊張，物資儲備減少，財政結餘用光，外貿出口不能完成等惡果。「全民煉鋼」不單賠了50個億，最大問題還在9,000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甚麼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

關於公共食堂問題，當時議論甚多，河南認為食堂有八大好處，全省沒一個垮的。大多數人還是要保食堂，以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標誌。報紙上曾大批「資產階級法權」，批按勞取酬。《發言》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照顧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明確提出：我們不能搞平均主

義，還是要按勞分配。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社會主義要貫徹按勞分配，就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權，這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這樣的富對個人好，對國家更好，它是應該的，光榮的。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發言》還精闢地談到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宣傳問題：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這些可以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做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

關於產生缺點的原因，《發言》同意《紀要》說的，主要是由於缺乏經驗。但不能以此為滿足，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和作風上去找原因，這樣才有利於總結教訓，避免今後重犯錯誤。這也是這篇發言的主旨所在。關於主觀主義和片面性，《發言》專門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講到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是對的，但強調過了頭，以致不顧實際可能性，這就成了主觀主義。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從主觀主義進而談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領導經濟光政治掛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賬，只要算政治賬。這是不行的。今天總結經驗，尤應該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

綜合平衡的問題，當時也是很有爭論的，有的人以「平衡

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一法則，為大躍進出現的嚴重失調辯護，甚至認為就是要衝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紀要》中「綜合平衡」一節是我參加起草的，內中有四句話：「統籌安排，供需協調，瞻前顧後，合理佈局。」記得因字數所限，沒有展開講透。《發言》明確地說，經濟建設就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我們利用相對平衡制定經濟計劃，要使之大體是個平衡的計劃。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時平衡，這就是積極平衡。還建議在《紀要》草稿中加一條「經濟核算」。任何產品，都要講成本；要算賬，這跟「算賬派」是兩回事。用毛主席的話，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就是要精打細算。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說是要算「政治賬」。其實，「政治賬」同「經濟賬」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我們的國家還是一窮二白，資金有限，必須根據節約原則，嚴格控制資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塊錢。毛主席提出要大家學政治經濟學。領導經濟建設，不懂或不熟悉經濟規律是不行的。中國的經濟建設有其特殊性，但是有關的普遍規律仍然起作用，問題在於兩者相結合。政治經濟學，不僅高級幹部要學，廣大幹部也要學。

大躍進時期，不按科學精神辦的事太多，報紙上放肆地報道，隨便吹牛，放衛星，超外國，引起很大的混亂，國外影響也不好。廬山會議前夕，在外交部的務虛會上，張聞天就講過不要吹，說有些東西我們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但究竟正確與否，還有待實踐證明。因此，《發言》強調，必須學習科學技術知識。許多東西我們缺乏常識。不能隨便把原有的東西推翻，更不能隨便吹牛。生產技術措施沒有科學根據，光用土辦法蠻幹不行，蠻幹是要死人的。對於已有的科學成果要重視。「一切經過試驗」，

試驗確實成功了，再推廣不遲。但實驗室裏成功了，還不等於在生產中也已成功。趕超世界水平之類的話，要謹慎，的確比人家高明再講也不遲，而且以自己不講、讓人家替我們講為有利。他覺得當時我國的國際威信已經受到影響。

《發言》針對性極強，如此明快而尖銳，幾乎毫無顧忌。最後談到根本關鍵還在黨內民主作風問題時，尤其如此。廬山會議之前兩個月，4月上海會議時，毛澤東曾提倡海瑞精神，鼓勵大家講話；說不敢提不同意見，無非是怕撤職，怕開除黨籍，怕離婚，怕坐牢，怕殺頭，等等。在小組會上，張聞天也曾談過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問題。《發言》中這一段話，今天讀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發言》還特別欣賞《紀要》草稿中這一段話：「必須在全黨幹部中間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對於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參差不齊，只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麼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採取粗暴武斷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發言》說：「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光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

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幹部有利，對工作有利。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甚麼這樣呢？為甚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裏，怕甚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這段話講得多麼好啊！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每一個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要永遠記住這段話的精神。當年張聞天赤膽忠心、不顧個人安危的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發言》的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針對有些人對信中某些措詞的挑剔，《發言》為之辯解。特別是關於最敏感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法，為最受攻擊之處，就是贊成彭德懷的信的精神的人，也都不敢表示同意這個說法。惟有張聞天一個人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颺『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7月23日之後，硝煙滾滾，風雲突變。在7月24日的小組會上，張聞天還是坦然的，發言仍舊從容不迫，講出心裏的話：「我沒有經驗，是從旁看的，與整個群眾聯繫不夠。同時，覺得你們不大願意聽，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經常講出來，經過爭論，認識一致了，問題就解決了。這樣的會開得很有味道。現在顧慮的人還是不少的。彭總寫了一封信，引起大家

爭論，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亂扣帽子，不怕爭論，有話就講，大家認識一致了，沒有負擔了，這就是心情舒暢。有甚麼講甚麼，就沒有甚麼緊張了。我有時也想，不關我的事，我講不講，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講了以後還有些後悔，我何必講呢！緊張狀態的確是存在的，養成民主作風很重要。這裏都是負責同志，下面更嚴重些。」

就在他的《發言》被當做靶子印發的當天，我們還有過一次偶然的接觸，他問我發言稿看了沒有？我說看了，那些缺點都是存在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便於再談甚麼了。

7月23日之後的一兩天，張聞天同彭德懷碰面時，他們還相互談到：講缺點竟如此危險。我們總結經驗，人家扣帽子。在後來的「檢討」中，張聞天交代，他與彭議論的要害，是關於領導作風問題，如何避免一言堂問題。如果只好聽好消息，就必然助長下面報喜不報憂，因而容易受蒙蔽，容易頭腦發熱，也容易驕傲。他們還從南寧會議後個人威信的發展，談到樹立集體威信的重要，以及應防止損害集體領導原則的事情發生。

批鬥升級之後，「不僅對事，還要對人」。8月2日，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印發了。張聞天希望不扣帽子，不亂扣帽子，然而，千鈞重帽扣下了：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發言》被指責為：「安的是甚麼主意？那樣四方八面，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張聞天被認為「舊病復發」，遭到尖刻的諷刺與奚落。枚乘的《七發》隨之印發，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這種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這類毛病，是有歷史和社會原因的，「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治療之法，「批判從嚴」；「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的極端重要性」。

8月上旬，原來六個小組併成三個大組，分頭批判彭、黃、張、周等人。這些「批判從嚴」之處，就不必多說了。

在後來的「檢討」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張聞天總結了以下六條，為「兩條路線——總路線和反總路線的鬥爭」，他說自己從這六個方面反了「總路線」：

(1) 強調發展生產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這是「三分政治，七分經濟」，而政治也只是為了經濟。

(2) 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進行「和平競賽」。

(3) 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產積極性。

(4) 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產計劃都應服從於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於生產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指標等等。

(5) 在生產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產階級管理生產的經驗學習，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

(6) 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產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總結以上所說，張聞天「檢討」說：「這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是要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改為引導到穩步可靠的路線上來。結果是不要搞群眾運動，取消大躍進。」

當年張聞天寫這些「檢討」時，相信他心中是坦然的，當然也是痛苦的，因為硬要在紙上把自信是正確的東西寫成是錯誤的東西。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謬誤終歸謬誤，真理終歸真理。不是嗎，我們的國家現在不是遠比張聞天26年前的設想更健康地在生活和發展嗎！

從上面詳細介紹的張聞天的《發言》和「檢討」來看，當然《七發》等是無的放矢，恰恰相反，楚太子早已「霍然病已」。張聞天如不是早在遵義會議開始、特別是延安整風期間就將「舊病」治癒，他怎麼可能在廬山作這樣一篇精闢的切中時弊的發言呢。我聽見楊尚昆談過，在江西的後期，張聞天同博古、李德就有爭論的，就已經將他擠到政府部門，離開了中央的核心。現在從公佈的文獻上已得到證實。這也說明，他在遵義會議上的轉變，不單是毛澤東爭取的結果，而是早有自己的覺悟做基礎的。遵義會議之後，他對毛澤東是信服的；在後來歷次重大政治關節時，他同毛主席都是一致的。據說，曾因此遭受過譏諷。當時，張聞天還處在中央負總責的位置，他這樣義正辭嚴地回答：「真理在誰手上，就跟誰走。」據不少同志回憶，毛澤東當時曾對張聞天作過這樣稱譽的戲言：「你是一個開明之君。」但他決不是只求形式地「緊跟」，更不是一味盲從的人。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時，接受毛澤東的教導，他深感有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對中國社會作周密調查的必要，主動要求到基層去。1942年1月，他率領調查團到陝北的神木、府谷、米脂、綏德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對農村、城鎮的生產和社會關係進行全面調查，長達402天。他親自主持調查會，長時間地訪問農民、基層幹部和各階層人物；查閱、收集大量有關經濟和社會的文字材料，家譜、碑記都不放過；親自或指導其他同志共寫出19篇調查報告。這說明張聞天一旦大徹大悟過來，何等誠懇地向群眾學習，並且在以後

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堅持求真知的科學態度。後來他在延安主持編輯的《參考資料》，對國民黨統治區和國際形勢作具體分析，文章質量是很高的，許多論文是他親自撰寫的。（至今我還保存着這些馬蘭草紙印刷的珍本。）東北地區土改運動中，同其他解放區一樣，一度發生過「左」的偏向。1948年3月，東北局為此召開過一個月的總結會議，自始至終我都參加了。張聞天主持的合江地區的土改，基本上沒有受這股「左傾」思潮的影響；關於團結中農，區別地、富，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等，他都為省委寫了文件，作了一系列合乎實際的規定，防止了可能發生的偏向。所以，張聞天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所犯過的「左」的錯誤，早以自己的言行證明徹底清除了。他不僅沒有再「舊病復發」，而且在黨犯新的「左傾」錯誤時，能夠堅決頂住，明確地、全面地從實際到理論，指出這種錯誤，分析其原因，提出克服的辦法。可是，歷史多麼不幸，這頂沉重的「舊病復發」的帽子，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戴在頭上。然而他並沒有就此中斷對真理的探索，在廬山蒙冤之後直到十年動亂期間，他還撰寫了幾十萬字的筆記和文稿。從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始終堅持真理，不畏橫逆，挺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而且從理論上總結了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經驗，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有過許多真知灼見，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何其相似。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啊！這種精神，多麼催人奮進，永放光輝。

戊戌政變的第二年，1899年，被「放歸」的黃遵憲，寫過一首發感慨的詩：「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驅的自信心。黃遵憲深信，他所贊同的那些維新變法的主張，雖然一時在高壓之下受到了摧殘，但是時間終究會證明它是正確的，二十年之後一定會

證明它是正確的。黃遵憲的期望沒有落空。二十年後是1919年，這一年發生了五四運動，提出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已經大大超越了戊戌時代那些維新志士的要求了。

張聞天在廬山的《發言》，當時我是從心底裏贊同的，覺得他比彭德懷的信講得更清楚，而且作了理論的闡述。在當時的氣氛下作這樣一篇發言，不僅要有至大至剛的正氣，而且要有理論上的自信。他當然是深信自己意見的正確性的。張聞天在一生的最後時刻，以衰病之身，管制之嚴，仍奮筆痛斥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謬論，寫出那些研究政治和經濟，以及黨內民主生活的戰鬥檄文，當然也必定是堅定的自信心驅使他寫的。現在，歷史的曲折終結了。張聞天的這個《發言》和《選集》中其他文章特別是晚年所寫文章的觀點，已經被普遍接受了。這也是在時間過去了二十多年之後，才被承認其正確性的。現在，兩個三中全會的文件比張聞天當年所想的更是大大前進了。我們的國家在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的指引下，可說正在經歷第二次革命，正在欣欣向榮地向國家現代化的總目標勝利前進。張聞天在天之靈當會感到欣慰。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正確意見要過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相信當不致再出現了吧。努力做到這一點，是我們後死者、後來人的崇高職責。

1985年6月

附錄 4：

實事求是，何惜烏紗

——懷念周小舟

小舟於1966年12月26日在廣州含冤辭世，至今整整十五年了。

為查勘五強溪工程，1979年初秋到長沙，我去過小舟舊居。當時一陣莫名的寂寞之感襲來：蓉園已是花千樹，不見周郎談笑聲。1949年南下湖南時，我與小舟在開封初會。大概由於是同鄉，年歲、經歷相差不遠（他比我大5歲，「一二·九」以前入黨），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一見如故。湖南有句俗話：「長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義不易說清，硬要翻譯，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恰相對立，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之後約一年半時間，正副職的工作關係，我們朝夕相處，意氣相投，凡事直來直去，建立了友誼和某種交心關係。二十年後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躍進年代的往事：獨自徘徊誰共語？到鄉翻似爛柯人。大躍進尤其廬山會議這一段史實，最能說明小舟的為人。

1959年拓溪開工，5、6月間，我從四川、貴州、廣西轉到湖南。小舟約我到家中長談。他正下鄉一個月歸來，豐富了第一手資料，在省委常委會上提出農民積極性、公社供給制、大隊核算、公共食堂、糧食與鋼鐵指標以及勞動生產率等十多個問題。關於大躍進一年來的看法，我們毫無忌諱，交換見聞，觀點一致。雖是憂心忡忡，仍然談笑風生。小舟是一個平易而謙虛的

人，並不固執己見，尤不願談自己。從追悼會的悼文中，才知道1956年毛澤東到湖南，見到大好形勢，曾誇獎過他：「你已經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載幾千萬人的大船了。」這夜的長談，他卻禁不住談到他的「先見之明」。他說，湖南去年老挨批評，被插過白旗；可是結果插紅旗的省糧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之後，對糧食估產，他跟左鄰右舍有過爭論：要麼你是官僚主義，要麼我是官僚主義。因為湖南估得低，鄰省估得高。還有密植問題，有的省過密，湖南較稀。從農民的一句老實話，「做了一天活，身上沒出汗」，提出農民積極性問題。他不贊成辦常年食堂，辦食堂浪費物力人力。說公社供給制，窮的時候不能搞，富的時候也不能搞。還談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飯，糧食也只增產14%。他的總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靜下來，總結經驗教訓。

因此，7月初開始的廬山會議前期，我與小舟來往較多。毛澤東在會前視察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對湖南的工作頗加稱讚。小舟帶上山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為會議的方針。當時劉少奇也反覆講：成績講夠，缺點講透。到7月22日為止，會議還稱為「神仙會」：交流情況，各抒己見。周總理三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談形勢，算細賬，強調陳雲的三個平衡。大家座談之餘，遊山賦詩，心情愉快。毛澤東的兩首詩——《到韶山上》、《登廬山》，正由小舟傳播開來。這兩首詩是毛寫給小舟、喬木二人，附信徵求意見的。小舟在抗戰前後，當過毛澤東的秘書，也愛好詩詞。（「小舟」之名，即由毛澤東叫他「小周」而來）我們同在中南組，開會後不幾天，他就興致勃勃地將兩首詩寫在我的筆記本上，並將原信給我看。詩中詞句，同後來發表的微有出入。《登廬山》還有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廬山，望鄱陽湖、揚子江。千巒競

秀，萬壑爭流，紅日方升，成詩八句。」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的鬆快心情。我的本子上還有董老親筆寫的一首七律，頸聯為：「盤桓最好尋花徑，佇立俄延讀御碑。」這都可說明會議前期大家的情緒。

按六個大區分的小組會，討論毛澤東提出的讀書（讀政治經濟學）、形勢、任務、體制、食堂、學會過日子、綜合平衡、產品質量等十八個問題。小組會上，可說議論紛紛，但一些比較尖銳的意見，如不贊成「以鋼為綱」、公社化過早等，還不能完全暢所欲言。有不少同志護短，轉不過彎，直至反對批評過份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筆記本上，記有他7月4日的發言：1,070萬噸不如800萬噸；公社一股風，越包越多；總產值至多每年增長10%到20%（按：其實這也很難做到）；基本建設搞得太多了，湖南省縣以上1,000個項目，只有300個經過批准。他還談到食堂反對派的6條意見：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會議原準備半個月左右結束，毛主席指定喬木、小舟、家英和我等七人起草一個《會議紀要》，論述形勢、任務、綜合平衡、經營管理、食堂等幾個主要問題，總結1958年的經驗，指出今後方向。

此時發生的影響當代歷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懷的往來以及導致彭寫那封信。1958年12月武昌會議之後，彭德懷來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到過湘潭烏石（彭總家鄉）、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為搞居民點，有的房子遷拆一空；有上千人擠在一丘20畝的田裏搞深翻；聽縣委書記彙報糧食的困難情況；還看了一些土高爐。後來彭又去平江。小舟介紹，這是個「颳共產風」較嚴重的地方，幹部的強迫命令也厲害。他們之間談得比較深。上山之後，小舟又找彭談過兩次話。彭表示，有些意見，希望同主席敞開談談，但由於自己個性，怕談不好。小舟就根據眼

前經驗：「我們同主席談話很隨便呀。」慫恿彭去談。原來7月11日夜，毛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去漫談過一次（以後還談過幾次），談得很是融洽。毛主席認為1958年的問題主要出在綜合平衡上，說他自己有時也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還風趣地說，否則，人們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小舟乘機而言：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夜談話情況，小舟給彭講了。彭德懷於是決定給主席寫一封信，反映自己的主要看法。小舟還建議彭根據在西北小組的幾次發言，予以整理，系統寫出，這就是後來批判彭德懷時，追究小舟為「宣傳員」、「提供材料」和「當了參謀」的由來。

彭德懷的信是7月16日印發給大家的。小組會議從此起了一些變化，多圍繞這封信和《會議紀要》繼續討論形勢。有些對情況了解不深、不全，特別是護短的同志，不很贊成彭的意見，且多從一些措詞上加以指責。康生和柯慶施等人，更是興風作浪。7月19日，小舟在小組會上完全同意彭德懷的信，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可以斟酌。他特別談到得失問題：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都是有的，要加區別。比如湖南搞了5萬個土爐，有2萬個根本沒有點過火；有些地方晚稻並秧，大大減產，這就只有失而無所得。缺點少講，或講而不透，是難以正確總結經驗教訓的。正確地檢查缺點，不僅不會洩勁，反而能夠更鼓舞正確的幹勁。他以為各人由於工作方面不同，接觸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把問題提出來，經過分析，就可以達到一致。

大家知道，7月23日毛澤東作了反右的講話之後，會議急轉直下。小舟是第四個受到千鈞壓力的人，他雖然不得不作些過頭的戴帽檢討，但沒有生造或誇張一星半點事實；相反，他還為彭德懷辯護。8月3日小組發言中，小舟舉出彭跟他談的兩件事，

以說明彭德懷自己承認「對主席的正確、偉大是逐步認識的」。一是井岡山會師，毛澤東不准井岡山的人議論湘南失敗，以利團結。彭德懷說，可見毛主席的偉大深遠精神。二是抗戰初期運動戰與游擊戰之爭，彭說，很久之後才認識自己的錯誤和毛主席的正確。這就證明彭德懷從心底敬佩毛主席。

這個時刻，我與小舟還碰過面，他非常感慨，說準備撤職，摘下烏紗帽，但希望有機會去辦好一個農場。小舟是一個對革命對自己極端負責的人，也是一個重感情的人。由於主客觀之勢太不相容，許多事他想不通，非常傷心，非常痛苦。8月13日寫給主席的信中有這樣的話：「解剖我們自己，披肝瀝膽，又感覺與實際情況確有出人。我想假若戴上（右傾機會主義）這樣一頂帽子，我對主席、中央、全黨、湖南黨員和人民，甚至對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須說我犯了反黨、反中央、反主席……的錯誤，然而再說下去，勢必淚潛潛下，不盡欲言。」

去年到廣州，見到小舟的夫人王寧同志，探問小舟辭世前的情況。我們黨幾十年歷次政治運動，大風大浪之中，有許多同志能夠立如砥柱，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事實。小舟正是這樣堅持並以身殉的人。也許他一時有絕望之感，人誰不有一時的迷誤呢？這只是說明他的極度認真，執着於自己的信念，而決不是脆弱。要知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

黨已給廬山會議作了正確的結論。與此有關的受過委屈還活着的同志，如今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德懷、張聞天等一樣）卻以54歲的盛年抱恨以終。小舟當年企盼的黨的集體領導、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來。每逢佳節倍思親；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地皆春色，只是詞場少一人。小舟是愛舊詩詞的。上廬山第四天，我的登舍鄙口句：「高處為雲低處霧，笑談不覺失群山。」頗為小舟稱賞。故人談

笑仍如在，使我傷懷奏短歌。小舟同志，願將下面這首七律遙祭
你在天之靈：

周郎意氣永興歎，拋卻瀟湘第一官。
舉世沉冤皆大白，當年遺願可長安。
桃符舊歲翻新歲，流水前灘讓後灘。
知己平生能得幾？心香燃盡淚闌干。

1981年11月

（原載1981年《人民日報》）

附錄 5：

請吳冷西給一個「說法」

最近一位朋友特地送來新出版的《回憶胡喬木》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說其中吳冷西的文章《憶喬木同志》，談到廬山會議時，比在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多了一大段話，不點名地指責我和我寫的《廬山會議實錄》。我讀後認為，這決非記憶有誤，而是無中生有，歪曲事實，說得嚴重一點，是蓄意誹謗。因此有公開澄清答辯的必要。

現在先看這一段話：

當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局勢無法改變之後，他仍然想幫助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志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二十多年之後，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身恨事」，似乎是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後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喬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尚昆同志要我們在大會上同此人對質，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志都目睹當時會場

上對質的情景。中央為此調查了兩個多月，直到10月初，毛主席找喬木、家英和我談話時才算結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來越少，我責無旁貸，要為喬木、家英兩位亡友公開澄清歷史事實。

有關的歷史事實其真相究竟如何？

關於喬木建議我向毛主席寫封信，事情的原委我的《實錄》書中寫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於7月23日作了批彭講話之後，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住處，三人思想都不通，隨後及到黃克誠住處，繼續發牢騷。周小舟講了「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我也講了「他不能一手遮天」的話。後來，我們三人到黃克誠處去了解這件事，被傳播開來，傳到主席耳中。「湖南集團」的指責即由此而來。田家英轉告胡喬木的一個主意，讓我給主席寫一信，以釋主席關於「右傾活動」的猜疑（見《實錄》初版208頁），「7月30日晚上，反覆考慮之後，接受喬木的意見，向主席寫了下面這封信。當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問題，我隱瞞了，而且用『政治生命』這樣的重話作保證，想取得主席的相信。現在回憶，仍覺得是終生恨事。」（初版212頁）

「斯大林晚年」問題，是8月10日才在兩個大組的會議上被揭發出來的。我寫那封信時，還是抱着「僥幸過關」的心情。因此，「在秦城獄中，回憶廬山舊事，常常懷着自責的心情，7月23夜的事，更追悔無已」。（初版179頁）

任何一個讀過我這本書的人，都會理解，所謂「終生恨事」這四個字，完全是表述一種自責與內疚的心情，即聽了主席的批彭講話後，不應當跑到周小舟處再發牢騷，從而惹出後來那麼複雜而嚴重的局面來。這怎麼扯得上「似乎是胡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呢？

吳文無中生有的要害，還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廬山會議時，究竟是我「保護」（在書中我從沒有用過這兩個字）過胡喬木、田家英（還有吳冷西），還是揭發過他們的「罪狀」？

廬山會議時，我只在7月30日向毛主席寫過一封信（要常委中傳看，沒有印發），8月11日寫過一份「檢討書」，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除此以外，沒有寫過片言隻字。這有會議的全部文件作證。

大概是7月25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我在火車上的發言說過：1958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我這是轉述胡喬木的一種比喻，我的發言和我當時的思想，也決不是這個意思。這時我就一口咬定，這是我自己打過的一種比喻。（從而撇開了胡喬木，在延安的經驗，有事自己承當，不牽連別人。）我說車不按軌道走要出軌的，只是講綜合平衡中出了問題」。（初版193頁）這是批彭開始時的情況。在整個批鬥階段，我始終只將「坦白交代」限制在同周小舟、周惠兩個人的交往中，而決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因為二周同我的關係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8月10日「斯大林晚年」問題被捅出來之後，「我最擔心的是同田家英（也還有胡喬木）的來往，再這樣被迫逼下去就複雜而麻煩了。……可是關於我同田、胡間也有活動，第二組的《簡報》上已有反映，於是我就先單獨同薄（薄一波）談出我的想法：『禍』是我闖的，一切由我承當，我作交代，作檢討，但人事關係只能到周、周、黃為止，這已是眾所周知的，無可隱諱，決不能再扯寬了。薄很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發制人』。我隨即寫篇自我揭發的檢討。11日上午我交出檢討，檢討由薄看過」。（初版322頁）「不料我的這點『苦心』，使得小舟極其不滿，因為我曾同他談過一些田、胡同我談過的東西，他認為我『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結果他8月13日向毛主席寫的信中交

代材料，如前所述，被毛主席批示：『全篇挑撥離間，主要是要把幾個秀才劃進他們的圈子裏去，並且挑撥中央內部。』」（初版323頁）小舟這封信的內容，我在書中沒有摘錄。廬山會議時尤其後期，印出的《簡報》和「傳閱」文件是很多的，但是，《毛澤東同志對「周小舟同志的信」的批語》（附周小舟同志的信）這份文件（1959年8月14日八屆八中全會文件67），在會議將結束時並沒有發給我，因此當時我並不知道小舟在這封長信中，除開交代了他同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的來往交談之外，還專門寫了同李銳的有關交談，信中說：「但是他隱瞞了他談到的許多問題」，將我轉告他的胡喬木、田家英等同我談過的一些話都一條條寫上去了。接着寫道：「這些自由主義的亂談，是否事實，我完全不清楚。談後他說當做（紙）燒掉。他的用意是喬木、伯達、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連累他們，並且又把事情弄得愈來愈複雜。他的交代不談這些，我認為這一點用心是善良的。請您考慮，可否把這段情況只在中央少數同志之間查明，不要傳播開去，因為我確實認為喬木、家英、伯達諸同志都是善良的（雖然也有自由主義的錯誤），把他們扯進去對黨沒有好處。」小舟當時受到的壓力很大，他原想讓毛主席一人了解這些複雜情況，萬萬沒有料到，毛主席立即把他這封信印發出來，並寫上了那樣嚴厲的批語。由於我沒有看到這份67號文件，因此才發生8月15日（或14日）的大會上，我在書中寫到的這一情節：「我的回憶中，周小舟由於思想不通，沒有讓他在大會上作檢討，但在大會上逼他作交代。他又談到他8月13日向毛主席信中寫過的，關於我同田家英等來往之事。特別是提到田離開中南海時準備向主席的三條進言（按：即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作秘密報告，聽不得批評，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全場震動。於是劉少奇問我，是怎麼回事。在11日交出的檢討中，我完全撇開了同田

家英等的往來，這個決心是不可動搖的。於是我站起來，大聲而從容地說道：這三條意見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無關，大概是小舟聽誤會了，這完全由我負責。劉少奇馬上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會的人，他的問題不在這裏談，另外解決。於是，這個險情總算避開了。」（初版343頁）這天以後，8月16日的大會就不讓我參加了。廬山會議後期的八中全會，開過多次全體人員的大會，參加這次會的許多人（包括吳文提到的三位國家老領導人）還健在，除了這一次劉少奇主持的大會上，或可說李銳曾同周小舟「對質」外，誰還參加過彭真、薄一波、楊尚昆要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同此人（李銳）對質」的會呢？吳文肯定「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志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請問，哪一天開過這樣的大會？《簡報》的哪一期刊載過這一情景？

老熟人吳冷西究竟為甚麼要對我這樣無端指責？此時此舉，所為何來？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關於李銳的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應當不知道，因為這就寫在《廬山會議實錄》的開篇——「上廬山開會（我的記錄本）」。1967年8月間，當時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電站。「北京專案組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總理。當時我雖已50歲，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卻依然少年氣盛。我說，毛主席周圍的人最危險的，不是他們三個人，而是陳伯達。『我最不放心的是陳伯達』。於是我舉出事例，以為證明。」（初版15頁）陳伯達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可謂紅得發紫。當時說這樣的話，自知是要擔風險的。可是，李銳就是這樣一個人，為維護自己的信念，為堅持真理，是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外的。果然，1967年11月11日，一架專機，將我從安徽送到北京，關入秦城監獄。在獄中八年，為任何熟人寫「證明材料」，都是

如實落筆或着意保護，從未有過甚麼檢舉揭發之事，包括對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為少矣；總認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從不計較，一笑置之。但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計較不可，因為這太出乎意外，太違反常情；因為這發生在「文革」噩夢已逝去18年之後，廬山會議已平反16年之後。還因為這是出自延安時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紙黑字，印在書本上的東西。看來，作者至少是想讓世人相信：李銳此人，並不老實，大家要小心此人的「著書立說」啊！《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其實是胡喬木建議我寫的，書出版後並表示他對此書完全負責。這些過程，在1989年此書初版和1994年6月增訂再版中，我都有說明。喬木生前一再肯定這本書，不僅當面同我談過，也同別人（我同吳共同的老熟人）談過。吳冷西不是在喬木生前提出對我的責難，而要在喬木去世後，再來為「兩位亡友公開澄清歷史事實」，這豈不令人費解？我希望老熟人吳冷西給我一個「說法」，也給歷史一個「說法」。

1994年10月28日

原載《讀書》1995年第1期

增訂版後記

本書初版於1988年底，有一個「出版說明」如下：

1959年7、8月間舉行的廬山會議，是中共黨史極為重要的一頁。本書作者李銳同志曾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過程，會議後期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而受到批判。1980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看到作者有關廬山會議的長篇發言後，當時，主持《決議》起草的中央領導同志即建議作者寫出這一段歷史（在11月19日的信中說）：「你是否可以負責寫一廬山會議始末史料，寫出後再找有關同志補充審定。這事很要緊，值得付出心血。萬一我輩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禍福），這一段重要史料誰來寫呢？會寫成甚麼樣子呢？」根據自己的記錄本和有關原始資料，作者終於在今年夏天寫成此書。鑒於有關廬山會議的情況，現已有數種書刊廣泛流傳，其中史事，或嫌簡略，或有失真。特將此書少量刊印，內部發行，供黨史研究和有關同志參考。其中不當之處，請閱者批評指正，以便作者修改，今後再出定本。

當時是內部控制發行。當今之世，越是內部發行，越是容易在社會上傳開。幾年來，此書我自己送人近200本，至今還有

人索取；無論老中青哪一代人，大都願意看這本書，我也樂意送人。現在到處弄不到這本書了。既已開過支票，自己也覺得不如再出一個完備些的定本。

1980年11月，胡喬木寫信催我盡快成書時，曾指定黨史研究部門的同志，從資料方面給我以幫助。這次增補修訂，仍舊是他們給了我很多幫助。還有有心的同志幫我摘抄材料，細心安排如何補充。

這次比較多的補充修訂是兩個部份：一是毛澤東的幾次講話包括7月23日的講話，初版主要是根據自己的記錄，這次找到更詳盡的記錄作參考。二是進入揭批「軍事俱樂部」和揭發「斯大林晚年」問題之後，各小組一些較重要的發言。其他就零星一些。總之，力求是一個比較完備的《實錄》。總計增加了近六萬字。原來從「引論」到「結束語」共二十五節，現在是二十八節。此外，還附上我近年來紀念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文章，約四萬字。

這本書的發起人胡喬木已經作古了。他收到我的贈書後，一次見面時對我說：這是我建議寫的，我對此完全負責；還表示再版應公開發行。可惜他見不到這個新的版本了。

我要向支持此書的好友和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沒有這種鼓勵，我也難以75歲的帶病之身，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完成再版的勞作。

李 銳

1992年8月於北京醫院

1993年10月最後修訂

增訂三版後記

《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於1994年公開出版發行後，出版社告知，已發現的盜印版有五種，共加印八次，期間早已脫售。這次增訂，比較多的是四個部份：一是「對事，也要對人」這章，增補周恩來7月26日長篇講話，7月23日毛澤東已作批彭德懷的講話之後，總理仍召開國務院各部長回憶，醞釀計劃指標的調整。二是新增「大會批判」一章，即8月11日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之後，13、14、15三天連開大會，全體中央委員參加，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三是毛澤東8月16日講話與五個文件。四是新增「8月17日的工作會議」一章。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人事調整及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繼續批判的情況。此外，其他個別章節也小有增訂。總計共增補約四萬五千字。

本書1988年初版，十年過去了，共補充修訂三次，力求使這次會議的全部情況得到更完整的反映。

李 銳

1998年11月30日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廬山會議實錄
- 編著** 李銳
-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 日期** 2009年5月 / 最新增訂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09

ISBN 978-962-257-661-2

